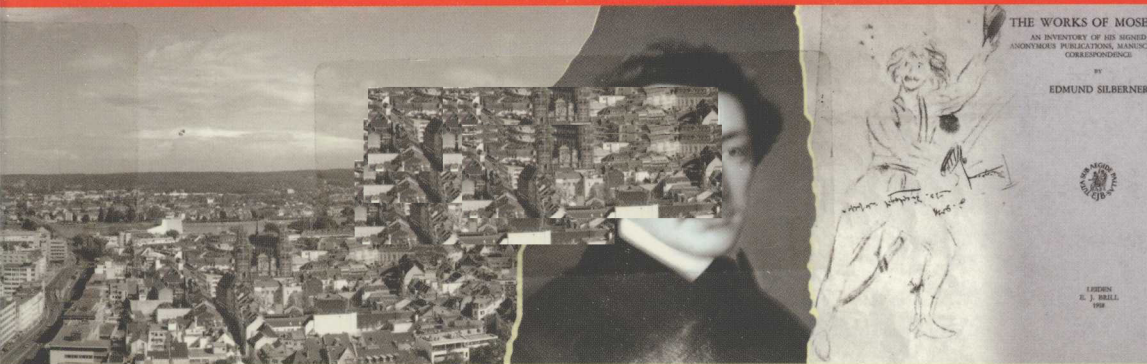


主 编/张一兵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 第4辑

- 赫斯：一个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思想先行者和同路人 张一兵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德]莫泽斯·赫斯
早期马克思像的批判的重构 [日]广松涉
赫斯是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坐标轴吗？——评广松涉的早期马克思像 [日]良知力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及编纂出版过程中的若干插曲 [韩]郑文吉
马克思恩格斯藏书中读书批注的意义及其出版问题 [韩]郑文吉
雷蒙·威廉斯与新左派政治学 [英]布莱克本
爱德华·P.汤普森的伦理激进主义及其遗产 [英]迈克尔·肯尼

Register of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

第4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主办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Register of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 第4辑/张一兵主编.--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9
ISBN 978-7-214-06486-8

I. ①社… II. ①张… III. ①社会批判论—丛刊
IV. ①C9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8654 号

书 名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4辑)
主 编 张一兵
责任编辑 王 溪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mm×1304 mm 1/32
印 张 13.875 插页 2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486-8
定 价 33.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卷首语

“回到马克思”，是上个世纪 90 年以来一个响彻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战斗口号！十多年来，我们的理论前辈们正是在这一时代先声的引领之下，潜心研究，辛勤耕耘，逐步打破了长期以来由于教条主义的禁锢而形成的“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藩篱，一个活生生的马克思的形象才渐渐地第一次在中国人民面前站立起来，正是在对曾经被供奉在无可置疑的神坛上的“马克思”的“趋魅”的过程中，马克思哲学才得以真实的绽现出“历史原像”！——正如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所言，这是“对马克思基本理论地平的重新廓清”，而且“是一个相当巨大的理论工程”。历史总是在曲折回环中向上递升，理论的发展亦是如此。时至今日，站在开一代风气之先的理论前辈们坚实而宽阔的臂膀之上，我们不再把马克思的思想作简单的同质化、平面化的处理，而是始终坚持历史性的科学原则，在马克思思想进程具体的历史的语境中去捕捉伟大的思想家“何以可能”的深层逻辑进展，在“总体性”的理论视域中去探寻多重思想“质料”如何激荡、扬弃并最终融汇于创立和深化新世界观的过程之中。这无疑是历史唯物主义地对待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的必然要求，唯有这样的理论自觉才能深刻地“神会”马克思；也只有廓清马克思基本理论地平的基础上，才能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科学的“现代转换”，才能更好地立足现实与历史，放眼国际和未来、采“他山之石”以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之玉。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自觉下，理论界对马克思的思想进程进行了逐步深入和更加广泛的研究，特别是开始对其早期的人学现象学视域中的人

本主义哲学进行细致梳理和科学界定。然而,对于莫泽斯·赫斯,这样一位在马恩早期著作中经常出现的、对青年马克思具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在过去的研究中却被忽视了——这无疑是理论上的一桩憾事。这固然存在着赫斯的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严重滞后的客观原因,然而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之后的经典作家们对此不同程度的理论漠视或者误释,从而造成了赫斯的影响被有意无意遮蔽。有鉴于此,本辑专题收录、补译了他的一些和马克思思想发展有关的早期文献,以期引起学界对青年赫斯思想的关注和进一步研究。这五篇译文分别侧重于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等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赫斯的哲学共产主义思想。比如《论货币的本质》(1841)一文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出发来论证共产主义,作者通过经济学批判指明了现实社会活中的经济异化现象,提出了金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重要思想。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843)则代表作者试图以德国哲学为基础去批判、整合英法社会主义的努力,作者认为德国以绝对的精神自由的学说和法国以绝对的社会平等的学说,都源自于绝对统一的近代原理,因此只有把自由和平等统一起来,才能使真理即社会主义在生活中现实化。相较于国内学界对这方面关注甚少和研究滞后,国外的一些学者已经在赫斯与马克思思想关系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对此我们还专题组织编译了两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以期对国内研究有所启迪和借鉴。日本著名哲学家广松涉的文章从马克思综合、扬弃黑格尔左派的三大潮流从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视角指认了赫斯对马克思的“压倒性”影响。然而,日本同期的另一位著名学者良知力则通过梳理赫斯早期思想发展的线索,认为尽管赫斯的影响不可欠缺的,但不是对早期马克思作纵向的再构成之际的坐标轴,广松夸大了赫斯对同时期的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西方“马克思学”是国内学界近年来兴起的一个研究热点,然而对于韩国的“马克思学”研究现状国内学界却知之甚少。事实上,韩国学界在该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是非常之大的,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东亚最优秀的,其中杰出的代表就是高丽大学的郑文吉教授。郑文吉教授是韩国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学”者和文献学家,长期致力于 MEGA 与《德意志意识形态》

手稿研究,多次到德国、英国、美国从事学术交流和访问活动,影响力颇大。2008年10月郑文吉教授应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张一兵教授邀请,对南京大学进行长达为期一周的学术访问。缘此,本辑特刊“郑文吉教授的‘马克思学’研究专辑”,收录了两篇郑文吉教授在MEGA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研究的代表论文和一篇介绍韩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与现状的论文,并希冀以此为契机增进国内学界对韩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关注和进一步交流。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的新的历史条件和全球化资本主义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格局,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深化基础理论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理论借鉴成为时代赋予理论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在这一基础理论探索进程中,以张一兵教授为带头人的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择取“资本主义理解史”这一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认识和批判的思想史全程作为研究对象,认真梳理了160年来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左派对于资本主义认识和探索的历史变迁(作为研究的最终成果《资本主义理解史》前六卷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正式出版)。目前看来,这一工作在国内外学术史上尚属第一次!缘此,本辑推出“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当代重建”专题,选编了由各子课题负责人撰写的前五卷各卷的导言,分别简要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第二国际、苏联时期、当代经济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时代或视域中的资本主义认识的发展史,借以希望引起学界同行对这一重大理论成果的关注并推进国内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同时,近年来随着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各个流派著作的大量译介,如消费社会批判、空间生产理论、后马克思主义等,在国内学界引发诸多争论,使得生产方式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缘此,本辑还推出“生产与再生产理论研究”专题,收录了两位青年学者的从当代视野出发来审视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研究论文,以期引起学界同行对生产方式分析范式这一基础理论的关注。

另外,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兴起是近几年来国内学界的一个重大的理论拓荒事件。长期以来,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欧陆

马克思主义和左派理论,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源地——的发展态势却不甚了解。事实上,二战之后,英国开始确立了具有鲜明英格兰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这无疑得益于以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左派运动的历史贡献。为了增进学界同行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和了解,本辑组织了两个专题来介绍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和战后发展史。第一个专题编译了三位英国当代学者对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思想家的追忆文章,力图使读者能够回到战后文化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语境中去。如,当代“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斯图尔特·霍尔分析了理查德·霍加特的经典著作《识字的用途》对早期文化研究特别是作者称之为“文化转向”过程中的重要影响。迈克尔·肯尼则从爱德华·P. 汤普森的成长经历和思想背景的角度指认汤普森思想的本质是一种伦理激进主义。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状况,我们还收录了张亮教授论英国马克思主义战后发展的一篇长文,该文细致梳理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在战后从文化马克思主义经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目前多元分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历史性生成过程,再现了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辉煌历史。

在当今欧洲左翼知识界,活跃着炙手可热的四大明星,即巴迪欧、阿甘本、齐泽克和拉克劳,他们共同构成了当今左翼思想界的脊梁。本刊第3辑曾详细介绍了齐泽克“怪诞”的思想,拉克劳也同莫菲一道作为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为国内学界广泛关注和研究,然而对于同样著名的巴迪欧和阿甘本,学界同行却关注甚少;有鉴于此,本刊将在第5辑隆重推出“阿兰·巴迪欧专辑”,希望通过该专辑让这个在世界思想界有着广泛影响力的思想家能够在中国点燃新的思想火花,我们也希望能够搭建这样一个理论平台,让更多的学界同仁来关注和研究他的思想发展及其影响。

2009年5月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编辑部

目 录

莫泽斯·赫斯的早期思想/1

赫斯：一个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思想先行者和同路人/2 张一兵

德国哲学的现代危机/24 [德]莫泽斯·赫斯

共产主义原则的统治形式/28 [德]莫泽斯·赫斯

论货币的本质/30 [德]莫泽斯·赫斯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60 [德]莫泽斯·赫斯

共产主义信条问答/79 [德]莫泽斯·赫斯

赫斯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研究/91

早期马克思像的批判的重构/92 [日]广松涉

赫斯是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坐标轴吗？——评广松涉的早期

马克思像/128 [日]良知力

郑文吉教授的“马克思学”研究专辑/145

写在前面的话/146 张一兵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及编纂出版过程中的若干插曲/152 [韩]郑文吉

马克思恩格斯藏书中读书批注的意义及其出版问题/168 [韩]郑文吉

韩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以著作的翻译和研究现状为中心/185

[韩]郑文吉

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当代重建/209

应当重视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的研究/210 张一兵

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演变/232 姚顺良

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模式及其当代反思/242 刘怀玉

经济哲学视域中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259 唐正东

- 西方左派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266 胡大平
- 生产与再生产理论研究/297
- 历史与文本中的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298 周嘉昕
-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316 孙乐强
- 追忆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思想家/337
-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及文化转向/338 [英]斯图尔特·霍尔
- 雷蒙·威廉斯与新左派政治学/353 [英]布莱克本
- 爱德华·P. 汤普森的伦理激进主义及其遗产/367 [英]迈克尔·肯尼
- 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381
- 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战后发展/382 张亮
- 英文目录/425
- 中文摘要/427
- 稿约/435
- 第5辑专题预告/436

莫泽斯·赫斯的早期思想

赫斯：一个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思想先行者和同路人

张一兵

赫斯(Moses Hess, 1812—1875), 19 世纪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和早期共产主义者。1812 年 1 月 21 日, 赫斯生于德国西部莱茵河畔城市波恩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其祖父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 赫斯幼年受到了祖父那种严格的犹太式教育。其父是一个精糖商人, 所以, 与青年恩格斯的遭遇相近, 可怜的赫斯 14 岁起就在科伦经商, 这也让他很早就直接目睹资本主义商业市场和金钱世界的黑暗。

与青年马克思恩格斯一样, 出身布尔乔亚家庭的赫斯没有站在自己出身的剥削阶级立场, 反倒心怀正义和平等同情这个布尔乔亚王国中的弱者——劳动者。在开始的时候, 他曾经立志从事犹太人的救济事业, 所以他没有继承父亲的家业, 反倒是前往英国、荷兰、法国等地作流浪式的旅行, 特别是在法国接触到圣西门、傅立叶和巴贝夫等人的法国社会主义思想, 这使得他少年时期业已接受的弥赛亚思想向着人类的解放、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为了解开自己心中的困惑, 赫斯开始业余自修哲学。读书以后, 他最先崇拜的是斯宾诺莎和费希特, 特别是前者思想中的那种强烈的现实伦理关怀。1837 年, 赫斯发表了带有一定社会主义色彩的先驱

性文献《人类的圣史》，该书的思想集中体现了斯宾诺莎的道德哲学。1841年，赫斯在切什考夫斯基^①的“行动哲学”的影响下，写成《欧洲三头政治》，道德哲学内化为费希特式的自由行动批判，他的理论思考明显开始摆向同时代的革命实践。1841年夏，赫斯在认识马克思的同时，通过后者的引介与柏林的青年黑格尔学派取得联系，并开始在波恩旁听鲍威尔^②的讲学。这一点，与青年恩格斯的经历也非常相似。1843年，赫斯发表《行动的哲学》。时至本年末，鲍威尔式的批判意识和无神论思想已经强烈影响到赫斯。所以，赫斯加入青年黑格尔派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并逐步成为黑格尔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在现实实践中，从19世纪40年代起，先于青年马克思恩格斯，赫斯就活跃于许多共产主义团体之中，如魏特林^③的“正义者同盟”等，恩格斯评价这一阶段中的赫斯为“党的最早的共产主义者”。1841年秋，赫斯参加《莱茵报》^④的创立，至1843年3月该报禁止发行为止，他在《莱茵报》公开发表近百篇论文，其思想激进而深刻。从1842年至1843年，赫斯执笔的三篇论文发表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

① 奥古斯特·切什考夫斯基(August v. Cieszkowski 1814—1894)，波兰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主要著作有《历史学导论》(1838)。

② 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 1809—1882)，德国哲学家、神学家。1834年起在柏林大学任神学讲师。1839年，因发表反对正统派的小册子被调到波恩大学任讲师。1840—1842年间，他相继发表《约翰福音史批判》和《对观福音和约翰福音史批判》等书，以同施特劳斯争论的形式，更加尖锐地批判了宗教神学。在青年黑格尔派的运动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并成为这一派的首领。1841年8月，鲍威尔因批判宗教触犯当局而被开除出波恩大学。1843年以后，他越来越脱离实际生活，沉湎于纯粹的理论批判。1843年12月至1844年10月，他在《文学总汇报》上发表文章，公开背弃了原来所持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立场，大肆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和英雄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主要代表著作有《福音的批判及福音起源史》(1840年)、《斐洛、施特劳斯、勒男与原始基督教》(1842年)等。

③ 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 1808—1871)，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早期活动家，空想社会主义者。1808年10月5日生于普鲁士马格德堡。少年当学徒，后成为裁缝工人。1835年去巴黎，加入流亡者同盟。1836年这个组织的左派组成正义者同盟。主要著作有：《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838年)、《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

④ 《莱茵报》于1841年1月创刊，时任主编为鲁腾堡。

张》。1843年5月,赫斯与卢格^①相会,参加《德法年鉴》(1844年2月刊)的企划。同年8月,赫斯前往巴黎。据德国驻巴黎普鲁士大使称,赫斯是此时“巴黎的共产主义者领袖之一,是他们当中最有才能的人”。在这一阶段中,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话语开始不断替代原来赫斯头脑中的费希特—鲍威尔式的批判观念,并将其运用于对当下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批判。所以,1844—1845年期间,赫斯实际上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奠基人。1844年初,赫斯写完《论货币的本质》(一年半之后发表于《莱茵年鉴》)。从那时到翌年1845年,赫斯给《新秩文集》、《德国公民手册》、《前进》、《社会明镜》、《莱茵年鉴》等刊物投稿。进而在1845年上半年发表《最后的哲学家》,批判费尔巴哈、施蒂纳^②、鲍威尔的“唯心论的妄想”,从而没有读马克思而站在与马克思“相同想法”的地平(恩格斯语)。

从1845年秋天到翌年三月,在布鲁塞尔与马克思相邻而居,参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部分初稿写作。赫斯的起草工作,只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的J(V.库尔曼批判)^③。1845年11月,赫斯离开布鲁塞尔,去威斯特伐利亚地区旅行。旅行的同时,他接触了当时以比勒费尔德为中心的当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与律宁(Otto Lüning)、伦佩尔(Rudolph Rempel)、迈耶尔(Julius Meyer)等具体商议了成立社会主义者出版社的事宜。尽管有赫斯的不懈努力,《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还是于1846年11月初再次回到布鲁塞尔的马克思手中。1846年上半年马克思

① 卢格(Arnold Ruge, 1802—1880),德国哲学家,政论家。年轻时参加“自由德意志”(Burschenschaft, 创立于1815年)运动而被捕,在1830年七月革命中被释放,1832—1841年任哈雷大学的哲学讲师。在此期间创办青年黑格尔派的机关报《哈雷年鉴》(1838—1841),更名后又继续任《德国年鉴》(1841—1843)的编者,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中心人物而活跃,《德国年鉴》被查封后,1844年虽与马克思一起创办《德法年鉴》,但停留于自由主义或民主主义。

② 施蒂纳(Max Stirner 1806—1856年):德国19世纪哲学家。1806年10月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1826—1829年,在柏林和埃尔兰根等地学习哲学和神学。1835年毕业于柏林大学哲学系。毕业论文《论教育法》没有通过。1839年起在柏林一所女子中学教书。1842年曾为青年马克思编辑的《莱茵报》写稿。1856年6月在柏林逝世。其重要论著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4年);《反动的历史》(1852年)等。

③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手稿中,存在着该书是唯一一处非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部分——J(V.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这一部分手稿是由魏德迈誊写的,在末尾标有“M. Hess”。

与魏特林决裂的时候，赫斯脱离马克思，1847 年秋再次在布鲁塞尔与马克思交往，翌年年初最终与之断交。在 1848 年的革命活跃期及革命失败之后，赫斯一边在瑞士、比利时、荷兰、法国等地过着艰难的亡命生活，一边与拉萨尔联合致力于德国工人同盟的创立，始终一贯地为工人阶级实现没有阶级的社会而努力。以后曾加入在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德意志工人协会，晚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60 年，赫斯投身于意大利民族独立运动。1862 年发表《罗马与耶路撒冷》，成为 19 世纪后半期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驱。赫斯始终过着流浪和亡命的生活，直到生命结束。1875 年 4 月 6 日，赫斯卒于巴黎，享年 63 岁。

二

我已经说过，在 19 世纪 40 年代初，在青年黑格尔派的阵营中，与青年马克思并步前行的有两位重要人物，即赫斯与青年恩格斯。^①他们是在和青年马克思一同进入一般唯物主义基本构架之后，对他产生更加重要的理论影响的关键性人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 1844 年（马克思进入经济学研究之前），他们的思想比同时期的马克思深刻得多！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对青年恩格斯是重视的。可是，由于受到惯性思维的牵引，学者们总是愿意相信马克思一直深刻影响着恩格斯的一面，然而忽略了后者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特定时期中对前者产生十分关键的影响的另一面，忽略了尤其是 1843 年促使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去研究经济学重要原因。

此外，被漠视的还有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史前时期的传统研究中，与其他青年黑格尔派学者一起总是被安置于“引言”，淡化或“矮化”（广松涉语）为背景——的赫斯。与青年恩格斯相比，赫斯的历史地位，特别是他对青年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直接影响，更是有意无意地被遮蔽的了。

^① 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一章。

造成这种研究局面有两个主要原因：在理论观点上，一方面是恩格斯后来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谈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时，主要论述的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另一方面，是没有读到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论著里的列宁提出的思想史公式（参见《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是直接的导源。^①而在历史文献的出版方面，赫斯的大量史料的整理出版严重滞后，特别是在前苏东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赫斯思想的完整历史文献。^②

其实，历史的真实情况是，赫斯是与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向前行进的唯一同路人。他们之间的这种合作甚至一直延续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赫斯撰写了其中两章：第一卷中批判卢格的一章和第二卷中的批判库尔曼的一章。前一章刊于1847年8月5日和8日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62—63号上，当时题为《评格拉奇安博士论文集》。只是到了1848年2月，由于赫斯自身的内在思想逻辑中隐匿的人本学意识形态话语与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内在逻辑发生冲突，这才导致了他最终与马克思恩格斯分道扬镳。因此，只是将赫斯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另册”中显然是不恰当的。我想，确证赫斯特别是他那种基于经济学的对资产阶级社会批判的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个时期里对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产生的影响，对于我们真正理解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的哲学革

① 对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过程的理解，列宁的观点显然是“一次转变论”。他正确地看到，在青年马克思写于1841年的关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所持的还完全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是他认为，从青年马克思在1842年《莱茵报》工作时期所发表的文章中，已经可以看出他“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而到马克思与卢格所主编的《德法年鉴》时，“上述转变在这里彻底完成”。参见列宁：《卡尔·马克思》，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83页。详细讨论可见拙著《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章。

② 据广松涉的考证，赫斯的文献出版才是严重滞后的：1921年，在柏林出版了T. Zlocisti编的Moses Hess. *Sozialistische Aufsätze*（《赫斯社会主义论文集》，1841—1847），但缺漏了与马克思的关系上的几篇重要的资料。三十多年后在纽约出版了E. Silberner编的Moses Hes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赫斯评注性传记》，1958）。此后，E. Silberner u. W. Blumenberg编的《书信集》（1959）、科尔纽和W. Mönke的Moses Hess. *Sozialistische und philosophische Schriften*（《赫斯社会主义和哲学文集》，柏林：1961年），以及Mönke的*Neue Quellen zur Hess-Forschung*（《赫斯研究的新源头》，柏林：1964年）陆续出版。

命实质,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下面,我们先来解读一下赫斯。

如前所述,赫斯曾被青年恩格斯称为德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①在切什考夫斯基的《历史哲学引论》出版以后,他立刻表示赞同,而且提出要以“行动的哲学”恢复在黑格尔哲学中被泯灭的人类主体性,并将其与共产主义结合起来。在他于1837年写下的《人类的圣史》这一文本里,一方面,赫斯提出人类的圣性救赎是通过人类自身的创造性活动发生和实现的,在人类自己的历史发展中,上帝的意志才有可能对象化实现。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他试图将历史规律看做是观察世界史的根据,当然更重要的方面,是赫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初批判。麦克莱伦认为,赫斯的这本书是德国第一部共产主义的文献。^{[1](p.59)}在赫斯的笔下,资产阶级社会是一种人人为自己的利己主义“动物世界”,在这种悲惨的情境中,由于工商业的经济垄断,中间阶层必然会不断没落,两极分化中财富的集中和社会贫困的增加同步发生。同时,他深刻地指出:“从自由贸易和工业占统治地位以来,金钱是这个社会的唯一杠杆。并且贸易和工业越进步,金钱就越强大”。^{[2](p.62)}

在1841年匿名写下的《欧洲三头政治》一书中,赫斯主张人类的解放只能发生在欧洲最先进的三个国家,即德国、法国和英国。作为这种革命实践的指南,他在切什考夫斯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行动的哲学”。赫斯说明了这种行动哲学以法国人的革命实践(“搭桥”)使德国人的思辨“从天国回到人间来”的特点。而且,赫斯已经将革命的矛头指向了当时的“富者越富,而穷者耗尽自己的血汗都活不下去的”资产阶级社会。在

① 从20世纪初开始,赫斯与马克思的关系就一直为西方学界关注的热点,其基本论点是肯定赫斯前期思想对青年马克思的重要影响,甚至提出马克思恩格斯早期都是赫斯式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前苏联、东欧学者则是这一观点的否定派。国内个别学者近期也开始注意这一问题。可参考以下文献,如[德]哈马赫:《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意义》,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库》,莱比锡,1911年;[德]梅林:《马克思传》,1918年;[匈]卢卡奇:《赫斯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中的问题》,1926年;[德]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1934年;[德]济尔伯奈:《赫斯传》,莱登,1966年;[德]拉德马赫:《赫斯在他的时代》,波恩,1977年;[前苏]米特:《真正的社会主义》,莫斯科,1959年;[德]费尔德尔:《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前夕》,柏林,1960年;[日]广松涉:《早期马克思像的批判的再构成》,东京,1967年;[日]良知力:《早期马克思试论》,东京,1971年;侯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1842年谈到英国所发生的社会灾难时,他十分明确地指出:

这根本不是政治上的原因。——工业从人民手中转到资本家的机器之中;商业通常是小本经营并且是由许多小人物经营,现在逐步转到少数大企业资本家或者冒险家(所谓投机者)的手中;通过继承法聚集在少数贵族手中的日益增长的地产,以及总体来说在个别家族中繁衍滋生的大资本。^①

在赫斯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性灾难的原因。

原来,我们较为清楚的是青年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接受了一般唯物主义,可却没有注意到青年马克思乃至整个青年黑格尔派中的先锋分子都从赫斯这里接受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理论与社会主义运动的联结中,赫斯一开始就批判性地分析了巴贝夫、傅立叶、圣西门和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并于1841年下半年开始转向费尔巴哈的哲学立场。他明确提出,要将费尔巴哈哲学与蒲鲁东的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创建一种所谓的“科学共产主义”。起初,赫斯试图用费尔巴哈为社会主义提供哲学论证,后来,这种论证才逐步深入到经济学领域。可是,赫斯的这种哲学共产主义思想并不是一开始就打动了马克思,相反他对此倒深为怀疑。这种状况,甚至一直持续到1843年在《莱茵报》初期马克思与赫斯的共同合作中。他们俩人的语境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当马克思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大谈从宗教的异化、思辨哲学主谓语倒置走向现实政治异化(法人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裂)批判时,赫斯已经明确指出,对于归根到底不是政治的而是社会的罪恶,一切政治改革都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

三

从思想史的进程来看,真正触动青年马克思发生思想变化的理论

^① 1842年6月26日《莱茵报》第177号。

文本是赫斯 1843 年发表在《瑞士二十一印张》中的几篇文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赫斯的《行动的哲学》(*Philosophie der That*, 1843)。在这篇论文中,赫斯第一次系统地界定了一种超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性社会历史哲学。用科尔纽的话说,赫斯是“第一个在行动哲学中把黑格尔哲学与法国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人”。^{[3](p. 262)}从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赫斯用功能性的行动(费希特的“自我”创化力)取代了笛卡尔式的存在——“一切在于行动而不是存在”,这实际上是将黑格尔哲学中的生成性规定在社会历史层面中本体化为一种逻辑基础,这一点自然也是透过费尔巴哈感性生活的中介而生成的。以他之见,人的生活就是行动,而行动就是“真正的个体——自我意识的精神、自由的人,真正的普遍”。^{[4](p. 184)}显然,赫斯这里所阐发的行动的内涵还是取自切什考夫斯基所谓实践哲学那种自我意识的精神活动,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我们看起来很熟知的自由的个人,已经不再是启蒙精神确证的一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什么?因为赫斯说,反对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干了什么”?“它的自由平等,它的抽象人权,仅仅是奴役的另一种形式”。^{[5](pp. 438—439)}资产阶级社会不过是“暴君已经换了,暴政依然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赫斯超越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原因。

赫斯主张一种反对资产阶级社会新奴役的共产主义“自由行动(*freie That*)”。可是,这个自由的行动实质上也是哲学本体论上的一种理想化的价值悬设。赫斯认为,如果德国要实现社会主义,那么它的社会历史领域中就必须有一个康德,但这个康德的使命不是回到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抽象的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他显然不同意蒲鲁东的政治立场。他的意图是真正树立一种类似斯宾诺莎式的新伦理学。所以以他之见,“自由就是道德”,人的自由行动不是通过“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自然的偶然性,像以往任何创造物的生活中发生的那样,而是通过自我决定”。^{[5](p. 445)}后来在费尔巴哈的语境上,赫斯还专门将真正体现人的类本质的自由行动与奴役性劳动区别开来:“自由的活动是出于内心的驱使而进行的一切活动,相反,被迫的劳动是由于外力的驱使或是由于穷困而进行的一切活

动。”^{[6](p. 210)} 在 1844 年发表的《共产主义信条问答》一文中，赫斯明确提出了“雇佣劳动(Lohnarbeit)”一语。所不同的是，“在奴役中，生产束缚生产者本身，而在自由中，精神在其中异化的任何限制都不会变为自然的约束，而是得到克服成为自我决定”。^{[7](p. 207)} 这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逻辑的“应该”与“是”的对立在社会现实批判中的延伸，也是青年马克思后来在《1844 年手稿》中提出的那个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自由劳动活动与异化劳动对立关系的逻辑前身。

赫斯在《瑞士二十一印张》上同时发表的另一篇文章《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中，提出共产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消除劳动与享受的对立。他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私有制的现实“一方面否定了自由活动，把它贬低到奴隶劳动的地步，另一方面又把动物的享乐作为这种动物劳动的当然目的，提到人类至上幸福的地位”。这是一种人类生活的颠倒，因为，

劳动，以及一般地说，社会，不应当从外部加以组织，而只能这样来自行组织：使每个人都能做他所不能不做的，而不做他所不能做的。每一个人可以爱好某一种活动，甚至可以爱好几种不同的活动，从这样自由的合乎人性的爱好和活动的多样性中就产生出富有生气而永葆青春的自由的合乎人性的社会机体，产生出使劳动完全变成一种“享受”的自由的合乎人性的各种职业。^{[2](p. 71)}

在他这里，自由的核心是道德，道德的至善将最终打破“奴役的牢笼”。赫斯的社会批判实质是伦理价值批判。以我的观点，在此处，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了青年马克思《1844 年手稿》中共产主义、先验的劳动类本质与异化论的原生地。关键之处在于，赫斯始终停留在这种人本主义价值批判之中了。这也是 1845 年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创立以后，赫斯表面上赞成而最终与马克思恩格斯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产主义“不是现实与之适应的理想”这句话就是批评赫斯的。

四

直到《德法年鉴》时期,才是赫斯与马克思开始真正形成密切关系的时期,这也是赫斯通过对经济学的研究后所发生的经济异化思想直接影响青年马克思的关键时期。^①究其实质,赫斯的所谓经济异化思想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他直接经济学研究的结果,它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对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的黑格尔-费尔巴哈式的哲学改造。我以为,就赫斯的理论构架而言,它显然主要是从蒲鲁东那里获得的。当然,我认为,赫斯的经济学研究达到的水平远远低于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提及赫斯那篇非常著名的《论货币的本质》(*Über das Geldwesen*,又译《论金钱的本质》)。这篇论文是赫斯于1843年底到1844年初为《德法年鉴》撰写的,并且已经呈交编辑部准备发表,后来因杂志停刊,未能及时发表,一年多以后才在其他杂志上刊出。^②明显的事实是,作为《德法年鉴》编辑的青年马克思1844年初就读到了这篇重要的文稿,所以我们有理由说,赫斯的这一文本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并促使马克思思想产生重大变化。这也是马克思自己明确指认的。^③国内学者赵仲英先生在说到马克思与赫斯的关系时,指认“这是一种思想交流”,并且认为英国学者麦克莱伦关于赫斯影响马克思的观点是错误的。^④我觉得,实际情况是,由于马克思没有研究经济学,所以他不可能独立形成经济异化的观点。赫斯的经济异化思想影响了马克思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认为,绝不会因为我们承认了马克思受到过赫斯的影响,马克思就会被贬低。科尔纽指出过,赫斯的思想,特别是他关于货币的本质与作用的观点对当时青年马克思“那种还是哲学政治的理解打下了坚实的社会经济基

① 从现在的文献看,没有资料显示赫斯对经济学有过系统而深入的科学研究,这里我们所说的经济学研究实际上至多只是一种对经济学的哲学关注和共产主义理论投射。

② 参见《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1卷,达姆施塔德,1845年,第1—34页。

③ 参见马克思《1844年手稿》的引言部分。

④ 参见赵仲英:《马克思早期思想探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英]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夏威仪译,第163—164页。

础”。^{[3](p. 621)}我基本同意科尔纽的看法。为此,我们先来查看一下赫斯这一文本中的一些重要内容。

我们发现,在步入经济学视界之后,赫斯原有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哲学逻辑开始变得深刻起来:“生命是生产性的生命活动的交换”!这是《论货币的本质》一文的第一句话。从理论逻辑上分析,这标志着赫斯开始从人的自由活动过渡到社会关系,从个体本质过渡到类本质。深一些看,这当然还是费尔巴哈的逻辑。赫斯试图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现象中对象化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批判。在他看来,人这种存在物原本出自于生产性活动的交换,而“不可让渡的生活资料”则是这一交换的中介^{[8](pp. 179—180)}。与以前赫斯将人的本质主要规定为“自由的、独立于那种外部强制的活动”——非奴役的劳动相比,赫斯在此进一步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论证了人的类本质的社会实现,即交往(*Verkehr*)关系。在他看来,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要素就是这种人们社会生活交往中的“共同活动(*Zusammenwirken*)”,而且,“单个的人在这里作为有意识的和有意识地行动的个体”,显然是无法脱离“其社会生活的交换的领域的关系”的,这就如同肉体的人无法脱离空气。^{[8](p. 180)}更重要的是,这种交换与交往的共同活动也就是“个人的现实的本质(*wirkliches Wesen*),是他们的现实的能力”。^{[8](p. 180)}赫斯直接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共同协作与交往看做是人的社会本质,交往就是个人实现、发挥自己力量和本质的形式,也是生产力的实现形式。赫斯指出:

人与人的交往越发达,他们的生产力(*Produktionskraft*)也就越强大,在这种交往还狭小的时候,他们的生产力也就低下。……人与人的交往决不是从人的本质中产生的,这种交往就是人的现实的本质,而且它既是人的理论本质,人的现实的生命意识,又是人的实践本质,人的现实的生命活动。^{[8](pp. 180—181)}

在这里,赫斯区分了人的类本质的双重规定:一是精神交往的“理论的类本质”,二是物质交往的“实践的类本质”。这个所谓人的实践的

(*praktische*)类本质就是人们“生产和为继续生产所需求的产品消费的交往”。人的现实本质是一种物质交往关系,这显然是赫斯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开始超越费尔巴哈哲学的重要进步。国内学者侯才没有意识到赫斯的更深一层的经济学背景,仍然将赫斯此处的论说仅仅界定在费尔巴哈的哲学语境中,这显然是一种误解。^{[9](pp. 130—132)} 请注意,赫斯甚至直接指出:人的思维与行动只能产生于这种交往,而这种交往的共同活动就是生产力。^{[8](p. 181)} 饶有意味的是,在 1845—1846 年确立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新视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的第一手稿中,我们发现了赫斯这个论点被改造后的近似观点。^{[10](p. 24)} 这是赫斯这个文本开篇第 1—2 节正面表述的观点。我们可以视其为一种理论逻辑的设定。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先做一个简单的评述。显而易见,赫斯这里的哲学历史观点主要是对古典经济学描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理论提升和概括,与费尔巴哈相比,的确有了很重要的进步,但有两个致命错误:一、他将交往(实际上是商品经济的现代交换)置于生产之上,但没有意识到这种“交往”是生产的结果。这一交换决定论是在古典经济学社会唯物主义第二层级上的倒退。我认为,青年马克思在后来的《穆勒笔记》中,就直接受到了赫斯这种交往决定论的影响。二、他更无法意识到,这种交往只是物质生产的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即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生产的特定历史结果。以费尔巴哈的类哲学去提升经济学,必然是从同样抽象了的交往(交换)出发。由此,他更接近重商主义而不是斯密和李嘉图。当然,赫斯在此处的观点的实质(包括他所标举的生产力、交往的共同活动等规定)在隐性逻辑上是非科学的。但我还是要指出,与赫斯相比,此时马克思的思想远远没有抵达这种深度。

文本的另一部分(第 5 节开始)是对现实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批判。这就是人的类存在——社会交往关系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过程中的异化了。我们看到,在这里赫斯的确是自觉地将费尔巴哈与蒲鲁东结合起来。他认为“费尔巴哈是德国的蒲鲁东”!但费尔巴哈远没有达到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实践结论的思想深度。所以,必须“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2](p. 292)} 赫斯是较早将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史观运用到社

会现实中来的人,并且他也自觉地将蒲鲁东拒绝共产主义的立场向前大大推进一步。以他之见,费尔巴哈在宗教领域所发现的这种人类异化也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私有制的基础上,竞争和对利润的追求使人彼此分离和对立起来,这是一种利己主义(*Egoismus*)生存中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在赫斯看来,在自然过程中,类生活是动物生存的中心,个体只是生活的手段。然而,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到资产阶级社会为止,私有制社会却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图景,因为在这里个体与类的关系被颠倒了。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世界观是一种个人利己主义的“小贩世界(*Kramerwelt*)”。在这里,盛行着神学这一类颠倒的世界观,即个体是目的,类(上帝)被贬低为手段的基督教观点。赫斯认为,“基督教是利己主义的理论、利己主义的逻辑。而利己主义实践的典型基地就是现代的、基督教的小贩世界”。^{[8](p. 186)}在赫斯看来,颠倒的世界观的出现,是“因为这种状态本身是颠倒的世界的状态”。^{[8](p. 186)}赫斯的批判让我们想起黑格尔颠倒的世界论,与之不同的是,赫斯没有经过观念颠倒的中介,更没有真正理解古典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如果他从斯密的利己主义经济人的角度出发来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和自由竞争的客观作用,那么这种批判在一开始就会变得深刻起来,可能达到一剑封喉的效果,可是,赫斯是从费尔巴哈的基督教批判直接导引出经济批判的,这就必然决定了他的批判基础中的非历史性。他甚至看不到黑格尔已经看到的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方式的历史进步性!直到1845—1846年,马克思才真正跨出这重要的一步。

赫斯发现,在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生活中,利己主义的小贩之间是相互隔绝的,人与人之间没有直接的交往关系,他们只能通过市场交换联系起来,于是,市民社会就是将现实的人变成死去的遗骸——私人:

人们通过把人确认为单个的个体,通过把抽象的、赤裸裸的人宣布为真正的人,通过宣告人权、独立的人的权利,因而把人与人彼此之间的独立性、分离和孤立宣布为生活和自由的本质,证明孤立的人就是自由的、真正的、自然的人,也就确认了实践的利己主义。^{[8](p. 193)}

赫斯认为,这实际上是“把一切人加以孤立并加以杀害”的过程。^{[8](P.193)} 因为,人在这里失去了自己的类存在,人们再也无法相互真实地直接交往。在市场交易中,我们必须外化我们的类生活,即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交往关系,我们只有“继续出卖我们的本质、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的自由的生命活动,以便能够在贫困中糊口度日。随着我们的自由的丧失,我们可以继续买到我们的个体的生存”。^{[8](p.187)} 他深刻地指出,这种人的现实中的异化了的“类生活就是货币”。^{[8](p.186)}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世界中,孤立的人与人的交往,只能通过非人的货币才能实现。货币正是那个颠倒了离我们而去的类生活。这是费尔巴哈式的,上帝是人本质的异化,而货币则是我们异化出去的交往类本质。他甚至认为,正是“基督教发明了商品化(*Verkäuflichkeit*)的原则”,所以,“上帝对理论生活所起的作用,同货币对颠倒的世界的实践生活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人的外化了的能力,人的被出卖了的生命活动。”^{[8](pp.186—187)} 在这里,金钱是量化了的人的类本质和真正的价值,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奴役制铭刻在人类主体之上的印记。货币的本质是穷苦人民血汗的结晶,劳动者将自己不可让渡的财产——“自己的特有的能力、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拿到市场上去出卖,以便换得同样是穷苦人的死的生命即所谓资本(*capital*)”。^{[8](p.187)} 这种劳动者活的生命活动与死的生命活动——资本的对立,后来在马克思那里被重新认定为劳动与积累起来的死劳动(资本)的对立。赫斯指出,“现代商业世界的本质即货币是基督教的实现了的本质”!^{[8](p.190)} 请读者注意一下青年马克思在下面《巴黎笔记》中对穆勒一书的“货币”媒介论的评点。赫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透过货币的交换手段和媒介表象看到了金钱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幻影:“金钱不外是非组织化的、因而脱离我们自己的理性意志并因此统治我们的人类社会现代生产方式的幻影”。^[11] 这个现代生产方式的说法,是至关重要的。

五

必须指出,赫斯在此对货币的批判恰恰不是以古典经济学内在的学

理逻辑为基础的,因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劳动价值论的意义,也没有科学地界定货币与资本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他又从蒲鲁东所达到的水平向后倒退了,更无法与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汤普逊、霍吉斯金等)的观点相提并论。正是这种错误的理论意向,使后来受到赫斯影响的刚刚步入经济学研究的青年恩格斯和青年马克思都走了否定劳动价值论的人本主义弯路。

在论及这一层面时,还有值得我们注意的方面,那就是赫斯在人本主义逻辑尺度上是如何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实际上,经济学同神学一样,关心的根本不是人。国民经济学是尘世的发财致富的科学,正如神学是天国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一样。”^{[8](p.188)}这似乎与我们前面看到的西斯蒙第的话语完全相近!不过,它已经是经过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中介的批判话语。同时,这也是后来青年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青年马克思(《巴黎笔记》前期)直接曾经引述过的一个重要界说。赫斯认为,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货币应该是一般的交换手段,因而是生命的中介,是人的能力,是现实的生产力”。^{[8](p.187)}而实际上,“货币是彼此异化的人、外化的人的产物”,因为政治经济学是“根据人的钱袋的重量来评价人”,“如果人再也不能被拿去出卖,他也就一文不值了”。^{[8](p.188)}所以,“货币是凝结成为死的字母的、扼杀生命的交往手段”。^{[8](p.204)}于是,赫斯力陈货币敌视人和非人的罪状:

第一,货币是社会的血,但它是被出卖的、被抽出来的血,是我们“生命的交换价值”。这种“出卖的血”导致了人及其生活的非直接性。生活是什么,生活是直接的爱;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人与人直接的相互交往(类)。可是,今天的人却“没有生活在类当中,没有生活在爱当中,而是生活在离间和敌视当中”。^{①[6](p.222)}资产阶级社会正在“把一切直接的交往、一切直接的生活消灭掉”。^{[8](p.194)}因为人的一切现在都必须通过金钱这个中介!从最自然的爱情、两性的交往,到整个知识界的思想交流,

① 我请读者注意这个反对中介性的还原直接性的费尔巴哈式的逻辑构架。在后文对马克思的哲学解读中,这是一种认识论上扬弃了的重要环节。

没有金钱就寸步难行。这已经成了一个“为了能活下去每一次心跳都必须先加以变卖”，“除了被变卖、被拍卖的人以外没有其他实际的人的地方”。^{[8](p. 194)} 第二，货币的非人性还在于它将活生生的人的生存量化了。人不再是人类的“社会的躯体，有机的类生活，社会的交往”，而成为一个“僵死的量，一个数量或者数目”。^{[8](p. 199)}

金钱是用数量来表示的人的活动的价值，是我们的生命的买价或交换价值。……人的活动也和人自身一样，是不能对之支付代价的；因为人的活动就是人的生命，而人的生命是不能用任何数量的金钱来补偿的，它是无法估价的。^{[6](p. 212)}

赫斯愤怒地问道：“活的存在物，人及其最崇高的生活和活动的价值，社会生活的价值，怎么能够用数量、数目来表现呢？”^{[8](p. 199)} 如上所述，由于看不到货币在经济学中的实质——货币与劳动价值论的关联，即货币不过是商品价值在市场交换中必然出现的物化形式和手段，赫斯的这种批判总是浮在非历史、非科学的伦理价值冲击上，犹如悬浮于虚无缥缈的云端，必然是不着边际的。

赫斯认为，在古代的奴隶制的强制下，人们只能不情愿地被出卖，产生这种痛苦是自然的和合乎人性的，然而，更可恶的是，在这个资产阶级的货币世界中，人们自愿地自我出卖，倒是自然的和合乎人性的。因为，在这里，“人首先必须学会蔑视人的生命，以便自愿地把它加以出卖。人们首先必须把以前认为现实的生命、现实的自由是无法估价的财产的认识忘掉，以便把这种生命和自由拿去出卖”。^{[8](p. 189)} 由此，赫斯将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王国称之为社会动物世界。他说：

我们现在正处在社会动物世界(*sociale Thierwelt*)的顶点，最高点；因此，我们现在是社会的猛兽，完成了的、有意识的利己主义者，我们确认自由竞争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确认所谓人权就是孤立的个体、私人、“绝对的个性”的权利，确认经营自由就是相互剥削、货币欲，这种货

币欲无非是社会猛兽的嗜血欲。^{[8](pp. 202—203)}

在赫斯看来,资产阶级社会制度是“实际的假象和谎言的世界”,因为它“在保证每个人享有不可侵犯的财产的假象下面,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全部财产;在最普遍的自由的假象下面是最普遍的奴隶制”。^{[8](p. 203)} 所以他认为,“金钱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类的奴隶制度的标志”。^{[8](p. 213)}

可是,如何才能消除这种非人的奴隶制呢? 赫斯指出,“在我们的力量和能力已经发展起来以后,如果我们不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就会彼此使对方毁灭”。^{[8](p. 207)} 这是他的政治结论。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出现了以“生产力的过剩”和力量的浪费为特征的自我毁灭的荒唐现象。这个问题得以根本解决的途径只有人们真正地“联合起来”,以创造一种“我们的力量的联合或者共同活动”的新生活,那就是共产主义。据此,赫斯断言:“社会的形成史已经结束,社会动物世界的丧钟很快就要敲响。”^{[8](p. 208)} 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科学地将资本主义社会表述为“经济动物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也被称之为人类“史前社会”的终结。赫斯认为,伴随着人的本质与能力的现实发展,伴随着物质生产与交往的发展或未来社会组织的物质内容的获得,“非人的、外在的、死的交往手段就必然要被废除”。^{[8](p. 206)} 人类社会中的这种类的异化存在阶段,必然要过渡到“类生活的全面展开”阶段,即“有组织构成的”共产主义阶段。^{[2](p. 276—277)} 在这种新的“有机的共同体”之中,随着得到管理的社会组织的出现,雇佣劳动必须被消除;随着人的价值的提高,货币就会失去价值。^{[6](p. 218)} 这样将产生:

一个没有自我毁灭的人类社会,并且实现一个多种多样的和协调一致地共同活动的生产,有同人们的各种不同的生活目标和多种多样的活动相适应的多种多样的有组织的活动范围的、合乎理性的、有机的人的社会,以便使每一个受过训练的人都能够按职业和爱好在社会中自由地表现其能力和才干。^{[8](p. 183)}

在那个社会中，“人的本性在所有的人身上都得到发展，而每个人又都能发挥自己的全部能力”。^{[6](p. 211)} 赫斯的这一思想，在后来马克思关于第三大社会形态中人的全面解放学说中也有更加科学的表述。

正是赫斯的这种将费尔巴哈宗教异化批判思想(经过鲍威尔改造了的?)推广到社会经济领域的人本学异化论，直接影响了 1843—1844 年的青年马克思。但从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几篇文章来看，由于他没有研究经济学，因此他还无法理解赫斯已经提出的一些社会历史哲学观点。但是他已经注意到，赫斯与受到赫斯直接影响的恩格斯观点的深刻性是受益于经济学研究的。这也是促使马克思下决心涉猎这一领域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

如前所述，20 世纪以后，随着赫斯原始文献的陆续问世，人们开始对赫斯的思想特别是赫斯与马克思的学术思想史关系重新发生浓厚的兴趣，也形成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可以粗分为三种主要观点：一是仍然否定赫斯对马克思的重要影响。当然，这是前苏东学界为代表的多数研究者的观点，其中甚至包括已经转到苏东学者立场上的卢卡奇。卢卡奇认为，固然赫斯是所有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中离马克思最近的人，但由于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却时常倒退到费希特的立场，所以，卢卡奇将赫斯称之为完全失败的“马克思的先行者”。^{[12](p. 21)} 这是前苏东学界始终坚持的观念，但是在赫斯的大部分文献已经重新问世的情况下，卢卡奇的这种观点显然十分怪异。

第二种观点是开始正视赫斯对马克思的一定学术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写《马克思恩格斯传》的科尔纽。在他看来，一方面，赫斯在《二十一印张》中发表的《行动的哲学》，是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德国哲学与法国社会主义的最初结合，所以，赫斯“为马克思的唯物论的实践概念的完成作了一定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是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在这一文本中，赫斯成为马克思将异化理论运用于市民社会的、经济的诸

关系的分析的诱因及中介，“他对于金钱的本质和作用所作的分析也促使马克思给自己对于共产主义的那种还是哲学政治理解打下了坚实的社会经济的基础”。^{[3](p. 621)}说实话，我基本认同科尔纽的观点。

第三种观点是过分夸大赫斯思想对马克思的支配性影响。我觉得，这里的最突出的代表是日本的广松涉。他认为，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压倒性的”。广松涉有一个观点是有价值的，即青年黑格尔派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是综合性的。^①并且，在他看来，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绝不仅是指1844年以前的青年马克思，而是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基本文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他认为：

被看做早期马克思的独创的《1844年手稿》的各个立论，不仅其构想和视角，甚至在修辞上也有很多地方追随赫斯，被誉为“唯物史观的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②从著名的第一条开始，就恰似参考了赫斯当时发表的一些文章，而到了最后的条目中，则确实无非是从赫斯的立场来批判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旧层，也仍然留有作为共同执笔者之一的赫斯的影子。^③

指认赫斯对马克思的重要影响，是我与广松涉的一致之处。可是，认真地思考之后，我认为广松涉的观点还是有些夸大其辞的。我们可以稍微仔细地看一下他的论据：

一是说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赫斯的影响。在广松涉看来，赫斯是第一个将费尔巴哈的异化史观运用到经济社会领域中的人，这种说法基本不错，可是，他进一步说，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不

① 广松涉认为，黑格尔左派哲学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决不只是以费尔巴哈作为单线的中间环节。“在黑格尔左派自身的内部存在着三种潮流及其综合。第一种潮流是由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的系列（进而通过中期鲍威尔及其一派而继续），第二种潮流是由切什考夫斯基、赫斯的黑格尔历史哲学批判的谱系，第三种潮流是经由卢格而与马克思相关联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谱系。”参见本书第95页。

②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12页，此处原中译文是“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

③ 参见本书第92—93页。

光在着眼点和构想上,甚至有很多引人注意的词句和修辞技巧都表现出与赫斯的论稿明显地一致”,最关键之处,是青年马克思和赫斯都认为人的类本质是社会性的自我活动。然而,我以为广松涉没有更进一步理解的方面是,赫斯的类本质更多地是倾向于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和共同活动,在这一点上,赫斯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恰恰体现在《穆勒笔记》笔记的货币中介为核心的“经济异化”(交往异化)之中,而不是《1844年手稿》的劳动异化。《1844年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结构中的劳动关系多重异化批判和基于工业生产(动产)之上的客观逻辑批判,都是超越赫斯的。广松涉的这一观点并不能说服我。

二是广松涉指认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赫斯立场,“用一句话概括其性质,这由十一条组成的《提纲》,是宣告马克思从‘费尔巴哈和赫斯之间的中立立场’,几乎完全过渡到赫斯的立场的文书”。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文献几乎条条与赫斯相关,其中,1、2、5、8、9条以及第11条,都渗透着“切什考夫斯基—赫斯的立场”。其中,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来自于赫斯《关于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德国哲学的共同缺陷”;马克思所指认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语,来自于赫斯关于人的本质是人的“共同活动”的观点。所以,在这个意义,广松涉进一步指认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初稿中,同样内含着赫斯的立场就不难理解了。对广松涉的这种分析,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如同广松涉在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原始手稿的主体部分都是恩格斯的笔迹之后,就轻率地认定恩格斯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者情况相近。有时候广松涉的分析会脱离整个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进程,显然得格外武断和简单。在对赫斯与马克思的关系上也是如此,承认赫斯对马克思的学术思想影响,这是正确的,是对斯大林教条主义意识形态构架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研究的遮蔽之解蔽。可是,夸大这种作用同样是有害无益的。广松涉的问题在于,他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仍然停留在哲学逻辑层面上,而不能真正透视1844年之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逻辑话语转换。他不能理解,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

哈的提纲》中实践概念背后的现代性工业生产的定性,以及这一实践范式为什么会超越切什考夫斯基—赫斯的思想构境,同样,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是在其现实性上社会关系的总和,为什么不再是抽象的人的类交往的共同活动,而是一种历史性的结构性关系确认。广松涉更不能理解的方面是,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的确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多处使用了“共同活动就是生产力”之类赫斯术语,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新理论情境为什么会是一种全部“形而上学的颠覆”(海德格尔语),是一种真正的思想革命。^① 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远远超越了广松涉和他的那个时代。

参考文献:

- [1] [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2] [德]赫斯,哲学和社会主义文集(1837—1850年)[M],柏林,1980
- [3] [法]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M],刘丕坤、王以铸、杨静远译,北京:三联书店,1963
- [4] [德]赫斯,罗马与耶路撒冷[M],莱比锡,1899
- [5] [德]赫斯,行动的哲学[M],中译文参见《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1981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 [6] [德]赫斯,共产主义信条问答[M],葛斯译,中译文参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7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7] [德]赫斯,赫斯论文集[M],柏林,1961
- [8] [德]赫斯,论货币的本质[M],刘焯星译,中译文参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7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9] 侯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① 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009年第二版。

[10] [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1] 卢格在巴黎[J],《社会》第8卷,1931(2)

[12] G Lukács, *Moses Hess und die Probleme in der idealistischen Dialektik* [M] (G. 卢卡奇:《赫斯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中的问题》), Lpz., 1926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

德国哲学的现代危机^①

[德]莫泽斯·赫斯

如果不得不一方面断言，人们不想仅仅停留在唯心主义或者本原的哲学即思维上，而是想从现在起把哲学上已经取得的东西，即相应的上帝意识或自我意识运用到生活中去，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据已经获得的自我意识来塑造生活，而所谓的“青年黑格尔派”^②在这一点上已超越了黑格尔哲学，那么另一方面就不能不承认，现代流派除了黑格尔哲学的理性之外没有别的基础。同时，如果卢格^③、费尔巴哈^④、鲍

-
- ① 原载 1841 年 10 月 9 日柏林版《雅典神殿。有教养的德国人杂志》。——中译者
这篇论文发表于当时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具体地说是柏林大学的博士俱乐部(学生马克思也属于这个俱乐部)的机关报《雅典神殿》第 40 号(1841 年 10 月 9 日)。这篇文章明确表明了当时的赫斯对黑格尔尤其是青年黑格尔派的看法。另外，赫斯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写有“赫斯。《欧洲三头政治》的作者”的字样，才第一次公开了赫斯是同一年 1841 年匿名发表出版的《欧洲三头政治》的作者。——日译者
- ② 德国古典哲学的完成者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死后，黑格尔派围绕宗教及政治问题分裂为左右两翼。想要通过批判地推进黑格尔哲学的黑格尔左派，因其急进的主张而被称为“青年黑格尔派”。——日译者
- ③ 卢格(Arnold Ruge, 1802—1880)，德国哲学家，政论家。年轻时参加“自由德意志”(Burschenschaft, 创立于 1815 年)运动而被捕，在 1830 年七月革命中被释放，1832—1841 年任哈雷大学的哲学讲师。在此期间与 Th. Echtermeyer(1805—1844)一起创办青年黑格尔派的机关报《哈雷年鉴》，更名后又继续任《德国年鉴》的编者，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中心人物而活跃，《德国年鉴》被查封后，1844 年虽与马克思一起创办《德法年鉴》，但停留于自由主义或民主主义。——日译者
- ④ 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 1804—1872)，德国哲学家。起初是从作为黑格尔学徒出发，此后把批判黑格尔哲学作为神学来批判，通过《基督教的本质》和《哲学改造的临时提纲》等，对包括马克思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以及宗教批判和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克服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译者

威尔^①等人在现今时代公开讲的一些问题不能清楚地黑格尔那里发现，甚至黑格尔的说法经常显然与这些人相矛盾，那么这些显然的矛盾并不背离黑格尔哲学，它们倒是从黑格尔哲学的核心中得出的，是比黑格尔本人敢于得出的结论更严密的结论，不仅摆在热心的哲学家面前，而且摆在每个睁着眼睛的人面前。

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是众所周知的：为了使人的自我意识或黑格尔的所谓“绝对精神”具有普遍性而扬弃精神的各种不同的因素——这些因素在精神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被看做是个别的、片面的和在它们的独特性和片面性中固定下来的形式。黑格尔哲学证明，迄今为止的一切被人们相信、想象以及被视为真理的东西都是产生于人的自我意识，而且必定是产生于人的自我意识；因为对黑格尔哲学来说，自我意识是它的核心和萌芽，并由此长出多种多样的生活之树和精神的各种各样的形式，所以当生活之树的生长以及它的分枝和分杈的历史结束以后，对黑格尔哲学来说，自我意识自然也就是唯一剩下的果实了。

但是，除了现代的精神潮流也承认的“绝对精神”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原则。彻底地说来，似乎使精神硬化和僵化的每种积极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以绝对的真理出现；更确切地说，这个绝对真理作为真理和现实性的永久出生地，只能被要求归还给精神和自我意识；据此，一句话，在哲学中只有发展(Werden)才是基本形式，所有其他的形式都产生于这个基本形式，并且都势必重新回到这个基本形式上来。这一切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即使他不是哲学家。

人们无需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②和《精神现象学》^③就能够知道，根据黑格尔哲学直言不讳的原则，黑格尔最后必定会对所有那些到现在被

① 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 1809—1882)，德国哲学家、神学家。1840年以来发表一系列的福音书批判，为此被波恩大学开除，加强了从黑格尔哲学引出的自我意识的立场对宗教、现实的批判，一时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指导者。但停留于唯心论的框架内，后来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其进行了批判。——日译者

② G. W. F.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Nürnberg, 2 Tle. 1812—1816. ——HS(“赫斯”的略称，下同)。——邓习议)

③ G. W. F. 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Jena, 1807. ——HS

视为客观真理的东西进行批判,根据他的门徒们的说法,他在晚年的确进行了越来越严厉的批判——并且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如果说经常有一种假象,似乎黑格尔使一切事物都保持它们的原始的形态,那么其原因就在于:除了《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它们认为只有普遍性、精神、理性才具有合理性)外,黑格尔还研究一些特殊的学科,并且在这里,特别是在宗教哲学中,更加强调阐明《宗教哲学》^①各种形式产生的必要性那一方面,与此相反,今天的实践哲学更多地是揭示宗教哲学衰亡的方面。然而只有那些不懂哲学的人才会误解黑格尔,因为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里把所有的精神现象作为最终的现象,而使之成为自我意识的无限性的基础,然后他在他的《逻辑学》里把自我意识的永恒的基本形式,即所谓的范畴阐明为唯一的、不受时代限制的真理,这样一来,对他来说,后来出现的那些历史的、有时代限制的真理怎么能够成为完善的、固定不变的、实在的真理呢?——但是黑格尔哲学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承认有完善的东西和永恒的东西,只会强调精神劳动(*Arbeit*),而这个来自自身、来自永恒的真理之泉的精神必定会使精神劳动永世常新!

但是总会有人这样提问:为什么黑格尔经常只强调历史形态的积极方面,而为什么现代哲学家经常只炫示历史形态的消极方面呢?难道既不应当指责黑格尔害怕触及现状,也不应当指责“学派”的现代的无所顾忌吗?——这种意见分歧不是纯哲学的,仅在于如何把哲学适用于生活,所以分歧的原因恰恰在于改变哲学对生活的态度。黑格尔只能用哲学本身来对待生活。黑格尔作为哲学家避免与生活产生任何冲突,因为任何冲突只能妨碍他去执行结果哲学的使命。可是不能假定,黑格尔是有意地回避这种冲突,即使黑格尔已经像我们一样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态度,那么我们这些受过他恩惠的人也绝对不能因此而报备他。黑格尔为了使自己适应精神已经作了足够的斗争;他必然把其他的事情,也就是使生活适应精神的事情委托给别人去做;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义务去做这种事

^① 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Religion, nebst einer Schrift über die Beweise vom Dasein Gottes*, Hrsg. Von Ph. Marheineke, Berlin, 1832. — HS

情,也许恰恰是因为他缺少一种积极的创造力,无法用他的理念去丰富大众的思想并用现代思想去革新生活,他对现状有一定恐惧感,而我们经常不公正地责备他的这种恐惧感。

黑格尔清楚地知道,当哲学开始涂上“灰色”的时候,生机勃勃的生活就失去了生气,而他作为纯粹的哲学家像一些人那样,只要哲学一触及到生活,就对贯彻哲学感到恐慌。

而那些门徒们则与此相反,他们越是超越唯心主义并走向理念的实践,越是专心致志于积极地塑造未来,他们就越是能够对过去进行严厉的批判,从生活之树上砍下干枯的树枝,以便让永恒精神的总是新鲜的汁浆萌发出新芽。

那些不知道精神和永恒性为何物的人——那些还没有从麻木的、野蛮的以及模糊的感情和欲望中努力走向明确的、显而易见的自我意识的人——抱怨哲学要窃取他们的圣物。如果人们仔细地看一看,这些抱怨意味着什么,那么就可以很快地看清,这是为有限的、世俗的人性担忧和悲伤,他们尽管有了他们显然所属的精神宗教,但仍没有摆脱这种人性。他们自身所不能抑制的人类犯罪本性;他们在感情上想象成造物主的人格化的上帝,尤其是,当做他们的有限生命的保护神的人格化的上帝;经验的人的有限的延续,兽性的灵魂,这一切就是他们的圣物。这些先生们不害怕用他们的基督教每天所展示的那些东西去谴责德国哲学、基督教最纯的全盛时期。永恒精神的终结和空虚的、世俗的存在物的永恒性——人性的贬低,兽性的神圣化——否定神、爱护和保护尘世。

他们继续不断地反复唱着关于“毫无顾忌的批判”的老调。是的,哲学要否定,但是哲学要否定什么呢?无精神的、不可调和的、无神采的生活。——您也要否定并“毫无顾忌地”进行笔伐,但是您要否定什么呢?您所最厌恶的永恒的精神,因为永恒的精神随时随地有可能毁掉您的可怜的生存!

赫斯。《欧洲三头政治》的作者

(章林 译,何力 校,单位:中央编译局)

共产主义原则的统治形式^①

[德]莫泽斯·赫斯

《德意志电讯》^②八月号在上述标题下发表了《年轻一代》^③杂志上转载的一篇文章，“正如《电讯》所说，目的是使它的读者认识共产主义本身的性质”。《电讯》补充说明，《年轻一代》是一个名叫魏特林的德国裁缝编辑出版的。上述文章批判了从君主政体到共和政体的各种不同的统治形式并认为它们对“大同社会”来说都是不充分的，然后，它阐明共产主义原则的统治形式不是民众统治，而是科学统治。这也就是说，任何工作在达到一定的高度时都会变为一种科学。正如泥瓦匠可以登上建筑师的科学，印染匠可以登上化学家的科学，这种情况在任何行业中都屡见不鲜。如果把思想提供给行业，那么任何行业都会变为科学。每个行业都必须从自身任命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可以裁决这个行业的各个专业的进步、完善、改进和发明等等，而且这个委员会似乎可以成为一个**选举机构**，但它不是选人，而是选才。前者即人应当在**宣布选举以后**才为人所知，目的是把所有的偏爱和成见拒之门外。选才可以采取像现在一个发明家交出他的图纸和样品以获得专利那样的办法来实现，或者采取像现在著作

① 原载 1842 年 9 月 29 日《莱茵报》第 272 号。——中译者

② 《德意志电讯》是德国作家卡·谷兹科夫创办的一家文学杂志，1838—1848 年在汉堡出版，它反映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的观点，恩格斯早年曾为该刊撰稿。——中译者

③ 《年轻一代》是威·魏特林主编的杂志，1842 年 1 月—1843 年 5 月先后在伯尔尼、菲菲斯和朗根塔尔出版。——中译者

家向学院申请解决价格问题那样的办法来实现。人们不能否认这种思想所具有的创造性和独特性,在一篇报刊文章的范围内对这种思想只能阐述到这种程度。《共产主义原则的统治形式》这篇文章的结尾写道:“关于这个问题还有许多要解释;我们将在一本篇幅较长的书中来做这件事,这本书已接近完稿,并且大概可以在几个月内付印。”

(章林 译,何力 校,单位:中央编译局)

论货币的本质^①

[德]莫泽斯·赫斯

“商业把自私自利的标记，
铸刻在一种发光的矿石上面，
授予它奴役一切的权柄，
将其命名为货币。

在这个偶像前聚集着，
庸俗的大人物、虚荣的富豪、落魄的显贵，
以及农民、贵族、教士和王侯等，
乌合之众。

他们一个个盲目地崇拜这一位权威，
不过这一位还是将他们碾成粉末，

① 本文摘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7辑第179—208页。《论货币的本质》(日文译为《货币体论》或《关于货币存在》。——邓习议)这篇论文原载德文版《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1卷，达姆施塔德，1845年版，第1—84页。

赫斯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最主要代表人物。《论货币的本质》是他的重要的代表作。文章以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论证共产主义，用异化概念分析货币，提出货币是人的异化的本质，对资产阶级利己主义进行道德的批判，把爱看成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文章据称是为马克思和卢格主编的《德法年鉴》而写的，稿子的大部分已交给了编辑部，但因该年停刊，文章在一年半之后才发表在彼德曼主编的《莱茵社会改革年鉴》1845年第1卷上。由于这篇文章，在现代史学家当中出现了究竟是马克思还是赫斯首先把异化概念运用于社会经济领域的争论，故译载供研究参考。——中译者



然后打入贫困的深渊。

在他们的奴颜婢膝的心坎里，
黄金是一位活佛，睥睨一切。

.....

一切都可以出售。
并且上天的光明也能用钱来买。

大地的慷慨赠与，
潜伏在深海的最渺小
最低等的生物，
我们生命中的一切，
甚至生命本身，
还有法律所允许的
微乎其微的自由，
人与人的友谊，
以及爱人之心，
驱使你自动去担负的种种义务：
桩桩件件都在那唯利是图的
公开市场里买进卖出，
每一样都由自私规定了价格，
这是它王国里一致公认的标记。

连爱情也可以出卖。

一切痛苦的安慰，
竟然变成了刻骨铭心的烦恼。

白发老人在自私的美人儿憎恨的怀抱里，
打着寒战。

.....

且说白发的自私已经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蹒跚地走向墓穴。
光明的早晨，
不久就要来到人间。

从此地球上一切天然礼物的转手，
要与美言善行来做交换，
从此对财富与名誉的追求，
以及对贫穷、疾病、耻辱、不幸的惧怕，
战争的恐怖，
以及地狱的凶恶，
只能在时间的记忆中继续生存：
时间正像一个悔罪的浪子，
回首当年，
禁不住胆战心惊。”

——雪莱：《麦布女王》^①

① 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反对一切因袭、权威，写有很多点燃人类解放的未来的诗。《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是其代表者。这篇《麦布女王》写于1813年，这里所引用的是J. Seybt的德译本(1844年)。——HS

本书中译本《麦布女王》译自日文版《早期社会主义论集》，山中隆次、畑孝一译，东京：未来社，1970年版，第112—116页。参阅雪莱《麦布女王》，邵洵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54—64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也曾引用英国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中的著名诗句，可谓与赫斯此处所引用的雪莱的诗句有异曲同工之妙。

“金子，只要一点儿，
就可以使黑变成白，
丑变成美，
错变成对，

(转下页)

生命是生产性的生命活动的交换。因为这种或那种存在物的生产性的生命活动的交换的中介是它的不可让渡的生活资料,所以每一种生物例如动物、植物、单个的人的身体就是它的生命的中介,因而身体上作为交换的中枢的那些器官也是身体的最高贵的、最不可让渡的器官,例如头脑和心脏。对于小的个体的身体是如此,对于大的个体的身体也是如此,而且无论对于无意识的所谓天体,还是对于有意识的所谓社会体,都是如此。地球的大气,进行地球上生产的交换的不可让渡的中介,是地球上的生命要素,而人彼此交换其社会的生命活动的领域——即社会中的交往(Verkehr)^①——

(接上页)卑贱变成高贵,

懦夫变成勇士,
老朽的变成朝气蓬勃!
啊!这个闪闪发光的骗子手……
它使人拜倒于多年不愈的脓疮之前;
它使年老色衰的孀妇得到丈夫;
那身染毒疮的人,
连医院也感到讨厌而要把他逐出门,
但它能使他散发芬芳,
像三春天气一样的娇艳!……
……你,我们看得见的神,
你可使性格全异的人接近,
使他们接吻!……”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1—152页、第3卷第254—255页,人民出版社1960—1979年版。)

1845年2月22—26日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写到:“昨天,在我们这个城市一个上等饭店的最大的客厅里召开了共产主义者第三次大会。第一次大会有四十人参加,第二次大会有一百三十人参加,第三次大会至少有二百人参加。整个爱北斐特和巴门,从金融贵族到小商人都有人参加,所缺少的只是无产阶级。赫斯作了报告。会上朗诵了弥勒和皮特曼写的诗以及雪莱的诗的一些片断,也宣读了登在《公民手册》上的关于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邓习议

① 交往(Verkehr),是本文的一个重要概念。当然,不仅从“交往”联想到运输、通讯,而且产品的“交往”也含有从男女的“交际”到思想的“交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意思,是广义的“交往”概念。作为译语,虽然尽可能译为“交往”,但有时也根据前后文译为“交流”、“交际”。——日译者

是不可让渡的**社会的生命要素**。单个的人在这里作为有意识的和有意识地行动的个体同其社会生活的交换的领域的关系，正像他们作为无意识的个体，作为**身体**同其身体的生命活动的交换的领域，同**地球的大气**的关系一样。如果单个的人同其**社会的**生活的中介的领域分离，他们就无法生存，正如如果他们同其身体的生命中介分离——就是说，如果使他们丧失了其生活的空气——他们作为身体就无法生存一样。单个的人同整个社会身体的关系，正像单个的肢体和器官同单个的个体的身体的关系一样。他们的现实生活只是在于他们的生产性的生命活动的交换，只是在于**共同活动**(*Zusammenwirken*)^①，只是在于同整个社会身体的联系。

二

个体的生命活动的相互交换，交往，个体力量的互相激发，这种**共同活动**，是个体的**现实的本质**，是他们的**现实的能力**。个体可能不实现、不使用、不行使、不运用他们的力量，如果他们在跟同一个共同体的伙伴或同一个团体的成员的交往中不相互交换其生命活动的话，这种力量甚至根本不能产生，或者（如果这种力量已经产生出来的话）会重新死灭。正如地球的空气是**地球的活动场**一样，**人的交往则是人的活动场**，在这里单个的人实现、表现其生命或能力。人与人的交往越发达，他们的生产力也就越强大，在这种交往还狭小的时候，他们的生产力也就低下。个体离开了其生命中介，离开了其个体力量的**交换**，就不能生存。人与人的交往绝不是从人的本质中派生的，这种交往就是人的**现实的本质**，而且它既是人的理论本质，人的现实的生命意识，又是人的实践本质，人的现实的生命活动。思维和行动只能产生于交往，产生于个体的共同活动——我们神秘地称之为“精神”的东西，正是我们的这种生命的空气、我们的活动场、这种**共同活动**。任何自由的活动——而且除了自由的活动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活动，因为如果一个存在物不是从它自身产生，因而不是自由地

^① *Zusammenwirken*，日文译为“协动”。——邓习议

行动,那就根本不是行动,至少不是自己的行动,而是他人的行动,因此一切现实的生命活动,即理论的及实践的生命活动——都是类活动,是各种不同的个性的共同活动。只有这种共同活动才能实现生产力,因而是每一个个体的现实的本质。

三

人的本质、人的交往,正如任何本质一样,是在历史的进程中经历许多斗争和毁灭而不断发展的。人类的个体的现实的本质即共同活动,像一切现实的东西一样,有一个发展史或发生史。社会的世界,人的有机的组织,像任何其他世界,任何其他有机体一样,有其自然史,有其起源,有其创造史。但是,当地球的自然史已经完成,就是说,当地球已经生产出其最后的和最高级的组织即人的身体,从而也生产出其一切有身体的组织的时候,人类的自然史才开始。地球的自然史,按照地质学家们的意见,已经延续了数以百万年的时间,早在几千年以前已经结束,地球已经完成了。相反,人类的自然史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总是生活在斗争中。人类还没有完成;但是人类已接近于其完成阶段。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远处有组织的人类的上帝应许的福地,我们已经可以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个福地,人类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预示着这种福地的来临——虽然我们还不能用双脚踏进这种福地。

把人类的自然史的完成,人类的创造史的终结,看做人类本身的终结,看做人类的“末日审判”^①,是错误的。那种看法是一种视觉上的错觉,有一种人以前一直屈服于这种错觉,这种人除了现存的现实外不能设想任何其他的现实——虽然现存的现实并不使其感到满意,因此他们也希望有另一种现实——正因为如此,他们把不好的世界的毁灭和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开端看做是世界的毁灭和来世的开端。还有一种人现在仍然

① der Jüngste Tag,当世界末日,在天的耶稣基督再次降临,对这个世界及其人们进行审判的日子。末日思想,与弥赛亚思想有很深的关系。——日译者

屈服于这种关于“末日审判”的错觉，这种人虽然不相信有比目前存在的状况更美好的来世，但是也不相信有更美好的今世，他们把关于今世不完美的基督教教义变成自己的教义，但是并不寻求来世的安慰，——他们梦想着无限的进步，并且除了死亡或者他们称为“精神”的没有生命的幻影以外，不承认这种进步的任何其他的终结，任何其他的完结。甚至连那些哲学家也属于除了现存的不好的现实以外不能设想任何其他现实的人之列，属于洪水期前的动物(*antediluvianische Gethier*)^①之列，这种动物把旧世界的灭亡看做它自己的灭亡，把人类的完善的组织只看做是死亡——因为有一种正确的本能告诉这些哲学家，他们自己构成了旧的、正在灭亡的、不好的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那些洪水期前的怪物——它们是地球在其形成以前，在其成年以前，在其“血气方刚的年华”生产出来的——具有意识的话，它们也会像我们的哲学家、神学家和牧师一样，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去夸夸其谈和高谈阔论的。它们也不会相信，会出现更高级的造物，会出现地球的完善的产物，会出现人类；它们也会认为，它们将会看到，随着世界出现前的害虫的灭绝，世界也就临近灭亡了。但是，正如随着地球的完成形态的出现，地球的现实生活并不是终结，倒是刚刚开始一样，随着人类的完成态的出现，就是说，随着人类的完成，这种现实生活不是终结，相反，它才真正开始。

四

人类的发展，即人类的形成史或自然史，以及人的创造史的必然性，是由于人在其个别化的交往这一矛盾而产生的人相互间的毁灭。人的本质(*human Wesen*)或者说人类的产生史，起初表现为这种本质的自我毁灭。人早就为天国的和尘世的偶像而牺牲，这发生在有为这种现象辩护的天国的和尘世的、宗教的和政治的经济学以前很久。人曾经毁灭自己，

① 指“诺亚的大洪水”这种世界的审判之前的动物(包括人)，因而尚不具有来世的意识、罪的意识。——日译者

因为人一开始是作为单独的个体而行动,因为人不能作为同一个有机整体的成员,作为人类的成员协调一致地共同活动。如果从一伊始就能够进行一切人的有组织的产品交换、有机的活动、一切人的共同活动,那么人当然不需要作为单个的个体各自通过暴力或精心策划的骗局去夺取或者赢得其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了,人就不必在自身之外去寻找其精神的和物质的财富(Güter)了,人就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训练自己,就是说,能够共同地发挥他们的能力。而这一点具有很大的意义,就是说:如果人作为完成了的人的本质来到世界上的话,他们就不需要经历形成史了。换句话说,如果人类不是从单独的个体开始的话,人类就不必为了它的对它来说是异己的和外在的财富而进行利己主义的斗争了。

现在,在为了个人的本质(*das eigne Wesen*)而进行的这种残酷斗争将要结束的时候,现在,当我们的本质至少在理论上已经受过训练的时候,我们当然能够设想一个没有自我毁灭的人类社会,并且实现一个有多种多样的和协调一致地共同活动的生产,有同人们的各种不同的生活目标和多种多样的活动相适应的多种多样的有组织的活动范围的、合乎理性的、有机的人的社会,以便使每一个受过训练的人都能够按职业和爱好在社会中自由地表现其能力和才干。现在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现在人的能力、人的本质(生产及为了进一步进行生产的产品消费的交往= *Communication*)发展到了过剩的程度。自然力不再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同人相对立,人认识了自然力并运用它来达到人的目的。人本身也一天天越来越彼此接近。空间、时间、宗教和民族的限制,个体的限制一下子都崩溃了,愚昧无知的人会大吃一惊,而有教养的人类之友会感到莫大的喜悦!我们除了承认自由的光明环境以外,再也不需要任何东西,除了把黑夜的卫士撤职,以便我们大家都能高兴地握手以外,再也不需要任何东西。是的,现在人类已经成年,任何东西也阻碍不了人类最后继承其遗产,即奴隶劳动和持续了好几千年的自然斗争的成果!人类目前的贫困本身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这种贫困不是由于生产能力不足,而是生产能力过剩的结果。英国打入了地球上最遥远的角落,以便寻找消费者;但是整个地球对于它的生产说来已经是或者很快就将成为一

个**小市场**了，它的生产继续以**几何级数**增长，而它的顾客却以**算术级数**增加，结果**马尔萨斯**^①理论——众所周知，根据**马尔萨斯**理论，顾客是以**几何级数**增加，而产品只以**算术级数**增加——原来正好是**真理的颠倒**。是的，现在人们已经发育成熟，可以完全享受其自由或者说其生命了。

在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人的生产能力首先必须**受到训练**，人的本质必须**得到发展**。一开始这只是粗俗的个体，只是人类的简单的分子，这些分子或者彼此还没有**相互接触**，像植物一样完全是直接从大地得到其营养，得到其肉体的需要，或者彼此是这样进行接触，以致它们是在残酷的、动物般的斗争中交换其力量。因此，**产品交换的最初形式**，交往的**最初形式**，只能是掠夺，人的活动的**最初形式**只能是**奴隶劳动**。在当时还无可争辩的**历史的必然**这个基础上，不可能出现有组织的交换，只能够出现以**产品牟利**的买卖(*Verschacherung*)，而且后来果然出现了这种现象。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的**法律**只是为掠夺行为和奴隶制制定规则，只是把一开始是偶然地、无意识地和无意志地发生的东西提升为**规范、原则**。迄今为止的历史无非是为掠夺行为和奴隶制制定规则，**提供根据**，使之贯彻实施并加以**普遍化**的历史。正如最终出现的那样，我们大家**毫无例外地每时每刻**都在为牟利而买卖我们的活动、我们的生产力、我们的能力、我们自身，作为人类历史由此开始的**相互蚕食、相互掠夺和奴隶制**，被提升为原则。而有机的**共同社会**怎样才能从这种普遍的剥削和普遍的奴隶制中产生出来——这一点应该在下面加以证明。

五

个体被提升为**目的**，类被贬低为**手段**，这是人的生活和自然生活的**根本颠倒**。

如果人的个体生活和类生活这两者之间发生冲突的话，人会有意识

① 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他在《人口论》(1798年)中，将失业、贫困等社会恶的原因求诸于人口和食物的自然增长的差距，是所谓马尔萨斯主义的鼻祖。——日译者

地为了类生活而牺牲他的个体生活。甚至那些还不会思维的存在物,那些会感觉,会忘记其自我保存的本能、欲望的动物也是如此,如果这种本能和欲望同其自我生产的欲望,同其类本质即生产的本能发生冲突的话。爱情,无论它在哪里出现,都比利己主义更强有力。当母鸡不得不保卫其雏鸡免遭外来袭击时,它情愿进行各种斗争。猫为了能够满足其类欲望,而且也由于失去其幼仔(这些幼仔通常被残酷无情的人偷走)的悲哀,自愿几天不吃东西。自然界始终只是关心自我生产,关心维持类生活,维持真正的生命活动。个体在自然的世界秩序中总是在不断死亡,而且一旦不再具有生殖能力,个体就开始死亡,对于动物界的有些个体说来,甚至结婚之日就是死亡之时。人也能通过其思维、感觉和愿望完成类活动,对人来说,他的全部精神力量的逐渐消失就是他的自然死亡的可靠征兆。自然的世界观是建立在这种世界秩序的基础上的,这种世界观把类看做生活本身,而把个体只看做是生活的手段。

与此相对,在利己主义的状态中盛行的是颠倒的世界观,因为这种状态本身是颠倒的世界的状态。对于今天的俗人、基督教的小商人和犹太教徒来说,个体就是生活的目的,而类生活却是生活的手段。他们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特殊的世界。从理论上说,这种颠倒的世界的典型形态就是基督教的天国。在现实世界中,个体是要死亡的,在基督教的天国中个体是永生的,在现实生活中,类在个人身上并借助于个人表现出来,在天国中类存在物即上帝生活在个体之外,这些个体不是上帝赖以表现出来,类存在物赖以生存的中介,而是相反,个体借助于上帝而生存。在这里,类存在物被贬低为个体生活的手段;基督教的“自我”需要其上帝;它为了其个体的存在,为了其神圣的、不死的灵魂,为了灵魂的拯救,需要其上帝!“如果我不希望享有不死的命运,那我就既不为上帝,也不为整个教义而烦恼了。”——一位非常虔诚的人所说的这句话中包含着基督教的全部本质。

基督教是利己主义的理论、逻辑。而实践的利己主义的古典的土壤就是现代的、基督教的小商人世界(Kramerwelt)^①——也是一个天国,也

① Kramerwelt,中文原译“小贩世界”,本书根据日文译为“小商人世界”。——邓习议

是一个虚构,也是对个体生活的一种想像的、臆造的好处,这种好处是从堕落的人类的病态的、利己主义的恶作剧中产生的。不是想通过自身为类而生活,而是想通过类仅仅为自身而生活的个体,在实践上也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颠倒的世界。因此,在我们的小商人世界,个体在实践上是生活的目的,类只是生活的手段,正如在基督教的天国,个人在理论上是生活的目的,类只是生活的手段一样。在这里,类生活既不是在个体身上,也不是通过个体表现出来;在这里,也同在天国一样,类生活被置于个体之外,被贬低为个体的手段,在这里,类生活就是货币。上帝对理论生活所起的作用,同货币对颠倒的世界的实践生活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人的外化了的能力,人的被出卖了的生命活动。货币是表现为数目人的价值——它是今天的奴隶制的印记,是今天的奴役的不可磨灭的烙印——可以拿来买卖的人就是奴隶。货币是穷苦人血汗的结晶,这些穷苦人把自己的不可让渡的财产、自己的特有的能力、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拿到市场上去出卖,以便换得同样是穷苦人的死的生命(*caput mortuum*)即所谓资本(*capital*),靠野蛮地吃自身的脂膏为生,过食人的生活。——而我们大家就是这种穷苦人!我们在理论上完全可以摆脱颠倒的世界意识,但是只要我们在实践上还没有离开颠倒的世界,我们就必然要如俗话说,入乡随俗。是的,我们必定要继续出卖我们的本质、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的自由的生命活动,以便能够维持贫困的生活。随着我们的自由的丧失,我们可以继续买到我们的个体的生存。当然,绝不仅仅是我们无产者,而且我们资本家都是这种喝自己的血、吃自己的肉的不幸者。我们大家都不能自由地实现我们的生活,不能进行创造,或者说不能彼此为别人进行活动——我们大家都只能啃吃自己的生命,只能互相吞噬,如果我们不愿意饿死的话。因为我们花费的、我们劳动挣得的货币,就是我们自己的血肉,这种血肉在其让渡中必定被我们所挣得、夺得并吃掉。我们大家都是——我们用不着隐讳这一点——食人者、食肉兽、吸血鬼。只要我们大家不是为彼此而活动,而是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挣钱,我们就一直是这种东西。

六

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货币应该是一般的交换手段,因而是生活的中介物,是人的能力,是现实的生产力,是人类的现实的财富。如果这种外化的财富在现实上同内在的财富相适应,那么每个人的价值就恰好等于他所拥有的现金或占有的货币价值——正如彻底的神学只能根据人的信奉正教的程度来评价人,彻底的政治经济学只能根据人的钱袋的重量来评价人。但是,实际上,经济学同神学一样,关心的根本不是人。国民经济学是尘世的发财致富的科学,正如神学是天国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一样。但是人绝不是财产!人对于纯粹“科学的”经济学家和神学家说来,没有任何价值。相反,在运用这两种神圣的科学的地方,也就是说,在我们现代的小商人世界的实践中,人实际上只是根据他的钱袋来加以评价的——正如在目前在部分地方仍然盛行的基督教中世纪的实践中,人是根据他的宗教信仰来加以评价的一样。

七

货币是相互异化的人的产物,是被外化了的人的产物。

货币不是“贵金属”,——现在我们所有的纸币、公债券、银行券比金属货币多,——货币是在这里被称为人的生产力,被称为人的存在物的现实的生命活动的东西。因此,根据国民经济学的定义,资本是积累的、储存的劳动,——而且因为生产来源于产品的交换,所以货币是交换价值。凡是不能拿去交换、不能出卖的东西,也就没有价值。如果人再也不能被拿去出卖,他也就一文不值了,但是如果人自己出卖自己,或者说,“受雇于人”,那就会有价值。经济学家们甚至断言,随着人再也不能被拿去出卖,因而再也不用为了活着而被迫自己出卖自己,人的价值就会提高,经济学家由此得出结论说,“自由的”人比奴隶更“有价值”。这是完全正确的。饥饿同奴隶主的鞭笞相比,是促使人去劳动的更强大的动力,而对货

币的追求同满意的主人的开恩的微笑相比,具有能促使私人所有者使用他的全部力气的更强大的诱惑力。国民经济学家们只是忘记了,“自由”越普遍,“自由”的价值就会越低。“自由的”人越是争着去从事奴隶劳动,就是说,“自由的”人越是容易买到,他们就越便宜,或者说,会变得越便宜。讨厌的竞争会损害“自由的”人的价值,——而且实际上,在利己主义的私人经营的基础上,除了恢复奴隶制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可以重新提高人的价值的手段。

八

古代的奴隶制是建立在掠夺行为的基础上的人的交往的自然形式,那种奴隶制是最合乎人性的形式。人们只能不自愿地被出卖,这是自然的和合乎人性的。相反,人们自愿地自己出卖自己,倒是违反自然的和违反人性的。只有现代的小商人世界利用基督教这个按原则来说是违反自然的东西才得以达到卑鄙无耻、违反自然和违反人性的这个顶点。

人首先必须学会蔑视人的生命,以便自愿地把它加以出卖。人们首先必须把以前认为现实的生命、现实的自由是无法估价的财产的认识忘掉,以便把这种生命和自由拿去出卖。人类不得不先经过奴隶制的训练,才能在原则上效忠于奴隶制。

我们现代的小商人是中世纪的奴隶的当之无愧的后代,正像中世纪的奴隶即基督教徒的奴隶是异教徒的奴隶的当之无愧的后代一样。正如浪漫主义的奴隶制是变本加厉的古代奴隶制一样,现代的、基督教的小商人世界是变本加厉的浪漫主义的奴隶制。古代人还没有把人的生命的让渡提高为基督教的自我让渡,还没有把人类社会的崩溃状态提高为意识,还没有把这种事实提高为原则。古代人是素朴的,他们心平气和地忍受了作为他们曾经在其中进行活动(而且我们现在也还在其中进行活动)的那个世界的本质的东西——人的让渡。正如宗教曾经得到它所需要的、由古代人所奉献的人这种牺牲品,政治也曾经得到它自己的这种牺牲品,并没有人设法对这种野蛮行为进行“科学的”论证,并没有人设法在还没

有觉醒的邪心面前把这种野蛮行为虚伪地加以美化。当这种邪心觉醒的时候,基督教已经形成。基督教就是堕落了的人类的觉醒了的邪心的诡辩哲学,是想摆脱对这种邪心的谴责的企图。但是,基督用来摆脱良心谴责的办法,并不是把贫困的人类世界从贫困中解救出来,而是硬要自己相信,这种人的贫困并不是错误的东西,而是正当的东西,现实生活按法律就是外在的生活,生命的让渡是整个世界的正常状态。

基督能区别“内在的”人和“外在的”人,即现实性和非现实性。因此,人的“精神”,即当一切“肉体的”东西都已经消散时剩下的遗骸——并且这里剩下的东西也是看不见的,因为它就是无——人的“精神”是人的神圣的和不可让渡的生命;而人的“肉体”却是非神圣的、不好的、糟糕的、外在的,因此也是可以让渡的生命。非现实的人不能把自己作为奴隶出卖,现实的人反正是一种废物,因此,他不仅能够,而且应该遭受贫困:对于贫困者说来,这就是天国。——这种学说的直接结论就是,人们事实上让奴隶制存在,甚至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只要不再出卖人,而仅仅出卖肉体,就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这是更深地陷入泥潭的进步。这样,一旦确立了商品化的原则,那就为普遍的奴隶制,为我的小商人的一般的、相互的和自愿的人身买卖开辟了道路。

九

现代商业世界的本质即货币,是基督教的实现态。小商人国家,即所谓“自由”国家就是基督许诺的神权之国,而小商人世界就是基督许诺的天国——正如反过来说,上帝不过是观念化的资本,天国不过是理论上的小商人世界一样。

基督教发明了商品化的原则。但是它还没有为运用这一原则而操心。因为对它说来,现实是不好的和微不足道的东西,所以它根本不可能关心现实、因此也不可能关心它的原则的实现。因此,人们是否真的把自己出卖了,即变成农奴,肉体上的奴隶,对它说来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它听任“外在的”、“尘世的”当权者去从事这种“外在的”实践。只要这些当

权者或多或少还囿于理论的外化，囿于基督教的信仰，只要这些当权者还没有达到实践的基督教，那么现实的奴隶制，尽管它在理论上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却是某种纯粹偶然的東西。

基督教在现实中，起初并没有使典型的奴隶制发生任何变化；实在的奴隶制保留下来了——它只是被一个原则所丰富了。但是，一个新的原则绝不是新的实在，这种区别对我们新近的基督徒们说来，对于晚近的哲学家们说来，还是十分熟悉的。谁会对这种敏锐的理解力感到惊奇呢？只要提出一种理论，——而基督教像哲学一样只是提出了一种理论，——那么对实际的生活的态度就是无关紧要的，理论是一种“由于自身的缘故”而不是由于应用的缘故被教导并被学习，被提出并被接受的“真理”。因此，在中世纪，就像在古代一样，一个人是否曾经是现实的奴隶，或者说，他在现实世界中是否仍然是自由的，同样是偶然的。

中世纪的奴隶制和古代的奴隶制之间的区别只存在于理念中。相反，在现实中，前者同后者根本不可能有丝毫的区别。前者既不比后者好，也不比后者坏。人在中世纪，也像在古代一样，由于其本质不可能要求现实的自由，——因为人们在古代还不知道，由于这种原因也不承认这种本质，而在中世纪只是在“精神”上和“真理”上，在神的彼岸世界，由于这种不同的原因不是在生活的现实中承认人的本质，——所以，人们在中世纪，也像在古代一样，不会提出把所有的人，即每一个人都变成现实的奴隶的任务。因此，无论在中世纪，还是在古代，都还存在着若干的自由，在中世纪，像在古代一样，除了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①生来就是奴隶身份的“若干的”人以外，事实上偶然也存在着“若干的”自由身份的人，即被称为“阁下”的贵族们。因此，奴隶制实际上也仍然是建立在掠夺行为的基础上的交换的自然形式。中世纪的奴隶制实际上不是，也不可能是人的自我让渡，因为人不可能自己把自己变成直接的、自然的奴隶。人的直接的生命，他的自然的肉体，只能被别人所占有。不是奴隶的别人属于直接的奴隶制度。中世纪的奴隶不可能占有奴隶，他不占有任何东西——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一篇第一章第四节。——HS

他占有他自己的肉体并不是作为财产来占有的——他怎么可能占有别人的肉体呢?!

如果基督教徒关心今世的立法,那么他们很快就一定会认识到,“尘世的”状况仍然同他们的原则相矛盾,这里盛行的还是各种各样的“自然性”。但是他们并不关心这一点,因为基督教徒是理论的利己主义者。——但是,当人们逐渐因启蒙而变得实际,今世就想把基督教加以实现的时候;当人们想运用“纯粹的”基督教,实现其“思想”的时候,人们就发现,基督教所宣布的“精神上的”自由和平等还根本没有实现。为了把肉体和精神之间的敏感的区别也引入生活中来,人们必须更加机敏得多地作为纯粹理论的利己主义者进行工作。必须找到一种社会生活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人的让渡就像在基督教的天国一样普遍地表现出来。没有肉体的自由的精神也必然会在今世出现——这真是莫大的无稽之谈,但是我们的受基督教精神教养的现代立法者和政治经济学家们的机敏却揭露了这种无稽之谈。基督教在我们的小商人世界中实现了。

十

现代的立法者作为启蒙的和实践的基督教徒不可能对彼岸的立法感到放心,而是想在地上获得基督教的世界,他们的天国;因此,他们必须使天国的神灵在此岸出现。但是,这种召神术并不是妖术,已经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因此,虽然现代立法者并不是会行妖术者,但是他们也能够轻而易举地使召神术得到成功。人们只需要把事实上(从奴隶制中产生出来的)中世纪的市民社会就已存在的私人——这种人把属于他的类生活的一切东西都放弃、摒弃、舍弃了,而在天国,即在理论上把这些东西归还给了上帝,在尘世,即在实践上则把这些东西归还给了货币,——人们只需要把现实的人的这种死去的遗骸,这种抽象的“人格性”封为圣者,确认为圣物,那么基督教天国的无性别的个人也就在今世实现了。换句话说,只需要在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方面,关于实际的生活发生了以前在宗教和神学方面,关于理论的生活发生过的那种情况,人们只需要更加把生活的

实践的让渡，像生命的理论的让渡一样提升为原则。

这样，天国的利己主义也会在尘世中得到贯彻执行。人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人们通过把人确认为孤立的个体，通过把抽象的、赤裸裸的人格宣布为真正的人，通过宣告人权、独立的人的权利，因而把人与人们相互的独立、分离和个别化宣布为生活和自由的本质，证明孤立的人格就是自由的、真正的、自然的人，也就确认了实践的利己主义。这些单子就可以合乎逻辑地不再彼此直接发生交往——这在以掠夺为基础的我们的交往中就等于说：不要再进行交往，不要再直接进行买卖。这种直接的交往，直接的人身买卖，直接的奴隶制、农奴制必须消灭，否则人还会彼此依赖；但是代替直接的奴隶制的必然是间接的奴隶制，代替事实上的奴隶制的必然是原则上的奴隶制，这种原则上的奴隶制使一切人都成为自由的和平等的，就是说，把一切人加以孤立并加以消灭。

随着事实上的奴隶制的消灭，掠夺不会消灭，消灭的是直接的掠夺。这无非是逻辑的利己主义的运用，通过这种办法，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奴隶制现在是被消灭了。只有在现在，奴隶制的原则——由于个人的孤立化，人的本质的让渡和本质被降低为这种个体的生存手段——才能普遍实行。现代小商人世界的这种在原则上得到了实行的利己主义不仅在今世而且在来世，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会把一切直接的交往、一切直接的生活消灭掉，只是还允许这些东西作为私人生存的手段。但是，在一切人的交往，一切人的活动都被直接消灭，只有作为利己主义的生存手段才能实行的地方，在从最自然的爱情即两性的交往，直到整个知识界的思想交流，没有金钱就寸步难行的地方；在除了金钱化、商品化的人以外没有其他实际的人的地方，在为了能活下去每一次心跳都必须先加以变卖的地方；天国的神灵正在地上漫游——因为今世也有非人化的人——来世的“至福”变成了今世的“幸福”，理论的利己主义变成了实际的利己主义——现实的奴隶制的纯粹的事实被提升为原则并彻底贯彻。

十一

私人 and 共同体的分离，家庭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分离，实际上始终是存

在的；因为这种分离无非是人格和财产的分​​离罢了。同自己的一切生存手段相分离、相脱离的“个性”，这种没有肉体和生命的幽灵，从历史一开始就追赶其失去的身体，时而在天国的彼岸，在上帝这个使他获得永远遥远的、始终可望而不可及的“至福”的授与者身上，时而在地上的彼岸，在货币这个使他获得永远遥远的、始终可望而不可及的幸福的授与者身上寻找自己的身体。如果这种只要宗教和政治存在它就实际存在的个人和财产的分​​离^①，只需要原则上加以承认和确认，那么，这样一来也就宣布，只有货币才是共同体或国家，而人只不过是它的工资持有者，其实只是一个赤贫的钱袋持有者。因此，在现代的国家制度中也不是人，而是钱袋才是立法者。如果说私人代表神圣的“人格”，那么相反，公人则代表神圣的“财产”。正如以前立法者们从上帝那里获得他们的全部权力一样，现在立法者们就从财产那里，从货币那里获得他们的全部权力。

与人格、即人相脱离的抽象的“财产”的神圣性，完全是以与自己的财产相脱离的、抽象的、赤裸裸的、空洞的“人格”的神圣性为前提的，反过来说，后者也同样以前者为前提。只有当“个性”恰好脱离了一切现实的财产以其神圣的纯粹的形式出现时，抽象的、让渡的、外在的和可出卖的财产才能同样脱离一切人的东西以其神圣的纯粹的形式出现。因此，在每一单个的人周围有一条明显的界线，神圣的人格应该处在这条界线以内。这些神圣的人格是地上的天国的极乐的精灵，肉体是其影子。因此，他们的界线是他们的表皮。但是，人的具象性的大气在天国就是上帝，超人类的善，而在地上就是在人外部的、非人的、用手摸得着的财富，事物，财产，脱离了生产者即它的创造者的产品，交往的抽象的存在，即货币。

“人格”这样被封为圣者，绝不是因为他是一种人的本质，——他的本质毋宁说已经完全脱离了他，在利己主义中一般人的东西是不受重视的——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自我”！另一方面，“财产”之所以被封为神圣，也不是因为它是人的财产——它只不过是一种事物，决不像天国的上帝那样是超人的东西，是人之外的东西——毋宁说，它之所以神圣，是因为

^① 请参照《二十一印张》刊载的赫斯论文《行动的哲学》。——日译者

它是利己主义生存的手段，因为它被“自我”所利用（实际上，彼岸的利己主义是这样感觉地理解）。但是利己主义却想在赤裸裸的个人抽象地或者独立地同他的自然环境和人的环境相脱离，同他的肉体的和社会的环境相脱离的条件下保全赤裸裸的个人，想在无生气的、无机的、不活动的、石头般的存在中保住他——利己主义感觉不到他的表皮以外的任何东西，看不到比他的鼻子能伸到的地方更远的任何东西——倒不如说，这种目光短浅的东西破坏了个人的现实生活本身。

明智的基督教立法者甚至根本没有想到，人要是离开他赖以呼吸的空气，是不能不在与外界的隔绝状态中悲惨地窒息而死的，不仅这些立法者所划定的肉体界线内的东西，而且整个自然界都属于人的自然的或肉体的生命，不仅留在人内心的产物，思想和感觉，而且社会生活的全部产物都属于人的精神的或社会生命活动。这些立法者没有想到，同环境隔绝的人是一个抽象的、剥了皮的生物，他像被剥了皮的生兽肉一样，像丧失了空气的没有生气的造物一样，决不会是活的。这些立法者使人丧失了全部社会生活的空气，再让他决定为此用货币这种物化的基督教的精神即上帝到处喷吐气体并尽可能保全自己。而他们又宣布这种灵魂复归（毫无生气的 *in Spiritus gesetzten*）的神圣的僵尸是自由的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限的人格！这些神圣的僵尸为了保全自己该怎么办呢？他们为自己寻找灵魂，寻找他们如果得不到就会腐烂的已离开的本质，他们彼此剥夺对方，他们互相掠夺，以便不至于没有财产——他们互相残杀，以便能够生活，即能够可怜地生存下去！——因此，人们认为，通过彻底实行一种以死亡的平等为基础的猛兽的自由，能够创造人的自由和平等。人们把这种自由称为人的自然的自由！那些有自由思想的立法者呀！你们向贫穷的人说了如下一些话：“你们生来是自由的，而你们的自然的自由，你们的赤裸裸的人格应该仍然是你们的不可侵犯的、不可让渡的财产。但是，凡是属于你们的社会生活的东西（当然一切都属于这种社会生活，如果你们挣不到社会所制造的生活资料，你们就不可能维持自己的自然的生命），因而，凡是属于你们的生活的东西，你们必须各自彼此争夺。你们正是必须利用你们的自然的自由，去为自己获得生活资料。你们通

过让渡自己的自然的自由就能挣得这种资料,但这是自愿地让渡!谁也没有被迫让渡他的自然的自由,被迫把自己出卖、出租,受雇——如果他宁愿饿死的话。——但是,你们要当心,别让更加懂的这一点的其他人出卖、拍卖了你们的自然的自由,你们要当心,别让这些诚实的人们扰乱你们的生计!如果你们想挣得生活资料,那么你们就必须自愿地放弃自己的自然的自由,像其他诚实的人们那样,把它加以拍卖。——但是,为此,当你们挣得了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们也可以重新买入并利用别人的自然的自由。”

人身买卖,即人的自由、人的生命的交易,在今天真是太普遍了,简直到处都可以看到。但是,有人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绝不是只是没有财产的人,才用他们的自由去换取生存资料。一个人越是“挣得”多了,他就越想继续多“挣得”一些东西——他想为了他的私人目的而榨干整个世界。是的,人们会非常习惯于用他自己的自由和别人的自由去作交易,人们最后会被束缚,以致对自由的活动、对真正的生活根本毫无所知,再也没有一点思想的痕迹。随着无产者的奴隶状态作为事实而愈明显,那么它在有产者那里就越是一块心病。——但是对于这一类天生的奴隶来说,明显的奴隶制本身却是看不见的!——我们的男女工人,我们的短工、仆役和婢女找到雇主时是高兴的,按照现代的概念来看,他们是自由的工人,而雇主正当地雇佣许多人手,正当地养活许多人,他是“市民社会的值得尊敬的(通常也是非常有自由思想的)有用的成员”。但是,在“自由的”北美洲的黑人,也完全和我们的“自由的”工人一样,为雇主而劳动,——那些奴隶主也完全和我们的市民社会的值得尊敬的有自由思想的有用的成员一样,正当地雇用许多人手并正当地养活许多人,那些黑人和那些奴隶主又怎么样呢?啊,那么不符合基督教精神呀!

……诚然,这是非洲海滨的“可耻的”人身买卖和我们大门口的体面的人身买卖之间的区别!甚至是基督教的北美洲的现代奴隶制和非基督教的希腊的古代奴隶制之间的本质区别!希腊人豢养奴隶,目的是为共同体服务,能够过自由的生活,在自由的空闲时间培植艺术和科学,古代人还没有使奴隶这种人的机器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机器,但是,如果他们拥

有这种新发明的话，他们也会像亚里士多德用明确的话所表示的那样^①，不豢养奴隶，以满足自己的贪欲了。但是，现代人，基督教徒只是购买人，因为他们用买来的人劳动可以比雇佣的人劳动更便宜，相反，一旦那种人身买卖看来不再那么有利可图或者威胁到小商人的生存了，他们就声称那种人身买卖是可耻的。——现在人身买卖已经在我们大门口进行了！什么样的本质区别！

在我们这里奴隶制已不再是单方面的了，它是双方相互的了：不仅我使你成为奴隶，而且你也使我成为奴隶，而且不是通过我们彼此直接夺取对方的自由的办法，——这已行不通了，而是通过我们彼此剥夺自由的手段，剥夺生活资料的办法。因此，我们可以不再违反自己的意愿被出卖，不，我们只需要经常把自己出租，受雇于人——我们只需要可以说经常完全自愿地放弃自己的自由就行了！是的，我们现代的立法者已经把出卖和受雇区别开来……这个主意妙极了！不过且慢！我们现代立法者的这个主意无非是奴隶的主意。——可以说，对于现代的小商人世界说来，明显的奴隶制本身也是看不见的。

十二

小商人世界解决了这样一个任务——把基督教变为现实的任务，即不仅在虚幻的理论中，而且在现实的、实在的生活中，在实践中使人完全丧失一切能力，并把这些能力赋予一个想象出来的、幻想的存在物的任务，——用明明白白的天国的虚构同样明明白白地把尘世变成地狱的任务——使人在社会生活中丧失一切人的生活的空气，把人放在利己主义的气泵下面并且把这些可怜的人的垂死挣扎看做人的正常的生命活动的任务！

同我们的社会关系相比，不仅古代，甚至连中世纪也还是合乎人性的。中世纪的社会尽管有其全部可诅咒的野蛮法律和制度的附属物，但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一篇第一章第三节。——HS

是没有像现代社会那样使人彻底堕落。在中世纪，除了无足轻重和一无所有的奴隶以外，还有具有社会财产、社会地位的，有所作为的人。等级和行会虽然只是利己主义的团体，但具有社会地位，具有公德心，尽管是狭隘的公德心，单个的人可能在其社会活动范围内消失，同共同体融合在一起，虽然是以愚昧无知的方式。——现在，当为普遍的奴役找到了范式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现在，人的社会生活完全没有任何高尚的动机了。再也没有社会的财产，没有活生生的财产，没有确实拥有某种东西或者说有所作为的人了。人们想象能从中占有某种东西的这种普遍的废物是人们徒劳地加以追求的幻影！

真正的社会的财产究竟在哪里呢？只不过是社会中生活和活动的手段罢了。财产是社会的人的肉体，而它作为这种肉体是在社会中生活的首要条件——正如自然的肉体，自然的财产是一般生活的首要条件一样。但是，什么是我们的社会的财产呢？——这种普遍的废物，这种货币不是有机的、活的肉体。是的，它应该表现社会的身体，有机的类生活，社会的交往；但是它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按其本性来说是无机的，没有构造，没有内在的差别，它无非是一个僵死的量，一个数量或数目。活的存在物，人及其最崇高的生活和活动的价值，社会生活的价值，怎么能够用数量、数目来表现呢？——只有在人们剥夺了人的灵魂的现实的生命，把它细分、分解了，把其中的一半放到来世，另一半放到今世以后，人们才会产生这种荒诞的想法。

人们想象出没有身体的精神世界，因而想象出一个妖怪，又把没有精神、没有生命的身体世界，死的物质——因而又是一个妖怪同它对立起来，然后让那些失去肉体的灵魂去追赶这些失去灵魂的物质，以便能够夺得或大或小的一块，继续勉强往前走。这就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妖怪世界的真实写照。——从那个死的、失去灵魂的、无机的物质中，从我们追赶它就像幽灵追赶其失去的肉体的那种普遍的废物中，我们还可以获得和挣得许多东西：用这种办法我们仍然得不到现实的、活的财产或者说社会的财产，我们得不到为我们在社会中的生活和活动，我们的社会活动所决定和要求的東西，只能在死去的、石头般的存在中保全物化了的基

督教的上帝，精神或灵魂，在这种精神或灵魂中我们可以保存我们尘世的尸体。

货币永远不可能变为财产，相反，每一个还没有被毁灭的人的本性必须把货币看做是某种外在的东西，不是人所特有的东西，正是那种构成任何真正的、现实的财产的性质东西，即占有者和财产的内在的不可分离性，在这里表现为最令人讨厌的、最令人鄙视的负担。——如果谁向来跟他的财产、跟他的现实的社会的财产完全相同，以致他像灵魂一样同他的身体长在一起并在其中消失；如果谁能够完全占据他的位置，以致这个人同其活动范围的分离甚至是不可设想的，这在现在是属于例外的一种现象，因为现在一切社会努力的内容就是货币——这种人是高尚的人，真正的人；因为并不是由于基督教的哲学凌驾于日常生活之上，而是由于克己及彼此为对方而生活和活动，人才成其为人。因此，占有者和财产的不可分离性是现实的财产的性质，既是社会的财产，也是一切自然的财产的性质。我现实地占有的一切，因而，作为我的活的财产的一切，是同我最紧密地长在一起的，它必须如此，因而也应该如此。

而同我们的所谓财产，同货币财产最紧密地长在一起的人是什么呢？那种和他的货币完全相同，以致不能同货币分离的人是什么呢？是可怜的家伙！但是我们还必须把这种普遍的废物看做是我们的首要的生活条件，看做是我们的不可或缺的财产，因为没有它我们就不能保住自己。因此，你必须永远努力去占有某种不能被占有的、永远离你很远的、留在来世的东西。你在你的货币中只能占有失去灵魂的肉体，你永远也不能使这种肉体具有灵魂，这种肉体永远也不能成为你的财产，你必须把有一个不属于你的肉体作为幸福，把能够用你自己的肉体、用你自己的血肉、用你自己的生命活动去同这种废物相交换，因此把出卖你自己作为幸福——这在中世纪和古代至少还被看做是不幸——你必须把成为现代的奴隶作为幸福；因为你经常面临着重新沦落到极乐的精灵的那种原始状态中去危险，而我们的立法者已经恳求基督教的天国能获得这种原始状态，并宣布这种状态是“自然的”人的正常状态——你经常面临着成为一个纯粹的、自由的、赤裸裸的人格的危险！

十三

小商人世界是**实际的假象和谎言的世界**。在绝对独立的假象下面是绝对的贫穷，在最活跃的交往的假象下面，是把每一个人与他的全体同胞死一般地隔绝，在保证每个人享有不可侵犯的财产的假象下面，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的全部财产；在最普遍的自由的假象下面是最普遍的奴役。毫不奇怪，在这个**实现了的谎言**的世界上，欺骗就是准则，诚实就是过错；卑鄙无耻获得了一切荣誉，而诚实的人得到的是贫困和耻辱；伪善在庆祝它的胜利，真实被看做是行为不端，优柔寡断逐渐成为多数，坚决果断无疑成了少数；结果，最自由的观点是**最具有破坏性的因素**，相反，最愚昧无知的奴隶根性却是**最稳妥的因素**！

十四

像腐烂的果实从生活之树上脱落一样，同自己生活的根基，同自己的生活要素分离，因而正在枯死的孤立的个体只能人为地脱离腐烂状态或者说被保存起来。有生命的存在物不是保存自己，而是从事活动，每时每刻都在重新生产自己。但是，为了能真正活着，即能够从事活动或者说生产自己，同一个比较大的有机体的各种不同的单个成分彼此之间必须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就像与其共同的生活要素或生活材料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一样；这些成分、它们的身体和它们的生活环境不能相互分离。个体的这种分离、孤立和分散是动物世界、利己主义的特点——在此以前人类也曾具有这种动物的性质，因为人类还处在生成过程中，因为动物世界本身无非是正在生成过程中的人类。正是这种人类具有**双重的生成史**：一种——它的第一个生成史——是它的还没有意识的或者说身体的存在的生成史，在自然的动物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生成史；另一种——它的第二个生成史，这个生成史从第一个生成史出发并在第一个生成史之后，人类只有在第二个生成史以后才完全地、完整地、完满地存

在——是它的有意识的、精神的或者说社会的存在的生成史，在社会的动物世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生成史。

我们现在正处在社会动物世界的顶点、最高点；因此，我们现在是社会的猛兽，完成了的、有意识的利己主义者，我们确认自由竞争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①确认所谓人权就是孤立的个体、私人、“绝对的个性”的权利，确认职业的自由就是相互剥削、货币欲，这种货币欲无非是社会猛兽的嗜血欲。我们不再像我们仁慈的祖先那样是食草动物，他们虽然也是社会动物，但还不是社会猛兽，他们按其大多数来说好像仁慈的家养猛兽一样，只是被饲养——我们是互相剥皮、互相吞噬的吸血动物。正如动物只有在鲜血中才享受它自己的生活，但是以动物的、残忍的方式享受——人是在货币中以残忍的、动物的、食人的方式享受他自己的生活动。货币是社会的血，但这是被出卖的、被抽出来的血。

犹太人在社会动物的自然史中曾经负有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要从人类中培养猛兽，现在他们终于把他们的这个使命完成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秘密在现代犹太教式的基督教的小商人世界中已经变成公开的秘密了。基督的密的秘密和古代犹太教对血的崇拜的秘密一样，在这里完全不加掩饰地表现为猛兽的秘密。在古代犹太教中，血的崇拜只是一种原型的崇拜；在中世纪基督教中，这种崇拜是以理论的方式、唯心的方式、逻辑的方式实现的，就是说，人们实际上是吞噬人类的被出卖的、被抽出来的血，但是只有在想象中才吞噬神人的血。在现代犹太教式的基督教的小商人世界中，社会动物世界的这种癖好终于不再以象征的方式或者神秘的方式，而是完全以散文的方式表现出来了。在社会猛兽的宗教中还有诗，虽然这不是奥林匹斯山的诗，但这是布罗肯山的诗^②。

① 这句话应该源自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写道：“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309 页）。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也引述了这句话（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95 页）。——邓习议

② 布罗肯山是希腊东北部的最高峰，作为希腊神话中众神居住的地方而闻名。另一方面，布罗肯山因其是德国的哈鲁兹山脉的最高峰，自古作为“布罗肯山的妖怪”而著名。——日译者

只有当自然界重新提出了它的权利,而孤立的人,这个可怜的古代的奴隶和中世纪的奴隶不再满意天国的圣餐时,当他不再为获得精神的财宝,而是开始为获得物质的财宝而斗争,不想再为他那看不见的胃,而想为他那看得见的钱袋而玩弄他的被出卖了的生命、他的被抽出的血时,才开始形成日常的散文式的社会动物世界。因为神圣的魔术变成了世俗的魔术,天国的欺骗变成了尘世的欺骗,带有诗意的神鬼斗争变成了动物的散文式的斗争,神秘的食神风习变成了公开的食人风习。上帝的教堂,即天国的地下拱形墓穴——牧师即社会动物世界的鬣狗^①曾经举办过想象中的出殡宴的地方——现在变成了货币之国,变成了尘世的战场,在这里,享有平等权利的猛兽正在彼此吸吮着对方的血。在货币之国,自由竞争之国,一切特权,一切等级差别都不存在了,这里盛行的据说是毫无诗意的,建立在死亡的平等基础上的猛兽的自由。面对货币,君主不再因为他们是人兽的狮子就有权利去进行征服,同样,在这里,板着面孔的牧师也不因为他是人兽中的鬣狗就有权利靠尸体的气味来恢复元气。倒不如说,这些人,像其余的动物人一样,只是由于共同的自然权利,由于其共同的品质,作为食肉兽,作为吸血动物,作为犹太人,作为金钱豹,还享有自己的权利。

十五

货币是凝结成为死的文字的、扼杀生命的交往手段,正如文字是凝结成为死的货币的、扼杀精神的交往手段一样。货币和文字的发明要归功于腓尼基人,这个民族也发明了犹太教的神。一位富有幽默的著述家^②在他的以《生产运动》为题的著作中,把我们在著作中(特别是在他的著作

① 鬣狗,一种外形似狼的动物,常吃狮子吃剩的腐肉。——日译者

② 这位著述家,指即将出场的舒尔茨。舒尔茨(Wilhelm Schulz, 1797—1860)是德国作家、激进的民主主义者,1832年写有“*Deutschlands Einheit durch National-Repräsentation, Stut*”,1835年亡命瑞士,任苏黎士大学讲师,在那里精力充沛地专注于著述活动,1843年的《生产运动》曾产生很大的共鸣与反响。伴随1848年3月革命勃发而回到祖国,由故乡Darmstadt推选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作为左派而活跃。——日译者

中)所占有的精神的资本,与我们在货币中所占有的物质的资本加以比较,然后补充说:“因此,废除货币将具有和废除文字一样的意义:这将是向世界历史发布命令,要它返回到娘胎里去。”^①他认为,他讲这段话是为反对废除货币说了某种十分机智的见解。首先,舒尔茨先生忽略了我们在货币中所占有的物质资本和我们通过文字能够占有的精神资本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并不亚于真财产和假财产之间的区别。当然我通过文字能够占有精神财富。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要把我们通过文字和著作所占有的(精神的)财富硬变为个人的私有财产,然后把它传给其私人的后代。诚然,我可以继承和获得一份藏书,一份所谓图书宝藏,我也能够通过圣经得到所谓的启示,但是,这种所得越是接近于货币收入,越是具有外在性和偶然性,越是隶属于盈利和亏损,我们的“精神”财富就越没有价值,越没有才智。或者舒尔兹先生认为,我有了文字和书籍就已经得到了智慧?

语言是活生生的、富于机智的交往手段,但文字并非如此。精神的货币只有同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是活生生的丰富精神的交往手段。语言能够向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因为它是有机的、排列整齐的整体。货币正如前面所证明的那样,不能同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因此,货币并不等于作为活生生的语言的著作,而是等于作为死的文字的著作。文字当然是很有特色的,它像货币一样,应该是莫洛克^②的发明者们所发明的。但是语言既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在那里发明出来的。——如果一种发明不再需要了,不再有用,甚至变得有害了,那么人们要不因此须要回到“娘胎”里去,就再也不会使用这种发明了。文字和铸币的发明是“有用的”发明,甚至是“必要的”发明,这是毋庸置疑的。人们反驳的只是,这种发明

① W. Schulz, 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 *Eine geschichtlich-statistische Abhandlung zur Grundlegung einer neuen Wissenschaft des Staats und der Gesellschaft*. Zürich und Winterthur, 1843. S. 79.

另外,这里的引文有若干省略。全文如下:“Eine Abschaffung des Geldes und sogenannten Geldsystems, wovon sich einige Communisten der Neuzeit träumen ließen, hätte also die gleiche Bedeutung, wie eine Abschaffung der Schrift: es wäre Commando an die Weltgeschichte, in den Mutterleib zurückzukehren.” (下划线部分是赫斯的引文)——日译者

② 参照《行动的哲学》的该译注。——日译者

因此在将来也是“有用的”和“必要的”。

在迄今为止的人的孤立状态中，在迄今为止的人的相互的异化中，必然会发明出表现精神的和物质的产品交换的外在的符号来，这是完全正确的。通过这种脱离现实的、精神的和活的交往的抽象，人的能力、生产力在人异化时就提高了；人正是在这种抽象的交往手段中有了他们自己的异化的起中介作用的存在物，因为人自身是非人，就是说没有联合起来，所以人必须在自身之外，即在非人的、超人的实体中寻找能够把他们联合起来的结合带。没有这种非人的交往手段，人就根本不能进行交往。

但是，人一旦联合起来，一旦在他们之间能够进行直接的交往，非人的、外在的、死的交往手段就必然要被废除。这种死的并能置人于死地的交往手段不可能，也不会任意地被废除的，这种交往手段的废除也像其创造一样，不会用命令的办法来实现。正如当人类处于内在的分崩离析状态时外在的联合手段的需要曾经创造了精神的和物质的偶像一样，人的直接的、内在的联合的需要又将消灭这些偶像。爱情在尘世还不能理解它的时候逃入了天国，但是它将重新在它诞生和被抚育的地方，在人的怀抱中得到其栖息之所。我们将不再徒劳地在我们之外和我们之上去寻找我们的生活。当什么事情内在地和现实地分离我们、离间我们的时候，再也不会会有疏远的实体，作为第三者的中介物闯到我们之间来，外在地、表面地把我们联合起来，“起中介作用”。

哲学的及神学的思辨将随着商业投机的停止而停止，宗教将随着政治的停止而停止。^① 我们由于受自己的本性的内在必要性和关系的外在需要的驱使，将通过联合成为共同体并把一切外在的交往手段，把我们的这一切肉中刺^②作为异己的身体连根拔除，将把那些同我们的资产阶级社会的非人现象和卑鄙勾当如此美妙地和谐一致的我们的哲学家、学者、牧师和政治活动家的这一切荒唐言论和伪善行径永远消灭干净。

① 赫斯关于政治和宗教的关系，关于宗教及政治异化的克服的理解，请参照《行动的哲学》。——日译者

② 《圣经·新约》“哥林多后书”12:7。“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HS

十六

我们所面临的有机的共同体，只有通过贫困和邪恶激情的痛苦的刺激，并由于我们的一切力量的最高度的发展，才能产生。只要我们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有机的共同体，人的发展的成熟的果实，就不可能产生，而如果我们彼此不进行交往，我们就不可能得到发展。但是，在交往的发展中，我们还作为单个的和孤立的人彼此进行斗争。我们为了我们的精神的和物质的交往手段而彼此进行斗争，因为我们作为孤立的人为了能够生活，需要这些交往手段。我们需要它们，因为我们还没有联合起来，但是我们的力量的联合或者共同活动就是我们的生活。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之外去寻找我们自己的生活，必须在相互斗争中去赢得我们自己的生活。但是，通过这种斗争我们赢得的东西，完全不是我们企图赢得和希望赢得的东西。我们本来以为会赢得外在的财产，而且我们自己只有在这里才能得到发展。这种荒唐举动只有当它确实有助于发展我们的力量和能力的时候，对我们说来才是有益的和需要的。在我们的力量和能力已经发展起来以后，如果我们不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就只会彼此使对方毁灭。现在我们的力量由于斗争已经不能再进一步发展了，其所以不能，就因为我们的力量已经发展起来了。但是，我们每天也看到，我们一方面只是非生产性地浪费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这些力量通过生产力的过剩又根本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如果说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还总是向我们谈论必须通过竞争的斗争取得进步，那么这是因为他们是没头脑的空谈家，因为他们犯了时代的错误，或者被利己主义所蒙蔽，没有能力去领会每个人只要睁开眼睛就能看到的真理。在我们所达到的这个发展阶段，如果我们不彼此在爱情^①中

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写道：“真正的社会主义”“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实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就不是宣扬革命热情，而是宣扬对于人们的普遍的爱了。因此，它不是向无产者，而是向德国人数最多的两类人呼吁，就是向抱有博爱幻想的小资产者以及这些小资产者的思想家，即哲学家和哲学学徒呼吁；它一般是向德国现在流行的‘平常的’和不平常的意识呼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37页）。——邓习议

联合起来,那么我们就只能更厉害地互相剥削,互相吞噬。用不了像那些没头脑的自由主义者所说的几个世纪,用不了几十年,成百倍地增长了劳动力将把必须靠这些劳动力的劳动为生的人的绝大多数推入贫困的深渊,因为这些人手将变得没有价值;而极少数从事资本积累的人如果事先不倾听爱和理性的声音或者向暴力让步,就将沉湎于奢侈丰裕的生活,并且在可鄙的贪图享乐的生活中灭亡。

十七

社会的形成史已经结束;社会动物世界的丧钟很快就要敲响。货币机器已经停止运转,我们那些进步的和倒退的政治家们企图使它继续转动是徒劳的……

(刘焯星 译,单位:中央编译局)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①

[德]莫泽斯·赫斯

虽然目前现代的痛苦仍是理论与实践的对立，并且从过去时代继承下来的现在的客观世界，事实上仍与我们的近代的感情和理念的主观世界相矛盾，但像文明国家中的德国那样的病症之恶化、矛盾之深刻的国家是不存在的。

德国文学的伟人们怀着何等深厚的感情以及何等明确的意识，创作出德国人的情绪和精神。在我们的理念王国中，已不存在任何偏见，任何憎恶的统治。在那里，完全承认人的尊严，并宣告人的永恒的权利。在那里，整个人类是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和伙伴。在那里，从野蛮时代的产生的盲目的利己主义的任何制度，也已不再存在。这样，那里居支配地位的是绝对的平等。

并且，在我们的周围有着具体形式的利己主义，无论对人类的这种绝

① 原载日文版《早期社会主义论集》，山中隆次、畑孝一译，东京未来社1970年版，第31—61页。——中译者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篇论文，匿名发表于1843年由瑞士发行的《二十一印张》杂志第74—91页。《二十一印张》杂志，是出于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机关报《德国年鉴》面临禁止发行，并且原本准备发行的月刊《Der deutsche Bote aus der Schweiz》，再次因为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而面临出版危险，因此该月刊原封不动地收录寄来的论文等稿件，并将杂志名称更名为《二十一印张》而出版。《二十一印张》这一杂志名称，是由于在当时的普鲁士对二十印张以上的大部头著作在形式上可免于检查，故带有应对这种书报检查制度的意味。在《二十一印张》杂志中除了赫斯之外，还收录了海尔维格、恩格斯、鲍威尔等的诗、论文。——日译者

对的平等玩弄怎样的诡辩,即利己主义无论怎样费力地混淆作为人的本质的东西和偶然的東西、正常的东西和异常的东西,要言之作为人的真正本性的精神和人的非真实的幼稚本性,但最终正如各种各样的个人都存在完全相同的東西那样,即使得出存在各种各样的人性这种结论,但我们还是在心底确信一切的人的本质性平等。我们与我们最伟大的诗人们一同感觉到这一点,与我们最优秀的思想家们一同认识到这一点。

是的,德国在理论上是最进步的。但遗憾的是,那仅仅停留于理论而已。在德国人一定的具体生活状态中,存在太多的精神性和普遍性。由于德国人是极其非实践的,乃至丝毫不想尝试将这种理念引入到生活。德国人把那种最崇高的感情、最优秀的思想当做美梦、“理想”。而且他的各个国民,例如与像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国民那样通常通过其行动超越他们自身的理念相对,德国国民根本不打算将其感情和思想付诸实践。

这样,虽然我们是最自由的人、最纯粹的民主主义者、最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完全甘于现实的分裂状态。我们忍受一切,从我们的高尚的哲学立场,或从我们的宗教的达观来看待恶劣的现实。由于我们缺乏把我们的理念引入生活的自信,只能把目光从现在移开,而把目光投向未来的彼岸。对彼岸的宗教来说,已没有比德国更好的土壤。行动哲学,也难觅如现在德国这样的极大障碍和必须斗争的地方。我们现在仍在为中世纪的世界病状,即实践与理论、政治与宗教、此岸与彼岸的对立而苦恼。

但尽管如此,能够领会行动哲学之原理的,却只有德国而非其他国家。哲学一般唯有达到其顶点之后,才能超越其自身而转化为行动。只有在精神中,通过精神产生的此岸与彼岸的对立,才能通过精神重新得到根本的克服。

德国哲学在现实上已经抵达近代的原理,而成为行动的哲学。虽然我们才刚刚踏上这一重要的精神之路,但能够有勇气把思想之剑的锋芒指向外界的哲学家几乎还没有。倒是有完全把生活置之度外的哲学家,也有能够无视生活却因离生活太近而顺利地与生活相妥协的哲学家。在这当中,也有由于对现实采取了与自我意识不太相称的方式,而把这种武

器指向自身,采取让自身的意识遵循恶劣的现实的方式,作自杀式的企图
的哲学家。

施泰因的确就是这样,^①他为对深深扎根于近代世界的本质的现象作出正确的判断而进行的努力,在此或许应该加以更详细的阐释。但我们必须进一步对前面我们自己关于这种现象的本质,还有这种现象与哲学及近代精神生活的关系,作出一般的、正确的判断。

上个世纪,通过对社会生活的中世纪形态的国家和教会采取争论性的批判态度,虽然开拓了通往对作为近代的基本原理的全部生活加以绝对的统一的欧洲文明各国的道路,但这只是在通往这条道路的途中,而并不表明已经抵达近代的基本原理。上个世纪一方面开展了宗教和政治上的启蒙,然而并没有触及到这两种现象的基石,而是满足于阐明教会和国家中意外产生的“弊端”,这些各种制度的统治者的恶意和无知的由来与虚妄,并有针对性地推行“理性的”宗教和“合法的”政治。

上个世纪的课题有两个,正如宗教上和政治上的这两个目标方向那样,还有两种国民分担这些工作。即,德国国民主要在宗教领域,法国国民则特别在政治领域致力于此。在德国是以康德,在法国是以革命作为上个世纪的目标的结果。

如今开始了近代史中的新时代。上个世纪,出现了一个新的作为国家的法治国家,和一个新的作为宗教的理性国家。不过在现实上,刚一达到打倒旧的宗教和政治的目标,就已出现以前的努力中包含的内在矛盾。无论是绝对主义,还是贵族主义或民主主义,任何一种政治都必然地为了自我保存,而不得不保持统治和奴役的对立。也就是说,政治有着对立的利害关系,这是政治之所以存在对立的原因。这正如精神的奴役是作为天上的政治的宗教,不是与这种或那种宗教,而是必然与一般宗教联系在

① 见法学博士施泰因《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HS

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 1815—1890),德国社会哲学家,行政学家。在基尔大学学习法学,1841年在巴黎接触社会主义思想,1842年写了在本文中赫斯对其作了批判的《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这本书,尽管是站在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但它对于社会主义思想在德国的传播,帮助人们认识社会问题的重要性和生活的独特性具有很大的贡献。此后,他在基尔大学、维也纳大学讲授国家学。还写有行政学、财政学等著作。——日译者

一起。由于宗教不否定自身,就不能使人达到(精神的)自由,并且宗教停留于它的神性即伦理,对人而言是彼岸的东西、外在的东西,人具有局限于朝这个目标而努力的利害关系,而这个目标一旦达到,宗教也就失去了自身的存在。

上个世纪所否定的,确实是旧的国家,但不是国家的一般概念。即,并非完全否定附着的利己性附属物,散乱的抽象人格的相互对立,以及那种人格的外在统治和支配的必然性。国家的弊病,与教会的弊病一样,不是从这些制度的本质中去寻求,而是从这些偶然的形式中,即国家的掌权者和教会的长老们的恶意与无知中去寻求。因此,当现在要建立“法治国家”和“理性国家”的时候,人们不无惊慌地发现,在全部敏锐的、有洞察力的知性批判之后看不见任何一种正面的、成体系的思想。

宗教已经“启蒙”。但是理性使某种新的宗教形式盛行。旧体制的政治即旧的统治形式被推翻,但是某种新的“法治国家”还没能建立起来。康德和法国革命以来,虽然求诸国家和教会的理性的合法性基础,但均以徒劳而告终。这有如下极为简单的原因,即中世纪的社会生活形式,既不是以理性也不是以法律为基础,而完全是由自发的、利己主义的盲目斗争和利己的个人欲望而产生的。

在这种公共生活中,人们尝试用新形式来代替被推翻的中世纪的各种制度,但结果却是徒劳的。虽然没给近代精神带来任何满足,但却形成了各种形式:不仅是面对过去的批判性的新思想,而且是面向未来的创造性的新思想,它已是秘密地、甚至事实上是完全违反警察令而形成的。

人们开始接受近代世界的基本原理。在德国最初是费希特,虽然确实或多或少还显得粗糙,但是仍阐明了精神的自律。在法国巴贝夫^①那里,可以说显露了统一的社会生活最初同样的形态。或者更容易理解地说,在德国是从费希特的无神论开始,在法国则与其说是从巴贝夫的共

① 巴贝夫(Francois Emile Babeuf, 1760—1797),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受青年卢梭的影响,抱有财产平等的思想,在1789年之后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多次被捕,为平等主义、共产主义生活的宣传及其实现而努力,与战友组成秘密结社,策划通过少数精兵的武装起义进行暴力革命,但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1797年5月被处死。——日译者

产主义,还不如说是从否定一切政治统治、国家和政治概念的无政府主义开始,犹如蒲鲁东^①所说的那样。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和法国由费希特和巴贝夫开始展开的本质性的新因素。现在,普遍的意识不过是吸收上个世界的成果,尽管在德国今天仍没有意识到,毫无例外都是从康德的知性范畴来思考一切,今天仍把“仅仅是理性(抽象的知性)界限内的宗教”看做现代的伟大目标,^②另一方面在法国,以“国民代议制”和“法律面前的平等”及其他假设为前提的“法治国家”,正以无可比拟的程度为一般人所接受,在这当中,在莱茵河的两侧,在德国和法国,完全悄悄地展开着未来的原理。

人们通常把康德看做德国哲学的创始人,并且在有丰富教养的诗人哲学家海涅^③那里,即以康德和罗伯斯庇尔、费希特和拿破仑、谢林和王制复古、黑格尔和七月革命作为类比的现象而对置,从各个方面将德国哲学与法国革命进行对比。然而德国哲学的真正创始人,如果实际地给出代表时代精神的个人的名字,而其世界观完全同样成为法国的社会哲学之基础者——除了斯宾诺莎^④别无他人。并且就海涅的类比而言,康德和罗伯斯庇尔即宗教革命只是类比的现象。可是德国哲学,即精神的自由的

① 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 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在1840年《什么是财产》一书中批判利息、利润和地租等不劳而获,指出“财产就是盗窃”,在当时有很大的反响。但由于他还没有达到对私有财产一般的批判,而是想通过小生产者的社会去除资本主义的矛盾,其小资产阶级立场对法国的劳动运动、社会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克思等对其进行了反批判。——日译者

② I. Kant, *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ssen Vernunft*. Königsberg, 1973. —— HS

③ 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德国抒情诗人。出生在没落的犹太商人家庭,写了很多爱情诗,1830年七月革命后移居法国,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并写了革命的政治诗,与“青年德意志派”一起,通过优秀的政治文学为祖国德国的市民解放而努力。本文中赫斯援引的海涅的观点,是海涅为有助于法国人了解德国而写的《论德国的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834—1831年用法语发表的该书又以德语概述而出版——)第三部“哲学革命。康德、费希特、谢林”中的观点,在这里第一次阐明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意义,最后还揭示了从哲学革命向政治革命的过渡,曾给予当时的德国知识分子很大的影响。——日译者

④ 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 1632—1677),荷兰哲学家。出生于犹太商人家庭,1656年作为无神论者而被开除犹太教教籍。受笛卡儿的影响,克服二元论,以实体概念(神)统一思维和存在,信奉泛神论。其伦理思想是在《伦理学》一书中展开的,认为认识作为一切事物的原因的神的本性,是人的最高的善和自由,其政治思想是共和主义。——日译者

积极发展,从费希特开始到黑格尔结束的整个过程,在原理上,并非是与革命之后的法国在政治上的实验相通的东西,在此提出这种类比,确实不过是诗人的幻想。

但是,如果对所谓德国哲学和法国社会哲学进行大尺度的类比,却简直有着惊人的一致。也就是说,德国哲学到了黑格尔那里不过是秘教的学问,如今作为思辨的无神论其影响开始波及实际生活,另外法国的社会哲学也同样,自圣西门^①和傅立叶^②之后,终于从现在的学派摆脱出来,开始作为科学的共产主义渗透到群众当中。这两种现象之间的相似性,不是诗的东西,而是哲学的明确的东西。换句话说,在巴贝夫的共产主义和费希特的唯心论失去其固有的基于虚无主义的力量之后,我们看到在德国出现了黑格尔和谢林,在法国出现了圣西门和傅立叶。

这种一切生活的绝对统一的近代原理——在德国表现为抽象的唯心论,在法国表现为抽象的共产主义——如今表现出其具体的内容。谢林和圣西门是作为感性的人,通过无中介的直观到达其成果。这些成果本身在没有首先通过思辨的辩证法加以精神化的情况下便被出卖给受惊的世界,这与其说是论证,毋宁说是通过劝说而使人们接受。但仅仅那样,由于还不是在科学的道路上获得的成果,因此还不是真东西。确实,近代的原理,在德国和法国所涉及的各种领域中,现在已有着坚实的地盘。它成为一种力量,并且在法国的社会生活中,在德国的自然中,富有生气地吹着,而使恶劣现实的僵死各种对立得以消解。可是,这种力量还没有获得与之相称的权利。还没有承认其对于精神的正当性。并且,与以严

① 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Rouvroy, comte de Saint-Simon, 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支持并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对法国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向与不彻底感到失望,提倡建立以工人、知识分子为中心的以劳动和科学为基础的实业社会。著作有《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实业家问答》、《新基督教》等。圣西门的思想为其弟子 A. Bazard 和 B. P. Enfantin 等传承,主张废除财产继承等。——日译者

② 傅立叶(Franc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出生于商人家庭,幼年时体验到商业的虚伪,曾前往欧洲各地旅行了解社会现实的矛盾,描画了以“法朗吉”的生产协作组织为中心进行快乐的劳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新社会的建设。著作有《四次运动的理论》、《论家庭农业共同体》、《实业社会的新世界》。傅立叶的思想为 V. Considérant 等接受,其乌托邦思想曾在北美进行实验。——日译者

格科学形式出现的黑格尔和傅立叶的学说相比,由于这些学说简单易懂,因此,会使人们着迷,而那些善于接受的年轻人则吸收得更为迅速。但尽管如此,这种力量最终必定让位于科学的更高的力量。

乍一看,在全然不同的领域中活动,然而两者之间并不是什么外在的联系,从这些思想家们——谢林和圣西门及黑格尔和傅立叶^①——的著作和他们的理论的命运的比较来看,他们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在黑格尔和傅立叶那里,是形成了新的用语与文体,而对圣西门来说,确实他自身虽没有他的精神上的同志谢林那样长寿,但如果他今天还活着,可以毫不勉强地说,大概已与谢林完全一样地加入了保守主义的行列吧。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他最忠实的弟子如米歇尔·舍瓦利耶身上,^②也能明白事实上确实如此。

德国和法国的精神留给自己的任务,本质上是同样的工作。并且,德国绝对精神自由的学说和法国绝对社会平等的学说,都归结为共同产生的同一的根本原理,那么质疑就是如何能够更进一步地追求这些理论的实践效应,犹如今天德法的情形表明的那样。并且,对于德国和法国的相同努力的最后疑问,无疑也如阳光下的雾一样,已逐渐消失。

虽然今天法国的社会理论,只要是从实际生活开始,确实又是与巴贝夫的共产主义相接近,但在本质上事实上远远超越了巴贝夫。关于这一点,在其能量和活动力方面又进一步通过与费希特的结合而超越了今天的德国哲学,这也在本质上,也同样远远超越费希特的无神论。这是因为,在巴贝夫的共产主义与今天的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完全充实的法国社会哲学,而在费希特的无神论与今天的无神论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完全辩证法式的德国哲学。

今天的共产主义并没有失去傅立叶伟大的理念:把劳动组织奠定在

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赫斯把法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德国哲学的发展综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把圣西门和谢林、傅立叶和黑格尔、蒲鲁东和费尔巴哈综合在一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80页)。——中译者

② 米歇尔·舍瓦利耶(Michel Chevalier, 1806—1879),法国经济学家。一度是圣西门主义者,Globe杂志编者。——HS

一切个性最全面自由的运动这个基础上。确实，傅立叶与黑格尔一样，对现状作了各种让步，这也给他的体系带来了在美、道德和知性方面的缺损，有鉴于此，虽然把傅立叶与黑格尔联系在一起是不可能的，但尽管如此，正是唯有在共产主义这种共同体的状态中，费希特的根本理念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和现实的可能性，同样也在另一方面，在无神论中，“绝对人格”这种黑格尔的理念才具有正当的意义，才能避免错误的解释。

依据傅立叶和黑格尔，法国和德国的精神抬高如下绝对的立场，即，在那里，人格的自由或绝对精神的自由的人格这种主体的无限权利，和赋予与此同样权利的客观世界的规律，即社会中一切个人的绝对平等，已经不再对立，而成为一切生活的绝对统一这种同一的原理的两个相辅相成的因素。过去对于共产主义，特别是基于法国的精神的非常通俗的非难，即，共产主义是一切人和一切活动的绝对自由——没有防止这种自由陷人恣意的外在的法，即没有任何种类的统治——成为支配性的共同体状态，这样的社会状态是“理想的”状态，这不是以人而是以“天使”为前提，这种非聪明的非难，在这里得到了解决。

傅立叶和黑格尔认为，一般地生活原理只有一个，只存在一种人性，并不存在善和恶、天使和恶魔、有德之人和缺德之人这样两种人性。傅立叶接近具有这种出色的生活观的诸多社会状态，通过将其适用于社会状态中，任何个性都不单是通过外在的障碍而被阻止，或者反过来通过反作用被病态地促进，而是只要完全自由地表现，在活动中发挥，就能发现一切的善。

这是斯宾诺莎已在其《伦理学》中表明的奥义。然而是由谢林最先获得其对于人类社会的客观世界的意义，在另一方面，又是由黑格尔最先获得其对于人类精神的主观世界的真正意义。然而傅立叶是要解决社会平等的问题，但他自己非难到，绝对平等只能是以“天使”为前提的，他没有意识到通过对这一问题的阐述能够实现对于共产主义的伟大贡献。这也是他自身之所以明确反对财产(或所有制)的原因。另一方面，黑格尔是要解决个人的自由的问题，虽然不是通过这一点，好像故意与傅立叶一样，来解决另一个非难，即，尚未完全完成的德国精神抗拒社会，因为在社会

中,任何个人的财产以及由此而来的——如他所提到的那样——每个人的个人自由都遭到否定。但是在黑格尔那里,已达到这样一种认识:德国精神,其个人的自由不应该诉诸各个个人的所有性,而应该寻求一切人的共同性。任何占有物,只要在普遍性上并非人的普遍的财富,就不是能够促进我的个人的自由的东西。这样,同时也只有普遍的财富,才是真正我自身的不可侵犯的所有物。特殊的个人占有物,由于原本只有通过从一切的他人那里的掠夺才得以成为我自身的东西,因此必然不得不从我这里再一次夺回去。当蒲鲁东回答“什么是财产”,答曰“财产就是盗窃”这个问题时,^①他可谓是击中了要害之所在。

法国和德国的精神,以近代的根本原理为真理。但是,这种真理要在生活中现实化,个人的自由和生活的平等这种真理的两个因素,就必须再次统一。然而,一方面如果不是绝对的平等,即法国的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如果不是绝对的自由,即德国的无神论,则无论是个人的自由还是社会的平等都不能成为现实的真理。在客观世界中,只要还能看到对立和奴役的状态,以及只要政治还支配着世界,就还不能考虑从天上的政治之锁解放世界。

宗教和政治存在共生共灭的关系。这是因为,作为精神的内在的不自由、天上的政治和外在的不自由,是相互支援的。宗教是对立和不自由的原理,它必然趋于否定共产主义,因为在共产主义,即共同体状态中,宗教不被考虑。与此完全相同,在无神论,即精神的自由状态中,反过来是政治不被考虑。当罗伯斯庇尔立足于打倒旧的不起作用的政治,代之以“自由的政治”这种幻想时,首先就是命令必须承认国民公会是“最高存在”的实在,^②即,对他来说若没有“理性宗教”的幻想,就不能实现“法治国家”的幻想。

① “什么是财产? 财产就是盗窃!”是蒲鲁东在其著作《什么是财产》中的语句。在蒲鲁东之前,布里索(J. P. Brissot, 1754—1793. 吉伦特派的领导人之一,被送上断头台)对这个问题的相同回答,是在他的著作《所有权与盗窃》中进行的。——HS

② 1794年5月7日国民公会是基于罗伯斯庇尔的提案,决定承认“最高存在”的存在,并举行国民庆祝大会。——HS

以上,我们把握了法国的共产主义的本质,以及它与德国的无神论及近代世界的根本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接下来;我们来探讨施泰因对这个问题的把握方法,他又从中得出了怎样的结论?

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相异,施泰因觉得主要有以下几点。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特别是,在与前者毋宁是理论的相对,而后者更直接地与实际生活相关这一点上,进而,在与社会主义基本上只是劳动组织有关相对,而共产主义包含整个社会生活,追求社会生活的激进改革,即私有财产及一切统治的废除这一点上,存在着差异。但是,他并不拘泥于上述差异,而是觉得两者的根本原理是同一的。其一,两者的历史的发生与形成的同时性,其二,两者的主要目标都是面向无产阶级。两者之间明确的内在联系,施泰因认为,这无疑可求之为两者的现象的共同基础。他把这种基础,看做法国的革命之前的表现,它与革命一起进入到生活之中,在革命中及革命之后越来越表现在决定性地确立起来的民主主义的精神中。

施泰因的这一正确的本能,必须给予正确的评价。恐怕其他的人们,作为法国今天的思想倾向的原理,都是举出替代平等的自由,由于这一错误的理解,的确全然看不见现代的一般志向及特别相对于德国的法国固有的特色。平等是近代法国特有的基础,这一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奥尔良公菲利普^①被冠以“平等”这一名字,这并非偶然。但是,如今天法国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表明,仅有这点基础是不够的,这终究既不是终极的基础也不是原理,如我们已承认的那样,即便这个特定的因素确实在法国是有力的,那也不过是推动世界的伟大原理的因素之一,因此,法国的社会运动不具有革命以来其充分的基础。关于这一点,从不能抛开与自由的统一来思考平等本身的本质来看,就已经十分清楚,进而,虽然前面确实出现作为其核心的平等,但从其与自由的统一的革命的历程——这点是决不

① 路易·菲利普·约瑟夫(Louis Philippe Joseph, 1743—1793),具有路易十四的弟弟奥尔良公菲利普的血统,作为自由主义贵族早就志于绝对君主制的改革,在法国革命初期持有反国王的态度,投了处死路易十六的赞成票,被称为菲利普·平等。后来因恐怖政治而被处死。——日译者

能忘记的——来看,就更加清楚。自由、平等、统一,贯穿于革命的历史,在对一切种类的压迫、不公、欺骗的斗争中成为点燃内心的神圣的三位一体。

要言之,由于施泰因没能把握对于时代的运动整体的这种作为认识者的态度,因此被如上的认识蒙住了眼睛。当施泰因确实非常强调平等的时候,他确实只是出于一种幸运的本能。他自己在这时好像压倒性地感知到书中所写的民主主义运动,他呼吸着这种运动的氛围,这种氛围从他的胸口,挤压出不安的长吁短叹。这样一来,施泰因预感到好像将有一场动摇社会基础的突如其来的风暴,但他之所以有那种感觉,不是因为了解精神的各个因素,正如动物面对自然的各种因素一样,是因为直接接触到精神的各个因素。因此,未来不是对他作了启蒙,而只是未来对他作了威胁。他所说的“原理”,至少对他而言不具有牢固的基础。他只是如前所述的那样,从氛围中把握其原理的,或者毋宁说,他被满足于“平等”这种因素的法国氛围所侵袭。

法国的思想倾向的真正原理,有着更深的层面。一方面是作为主体的自由,另一方面是作为客观的平等的正义而被表示的真理,其本质特征是统一的真理,这与近代德国的原理相同,是近代法国的思想倾向的本真的原理。好人施泰因完全误解了这一原理,因此在他那里,法国的思想倾向被思忖为片面的东西。确实,法国的思想倾向是片面的,并且由于与其说是以理念毋宁说是以现代为使命,而追求作为真理的特定方面的正义方面。虽说如此,错误决不在于这一倾向。这一倾向,与所对置的倾向具有十分明显的联系,而且因其决不欠缺作为中间项和真理的统一的原理,这种联系是自觉的。的确,在施泰因的叙述中,平等的根据是不确切的,其由来和将来的方向性并不明确。但是,德国的“法学博士”^①要把无法理解的方面作用于法国,进而作用于法国的精神,这怎么可能?

施泰因的书作为整体,最终除了让人长叹而外别无其他。这是由于他没能把握现代动向的积极性内容,而错误地以为克服了这种动向,因此,他没能理解现代的积极性内容,他从哀叹现代各种“消极的”倾向的人

^① 指施泰因。施泰因是法学博士。——日译者

们那里,每每听到长长的叹息。

施泰因,通过对法国精神的错误把握,开始陷入到重要错误之中,即在他所向往的平等的志向中,仅仅局限于享受这种完全外在的物质的倾向。他只看到唯物论中抽象的个人将具体内容赋予自身这一最初的工作,由于这一偏见,他为所谓的现代唯物论辩护,可见他只是以共产主义中无产阶级获得与所有者平等的享受为志向。但其中所消灭的享受与劳动的对立这一点,的确是共产主义的主要长处之一。只有在分裂的所有的状态中,享受才从劳动区别出来。共同体的状态,是认识自由的活动中真实的唯一的享受,是认识所谓的至善的哲学的伦理学的实践的现实化。——反过来说,分裂的所有的状态,是利己主义和非伦理性的实践的现实化,一方面,否定了自由的活动及其将其贬低为奴隶的劳动,另一方面,设定了取代人的至善性,把动物的享受作为与同样动物的劳动相适应的目标。另外,施泰因陷入了这种劳动和享受的抽象态当中,除此之外,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在其早期的代表者的精神中,这一点是自明的——早已经成为现实中应有的东西,即已成为实践的伦理学。

也就是说,施泰因只知道早期最粗俗形式的共产主义。这种形式是与共产主义的理念一起由巴贝夫而发明的东西,他不是把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看做理念的发展及经过的阶段,而是作为独立的现象来孤立地对待。并且他虽然确实发觉到这些现象与普遍的平等的理念的联系,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现象与共产主义的特殊联系。因此,由于他例如把蒲鲁东与拉蒙内斯^①同等对待,完全不知道把蒲鲁东放在什么位置,结果把蒲鲁东作为与拉蒙内斯“同列的著作家”!^② 不管蒲鲁东对个人财产或私有制作了多么尖锐的批判与否定,对施泰因来说仍不是共产主义者,即,根据他施泰因建构的共产主义的面貌,由于蒲鲁东的工作是学术性的,因此不可能是共产主义者。但又由于蒲鲁东确实否

① 拉蒙内斯(Félicité Robert de Lamennais, 1782—1854),法国的宗教社会主义者。著名的《信徒语录》的作者。——HS

② 施泰因《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三部“同列的著作家”。关于拉蒙内斯是 299 页以下,关于蒲鲁东是 317 页以下。——HS

定私有制,因此在施泰因看来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所以他是“同列的著作家”。

他把本来的社会主义完全从共产主义割裂开来。关于已经出版的独译书和摘译书中至少同样常见的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理论,他虽进行了贫乏的抽象化,但根本没有触及他们的理论与共产主义的理论与本质联系。他以为用他的平等这一贫乏的范畴,就能够解决一切。若除了这一点,他的著作作为整体,无非是对圣西门、傅立叶、皮埃尔·勒鲁^①、拉蒙内斯、蒲鲁东、巴贝夫、卡贝^②等人加以无思想的汇总、并列,一如蒲鲁士的严格军人在组织队伍时的排队。

从序言来看,施泰因是从巴贝夫开始叙述。这种最初形式的共产主义是直接长于长裤汉主义产生的。因此,巴贝夫关注的平等,是长裤汉式的平等,贫困的平等。富裕、奢侈、艺术、学问应该被废弃,城市应该被破坏。卢梭式的自然状态,是当时的人们头脑中不断浮现的幻想。产业扩张的原野,在这种共产主义中还是未知之国。那是最抽象的共产主义。平等是以消极的方法,即必须通过灭绝任何欲望而达到。那虽然是修道士式的共产主义、基督教式的共产主义,但那里既没有彼岸,也没有面向更好的未来的希望。只有自然的需求才作为现实的东西而被承认,恐怕这也只是迫于必要而如此。假如能够创造肉体或人,那或许将变成否定人。由于这是不可能的,作为满足肉体的需求的手段,农业才存续下来。这种形式最贫乏的共产主义,由于其自身否定一切学问,理论上没能不断生成,而不得不直接变成实践的。但是,现实已经比自然状态远处于更高阶段。因此这种共产主义的确只是引入了贫乏。

另一方面,拿破仑帝制和王制复古时代是外在地阻碍民主主义精神的发展的各种原因,这使得社会的内部尖锐地产生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

① 皮埃尔·勒鲁(Pierre Leroux, 1797—1871),法国民主主义者,之后是社会主义者。Globe杂志的创刊者。《两个世界评论》的投稿人之一。——HS

② 卡贝(Etienne Cabet, 1788—1856),1840年以降法国的平等共产主义的继承者。长期旅居英国(因而通晓欧文主义)后,回到法国后撰写《伊加利亚旅行记》,于1840年发表,该书有被称为“伊加利亚共产主义者”的众多信奉者。卡贝把民主主义视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然阶段,而当前的目标则是要求普遍选举权。——HS

级的对立,关于这一点,确实有力地使民主主义精神在七月革命后得到了极为丰富的多样性表现。上述情况,在施泰因那里得到了清晰而简洁的展示,这种清晰与简洁,伴随在其他点上屡次重复的冗长空论而让人感到不快,但唯其如此才愈发更快地为读者所接受。关于这方面的情形,例如共产主义与无产阶级的联系,虽然几乎是让人腻烦的重复,但这正是施泰因从共产主义获得的唯一具有生气的方面。与此相反,在无产阶级的要求的正当性成为问题的地方,他就罗列若干哲学的华而不实的语言,然后悄悄地从中逃遁出来。他之所以不能达到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显然是因为其论证的薄弱。的确,这种理解只有通过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及其科学的联系的洞察才有可能,而如前所述,他是完全欠缺这种洞察的。

施泰因实际上是如何解决他所思考的重要的社会问题,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或金钱贵族和贫民的对立的终极的和解这一问题的?虽然确实他在书中就这个问题作有各种论述,但从他的书中无法清楚地看出。另外,由于他不理解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中只看到噩梦、赎罪,这也同样是确切的。因此,他在对立的状态中只看到对立的调停是可能的。他通过以此推而广之的二、三句套话来示意,这就与其他场合一样,通过对德国“否定的”各种倾向的争论使自己处在“调停者”的位置。

但实际上,关于对立状态中的对立的调停的思考是不可能的。确实,施泰因提出了由于没有身份差别,谁都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力量获得财产这一旧的命题。尽管如此,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通过自己的力量获得或继承的财产,在哪里都是与抽象的个人“权利”即能力和劳动相关,单有“权利”而没有资力,必然不能与那种财产相比较量,因此通过自己的力量获得这种“权利”只能是幻想。而且,施泰因关于财产继承制的废除也没有任何一处将之表述清楚,好像是在回避这一问题。但是在这里,正如在原理上问题从来如此,相反的两个原理的调停是不可能的。

私有制的原理,具有谁都可以任意地处理与管理自己的东西的含义。我可以把我的财产传承下去或赠与出去,倘非如此那必定不是我的财产。并且,我通常是将之遗赠给我的孩子或亲人,或遗赠给朋友,而不会遗赠给作为普遍者的国家。像圣西门主义者所主张的,假设废除继承制,的确

可以由此废除私有财产。但在这种场合还存在的问题,是如何把握共产主义的本质。

如我们所看到的,巴贝夫没能把握这一本质。圣西门也同样如此。圣西门只是关注秩序,而没有关注自由。这是因为,他希望把一切统治形式中最恶劣的形式的教权制度看做是最彻底的东西。然而在否定自由的地方,平等或正义都不可能存在。圣西门希望没有自由的平等,与此相对,傅立叶希望没有平等的自由。前者过于新潮,轻视出自实践的热情的理论,后者又过于保守,欲使完全新的真正独创的理念、绝对自由的劳动的理念与现状和解。这样,最近的社会改革者和共产主义者们完全对共产主义的概念作了尖锐而深刻的把握。

只是根据绝对的自由,即不光是狭义意味上的“劳动”的自由,而是根据一般的一切人的个性和活动的自由,绝对的平等,或毋宁说一切的存在和一切财产的共有才有可能,反过来说,才能够考虑似乎只有在这种共有中才有的自由。一般说来,不应该从外部来组织劳动和社会,而应该通过谁都不做敷衍了事的事情、不做不得不做的事情,通过其自身来组织。任何人都不会喜欢某种单一的活动而喜欢多种多样的活动。并且从自由的人类性格和活动的多样性,产生的不是自由的人类社会的工作的死的既成组织,而是生气勃勃的永远年轻的组织。这种自由的人的工作,在这里,“劳动”停止了,变成了毋宁说与“享受”完全相同的東西。

人们不可能再次谈论共产主义与个人所有制的原则之间的调停了。从此,真正的、意识的原理的斗争开始了。过去的历史,绝不是纯粹贯彻个人所有制的原理的历史。越是到了近代,个人所有制的原理越是变得容忍作为其敌对者的共产主义。过去的历史,不过是作为抽象的普遍者的国家与作为各个个人的利己主义的市民社会之间的盲目而自然发生的斗争的历史。个人所有制原理纯粹支配的只是市民社会。不过,所有权,与抽象的个人自由的原理一起,转化成其反对物。也就是说,个人所有制的首先导致奴隶制。抽象的法治国家为了取得胜利,进行了数千年的努力。法治国家作为其敌对的对立者,又由于具有市民社会,其自身又不得不转化其反对者。普遍者的权利,在对立与利己主义的状态中,变成一切

的人的无权利。法治国家在其进程中取得的最高形式,是在自己当中集中国家,或是自己自称“朕即国家”^①的个人的权利,或是人民主权。然而,不光是在这两种形式中,即使在“君主立宪制”这种半阴阳体中,即,在君主制和共和制的中庸中,抽象的法治国家通过其固有的辩证法,已被历史地否定。

关于共和制,因为我们还要讨论多位德国的哲学家,我想将之作为一个例子来考察。法治国家就这样进而赋予人民以主权。但是法治国家,作为各种人的抽象的统一性或普遍性,由于被赋予保证抽象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所有制的使命,必须将自己置于这种所有制之上并与之相对立。这样一来,希望自治的人民,就产生出统治者(支配)和被统治者(奴役)的分裂这种矛盾。本来应该属于全体人民的立法权,必然经常通过仅仅一部分人民,而且是熟练地通过暴力和策略来强夺权利的那一部分的人民来行使。

在宫廷做官的人和追随统治者的人们,理所当然认为国家的统治形式等怎样都行。在北美从上个世纪后半叶开始,在欧洲自法国革命以来部分地存在的基于实定法的法治国家,确实,如果与封建的、神权政治的、专制的国家等相比,即如果与依靠财产、血统、国籍、宗教之类的自然规定性的国家相比,这是超越于这些的一种进步。本来,尚未克服自然规定性,而只是消除了自然规定性的法治国家,与其说接近作为绝对的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不如说接近前面所说的封建的、神权政治的、专制的人类社会。这正如新教实际上也是与其说接近无神论,不如说接近天主教(旧教)。但尽管如此,也同样是超越于它的一种进步。并且如果要在北美和俄国之间或法国的政体和奥地利的政体之间作出选择的话,就像选择新教而不选天主教一样,我会选择前者吧。

但在原理上,统治形式等完全是怎么都行。任何统治形式在本质上,都是与绝对的自由和平等相对立的。从专制政体到共和政体,从比市民社会更直接产生的世袭君主制,到克服了国家形式中个人所有制的自然

^① 这是法国路易十四说的话。——HS

要素的基于多数表决的代议政体,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政体来说都依旧存在统治和奴役。在最好的场合,少数是被多数统治,但是,现代的伟大各国中作为一种必然的代议制度,同时,连通过最激进的选举法的多数的统治也是幻想,想必显然是这种情况吧。也就是说,多数的统治必然逆转为少数的统治。少数统治,只有少数才能够统治。不过,少数也不过是具有幻想的权力。它被人民所感知,幻想的权力无论是否成为现实的权力,它都要被打倒。如此这般经过反复长时间的推演,最终,对立状态的国家被辩证地否定,让位于共同体的状态的调和状态的社会生活。

这样,讲述共产主义的历史发展的精心著作尚未出现。施泰因的书,与其说在这一点上存在很多缺陷,毋宁说全部是缺陷。

最后,我们来对作为黑格尔中间派的施泰因的共产主义的态度的特征作一番考察。

施泰因是政治的理性主义者。因此,政治的无神论,即不只是关于共产主义,他的乍一看不过是克服了关于基于实定法的法治国家的阐述,也同样没能作出明确的判断,反而有陷入反动的倾向的危险。这是因为,他追求作为法治国家的幻象的“理性国家”,所谓理性国家,与“理性宗教”不过是宗教的理性主义者的虚构一样,只存在于政治的理性主义者头脑中。

事情是这样的。黑格尔把国家作为现实的理性来把握。他不光是在法的领域,而且对人的全部生活也是作为这样的东西来把握。在这一把握中,“国家”的概念与绝对的人类社会的概念相一致。但是,绝对的人类社会,不能认为好像是扎根于某个特定的场所和时代。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生活是世界史的生活。不过在世界史中,国家被扬弃。黑格尔对国家态度,与他对宗教的态度相同。他为了赋予二者“永远的”基础,把二者装扮为绝对者,确实是通过这样而扬弃了二者。

施泰因属于自己“误解”老师的黑格尔主义者。他们在关于“绝对的”国家、“理性的”国家(以及关于“理性的、绝对的”宗教)中梦游,这就把自己表现为给予敌对者以武器。人们对黑格尔主义者的嘲笑就包含这种“理性国家”,还有一个这样的事实是,布鲁诺·鲍威尔从信仰的立场说它是“象牙驴子以萨迦”(beinernen Esel Isaschar)之类的嘲笑与否定同样是

正当的。^①

不仅是政治的无神论者,作为政治的理性主义者的黑格尔主义者,不是把批判的基准置于国家一般,而是置于这种那种国家、这样那样的统治形式。并且,“理性国家”和“理性的”统治的幻象,由于还附着在他们的头脑中,当他们确实要求人的自主性、人的自由的时候,是以人的依存性为前提的。他们的自由是一个虚构。即,他们的自由不过是在不具有现实性、不能具有现实性的领域中的自由。“理性国家”完全不是国家,或不是理性的现实性,而是别的什么。这是因为,理性的现实性,要求财产、宗教、国籍、政府的规定性,如果没有这些,如果否定了国家的全部内容,国家就成为多余的东西。也就是说,理性的现实性,仅仅被看做是人的绝对的自由。即,只有在绝对的社会中才能成为现实,这种那种的人类社会,在还附着自然规定性的人类社会中仅仅被看做尚未实现的自由。但是,理性主义的政治家,由于把那种特定的人类社会的国家,设定为绝对者,那样的社会,决没有达到理性的现实性。并且一旦下降到生活的现实,理性的现实性就变成反动的。在这里,即在实际中,此前还适合于理性的现实性的概念,在人类社会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国家,即,只是上述附着自然规定性的社会。作为那样的东西,国家不具有把绝对的自由现实化的使命,而只是具有适合其立场那样的自由的尺度、理性的尺度。这是因为,国家形式和统治形式的阶段的高低确实就在于此。例如,种姓制度和等级制度,在现在已被克服。也就是说,今天的现实的国家,即使自然规定性尚未被人类社会克服,但至少也被国家克服。今天的现实的国家是纯粹在法的领域活动,一切在这一领域之外的东西,例如宗教、血统、个人所有制,总之虽然未必克服了私法,但是如前所述的那样,是消除了这些东西的国家,换句话说,是作为不属于自己的领域的东西,从自己即公共法割断了私法的国家。要言之,这种分离,是以例如国家与教会的分离为原理的国家。

^① 布鲁诺·鲍威尔(匿名):《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1841年。——HS

更为进步的近代国家,认为这一原则是正确的。虽然在其他一些国家中,这些更自由的原理尚未达到现实或尚未成为现实的实际状态。尽管如此,因为人民的意识已把比这些更公平的诸原理吸收到自身当中,其实现也就成为可能的状态。可是,理性主义的政治家,关于比这更自由的诸原理什么也不想知道。他们虽然希求自己的“理性国家”,但因为“理性国家”是一个虚构,因此他们在现实中不希求任何自由原理。因此,对于例如黑格尔作为(政治的)理性主义者之一,局限于新教徒、旧教徒、犹太教徒是人而不是无神论者,进而把人等同于新教徒等,而不可能是什么“理性的”国民;主张他们在国家中没有接受同等对待的权利,或者,对于主张今天“科学自由”的人们,其主张绝不是表里不一地认真对待此事,也不是要求教育和国家的分离的原则,我们并不感到丝毫奇怪。对于这种反动的步调,与此相似的反动的步调,也不会感到奇怪。这是因为,政治的理性主义者,与对于绝对的人类社会完全一样,对于现实的法治国家,也不知道自由地对待。他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不自由的,他们的“理性国家”只是虚构中的自由。施泰因在这方面、在宗教方面都属于黑格尔中间派。并且,对于他既不能把握现在的状况的积极方面,也不能把握共产主义理论的真理,只是悲观地发现随处是“否定”和“破坏的倾向”,我们也完全不会感到奇怪。

(邓习议 译,单位:潮州学院)

共产主义信条问答^①

[德]莫泽斯·赫斯

一 论劳动与享受

第一个问题：什么叫劳动？

答：为了人类的生存，对物质进行的任何一种改变都叫劳动，或者叫工作、创造、出产、制造、生产、行动、活动，总而言之，劳动就是生活，因为事实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在劳动。可以说，涉及到人类生存时，不仅头脑和双手，就连人体的其他一切部位和器官都在为人类的生存而改变他们从外界获得的物质。例如，嘴为胃加工它所获得的物质，胃又为血液加工它所获得的物质等等。也就是说，人体的每个器官正像人类社会的每个成员一样，它似乎仅仅在消费和享受，实际上它同时也就是在为整体生产或者劳动、创造，而它似乎仅仅在为整体劳动或生产，其实它同时也就是在享受自己的生活。但是，劳动和享受的这种和谐只有在有机的、有组织的生活之中，而不是在无组织的生活之中才能产生。关于这一点我们将会立即看到。

① 本文摘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7辑第208—223页，原载德文版《莱茵社会改革年鉴》，1846年康斯坦茨第2卷第155—169页。赫斯的这篇著作1844年匿名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1844年12月又发表在巴黎德文报纸《前进报》第2号上，1846年赫斯把它稍加修改，发表在彼德曼主编的《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2卷上。——中译者

第二个问题：劳动有些什么种类？

答：有组织的劳动和无组织的劳动。换句话说，有自由的活动和被动的劳动或强制的劳动。

第三个问题：什么是自由的活动，什么是被迫的劳动？

答：自由的活动是出于内心的驱使而进行的一切活动，相反，被迫的劳动是由于外力的驱使或是由于穷困而进行的一切活动。如果劳动是出自内心的驱使进行的，那么，它就是一种增加生活享受的乐趣，也是一种本身包含着报偿的善行。相反，如果劳动是在外力的驱使下进行的，那就是一种贬低和压抑人的本性的重负，是一种仅仅为了可鄙的罪恶报酬才去干的恶行，是一种雇佣劳动和奴隶劳动。一个人假如除了其劳动本身以外还为他的劳动寻求报偿，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为他人的目的而活动的奴隶，是一部被驱赶的无生命的机器。

第四个问题：今天人们所说的劳动指的是上述两种劳动中的哪一种呢？

答：是被迫的劳动。

第五个问题：当前，什么叫自由的活动？

答：或者叫做享受，或者叫做善行。

第六个问题：今天人们所说的享受是什么？

答：是按照某些感官上的爱好生活，而不去考虑人类的整个本性。

第七个问题：今天人们所说的善行是什么？

答：是按照某些精神上的爱好生活，而不去考虑人类的整个本性。

第八个问题：我们今天能够按照人类的整个本性活动吗？或者能够真正地享受人的生活吗？

答：完全办不到。在我们的社会里，几乎进行任何活动都不是出于我们人类本性的内心驱使，不是出于对劳动的向往和热爱，而是出于外力的驱使，照例是迫于贫困或是为了金钱。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出于内心的驱使所完成的一切生活活动就是那些我们称之为享受或善行的活动，那么这些活动比强制劳动更加损害人性的真正的生活享受。当代人的一切自由的生活活动都具有非人的或动物的性质，这就造成在满足某些感官和

精神的生活活动时毫无节制,这种无节制是违背人的本性的,今天人只是感到自己被它诱引,因为人的本性没有得到完全发挥,而是受到压抑。因此,饮酒变成狂宴,性交或性爱变成淫欲,紧张劳动之后的休息变成懒散懈怠,学识渊博变成迂腐习气,内心憧憬美好的生活变成伪善,善行变成自寻烦恼等等。所有这一切无论是感官上的爱好还是精神上的爱好都完全堕落在纵欲之中,并且变成了贪得无厌,因为人类的整个本性不但没有得到发挥,反而遭到压制和损害。但是,贪得无厌还表现出牺牲其他一切人性的爱好,从而把人降低成了仅仅具有片面本能的动物。

第九个问题:是否所有的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和活动呢?

答:只要人的本性在所有的人身上都得到发展并且不受社会关系的强制压抑,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如此不可的。

第十个问题: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人的本性在所有的人身上都得到发展,而每个人又都能发挥自己的全部能力,那么,在这样的社会里,能够有些什么样的劳动呢?

答:在这样的社会里,只能有自由的活动。

第十一个问题: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人既不能得到充分发展,人发挥出来的力量也不能得到使用,那么,在这样的社会里,能够有些什么样的劳动呢?

答:在这样的社会里,只能有强制劳动、游手好闲、贪图享受和假仁假义。

第十二个问题: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人的一切力量能够得到发挥吗?发挥出来的力量能够得到应用吗?

答:不可能。无论在发挥我们的才干和力量方面,还是在应用我们的才干和力量方面,我们都受到了阻碍。在我们的社会里,实行普遍的教育和教养,正像我们的力量进行交换和得到使用一样,都是不可能的。人的大部分力量仍然没有发挥出来,而已经发挥出来的力量通常又受到压抑。因此,在今天的社会里,人的生活大部分是由强制劳动、禁欲和耽乐构成的。有人饱食终日,有人忍饥挨饿,有人由于穷困,有人由于豪富而降为动物。

第十三个问题：为什么在今天的社会里，不可能发挥和使用我们的人的力量呢？

答：因为我们买卖我们自己，或者同样可以说，我们买卖我们的人的力量，这样我们就相互把对方变成了奴隶。

二 论金钱和奴隶制度

第十四个问题：什么是金钱？

答：金钱是用数量来表示的人的活动的价值，是我们的生命的买价或交换价值。

第十五个问题：人的活动能够用数字来估价吗？

答：人的活动也和人自身一样，是不能对之支付代价的，因为人的活动就是人的生命，而人的生命是不能用任何数量的金钱来补偿的，它是无法估价的。

第十六个问题：可以被拿来卖钱或为金钱而出卖自己的人是什么人呢？

答：可以被拿来卖钱的人是奴隶，而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人是奴才。

第十七个问题：我们应当从金钱的存在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答：从这里我们应当得出的结论是：存在着人类的奴隶制度。要知道，金钱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类的奴隶制度的标志，因为金钱是用数字来表示的人的价值。

第十八个问题：人们还要当多久的奴隶，还要为了金钱而用自己的一切才干作多久的牺牲？

答：他们要等到社会为每个人提供和保证每个人都能够按照人的方式生活和活动所必需的各种手段，而不必再独自设法获取所有这些手段和为此目的出卖自己的活动，以便购买其他人的活动时为止。要废除这种人的交易、相互的剥削以及所谓的私人营利，不能通过任何法令，而只能通过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将为每一个人提供发展和运用人的才智的各种手段。

第十九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金钱的存在是可能的和可以想象的吗？

答：这如同人类的奴隶制度仍将存在一样，是不可能和不可想象的。假如人们相互之间已经没有必要用自己的力量和能力进行交易，那么，他们也就不再需要在数量上去估价自己的价值、不再需要计算和支付自己的价值了。到那时，真正的、不可估量的人的价值将取代用数量估价的人的价值——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和生活享受的高度满足将取代高利贷利息的暴涨，和谐的合作和高尚的竞赛将取代卑鄙地用武器进行的敌对的竞争，自由的、有活动能力的人的头脑、心脏和双手将取代九九表。

三 论财产和自由

第二十个问题：什么是财产呢？

答：我们把用作人的生活资料、人的活动资料的大自然的果实和劳动产品称为财产。

第二十一问题：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同胞的帮助和大自然的力量，他能够创造财产吗？

答：不能，每一个单个的人，连同他的全部力量、才能和手段只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产物。他独自一人不能做任何事情，因此更不能单独创造财产。人只有同自然界和人类相结合才能够生活和活动。

第二十二个问题：那么是谁创造了财产呢？

答：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第二十三问题：自然界的果实是不是单个的个人的所有物？

答：不，它是全体的共同财富。

第二十四问题：人类社会的产物是不是个人的所有物？

答：不，它是社会的所有物。

第二十五个问题：把社会产品和大自然果实收集和积累起来供一己之用的人是什么人呢？

答：他是掠夺者；他从社会手里夺取了属于社会的东西，夺取了社会

应当为了全体成员的利益自行处理的东西。他是杀人犯；因为他夺取了他的同胞赖以生存和活动的手段，因而也就夺取了他们的生命或自由。

第二十六个问题：今天我们怎样称呼和怎样看待这样一个夺取他的同胞的劳动果实的掠夺者和杀人犯呢？

答：我们把他叫做富翁、财主、所有者或有产者。

第二十七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什么是个人的所有物？

答：是保证个人生存和活动所必需的占有。

第二十八个问题：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能否保证个人取得他们赖以生存和活动的东西呢？

答：他们只有占有他们通过一定的法定形式从外部获得的东西和相互夺取的东西，才能取得这种保证，即他们只有占有他们通过对奴隶般地服苦役或从事雇佣劳动和通过继承、放高利贷、赌博、买卖股票、牟取暴利和合法欺骗而偶然得到的东西，才能取得这种保证。

第二十九个问题：单个的人是否由于得到这些东西而占有他们生存和活动所需的东西呢？

答：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那些谋利、欺骗和推行奴隶劳动的人的空虚、无知及堕落到禽兽般的地步，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第三十一个问题：这样说来，在我们的社会里，是否能保证每个人都取得他应得的那一份呢？

答：根本不能。

第三十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保证的财产，那谈得上公民自由吗？

答：在没有保证的财产的地方，只有专横和暴政占统治地位。

第三十二个问题：什么是自由？

答：只有不必强迫自己的本性，而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本性去生活和活动，可以毫无阻碍地在行动中表现自己本质的人，才是自由的。

第三十三个问题：在我们的社会里，人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本性去生活和活动呢？

答：他不得不经常强迫自己的本性。他时而不能满足自己追求知识的愿望，时而不能满足自己的艺术冲动，时而不能满足自己的从事机械劳

动的愿望,时而不能满足自己的食欲,甚之不能解饥止渴和满足自己身体最迫切的生活需求。

第三十四个问题:人的自由、真正的所有权或财产的真正保证在哪里?

答:首先要通过教育才能做到这一点。

第三十五个问题:教育指的是什么?

答:首先是指身体的培育,这是往后全部培育的基础。这种培育在母体中就已开始。其次是指在公共的教育机构里的普遍教育,在这些机构里,人类的一切美德和能力的萌芽都可以得到栽植和培养。子弟们从这一苗床被引入他们表现出特殊爱好或特别才能的那一活动范围。人的社会教育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第三十六个问题:为了保证所有的人都能享有他们真正的所有权和自由,还应当做些什么呢?

答:社会财产不应当由个别的人取得并且受偶然性的摆布,它必须得到管理,使每个人都能取得自己的一份。

第三十七个问题:应该根据怎样的法则来管理社会财产,领导产品的交换?

答:根据人类本性和它的需要的法则。

第三十八个问题:每个人都像其他的人一样或者始终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活动就是符合人类本性吗?

答:恰恰相反,这一个人的自由活动或生活享受都不同于另一个人的自由活动和生活享受,甚至同一个人的自由活动和生活享受也并不始终相同,而是多种多样的,这才符合人的本性。

第三十九个问题:把所有的财产平均分配,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均等的活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符合人类本性的吗?

答:恰恰相反,生活资料或活动资料分配给每个人各不相同,每个人始终得到的是他每次生活活动所需要的那些物资,这才是符合人类本性的。

第四十一个问题:只由自由来决定活动就不会产生弊病了吗?

答: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得到人的教育,其次,如果每个人的特殊才能都能得到培养,最后,如果每人都能拥有发挥自己的才能的各种手段,那么,人类社会就会按照人类本性的法则组织起来,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机体,在其中,每一个部分都全面受到教育并且向整体有机地共同成长,因而也就会在没有窘迫和强制的情况下,出自内心的生活本能去完成自己的职能。

四 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第四十一个问题:我们这一代人能够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吗?

答:他们只能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作些准备。

第四十二个问题:我们应该作些什么准备呢?

答:首先,我们必须唤醒现今的社会,使其意识到它的穷困,并且意识到它必须承担改善现实的使命,从而激发大多数人向往人的状况的愿望,即摆脱目前正在遭受的奴役的愿望。但是,即使不再有任何强权能够随心所欲地镇压各种改革,我们也必须首先废除那些为专制政治效劳而浪费人力的、毫无裨益的国家机构;其次,我们摊派捐税的原则应该是:财产越多缴税的比例应该越大。我们一方面节省过去的开支,一方面多倍增加收入,当然获得这些收入既借助于财产税也借助于继承权的根本改革,这样,社会就能够实行一种真正对人的、平等的、普遍的和无偿的教育,能够逐渐购买土地、建设大工厂和为任何愿意工作的人提供劳动的机会。

第四十三个问题:是否需要通过一项法令来废除目前的所有制和货币?

答:没有这个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假如采取上述措施,那么,目前的所有制关系就会逐渐地被改造成共产主义的关系。随着人的价值提高,货币就相应地失去价值。随着得到管理的社会组织推广开来并排挤掉雇佣劳动,其次,随着年轻的一代通过社会的培养和教育成长起来并且承担起一切社会劳动,人的价值必然提高到不可计量的地步,而货币的无价值必然下降到一文不值的地步。在采取上述种种措施以后,要从社会上抹

掉目前所有制关系的最后痕迹,至多用一代人的时间。相反,采用暴力和突然袭击的办法来废除目前的所有制关系,必然要引起不良后果。一种合乎理性的所有制是一个合乎理性社会的前提,而这种合乎理性的社会又是受社会教育的人的前提,因此突然把无组织的所有制改造成有组织的所有制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第四十四个问题:在过渡时期必须怎样改革继承权呢?

答:那些受社会教育的人以及那些加入了新社会组织的人不需要继承任何遗产,所以这些人继承的遗产可以归社会所有。此外,按照上述财产税原则必须实行普遍的遗产税。

第四十五个问题:如果要实行社会改革,难道不担心有产者外迁吗?

答:绝对没有外迁的必要,因为第一,无论这种社会改革首先从哪一个国家开始进行,都会迅速扩至整个文明世界,有产者要迁移也只能迁移到那些不开化的部落,而他们并不情愿走这一步。第二,那些我们认为必须采取的措施也绝对不会使有产者产生外迁的念头,因为尽管财产税很高,但他们仍然占有那一部分比税额多得多的财产。第三,人民的代表必要时可以采取适当的手段,以防止这些人外迁或者使他们不能为害。最后,资本家外迁会造成的损失无论如何也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一般说来,他们这种人都是一些游手好闲的人,再说社会目前并不缺乏人口,而是人口过剩,至于说到他们的财产,充其量是可能使社会损失一些金币,但在真正的所有制开始取代虚假的所有制以后,这是无所谓的。

五 论婚姻

第四十六个问题:目前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符合人类本性吗?

答:这个男青年只同一个姑娘相爱,或者这个姑娘只同一个男青年相爱,以及他们一般保持这种专一的爱情,这是符合人类本性的。

第四十七个问题:今天在爱情方面,不幸的婚姻和荒淫放荡是怎样造成的呢?

答:这是由于对爱情的粗暴压制造成的,它驱使男女两性在爱情方面

去过非人的、兽性的、甚至是违反天性的荒淫生活。这是由于这样的所有制关系造成的,这种所有制关系使女性处于极度穷困的境地,甚至使她们为了金钱被迫出卖自己的肉体。

第四十八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男女婚姻结合的纽带是什么?

答:是相互的爱情。

第四十九个问题:解除婚姻要有什么理由呢?

答:相互之间的爱情已不复存在才是理由。

第五十一个问题:纯属爱情缔结的婚姻关系是否在两性交往中就不会产生弊病了呢?

答:不会产生任何弊病,因为人性只有遭到粗暴的压制,才堕落成兽性。上面说过,婚姻通常是符合人类本性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一旦处在自由的制度下,真正的婚姻便会普遍存在,而今天,真正的婚姻仅仅是淫乱的一种借口。但是,今天在财产关系方面和对儿童的教育方面都会产生的各种弊病,如果纯属爱情缔结了婚姻关系,在这样的一种社会中是不会产生的,在这种社会中,无论所有制还是对青年的教育都已经不再听任偶然事件或个人的专断摆布。

六、论宗教

第五十一个问题:我们大家应该信奉哪种宗教?

答:信奉爱和人道的宗教。

第五十二个问题:这种宗教的见证在哪儿?

答:在一切善良人的心中。

第五十三个问题:这种普遍的人类宗教是非基督教的宗教吗?

答:不是,它倒是基督教的实现。

第五十四个问题:基督教的目的是什么?

答:通过仁爱、自由和正义使一切人得到幸福。

第五十五个问题:为什么基督教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答:因为基督教迄今并没有认清自己的目的,而是形象地想象它所期

待的、信仰的和希望的东西。

第五十六个问题：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

答：信仰人类的极度痛苦。

第五十七个问题：基督教信徒所想象的人类是什么样的形象？

答：是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的形象。

第五十八个问题：基督教徒的信仰是真理吗？

答：只要人类真正遭受苦难，只要人们了解基督教想象的实质，那么，基督教徒的信仰就是真理。

第五十九个问题：基督教徒可以期望解除人类的痛苦吗？

答：可以，这种期望甚至是他们的宗教的一部分。

第六十一个问题：他们所想象的人类美好未来是什么样的景象？

答：是他们所虔信的天国欢乐景象，但当我们不再生活在自私和仇恨之中，而是生活在爱之中，生活在和谐一致的人类之中，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之中时，我们就在尘世获得这样的天国。

第六十二个问题：我们的生性是恶吗？

答：不是，我们生活在恶劣的社会中，才变得恶。

第六十三个问题：基督教的社会和世界是恶的吗？

答：是的，这个世界正如基督教本身宣告的那样是恶的，可鄙的。

第六十四个问题：世上一向为基督教所痛恨的那种恶的东西叫什么？

答：叫金钱。

第六十五个问题：基督教劝人不要受其诱惑的那些世上的君主、恶棍和魔鬼，是否同我们称之为我们的财宝的可诅咒的钱财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答：毫无区别。但是以种种形象来想象一切东西的基督教徒们也以魔鬼的形象来想象可诅咒的金钱。

第六十六个问题：地狱同在可诅咒的金钱统治下的尘世有什么不同了？

答：两者毫无不同之处，尘世是真正的实在的地狱。

第六十七个问题：基督教把真正的实际生活想象成什么形象？

答：想象成天国上帝的形象。

第六十七个问题：天国上帝同仁爱有什么不同吗？

答：没有不同。

第六十八个问题：爱能产生什么呢？

答：能产生全部创造物或宇宙，它像爱一样，是永恒的、无限的和无法估量的。

第六十九个问题：创造物是一些不可改变的东西，始终一个模样吗？

答：不是，爱倒是不断地创造，哪里爱不起作用，那里的一切东西就全都四分五裂。

第七十一个问题：生活是什么？

答：生活就是爱，它使一切东西互相交配和具有生殖能力。

第七十一个问题：我们的上帝，即我们要生活、活动和存在于其中的上帝，是否同人类或由爱结合起来的人类有所不同呢？

答：毫无不同之处。

第七十二个问题：为什么迄今为止我们都认为魔鬼是在我们当中，在尘世之中，而上帝不在我们当中，不在尘世而在天国呢？

答：因为迄今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上帝当中，没有生活在类当中，没有生活在爱当中，而是生活在离间和敌视当中。爱远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处于分崩离析之中，所以才认为我们的上帝在我们之外，在这个可恶的尘世的彼岸，而魔鬼却在我们之中，在这个尘世之中，我们甚至把这一点看成是世界的本质。如上所述，我们的信仰没有谬误；这一信仰实质上是真理。但一旦我们联合起来并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地狱就不再在地上，天国也不再在尘世的彼岸，基督教用预言和幻想向我们许诺的一切东西，在真正的人的社会中将按照爱和理性的永恒法则全部成为现实。

（葛斯 译，文建 校，单位：中央编译局）

赫斯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研究

早期马克思像的批判的重构^①

[日]广松涉

早期马克思研究的热潮的呈现由来已久。在这一热潮中,当然也取得过很大的成绩。但尽管如此,早期马克思研究依然存在某种决定性的缺失,后者似乎也从来没有被成功地弥补过。

这是因为,从《1844 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经哲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横亘着很深的裂缝,其过渡过程的内在必然性,其中的连续性和间断性都不确定,因而也无法成功地将马克思的思想面貌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以重构。

过去的研究之所以没能填平这一裂缝,最大的原因在于无视或过低评价马克思的“大前辈”莫泽斯·赫斯——旁系的黑格尔左派中《莱茵报》的主要人物——对他的压倒性影响。被看做早期马克思的独创的《经哲手稿》的各个立论,不仅其构想和视角,甚至在修辞上也有很多地方追随赫斯,被誉为“唯物史观的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②从著名的第一条开始,就恰似参考了赫斯当时发表的一些文章,而到了最后的条目中,则确实无非是从赫斯的立场来批判费尔巴

① 本文译自《广松涉著作集》(第8卷),岩波书店,1997年版,第299—345页。本文对《思想》1967年第10期发表的论文进行了若干的增补修改,追加了补遗。——译者注

②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12页,此处原中译文是“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译者注

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旧层，^①也仍然留有作为共同执笔者之一的赫斯的影子。唯物史观，实际上是经历从赫斯的思想圈脱离出来的过程——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新层——才得以确立。马克思是如何在赫斯的思想圈中形成自己的理论，又是为何及如何从中超出，这些问题如果不弄清，归根到底就不可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

虽说如此，过去的研究者过低地评价赫斯的影响，原因在于：

第一，赫斯的著作，尤其是与马克思的关系的重要论文和书信长期被埋没，缺乏研究的资料。资料的整理仅仅是近十年的事。^②

第二，马克思早期的各种文稿，特别是《经哲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公开发表的迟滞，致使一个时期来颇为引人关注的“赫斯与马克思的关系”的研究，最后无果而终。等到马克思方面的资料基本出全了，对赫斯感兴趣的研究者业已退出了舞台。^③

第三，那些建立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基础的人们，坚守着赫斯与马克思“毫无关系”的先入之见或过份矮化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这种

① 关于新旧层及这一遗稿的文献学的意义的问题，请参照拙文“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收录于《广松涉著作集》第8卷）。

② 话虽如此，1921年在柏林出版了T. Zlocisti编的*Moses Hess, Sozialistische Aufsätze, 1841—1847*，但遗漏了与马克思的关系上的几篇重要的资料。三十年后在纽约出版了E. Silberner编的*Moses Hes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951（据说这是油印的），增添了新的资料、分量约增加了四倍的该书的公开出版是在1958年。此后，E. Silberner u. W. Blumenberg编的《书信集》（1959），科尔纽和W. Mönke的*Moses Hess. Sozialistische und 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Berlin, 1961，以及Mönke的*Neue Quellen zur Hess-Forschung*, Berlin, 1964等的出版，总算整理了基本的资料。

③ 如果马克思方面的资料提早出版十多年，写有赫斯传记*Moses Hess, Der Vorkämpfer der Sozialismus und Zionismus, Eine Biographie*, 1905, 2. Aufl., 1921的出版了上述资料集的Zlocisti，和写有*Zur Würdigung des, wahren Sozialismus*的E. Hammacher，既可能抱持坚定的观点，在其被译成日文的名著《社会主义史》中对赫斯给予高度评价的马克斯·伯亚，写有《莫泽斯·赫斯与唯心辩证法的问题》（1926）的青年卢卡奇，也应该会从马克思主义的方面作出积极的反应。然而《经哲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文公开发表后的1932年，他们已经不得不保持沉默。

先人之见直到现在也还在持续。^①

除了以上三点之外,还有就是关于赫斯与马克思二人文献考证的研究问题,不能仅仅根据形式上的资料整理就草率做出判断的情况。

恐怕还存在这种情形,奥伊则尔曼(苏)、马尔利奇(德)、阿尔都塞(法)、凯基(奥)、亚当斯(英)等^②人虽出现于赫斯的资料得到完备整理之后,虽然他们“关于早期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著作已有国际定论”,但在我看来,却依然没有摆脱旧有的状态。

当然,科尔纽的确在编辑出版了赫斯的资料集之后,就将旧作《莫泽斯·赫斯与黑格尔左派》(1934)付诸于绝版。但是,甚至他的被称作“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峰”的《马克思恩格斯传》(*K. Marx et F. Engels*)^③——尽管第一卷的写作^④是基于不完备的资料——一直不曾修订,落后于 Erich Theis,^⑤而形成一切委之于今后的现状。

对莫泽斯·赫斯与早期马克思的关系进行合理评价的作业,从实质

① 《经哲手稿》公开发表后不久,马尔库塞写了一篇突显手稿意义的经典论文 *Neue Quellen zur Grundlegung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1932(收录于良知力、池田译《早期马克思研究》),而兰茨胡特将马克思《手稿》独自发表,并添加了序言,他们两人都完全忽视赫斯的影响,而著有《从黑格尔到尼采》(1939)的洛维特只提及马克思与赫斯的私人关系而已。

撰写了马克思的传记 *Karl Marx. Geschichte seines Lebens* (1918)的梅林,一方面腾出篇幅记述作为马克思的同事的赫斯,而简单地处理为思想家的“赫斯从不从哲学的蜘蛛网解放自己……是由于明显的思想混乱”(*Geschichte Schriften*, 3. Bd., 1960, S. 143, 参阅弗·梅林:《马克思传》(上),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54页)的评价,古斯塔夫·麦尔的恩格斯传 (*F. Engels. Eine Biographie*, 1919, 2. Aufl., 1934)也是采取基本相同的评价。还有当时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写有《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西德尼·拉克,虽然郑重其事地提出了马克思是否是赫斯门下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这一问题,而最终还是贬低赫斯 (*From Hegel to Marx*, 1936, 2nd ed., 1962, p. 218f.)。这都成为后来的研究者们轻视赫斯的原因。

② Т. И. Ойзерман: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философии марксизма*, 1962(森宏一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 H. Ullrich: *Der junge Engels*, I, 1961, II, 1966; L. Althusser: *Pour Marx*, 1965; P. Kagi: *Genesis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1965; H. P. Adams: *Karl Marx in his earlier Writings*, 2nd ed., 1965.

③ 中文版见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全三卷),刘丕坤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80年版。——译者注

④ 参照 Tome 1 (1955)卷末的参考书目一览(p. 309)。科尔纽首先出版的是德语版 1. Band (1954),原稿想必是用母语语法书写的。

⑤ 例如, *Das Menschenbild des jungen Marx*, 2. Aufl., 1961. 当然,他也没有涉及赫斯为《德法年鉴》而写的 *Über das Geldwesen* (《论货币的本质》)这篇重要的资料。

上来说,不能停留于填平上述的裂缝。这一作业还必须面对,既成的马克思像一旦解体,早期马克思像的再构成的课题。“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源泉的综合统一”这个命题,如果将之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上所占地位的一个论题,这依然是正确的。但是过去的大多数研究者,都把这个命题当做马克思主义建立的标志。我们不能认可将早期马克思的思想形成过程嵌入这一图式。即使撇开与赫斯的关系不谈,如最近的实证研究的情况所表明的,作为“源泉”之一的法国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实际情况是如早期恩格斯反复强调的“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1](p. 279)}而且这种黑格尔左派哲学的展开过程,决不只是以费尔巴哈作为单线的中间环节。在黑格尔左派自身的内部存在着三种潮流及其综合。第一种潮流是由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的系列(进而通过中期鲍威尔及其一派而继续),第二种潮流是由切什考夫斯基、赫斯的黑格尔历史哲学批判的谱系,第三种潮流是经由卢格而与马克思相关联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谱系。从图式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但是,这是从撇开经济学的体系的意义上来说——就是通过对这三种潮流的综合、扬弃而形成的。

因此,马克思与赫斯的关系这个问题,不是作为横向的影响关系的问题,而是应该作为黑格尔左派的自我展开过程的一契机来研究的东西,必须置于作为这个过程的归结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的追认这种纵向的视角中来考察。根据这种视角概观马克思的思想形成过程,提出“早期马克思主义”像的重构,这是本稿的课题。

一 黑格尔左派的三极化与“莱茵报”时期

研究者们常常只是“笼统”地将黑格尔左派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前史来对待,而且认为《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似乎已经从中脱离了出来。但是,这种做法,不仅歪曲了历史事实,而且一开始就掩盖了马克思的思想形成过程。《莱茵报》时期(1842—1843)的马克思,是黑格尔左派中最稳健的一员,他当时从所谓右派的立场与柏林的黑格尔左派发生争执,也由此疏

远赫斯，这种迟钝后来反而成为加速他向左转的一个重要因素，对这些情况，我们必须有所了解。

[一]从黑格尔逝世到1841年的十年间，随着黑格尔学派的发展产生出一支“左派”力量，它们是一批与普鲁士国家“志同道合者的思想”团体。虽然左派被责难为“因得意忘形而失败”，但是这种左派甚至也“感到”普鲁士国家的庇护，^[2]能够以理性的=现实的限度上的普鲁士国家的理念承担者而自居。

D. 施特劳斯、B. 鲍威尔、L. 费尔巴哈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从1835年到1841年而进行的基督教批判，的确受到了保守派的反击。但是，当时普鲁士的政令不能畅通整个德国，一方面的新教虔诚主义和另一方面的天主教教皇绝对权力主义的两种宗教势力都很强盛——因此，求诸于罗马教会的调解而产生了“普鲁士在全世界面前亲吻教皇的鞋子”的结果，^{[3](p. 429)}最终爆发的“教会纷争”，这是1837年的事——这些传统的“宗教势力”成为实现“近代德国统一”志向的“最大障碍”。为了打破这个障碍，就必须对原教进行理性主义的批判，黑格尔左派的宗教批判，在此意义上是与普鲁士国家志同道合的伙伴。实际上，他们继续接受文化部长 Altenstein 的温情，继续相信“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4](p. 11)}

但是到了1841年，事态为之一变。前年即位的弗里德里西·威廉四世开始采用放弃重用阿尔滕斯坦因——这原本是先王时代的政策——的反动政策。姑且撇开德国工商业的发展及其影响，黑格尔左派到达的思想水准，与这种反动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其取得了质性飞跃。

黑格尔左派的国政批判，当然，是以作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现实的应有国家为尺度，通过攻击现实与应有的国家的背离而进行，但他们此时是以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作为自己的宗教批判的成果的补充。神学的秘密是人学，所谓的神不过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这种宗教批判的成果——虽然费尔巴哈自身停留于提出通过爱的宗教而回归类的本质的方针——鲍威尔兄弟、A. 卢格、M. 赫斯等，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推进。

鲍威尔一派，把教权的、政治的、社会的及其他一切构成桎梏的社会

现象归结于宗教的名下,用黑格尔左派的宗教批判的逻辑展开“批判的批判”。他们的批判,虽然一开始只限于在理性上对普鲁士国家提出建议,呼吁现实改良,但随着当局的反动政策的进展,他们领悟到这毫无效果,不久就力图颠覆体制本身。虽说如此,他们也觉得时机尚不成熟。在这里,他们把自己比拟为为法国革命作了准备的启蒙家,在以“自我意识的哲学”为基础的历史展望中,热心于激进的启蒙活动,以谋求应有的群众自我意识的自为化。这种启蒙=批判,绝不可能是受一般人欢迎的温和的东西。因为,这是应该形成的、与新的社会体制相适应的意识,因为体制内累积的批判归根到底不能破除体制内的意识。因此,他们对具有德国南部及其他可能势力的稳健的新自由主义(“*Juste-Milieu*”),以改良主义的要求是体制继续存在的前提为理由,也进行彻底的批判,1842年的后半期,甚至对法国共产主义产生了共鸣。

随着 A. 卢格于 1841 年被取消教职,1838 年创刊的《哈雷年鉴》因被弹压而改名为《德国年鉴》(每周六次发行的报纸)继续发行,其态度终于明朗起来。他一面进行黑格尔左派“共同的机关报”的编辑发行这一当务之急的工作,一面尝试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主张以共和制代替黑格尔的理想化的普鲁士国家,到了 1842 年甚至提出建“党”的必要性。

M. 赫斯虽然原本不是出身于黑格尔派,但是,1841 年写完《欧洲三头政治》之后,对黑格尔左派产生“振动和同感”,自己逐渐靠近黑格尔左派,参加费尔巴哈的“人学”而形成自己的共产主义理论。他很快与“正义者同盟”(魏特林派)取得联络,通过合法、非法出版物,开始从事共产主义的宣传活动。

就这样,在 1842 年马克思成为《莱茵报》主编前后,黑格尔左派坚持相对于作为整体的普鲁士国家的真正在野党的立场,在其内部产生了三极分化的征兆。

[二] 1842 年春,于耶拿大学取得学位的 22 岁的马克思,在谋求教职的短暂期间度过了一段赋闲的时光,等到为他的教职而奔波的 B. 鲍威尔本人失去教职(42 年 3 月)以后,决意以文笔立身。当时,《莱茵报》(1841 年 1 月创刊,由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直系弟子黑弗根

为总主编，B. 鲍威尔的义弟鲁滕堡任责任编辑），似乎成了黑格尔左派的机关报。马克思也作为鲍威尔派的一员从5月开始向其投稿，并于同年10月在鲁滕堡因当局的干涉而辞职后，就任主编。

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的文章，虽然主要内容是时事问题的评论，但是都不直接涉及狭义的政治事件、经济问题和作为宗教的宗教问题，基本上是围绕州议会中的法案的审议、中央政府的政令和法律修正案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评论。

与黑格尔左派的其他论客的文章相比较，——之所以限定于黑格尔左派，是因为与实际上已在1835年受到禁止写作处分的“青年德意志”派的领导者，以及受1839年布朗基的武装起义计划的牵连的“正义者同盟”魏特林派，原本不具有可比性——鲍威尔、卢格、赫斯这“三巨星”自不待言，即便与当时已公然肯定革命的暴力的克彭^①，当时在德国居住的基本上形成了其无政府主义立场的巴枯宁^②，出色地对英国经济的状态进行了分析并对“无产阶级革命”作了展望的梅菲森等等相比较，^{[5](p.96)} 马克思的议论也是相当的稳健。

当时的马克思：

(1) 正处于追随黑格尔，把国家看做“人类关系的理性的现实态”、“理性自由的实现”，^{[6](p.127)} “现代国家，不论它是怎样不符合自己的概念”，^{[6](p.155)} 国家的目的是使有道德的个人自由地联合起来，^{[6](p.117)} 也确信法律是“自由的体现”，^{[6](p.142)} “事物的法的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6](p.139)}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不仅在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在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6](p.121)} 基于这种确信，并且不能“让片面和庸俗的经验使我们陷入迷误之中”，而要通过“在衡量事

① 关于 K. F. Köppen(以及后面 Mevissen 的注释)，未能利用第一手资料，而是根据各种研究著作。这里的立论是根据 Hook 引用的 *Deutsche Jahrbücher*, 1842, S. 515, etc.。

② 参照 Maximoff; *Mikhail Bakunin*, 1961(主要文献的英译摘录)收录的 *Biographical Sketch* (by Nettlau)。

物的存在时,我们应当用内在观念的本质的尺度”^{[6](p. 61)}这种方法,^①对书报检查令、木材盗窃法、婚姻法等,^{[6](p. 3\135\182)}这些有悖于法的精神、危害国家的事情进行的批判,^{[5](p. 211\214\285\302)}对于法的历史学派——他们不是把理性的东西看做现实的东西这种情况^{[5](p. 252)}——的批判,确实是从黑格尔的立场进行驳难。

(2) 虽然是在这种框架的内部,但是,^①这是“将习惯权利返还给穷人”的“为穷人要求习惯权利”。^{[6](p. 142)}^②确认州议会是围绕各种身份的私人利害而运转,道破这实际上不过是“私人利益希望并且正在把国家贬为私人利益的手段”^{[6](p. 155)}——马克思还认为,即使以所有权的不可侵犯性为前提,^{[6](p. 139\165)}也可从这种私人占有制基础下的“下流的唯物主义”^{[6](p. 180)}中摆脱出来——总之,“痛感利益的咒缚力”。^③当初5月还是仅仅斥之为虚构的共产主义,到了10月则承认无论如何有研究的必要^{[6](p. 133)}——但是,马克思对“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因此,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都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的观点,宣布将对这种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6](p. 133)}并且,揭示了共产主义的“实际试验”,“即使是大众的尝试,也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这并不那么危险,“构成真正危险的,是共产主义的理论阐述”。^④^{[6](p. 134)}不管怎么说,这是值得留意几段话。

(3) 从论述的姿态来说,与柏林的黑格尔左派不同,具有如下特点,^①不是将事实还原为“宗教”的问题,而是始终从政治—法律的层次上进行论述。^②即使是在体制的框架内,所做的也是“有实现可能”的现实的批判。^③因此在拒斥过激的发言的同时,对中庸派(*Juste-Milieu*)的自由主义的一面基本上给予支持。

①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的附注中写道:“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正是批判从本质上衡量个别存在,而从观念上衡量特殊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8页——译者注),不用说,这里仍然坚持这种观点。

② 这里,应该斟酌取自赫斯写的报道而添加的另纸以答复“红色攻击”一文。但是,如果考虑到马克思甚至在 *ibid.*, S. 265 中所引用的 *Aachner Zeitung*, 实际上是通过巧妙的方法对共产主义基本作了全面的肯定,出于应付检查的需要而伪装的俗说是站不住脚的。原本这里所说的“伪装”好像过于苛刻。

在这种思想水准中的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1842年11月30日)中,如他自己所写的,对柏林的鲍威尔派寄来的“点缀上一点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废料”,“不比书报检查官淘汰的少”。^{[3](p.435)}其结果,检查机关高兴地认为,“与以前相比,莱茵报的论调无疑变得明显稳健”,^①由此与柏林的“自由者”们产生了矛盾。

[三] 在马克思与鲍威尔派产生矛盾的那段时间,卢格与鲍威尔之间也产生了矛盾,最终出现了先前叙述的“黑格尔左派的三极分化”的公然对立的形态。这促进了马克思和卢格相互呼应似的亲密度,使得志向于协同工作。

我想,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卢格,抑或鲍威尔派都不曾觉察到对立的真正意义。但是,如一切派别斗争常遇到的那样,对其中的当事者们来说毫无退路。他们深信在某一天黑格尔所谓的“理性的自由”一定能实现。他们已经不再相信神的存在,不相信理性的狡计,在他们看来,作为自由的实现的国家,作为伦理的理念的现实态的国家,必须通过人的双手去实现。这取决于作为民族精神的群众的自我意识(*Selbstbewußtsein* = 自觉),取决于启蒙的成功与否。这在以上各个问题上,没有任何错误。另外,关于应该实现的理想国家问题上,鲍威尔派的“共产主义”,一方面不完全接受法国的既成理论,另一方面尚未形成独特的体系化;卢格所谓的“共和制”“穷人的解放”也还不明确,马克思的伦理国家更是一种未定形态。在这些问题点上,尚不构成决定性的对立。成为对立的契机的,是围绕当前的“启蒙”的内容和方法。鲍威尔派寄理想的实现于遥远的将来,因而不考虑即时的效果,专擅于原则的批判和原理的宣传。马克思认为那些都是空洞无物的东西,而尝试现实的批判。卢格(以及赫斯),考虑到党的形成,而承认与群众意识相适应的启蒙的意义。然而对这一点,从鲍威尔、马延派的立场来看,这是以现行体制为前提的半途而废的批判,不过是畸形化了的原理的启示,对于“自我意识”的形成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① 参照梅林、科尔纽(*Marx u. Engels*, 1. Bd., S. 340)引用的检查机关的报告书。这每每被当做马克思的“巧妙的伪装”之故。即使承认这一主要原因,也不能否定与他当时的思想和态势所具有的渊源。

确实在这点上，鲍威尔派不得不对卢格、马克思的“改良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责备马克思的“保守主义”，“指摘书报检查官，说他们的书报检查执行得‘太软弱了’”。^{[6](p.110)}提出“书报检查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尽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的马克思，^{[6](p.111)}果断地保持自我，不放弃自己的观点，不惜与鲍威尔派决裂。这样，马克思为了确保作者和报道也就求助于卢格派，与卢格建立了联系。

但是，不管马克思怎样努力，翌年即1843年3月《莱茵报》还是被禁止发行——卢格的《德国年鉴》在前年底被禁止发行——黑格尔左派的两大机关报遭到了封杀的惨痛经历。^①

两位主编不久后移居巴黎尝试共同编辑《德法年鉴》，这一准备的过程，成为马克思自我批判和克服《莱茵报》时期思想的机会。

马克思必须直面的问题状况，目前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即使现状再怎么样也必定遵循其理念”“使理性的东西成为现实的”这种黑格尔的乐观，通过^①详细了解议会的“下流的唯物主义”，^②由于动摇了逢迎行政当局的日益反动政策，有必要对此进行再思考。

第二，马克思虽然意识到“批判的批判”是空洞无物的东西，但根据“现实的批判”进行改良也同样无效的，因此，必须要对理想国家的内容及其实现方法——在这一点上，鲍威尔派的主张有相应的重合性，卢格、赫斯亦然——进行彻底思考。在《莱茵报》被禁止之后，这一问题也成为马克思的人生方向问题，这也是人生方向的问题。

第三，^①一方面，通过摩泽尔地区的实地调查而了解到经济问题的重要性，^②另一方面，通过与赫斯、梅菲森等编辑的——他们认为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在于国家而是在于社会革命——共产主义观点的接触，促使马克思转向对社会经济问题研究。以至迫切需要进行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

^① 其实当局在前年底已内定于3月全面“封杀”《莱茵报》，为此检查官才经常尝试不讲理的干涉。不清楚当时的马克思是否觉察到这个“内定”，不过他已在禁止发行之前的3月中旬退出《莱茵报》。

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通过对黑格尔婚姻法的批判，以及报刊禁发前二三个月的“非妥协”性志度和对摩泽尔地区农民救济问题探讨，都包含着对上述三个问题的预见，但马克思真正直面这些问题则始于1843年后期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探讨。

二 与黑格尔哲学的决裂和《德法年鉴》时期

通过与黑格尔法哲学的决裂，马克思开拓了新的视角，迈出了确立“哲学共产主义”的一步。

回头来看，通过黑格尔的学生 E. 甘斯的讲座，马克思了解到了黑格尔的法哲学，这促使原本打算攻读法律的马克思转向了哲学，从此，马克思的命运发生了转变，走向了波澜壮阔的人生之路。在此之后，马克思深受黑格尔法哲学的巨大魅力吸引，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已把黑格尔的哲学当做解读历史现实的原则。确切地说，马克思于1842年3月就曾试图批判黑格尔的“自然法”，而不是到了1843年才开始质疑黑格尔的法哲学。^①

但是，1843年的马克思进行的，已经不是对自然法和婚姻法，^②而是对构成黑格尔法哲学的重点的国家法的批判（1843年的遗稿《黑格尔国家法批判》），虽然还维持着“从市民社会到国家”这种图式，但“国家”在此已注入了新的内涵。

〔一〕众所周知，黑格尔的法哲学，是由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作为辩证

① 1842年3月5日，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写道：“我为《德法年鉴》写的另一篇文章是在内部的国家制度问题上对黑格尔自然法的批判。”在1843年末—1844年1月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此作了自我批判。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1页，第700页“注311”。

② 参照《莱茵报》所载的 *Der Ehescheidungsgesetzentwurf*（即《论离婚法草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2—185页）（MEGA，1. Abt.，1. Bd.，1. Halbband，S. 315ff）。另外，马克思也许是无意识的，关于习惯法，与其说接近黑格尔（参阅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18—221页），毋宁说与萨维尼（萨维尼（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1779—1861），德国法学家，历史法学的创立者。著有《现代罗马法体系》）的立场相接近（vgl. *ibid.*，S. 271f.）。

的三个阶段而构成,形成市民社会的各种矛盾在国家中被扬弃这样一种图式。黑格尔所思考的市民社会的矛盾,可以说是抽象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矛盾,虽然市民社会归根结底不过是“原子的体系”,但是具有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知识并了解英国社会的情况的黑格尔,^{[7](p. 85)}对市民社会的矛盾作了极为具体的描画,甚至指出了如下问题。

作为欲望和劳动的体系的市民社会,通过其内在必然的机制,产生了一极是财富的过剩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过剩积累。但是市民社会,陷入了作为财富的另一极而产生的这种人口过剩、失业工人、被救济贫民的處理的两难处境。如果使“走向贫困的群众”通过社会救济事业而得到救助,“那末,穷人用不着以劳动为中介就可保证得到生活资料”,“这与市民社会的原则即社会上个人对他独立自主的感情是相违背的。”^{[8](p. 245)}反之,生活资料通过劳动而获得,又恰恰陷入了“生产过剩”的祸害。“尽管财富过剩,市民社会总是不够富足的,这就是说,它所占有而属于它所有的财产,即使用来防止过分贫困和贱民的产生,也总是不够的”。^{[8](p. 245)}于是将过剩人口输出到殖民地,这归根到底不过是将同样的矛盾转移到新的土地上进行再生产。^①

黑格尔论证说,应该把包括这种具体内容在内的“使人分散为原子式的单个的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私利的战场”的市民社会,^{[8](p. 309)}扬弃为“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统一”、^{[8](p. 261)}“伦理性理念的现实态”的国家。^{[9](p. 257\261\289)}

但是,此时黑格尔所设想的国家并没有超出理想化的普鲁士的立宪君主制国家的范围。^{[9](p. 273)}对这一点加以批判的是卢格。他指出贯穿于黑格尔的整个哲学的构想法上的缺陷使得法哲学也具有其缺陷,将他在宗教方面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作业比作施特劳斯所开始的业绩,^{[10](p. 496)}^{[11](p. 133\319\345)}将“理想化的普鲁士国家”置换为“理想化的法国

① 虽然不是作为主题性研究,但是 R. Heiss, *Wesen und Formen der Dialektik*, 1959, S. 73ff. 指出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与《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揭露”的惊人的一致。另外, R. Heiss 的这一优秀著作《辩证法的本质与形式》(加藤尚武译)预定最近在我国公开出版(未来社)。[已于 1970 年出版]

大革命时期的共和制”。

马克思进一步继承了这一点,主张“政治国家的彼岸存在无非就是要确定它们这些特殊领域的异化。……君主制是这种异化的完整的表现,共和制则是这种异化在它自己的领域内的否定”,^{[6](p. 283)}断言黑格尔的“立宪君主制”自不必说,甚至卢格的“共和制”的“伦理理念的现实态”也是不够的。

这里,马克思提出的代替方案是一种独特的“民主制”(Demokratie)。当时的马克思虽然模仿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而将“国家的彼岸存在”看做异化态,但是还没有真正地把国家当做普遍的异化状态而予以拒绝。在他的思考中,“民主制是一切国家制度的实质,是作为国家制度特殊形式的社会化了的人。……在这里类本身也表现为一个存在物”,^{[6](p. 281)}“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和特殊的真正统一”。^{[6](p. 281)}马克思以这种“民主制”代替黑格尔的“伦理理念的现实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是“真正的人的共同体”,从而将黑格尔的立宪君主制国家、卢格的共和制国家置换为“民主制国家”。马克思就这样一方面继承黑格尔哲学中的“市民社会向国家的扬弃”而由此解决市民社会的各种矛盾这种图式,一方面使所谓的“国家”脱胎换骨。

此后,马克思通过进一步将“民主制国家”置换为“共产主义”——虽说如此,这也已经不是通常的民主制——这种方法而进行共产主义的研究,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是通过与黑格尔法哲学的决裂才迈出了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

[二] 但是,此时马克思,并不是以黑格尔是反动的为由来批判黑格尔的。他批判的矛头指向的是黑格尔的逻辑,但从整体上看,马克思并没有超出黑格尔法哲学的范围。我们应该注意当时马克思的这一特殊的思想状况。

(1) 自鲁道夫·海姆^①的 *Vorlesungen über Hegel und seine Zeit*

① 鲁道夫·海姆(Rudolf Haym, 1821—1901),德国文学史家,政治上支持俾斯麦的政策,哲学上受施特劳斯的影响,属于青年黑格尔派。——译者注

(1857)出版以来,就存在将黑格尔的政治社会思想当做普鲁士反动权力的官方学术的倾向,在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上也经常存在以这一“通识”为讨论前提的倾向。的确,黑格尔思想中存在着这种反动情结,特别是根据1848年德国革命以后的观点来看,这种“通识”的存在也不难理解。但是,在1848年以前,黑格尔的社会政治思想常被理解近代普鲁士国家的预言,必须要承认这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不仅如此,甚至还应当承认“后进国思想的优越地位”。

关于这当中的情况,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指出:

“我们德意志人是在思想中、哲学中经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的。……因此,当我们不去批判我们现实历史的未完成的著作,而来批判我们观念历史的遗著——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本世纪所谓的问题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6](p.458)}“他们这些理想制度就包含了对现实制度的直接否定,而理想制度的直接实现,他们在观察邻国的生活的时候几乎已经经历过了”。^{[6](p.459)}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不仅是对德国现实的批判,而且是对其“后史”的批判,即,意味着对先进国所到达的状态的批判。

此时,我们无需列举E. 甘斯和L. 封·施泰因等人。前者在马克思还是学生的时候,就曾将法国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同黑格尔法哲学的同业公会进行比较,而后者著有《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842)并将法国的社会主义体系与德国的“法哲学”相比较。对于黑格尔派的大多数人来说,黑格尔哲学已超越了英法的“理想制度”,即,作为超越了既有的社会主义、既有的英法共产主义思想的东西而接受。

所以,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并不是依据英法的政治、社会思想而进行。

(2) 因此,与黑格尔法哲学的决裂,无论是卢格还是马克思,都是攻击

黑格尔的逻辑上的缺陷而进行内在的批判。总之——如费尔巴哈早就指出的——在黑格尔那里，主语和谓语是颠倒的，又是对这种颠倒加以批判。

马克思在 1843 年时，对“唯心论与唯物论”这种费尔巴哈的议论本身还不感兴趣，他主要是借用“主谓颠倒的批判”，以此为武器对黑格尔的国家法理论进行逐条批判，执拗地揭露“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理念当做主体，而把真正的现实的主体……变成了谓语”。^{[6](p. 255)} 上例的“民主制”的立论，也是通过对这种“主谓颠倒的批判”而展开的。

马克思说：“黑格尔把这些谓语弄成某种独立的东西，然后神秘地把这些谓语变成这些谓语的主体”。^{[6](p. 272)} “这样一来，构成国家本质的主权在这里先被看做独立的存在物，被当成了客体”。^{[12](p. 427)} 黑格尔就这样“力图在这里把君主说成真正的‘神人’，说成理念的真正化身”，^{[6](p. 273—274)} 试图由此导出君主权。但是，“假如黑格尔从作为国家基础的现实的主体出发，那末他就没有必要神秘地把国家变成主体”。^{[6](p. 272)} “国家是抽象的。只有人民才是具体的”。^{[6](p. 279)} 从这一现实的主体出发，“人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的条件下”，^{[6](p. 268)} 归结出“国家制度不仅就其本质说来是自在的，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说来也日益趋向于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确定为人民自己的事情”的“民主制”。^{[6](p. 281)}

马克思就这样通过把“主语”和“谓语”再颠倒过来，将黑格尔的“君主制”置换为“民主制”。

(3) 马克思创立的这种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6](p. 280)} 不仅维持着“从市民社会到国家”的图式，而且保留了包括黑格尔“国家”论在内的一切“优秀的东西”。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国家论，如通常所说的，可以说是对卢梭、康德的市民社会论和德国浪漫主义的国家论的扬弃。因而黑格尔的“国家”与——加上赫尔德^①的 Humanität 的实现，法的历史学派的民族精神的显

①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 德国哲学家、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和信义会神学家。著有《1769 年游记》(Journal meiner Reise im Jahr 1769)。——译者注

现等“德国的历史观”的构想——诺瓦利斯^①的 Makroanthropos、F. 施勒格尔^②的“犹如一个宽容的大家庭”等是相通的东西。

这种国家观，一方面确实是后进国德国的共同社会特质遗风的投影，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做是对过于有着利益社会特质的先进国家英国、法国的历史的现实的理想性扬弃。当时，对于面临 1848 年革命的德国思想界来说，在一方面打破旧体制是既定的义务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认为新体制应该唾弃英法的状态，不要陷入到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状态，要实现真正伦理的状态，这构成其志向的主流。这里的作为理想而描绘的国家，在气势上是一种家庭的共同体。

马克思的理想国家也恰似“把个人的目的变成大家的目的，把粗野的本能变成道德的意向，把天然的独立性变成精神的自由”的“理性的社会的存在”，^{[6](p. 118)}所谓的“民主制”，无非是“类本身也表现为一个存在物”的共同体。^{[6](p. 281)}当时的马克思所说的民主制，不是政治国家的形式，^③而是意味着真正的伦理的共同体。这——绝不是以市民社会的原子的个人为前提，也不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志向的英法“先进”思想为雏形——归根结底是以“德国的构想”“德国的理想”为基础。

[三] 马克思在 1843 年秋天怀着“民主制”的思想前往巴黎，与卢格共同创办《德法年鉴》。从年鉴上发表的马克思的两篇论文——《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也能发现受到莫泽斯·赫斯的影响。

“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不会集中于自己本身，而会集中于只用一个办法即通过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上去”。^{[6](p. 460)}“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6](p. 460-461)}现在，使人在与

① 诺瓦利斯(Novalis, 1772—1801)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译者注

② 施勒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 1772—1829), 评论家、语言学家,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译者注

③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 第 281 页。马克思在其中写道: “民主制独有的特点, 就是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 政治制度本身在这里不能组成国家。”——译者注

人的本质相符合的状态中存在的“人的解放”就成为问题。

“人的解放”与所谓“政治的解放”在层次上有质的不同。后者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整个社会的解放”。^{[6](p. 463)}与此相对，前者无非是“民主制”的实现，是“全面的”“人类的解放”。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可能是通过罗森克兰茨^①的著作(*Über d. Begriff d. Politischen Partei*) (1843)关注到卢梭关于公意和众意——黑格尔曾给予高度评价^②——的区分的，进而将费尔巴哈的“类存在”概念与公民(citoyen)概念结合起来，提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forces propres)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③[6](p. 443)}

在此意义上，对既成的共产主义而言，由于“这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它还没有摆脱它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存在的影响”，^{[6](p. 416)}因此马克思是持否定的态度。因为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没有超出“市民社会”的原则，归根结底这不是作为citoyen，而是作为homme，没能超出基于资产阶级(bourgeois)立场的“政治解放”的范围。对马克思来说，彻底的volonté générale的实现，用“德国式”的话来说，类生活(Gattungsleben)中的Humanität的自在自为的存在才是问题

① 参阅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4—255页。黑格尔此处对卢梭的评价使用了先扬后抑法：“卢梭在探求这一概念（即‘国家’——译者注）中作出了他的贡献，他所提出的国家的原则，不仅在形式上（好比合群本能、神的权威），而且在内容上也是思想，而且是思维本身，这就是说，他提出意志作为国家的原则。然而他所理解的意志，仅仅是特定形式的单个人意志（后来的费希特亦同），他所理解的普遍意志也不是意志中绝对合乎理性的东西，而只是共同的东西，即从作为自觉意志的这种单个人意志中产生出来的。这样来，这些单个人的结合成为国家就变成了一种契约，而契约乃是以单个人的任性、意见和随心表达的同意为其基础的。”

② 黑格尔死后，黑格尔学派分成了三派：老年黑格尔派（右派），代表人物有B. 鲍威尔、迦布勒等；青年黑格尔派（左派），代表人物有施特劳斯、费尔巴哈、施蒂纳、E. 鲍威尔、卢格、马克思等；新黑格尔派（中间派）代表人物除了这里谈到的罗森克兰茨(W. Rosenkrantz, 1821—1874)以外，还有埃德曼(J. E. Erdmann, 1805—1892)等。

③ 关于这一点，参照赫斯的*Philosophische und sozialistische Schriften*, S. 251, S. 219等。另外，参照《思想》1966年第6期城塚的论文和1967年第6期上山的论文。

的所在。

当时的马克思宣布说，“对德国来说”，“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全人类的解放”^{[6](p.463)}才是唯一可能的革命，大概这也是意识到卢格与罗森克兰茨的争论，因而大声疾呼“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核心是无产阶级”。^{[6](p.467)}

“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的身上，即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6](p.466—467)}无产阶级“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6](p.466)}这就是不同于所谓的政治解放的人类解放。

《德法年鉴》时期的以上思想，经常被人推广到后期。但是，我们必须避免这种草率的判断。

实际上，从以上观点来看，无产阶级——当时这个概念还很含糊，没有将其同一般无产者区别开来——归根结底是一个阶级的限定，不管怎样强辩，终究不能避免所谓的“人类解放”不过是阶级的解放，是一种“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整个社会的解放”^{[6](p.463)}的“政治解放”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不仅动摇与“政治解放”相对的“人类解放”的规定，而且也撼动他的“民主制”和其“反驳共产主义论”的力度。

即使撇开这一点不谈，同样是在《德法年鉴》中，马克思说：“我们的全部任务只能是赋予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以适合于自觉的人的形态，像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所做的那样。……意识改革……那时就可以看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一旦认识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6](p.418)}而《论犹太人问题》——在其中，马克思还没有肃清“自我意识的哲学”——就是以公开批判鲍威尔开头的。

尽管如此，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的“主语和谓语的颠倒”而设定的“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6](p.467)}“以人本身为体制的原则”的社会——这种以“类作为实存的存在的社会”的志向的树立，蕴含着与所谓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异质的构想和契机，成为通往马克思特殊的共产主义理论的第一步。

这里,马克思很快就会通到这一课题,即,所谓“人作为个人的类的存在”的“共同社会”,具体是一种怎样的社会体制?当说到无产阶级“人的完全丧失”时,^{[6](p.466)}所谓的“人”是指什么?又为什么会“完全丧失”?“现世的神是钱”所说的“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6](p.448)}这种异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等等,总之“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6](p.453)}而莫泽斯·赫斯则引导了马克思对这一课题的探讨,这主要体现在后面的《经哲手稿》。

三 历史哲学批判的谱系学考察与《经哲手稿》

1844年春夏之季写于巴黎的《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划分马克思思想形成的一个转机。此前的马克思,虽说也尝试了其他方面的兴趣与才华,但基本上可以说是黑格尔法哲学的学生。至少关于政治、社会问题的构想和视角,是在黑格尔法哲学的延长线上。在巴黎开始的经济学研究——恩格斯的触发和所看到的一般说法未必一定准确——可以认为是从黑格尔法哲学的某种观点受到启发。^①但是到了《经哲手稿》,可以看到与黑格尔历史哲学批判的谱系的“交流”,已远远超出黑格尔法哲学的架构。

对于马克思的这一飞跃,不能撇开莫泽斯·赫斯的影响来思考。虽然在过去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赫斯的态度是敬而远之,但随着他自身思想形成的进一步发展,现在得以效仿赫斯的条件已经成熟。马克思在1844年初,已经对费尔巴哈关于黑格尔“主谓颠倒”的判定产生共鸣,感到应该将过去追随鲍威尔稀里糊涂地解读为“自我意识”的“绝对精神”置换为人。但是,这里的人不是原子的各个个人,而是“共同体存在”的“德国式”的人——马克思把扬弃了“人”的颓废形态的市民社会的原子化

① 《巴黎笔记》尤其明显地表现出是从 Vgl. 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 189 的视角出发,而《经哲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也有不少地方是紧随黑格尔法哲学的市民社会论的叙述。

的自在自为的“人”的实现，称作“人类的解放”——这与费尔巴哈的“类存在”相近。但是，马克思没有把这种类存在的本质特征局限在所谓的“爱”中，而是把它理解为社会劳动的主体一人，这一进展是与他对象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相联系的。

然而，在当时真正对费尔巴哈的“类存在”作如此解释的是莫泽斯·赫斯，他当时在巴黎协助《德法年鉴》的出版工作，他根据类存在概念，把人类史理解为自我异化和自我回归的过程，并以此为基础阐述了他对社会、经济和革命问题的看法。

这里，马克思通过赫斯的中介，重新阐释费尔巴哈，借助于自我异化的逻辑，踏上了三个源泉的综合统一之途。

[一] 莫泽斯·赫斯——与卢格、马克思继承了法哲学的主题相对——可以说是从黑格尔历史哲学脱却出来而确立了共产主义。

众所周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将历史理解为“自由的实现过程”，提出历经东方专制君主自由，到希腊、罗马多数人自由的西方，最终在日耳曼系的国民中，得到了完全的实现。尽管黑格尔通过其方法作了具体的描绘，但自由实现的过程却是倚赖“世界历史的狡计”，归根结底托付于理想化的日耳曼·普鲁士国家。^[13]

赫斯通过对黑格尔的批判继承，把实现自由的行动看成现实的人类的事业，并接受了切什考夫斯基的想法，即日耳曼国家的理想只能依托于傅立叶的社会主义未来像，^[14]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推进。

赫斯在与黑格尔派合流之前创立了独特的历史哲学，详细地描画了人类史的最初阶段是以财产公有制为基础的无意识地存在的自由、平等、和谐的社会，在此之后遭到了历史的必然的破坏，现在则是通过有意识的人类活动而向其回归的过程，1841年则马上开始着眼于历史的“基础”。比如，指出了古代的奴隶为当时的物质生产的状态所决定，指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两极分化。他将人类的发展理解为受历史的制约的东西，尝试从欧洲的政治·社会史来发掘社会主义的基础。

而且，他还根据切什考夫斯基的指摘，试图将“只是对历史作各种各

样的解释说明的历史哲学”向“变革历史的实践”^①“行动哲学”转换。“拿破仑轻视德国‘意识形态论者’确实是有道理。历史哲学……只是将过去的东西、现在存在的东西看做理性的东西，这仅仅理解了自己课题的一半。在历史的认识中，本质上是应该从过去和现在……推论未来。……而伴随这一课题的解决，历史哲学也就成为行动哲学。”^{[15](p. 85)}而且这里，不单是作为未来而被预见的东西，也不单是“自我意识的自为化”，而是通过人的自觉行动而能够实现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

在赫斯那里，“行动哲学”倚赖原有的主体概念。他把笛卡尔以来的“我思”理解为人的自我活动(*Selbsttat, Selbstbetätigung*)的主体，而且把人理解为本源上的社会存在。在这里，人的本质被看做协同(*Zusammenwirken*)。^②“这种协同正是个人的现实的本质。……思维和行动也都由协同而产生。……用‘精神’这一神秘的名字而称呼的东西……也无非是协同。是协同才使生产力现实化”。^{[15](p. 330)}赫斯不仅把人看做类的存在，看做共同体的存在(*Gemeinwesen*)，同时也规定为协同的存在，即协同存在物，他通过社会的方法，在劳动的存在这一主体概念下，论述了“自由”概念，以及为了实现真正自由的共产主义而应具备的现实的、历史的条件和社会经济的机制等。

在这里，我们介绍一下他其中的一个观点，整个论述如下。——人类的协同，在只是作为自在地保持的、未组织化的混乱(*unorganisierte*)社会中，人的自我活动、协同被异化，表现为各个个人的外在力量。“在人类的相互异化状态下，人们不得不将统一的东西求诸于非人的、超人的东西”，^{[15](p. 347)}这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因为在以往的社会中，各种外在

① 经常有人在特别的含义上，以为 Praxis 一词好像是由马克思首先使用似的，可以说 Cieszkowski: *Prolegomena*, S. 129 就是这样认为。恩格斯也在《莱茵报》1842年4月12日的 *Nord-und süddeutscher Liberalismus* (MEGA, 2. Bd., S. 288f.) 中，谈到 *aus der Theorie zur Praxis* (恩格斯在《北德意志自由主义和南德意志自由主义》一文的结尾写道：“它(南德意志自由主义——译者注)从实践走向理论，但是通过这一途径没有达到目的；那么就让我们从另一头做起，试着从理论出发，深入到实践，——假如你们愿意，我准备打赌，我们用这种方法最终一定会前进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7页)。

② *Zusammenwirken*，“协同”(也译“共同活动”)。——译者注

的强制,迫使人们进行活动,另外,货币原本作为自在地保证协动的中介物,而现在则像财产一样成为协动的异化态!——正是由于“异化的力量”才保证了社会的存在,犹如“理性的狡计”一样。但是现在,“通过异化期间人们的生产力的提高”,^{[15](p. 347)}使扬弃异化的“直接交往”成为可能的客观条件业已成熟。“受益于近代产业……由于已经获得使人类社会组织化的素材·内容,……只要去除形式上的障碍即可。……因为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内容(读作生产力!),所以从濒临倒塌的旧的形式(读作生产关系!)中,新的内容创造出与自己相适应的形式”。^{[15](p. 277)}这里所看到的赫斯的思想水准,可以说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底稿的相应部分基本接近。赫斯在这种水准中,探讨了以异化为主的一系列问题,论述了共产主义。

〔二〕1844年,马克思的思想状况,无论如何也无法全面接受赫斯的观点。但是他将赫斯的某个主题作为自己的东西而转向社会经济问题。

赫斯将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的逻辑、人的类本质的自我异化这种推理方式应用于社会经济问题,试图据此导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结论。作为其一个环节,赫斯指出,“用与上帝的本质同样的方法,可以规定货币的本质,货币……是在实践上被异化的人的本质”,为了抵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结论,提出“从费尔巴哈的立场,用实践上的上帝——货币——对付就行了”,他在为《德法年鉴》写的一系列论文——以《论货币的本质为代表》中作了一些积极的尝试。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写到,“金钱是犹太人的世俗的上帝”,^{①[6](p. 446)}而现在则不只是沿着赫斯的道路说“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16](p. 153)}与通过揭露上帝的本质是人,剥夺上帝的超越的威力一样,指出“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因而在人之外独立于人的财富被扬弃

① 仅就这一点来说,虽然也可认为是马克思的独创(M. Hess: *Philosophische u. sozialistisch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 A. Cornu u. W. Mönke. S. 19f., Anm. 5),然而即使毋庸倚赖赫斯的 *Dottore Graziano's Werke*,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证言来看(MEGA, 5. Bd., S. 474, S. 477, etc.),恰恰是参考了赫斯的东西。

了”，^{[16](p. 112)}“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16](p. 117)}论证了世俗的异化和从这种异化的回归。

《经哲手稿》不光在着眼点和构想上，甚至有很多引人注目的词句和修辞技巧都表现出与赫斯的论稿明显得一致，这里恐怕没必要详细地引证对比吧。总之，《经哲手稿》中的马克思采取的姿态是，立足于赫斯出色的事象的知识，“从国民经济学的现实出发”，指出了所谓的三重异化，^①“通过分析，从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②，进而，借助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16](p. 101)}他就这样，以异化论为基础对“没概念的国民经济学的范畴”展开批判，揭示了以国民经济学的各种事实这种形式而存在的自我异化的内在逻辑本身即指向“复归”，通过将共产主义作为这种复归运动的奠基^{[16](p. 120)}而使经济学与共产主义得以连接起来。

这一作业，可以说在更大的范围上，从以前的姿态——即，市民社会的状态的不合理性仿佛是不言自明，而将“类作为个体的存在”的真正的人类共同体与之相对置的姿态——摆脱出来，现在，则设定了将① 市民社会的非本真性在于哪里？② 这种非本真状态的形成的必然性，③ 这种状态的自我扬弃的必然性及其进程，④ 当中应能招来的人的自在自为的存在方式，把它置于历史哲学的透视下予以阐明的新视角。所谓三个来源的综合统一之所以成为可能也正在于这一视角，可以说《经哲手稿》对于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以下。——译者注

②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0页。中文版原文是：“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了劳动异化的四种形式或规定性，(1) 劳动产品的异化。(2) 劳动本身的异化。(3) 人的类本质的异化。(4) 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这里，日文版是把“四种异化”归结为“三重异化”，也就是把“外化的人”和“异化的人”合并为“一重”，即“异化的人”。此外，在《唯物史观的原像》第一章第二节，广松涉更具体地谈到了“三重(四重)异化”：“对这一课题的尝试解答，无非是那个著名的三重(四重)异化论。(1) 生产活动的主体的人(工人)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2) 工人的生产活动本身的异化。(3) 人的类本质——以及与其他的人——的异化。”由此不难看出，第3重异化实际上是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即破折号中的“以及与其他的人”)合并到“人的类本质的异化”。——译者注

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①

[三] 说《经哲手稿》受赫斯的影响,这当然不是完全无视马克思的独创性。但这个独创性,有着与落后构成表里一体的一面,毕竟孕育应予克服的问题。

虽说马克思是对费尔巴哈加以赫斯式的再解释,然而在《经哲手稿》中,可以说是站在费尔巴哈和赫斯之间的中间立场。^② 这从根本上说,仍依赖于主体概念的设定的方法。不管是马克思还是赫斯,都把“人”^① 作为社会的存在,^② 而且在作为自我活动、劳动的主体的把握这一点上大体上一致。但是,^③ 马克思虽然也强调人的自然存在的一面,而且这时,还遗留着“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这种特殊的费尔巴哈式的含义。^{[16](p.95)}

^④ 马克思由于认为“类的存在”是各个个人的代数和以上的东西,不知不觉间,还遗留着将类本质实体化的倾向。^⑤ 马克思具有以作为自然、类存在的“人”本身为最高价值的旨趣(与此相对,在赫斯那里则是“自由”。然而不是“法国式”的自由,而是源于他的自我活动的主体这种人的规定,是相对于必然王国的自由王国的自由)。马克思通过把具有上述①—⑤的意义的作为类的存在、自我活动的主体的人当做主体概念而展开积极的论述。

通过上述主体概念,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展开得以保证。《经哲手稿》中的马克思承认“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失

① 但是,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在对于共产主义的态度上,可以看到《经哲手稿》还处于动摇之中。马克思将共产主义本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三形态的共产主义是“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在此意义上,当时1843年持有的“民主制国家”、“人类的解放”的实质内容,可以认为在共产主义的第三阶段这种形式中被扬弃。不过,在相同手稿的第7页后面,谈到并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为中介的“作为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谈到“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因此并不能把第三形态的共产主义直接看做是马克思的定论。

② 因此,马克思对赫斯更加“*vermenschlichen*”(人性化)的尝试给予肯定,这从马克思给赫斯的信(3. Juli 1844)即可知道。

去对象,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16](p. 163)}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功绩。但是,黑格尔把承担全部过程的实体=主体,通过“主谓颠倒”^{[16](p. 176)}而任之于绝对精神,因而最终陷入“把人和自我意识等同起来”^{[16](p. 171\176)}的抽象。因此他所说的异化和回归归根结底不过是“在纯粹思维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16](p. 176)}这里,对马克思来说,应矫正黑格尔的主谓颠倒而代之以新的主体概念。但这不是施特劳斯的“实体”,而是扬弃“实体”和“自我意识”的对立,^{[16](p. 158)}如实地统一了两者的费尔巴哈的“人”。这里取代绝对精神而能够担负辩证法的展开的东西,是对费尔巴哈加以再解释而得到的上述主体概念。马克思通过这一主体概念,确保了进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来作为人的存在”^{[16](p. 131)}这种宏大的辩证法的叙述的构图。

但是,在《经哲手稿》的雄大构想中,该主体概念成为一把双刃剑,孕育着陷入较赫斯更为抽象的、哲学的议论的危险。若要说成为后来应予克服或解决的课题,^①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1) 被称为“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6](p. 120)}“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16](p. 167)}的东西成为基本的立场。

(2) 是把共产主义放在“市民社会—国家”这种可谓是上下的系列,还是放在作为社会史的**通史**的阶段,这异质的两条途径在“异化—回归”的范围内,尚未完全区别开来,因而作为社会史的阶段=社会体制的把握还很薄弱。并且,提出与(1)的基本立场相应的“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不再需要通过**对神的否定和私有财产的扬弃**这样的“中介”,^{[16](p. 131)}如先前所看到的,提出“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

① 关于当时《经哲手稿》的异化论的难点,及其必须加以扬弃的理由,参照本书收录的《马克思主义与自我异化论》。

中介”^{[16](p. 131)}的“作为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16](p. 131)}在此意义上,私有财产的扬弃,以及共产主义具有的意义尚未完全设定。

(3) 作为个人的人和作为类的人的关系还很模糊,因此,作为自我活动的主体的人与经济学中的劳动的主体的连接产生了双重含义,私有财产(制)的历史形成这个最根本问题的“阐明”只是以“图式的提示”而结束。虽然马克思“承认劳动的异化、外化这个事实”,通过对这一事实的分析“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16](p. 101—102)}在此意义上,如马克思自身所确认的那样,又留下了“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个先决问题。^{[16](p. 102)}《经哲手稿》通过“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也就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16](p. 102)}这个“新问题的提出”直到最后也未作回答就中断、放弃了。^{[16](p. 102)}

《经哲手稿》——虽然具有如上所述的划时代的意义——就这样留下一系列的问题,这个手稿中的路线,对马克思而言,不久即成为必须自我批判的超越的对象。而其契机,是伴随着恩格斯的到访。

四 与恩格斯的重逢和通往新世界观之路

1844年8月,在马克思草写完《经哲手稿》的时候,恩格斯走访了巴黎。虽然马克思曾把拜访《莱茵报》的恩格斯以“鲍威尔派的使徒”为由而报以冷遇,^①但对他寄给《德法年鉴》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给予很高的评价,^②对已作为共产主义者展开争论的这位“健笔家”予以关注。当时,马克思不仅与鲍威尔派进行公开的争论,恰在那时赫斯与卢格决裂,紧随其后,马克思自己也与卢格产生了很深的对立。想来,在赫斯的影响下两

① 恩格斯本人寄给梅林的书信关于 *erstes sehr kühles Zusammentreffen* 可为证。

②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写道:“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讯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请参考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10页。

年前成了共产主义者的恩格斯，^①与同样在赫斯的影响下的马克思因“在很多方面观点几乎惊人的一致”而志趣相投也就不足为奇。

恩格斯离开后，马克思对恩格斯未写完的底稿进行了大量增补，写完了《神圣家族》。在这部“合著”中可以看出其思想大转折的兆头。下面我想着重考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前的马克思的“转变”。

[一] 众所周知，《神圣家族》作为《德法年鉴》刊登的《论犹太人问题》的继续，从正面对鲍威尔一派展开了批判。但对我们来说，应该关注的不是这个批判本身，而是通过这个批判提出的政治、社会思想及哲学思想。

从政治、社会思想来说，这部著作对鲍威尔派的批判——与当时对卢格的批判一样——还有几个方面显得落后。但是，这已经与其说是逻辑、思想水准的问题，毋宁说是关于“革命”的运动论、组织论的观点与预测的欠缺。在逻辑层面上，这部著作及在此之前8月发表的《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的政治、社会思想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

第一，非常明确地把握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马克思谈到，“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1](p. 145)}明确指出“把市民社会的原子彼此连接起来的不是国家”，^{[1](p. 154)}“他们之间的现实的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1](p. 154)}

第二，与上述把握相应，革命的中心问题不在于国家的层次而在于市民社会的层次。马克思批判“现代国家的存在是符合它的本质的，所以可以发现和说明那些构成现代国家本质的相对缺陷和绝对缺陷”，^{[1](p. 147)}对“布鲁诺先生把国家和人类……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混为一谈”^{[1](p. 111)}进行了反批判。光从“政治解放”“人类解放”的用词来看，是《论犹太人问题》以来的主张，当时马克思认为“基督教国家只不过是**非国家**”，^{[6](p. 431)}而“完备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和人的物质生活相反的一种类生

① 参照拙著《恩格斯论——第一部，其思想形成过程》，载《广松涉著作集》（第9卷），盛田书店版。——作者注

活”，^{[6](p.428)}因此，“人类解放”是被放在“完备的政治国家”的层次上来思考。但这里却表现出质的不同和飞跃，现在已经基本扬弃了直到《经哲手稿》尚未肃清的“从市民社会到国家”这一图式，并设想当时英法所谓的“社会革命”。

第三，明确了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如前面所指出的，在《德法年鉴》时期，“以无产阶级为心脏的人类解放”与当时英法中的“政治解放”还不是那么耦合。但是现在达到“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理解，^{[1](p.44)}由此主张从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出发的自我解放，只有通过扬弃“人的自我异化”本身，才能实现由“人的自我异化”到整个人类的回归。

〔二〕《神圣家族》中的马克思的哲学立场与《经哲手稿》的哲学立场基本上没什么不同。虽说如此，其中也包含一些通往自我批判的超越的值得注意的发言。

“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

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两人十分彻底地把黑格尔的体系应用于神学……只有费尔巴哈才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1](p.177)}

这里谈到的“费尔巴哈”，即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替换为“人”的立场，这无非是马克思所采取的立场。就此而言——当然，这里把绝对精神重新理解为以“人”为原型——基本上原封不动沿袭了《经哲手稿》的立场。在马克思看来，不仅鲍威尔，赫斯也是从费希特的自我意识的立场出发。由此，他没有原封不动地采用赫斯的主体概念，而是以自然和精神的如实统一的费尔巴哈的“人”为基础，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唯灵论和唯物主义过去在各方面的对立已经在斗争中消除，并为费尔巴哈永远克服”，^{[1](p.120)}而采取了“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统一”的“现实的人道主义”的立场。^{[17](p.179)}

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揭露了如下黑格尔及鲍威尔派的“思辩结构的

秘密”——思辩哲学家们公开把“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实’这个一般的观念”的“果实”本身当做独立自存的“实体”。并且他们把“从苹果的观念推移到梨的观念这种他本人的活动，说成‘一般果实’这个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将整个过程看做主体的自我展开过程。“这种办法，用思辩的话来说，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①[1](p. 75)

可是，当像上面这样说的时候，究竟什么是辩证法？至少明白过去形式的辩证法已难以维持。然而，无需凭借《经哲手稿》的指摘，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自我意识在这种异化中把自己假定为实物，或者把实物假定为自身。另一方面，这个过程同时还包含着另一个因素，即自我意识同时又扬弃自己的这种异化和实物性，并使它们返回到自身”。^{[1](p. 179)} 总之，整个过程依赖于作为其自我异化和自我回归的过程的主体=实体、实体=主体才得以成立。但是，现在的马克思真正表现出拒斥主语和谓语的颠倒及其谓语的实体=主体化的姿态，指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也是提升为自我意识的实体，或作为实体的自我意识；于是，自我意识就从人的属性变成了独立的主体”，^{[1](pp. 175—176)} 断言鲍威尔派担当置换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异化逻辑的主体=实体，即鲍威尔派所说的“自我意识”也不过是“果实”。如果那样，费尔巴哈所指的“人”又是什么？这不也是“果实”？如果这样的话，当时马克思自身构想的《经哲手稿》的辩证法，归根结底也必须拒斥为“思辩的构成”。实际上马克思不久后就意识到这一点。

当时《经哲手稿》中的马克思，批判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毕竟没有超越自我意识，当时还维持着过去鲍威尔派时期的实体=主体的自我展开这一构想，正因为如此，才将原本其自身与辩证法的展开难以相容的费尔巴哈的“人”作为自我活动的主体加以赫斯式的再解释，凭借这一被再解释的主体概念而确保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自我异化的逻辑。然而现在《经哲手稿》以来的主体概念本身，以及自我异化的逻辑本身，随着鲍威尔

① 马克思晚年所说的“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mysti fizierende Seite*)”(《Das Kapital》, 2. Aufl., Nachwort), 所指即在于此。另参照本书收录的“辩证法的唯物论的颠倒何以可能?”

派的思辨结构的秘密的暴露,已经变得有问题(*problematisch*)。作为这一自我批判的省察而踏出的第一步,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推定为1845年春,在布鲁塞尔——马克思由于与《前进报》有关的原因在上年末被逐出巴黎而移居于此——所写。这一著名的备忘录,不能不考虑到恩格斯的影响^①、赫斯的影响。若用一句话概括其性质,这由十一条组成的《提纲》,是宣告马克思从“费尔巴哈和赫斯之间的中立立场”,几乎完全过渡到赫斯立场的文书。

我们现在这里以“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为开头的这一备忘录(生前未发表),^{[18](p.3)}到底是否以正好当时发表的赫斯的论文《关于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节,指摘“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德国哲学的共同缺陷”的同趣的语句为机缘而写,已无需深入到对这一点的考证吧。这里只请铭记(参照第二、三、五、八、九条,特别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8](p.6)}这最后一条),原封不动地采用了把相对于理论的实践放在特别的含义上而对置的切什考夫斯基-赫斯的立场,确认在马克思那里对“人”的把握的转换就足够吧。

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8](p.5)}而且马克思说:“费尔巴哈虽说完全在本质上从思维找到人的‘类活动’”,像阐述真正的“类活动”、生命的活动“通过双关的对象的设定和扬弃……的同一性的恢复的创出”的赫斯那样,批判“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的活动”。^{[18](p.3)}

用不着再次想起,《经哲手稿》的马克思勉强读出“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的意思,^{[16](p.158)}与赫斯的自我活动的主体加以勉强的重叠。然而现在反过来,指摘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只是作为“类”,只是作为“共同性”来把握——这不是《神圣家族》中“果实”批判的简单延伸,我想这恐怕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赫斯的论文《行动的哲学》的立言——重新规定了人的概念。而且,这里已毫无过去那种

① 关于这一点,参照拙著《论恩格斯》。——作者注

作为在特别的含义上的自然存在的规定的影子,而是沿着将人的本质放在各个个人的社会的协调关系中的赫斯的路线即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来规定的。^{[18](p.5)}

与这一主体概念的转换相应,马克思当然迫切需要对过去的理论进行自我批判。即使依然留下奠基于“真正的人的共同体”的理念本身,即使能够维持将其置于历史哲学视域中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规定,只要以此为基础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回归的逻辑仍依赖于“费尔巴哈”的“人”,就根本无法原封不动地保持旧态,而必须切近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作为协调存在的人,从于迫切需要基于社会经济的具体研究而重新进行规定。市民社会的各种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其矛盾在哪里,还有它是如何隐藏其自我扬弃的必然性,通过其自我扬弃而带来的新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什么状况,必须对此进行社会经济的“科学”阐明。

然而,确实从这样的视角——话虽如此,这又或应称为社会经济哲学——来研究这些问题的无非是赫斯。马克思通过与费尔巴哈拉开批判的距离,现在真正对赫斯的先驱性业绩进行评价,进入到能够追随他的地平。^②当然,在《提纲》本身的内部只是重新设定了课题,还没有提出沿着赫斯的社会、经济的分析本身。但是,伴随着主体概念的转换,已不谈过去标榜的“使唯心论和唯物论相统一的真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的立场,现在采取了唯物论的立场(第十条)。与这种新的哲学的立场及主体概念的转换相应,马克思的思想向度开始急转直上。

回过头看,在黑格尔左派开始三极分化的时候,从作为鲍威尔派的稳健的一员出发的马克思,毋宁说是以偏右的批判为契机而转移到卢格的阵营,通过与黑格尔法哲学的决裂而从“从市民社会到国家”的主题脱却出来,巩固了通向作为真正的人类共同体的共产主义的志向。接着,对这个作为共同社会的否定之否定的实现,采取通过自我异化和回归的逻辑

① 我想提请注意的是,这里到达的水准依然维持着上述“德国式的构想”。

②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赫斯把法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德国哲学的发展综合在一起”(MEGA, 1. Abt., 5. Bd., S. 47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80页)。

作辩证法的展开的姿态,确保进行历史哲学的透视,而得以踏上所谓三个源泉的综合统一之途。通过这一过程,他可以说是超越了鲍威尔派和卢格派,而不久一旦觉察到费尔巴哈的主体概念——以及倚赖这一主体概念的自我异化的逻辑——所具有的难点,就干净彻底地采取了赫斯的立场。

这样,历经了黑格尔左派的三极的马克思,眼下在短暂的时间内,沿着赫斯的路线努力阐明“世俗的秘密”。顺便说一下,赫斯在当时,以协动、生产力、交往、基础等概念确立了一种唯物史观,通过这一史观,不仅奠定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且以其独特的组织论、运动论展开共产主义的实践运动,其中有很多东西值得马克思学习。

1845年春,在“流亡地”布鲁塞尔相会的赫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翌年1846年,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共同作业的过程,对于当时27岁的马克思来说,成为了真正综合、扬弃黑格尔左派的三极,从赫斯的思想立场和水准脱却出来的“自我了解”的过程。

通过追溯这一过程,回顾当中的情况,才能填平所谓早期马克思论的裂缝,使将马克思主义像作为有机的整体进行重构的工作最终成为可能。即,我们为了完成当初确立的课题,现在要进一步考察重要的“中介的综合的过程”,但限于篇幅的关系,我想这次就此暂且搁笔,今后通过他稿的形式继续这一作业。

补遗 W. 舒尔茨的社会历史观

W. 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1843)在《经哲手稿》反复出现的大段引用,历来不怎么被注意。其中涉及的,仅限于马克思所引用的该书第60—74页各处,这大概是因为其内容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状态”的现象的记叙为主。

在科尔纽看来,舒尔茨在这本书的开头,提出了极为接近唯物史观的思想。但遗憾的是,因为手头上没有这本书,我想姑且介绍他的记述。

舒尔茨明晰地洞察了资本主义的缺陷,并将这一缺陷从生产的历史

发展中导出来加以考察。他作了一般的、历史的概观，在这当中，揭示了历史的各个时期，既依存于需求的发展，也依存于需求增长的体系。这些[需求]产生经济的、社会的各种关系的不断变化。在远古时期，需求是简单的，主要以手工劳动为基础，并且当时的生产很少依存于土地的性质。既没有阶级的区别，也没有公共权力。

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是由农业而决定。进入这个阶段，人已不再局限于只是使用直接的天然的东西，而是努力利用各种各样的自然力量。

随着时间的流逝，增长的需求唤起了分工，在这里，工业逐渐从农业分离出来，结果出现了与此相应的居民的分层化。

随着分工的发展，不久就进入制造业的时代，即高度分化的手工业活动的时代，居民逐渐分属于某种特定的行会，形成特定的身份。生产的发展，使资本的逐渐积累成为可能，相对立的阶级的形成，达到了以物质生产为主，和知识生产为主的分离。与工业相并列的农业、商业、交通得到发展。这种多彩多样的发展赋予各个国民以各自特有的性格。

由各种各样的方式形成的织布活动，受益于通过分工而分解的极为简单的操作，使得能够使用机器（这是逐步实现的），能够构建与此相应的工厂系统。在这里，劳动的成果，即取得的产品，工人只要付出较之以前更少的体力劳动就能实现。

在工厂系统中——这是以历史发展的最新阶段为特征的东西——资本的急速积累，与工业和商业一样，在农业经营中，使得生产力的更为综合的利用成为可能，生产的基础性各部门实现了更为紧密的结合……

资本的积累，其反面，更凸显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贫穷和过剩的对比。舒尔茨强调，这是作为市民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他记述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工人的悲惨状态，这种体制使工人不得不在“过度紧张，有害身体，摧残道德和精神的劳动”中，进行辛苦而贫乏的工作，工人们在广泛的竞争下，毕竟在那种工作中安顿下来，而形成一种只要不被饿死就是万分庆幸的状态。舒尔茨明确主张，在作为总体的生产力得到提高，需求增大的情况下，虽然使得绝对贫困降低，但工人的相对贫困却反倒加重。贫困和富裕之间最终愈发形成对照，不断产生无产阶级和

有产阶级之间的尖锐化的对立,这种对立必须以社会革命为归结。

舒尔茨认为,要矫正现存的经济的、社会的弊端,需要通过适当的措施,尤其是劳动的组织化和财产关系的改造,为向更理想的社会的过渡做准备,这是国家的课题。与社会主义者一样,他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使社会问题得到和平的解决。但是,如果统治阶级妨碍和平的解决,在这种时候,就必须接受革命。

在论说过程中,舒尔茨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家、青年黑格尔派、“庸俗的”社会主义者及共产主义者对社会问题的态度。

他批判国民经济学家们,他们专擅于事物世界的研究,而不是“从人的本性本身去探求生产的本质”,他们没有把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青年黑格尔派,一直埋首于抽象的领域,没能从“空虚的普遍性的大气圈”走出来,通向“发现现实生活之路”。舒尔茨认为这一点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弱点。

作为“庸俗的”社会主义者及共产主义者的弱点,舒尔茨指出,他们没有考虑到精神的创造及其社会条件,只着眼于生产和消费的物质方面,他们忽视了各个个人具有的政治的、社会的意义。

舒尔茨通过经济的、社会的发展的分析,其志趣似在设法导出一种唯物史观。

他在原始时代这一形式的历史的叙述中,揭示了历史的发展受需求和生产的发展的制约。这时,他认为所谓国家,是在社会相当发达的阶段上才形成,逐渐进步的分工,决定了居民区分为各种阶层,另外,还决定社会及国家的各种形态,进而决定立法的变迁,并且,现代的大生产,最终将使得形成新的社会,舒尔茨作有如是浮雕。^{[19](p. 122)}

我们现在没办法验证科尔纽的叙述。但由于“过去几乎没有考虑到舒尔茨的著作”,^{[19](p. 119)}因此不只对马克思的影响这一点,就当时读完这部著作的马克思还不能完全地接受而言,从这一事实所间接提供的了解当时马克思的思想状况的线索这一点上也值得考核。

另外,《经哲手稿》中的引用,众所周知,几乎都是《巴黎笔记》的转记,

《巴黎笔记》没有关于舒尔茨的笔记。因此对《生产的运动》的引用不是直接从手头对照该书进行。该书在赫斯的论文《论货币的本质》(Über das Geldwesen)中被论及,根据情况来看,是马克思读后向赫斯推荐,后来有可能被赫斯离开巴黎时借走了。

[追记]

我想在此对论述赫斯与马克思的关系的值得关注的我国文献作一点介绍。虽然作为笔者来说仍保留若干疑问点和批判点,但都是很不错的力作。

一、良知力《德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未来社,1966年版)第一部,第一章(原型在《经济志林》1959年、1960年发表)。

二、畑孝一“莫泽斯·赫斯关于人的自我异化的理解”(《一桥论丛》1961年第7期)。

三、山中隆次“赫斯与马克思”(《经济理论》1961年第62—63期),“赫斯与马克思”(收录于《资本论的形成》,岩波书店,1967年版)。

此外,山中隆次和畑孝一先生,由于最近为未来社翻译赫斯的论文集,另一方面好像也在撰写关于赫斯的文章^①——上述两篇论文,也是由担当本身企划的至诚堂今泉先生的尽力推介才得以拜读——不过,我现在还没有读到。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 B. Bauer, *Der Aufstand und Fall des deutschen Radicalismus vom Jahre 1842* [M], 2. Aufl., Berlin, 1850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 黑格尔,序言[A],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

^① 山中隆次、畑孝一翻译的赫斯的《早期社会主义论集》(未来社)出版于1970年。其中,由畑孝一撰写了《赫斯与马克思》一文,山中隆次写了译后记。赫斯的这本《早期社会主义论集》,已收录于中文版《赫斯文集》中,即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印书馆,1961

[5] J. Hausen, *Gustav von Mevissen. Ein rheinisches Lebensbild*, 2. Bd.[M], Berlin, 1906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7] K. Rosenkranz: *Hegels Leben*[M], Berlin, 1844

[8]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9] Hegel: *Grundlinien d. Ph. d. Rechts*[M]

[10] A. Ruge, *Aus früherer Zeit*, 4. Bd [M], Berlin, 1867

[11] Coru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1. Bd. [M]

[12] MEGA, 1. Abt., 1. Bd., 1. Halbband, Berlin: Dietz Verlag, 1975

[13]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1. Bd. [M], herausgegeben v. G. Lasson

[14] Cieszkowski, *Prolegomena zur Historisophie*[M], 1838; Hess: *Die europäische Triarchie*[M], 1841

[15] M. Hess, *Philosophische u. sozialistische Schriften* [M], herausgegeben v. A. Cornu u. W. Mönke, 1980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7] MEGA, 1. Abt., 3. Bd, Halbband, Berlin: Dietz Verlag, 1975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9] Auguste Coru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2. Bd. [M]

(邓习议 译,单位:湖州学院;中野英夫 校,
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赫斯是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坐标轴吗？^① ——评广松涉的早期马克思像

[日]良知力

一 广松的问题提起

赫斯最初认识马克思，是1841年夏，在科伦。赫斯认识马克思后，马上在给友人的信中，赞叹这位年轻“偶像”的才能。“无论从他的倾向来看，还是从他的哲学修养来看，不仅超越了施特劳斯，而且超越了费尔巴哈。……如果我在波恩，而他讲逻辑学的话，我将会是他的勤勉的听讲者吧。我常想将这样的人作为哲学老师。现在我开始感到自己在哲学上好像并没有什么才能。”^{[1](p. 80)}

但是，即使赫斯给予马克思这样的评价，赫斯作为“共产主义之父”（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失败的先行者”（卢卡奇）仍是不变的事实。

为了在以下小论中尽可能鲜明地阐述赫斯—马克思的关系，有必要

① 译自良知力：《早期马克思试论》，东京未来社1971年版，第56—82页。最初发表于《思想》1969年第5期。良知力的这篇文章，是对广松涉1968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一书收录的《早期马克思像的批判的重构》（最初发表于《思想》1967年第10期）一文的一个批评，作者认为“赫斯不是对早期马克思作纵向的重构之际的坐标轴”。1969年9月，广松涉在其《马克思主义的地平》一书“追记”中，对作者提出的批评作了回应。——中译者

预先粗描一下赫斯的发展。赫斯于1812年1月21日作为犹太人精糖商人的长子出生于波恩。主要通过自学进行学习,1837年,即在德国社会运动史上自由主义阶段中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先驱性文献《人类的圣史》。该书的思想基础是斯宾诺莎。进而在1841年,发表《欧洲三头政治》,在切什考夫斯基“行动哲学”的影响下,以大致与前者相同的构想将其与同时代的革命纲领联系起来。1841年夏,与马克思相识,与此同时,通过马克思的介绍,赫斯与柏林的青年黑格尔学派取得联系,在波恩听鲍威尔的讲义。至1843年末,赫斯身上的鲍威尔的无神论色彩越来越强。1841年秋参加《莱茵报》的创立,至1843年3月该报禁止发行为止发表近百篇论文,1842年年末,作为该报通讯员派往巴黎,与其他革命社团相接触。从1842年至1843年执笔的三篇论文发表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1843年7月刊)。恩格斯把这一阶段的赫斯评价为“党的最早的共产主义者”。1843年5月从巴黎返回科伦,与卢格相会,参加《德法年鉴》(1844年2月刊)的企划。同年8月再往巴黎。赫斯是“巴黎的共产主义者领袖之一,是他们当中最有才能的人”(驻巴黎普鲁士大使报告)。在这一阶段中,费希特—鲍威尔式的构想急速地从赫斯身上褪去,费尔巴哈的影响则越来越强。1844年初写完《论货币的本质》(一年半之后发表于《莱茵年鉴》),大概是将原稿交给马克思之后,返回科伦。从那时到翌年1845年,给《新秩文集》、《德国公民手册》、《前进》、《社会明镜》、《莱茵年鉴》等刊物投稿。进而在1845年上半年发表《最后的哲学家》,批判费尔巴哈、施蒂纳、鲍威尔的“唯心论的妄想”,从而没有读马克思而站在与马克思“相同想法”的地平(恩格斯)。从一八四五年秋天到翌年三月在布鲁塞尔与马克思相邻而居,从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共同写作。1846年上半年马克思与魏特林决裂的时候,赫斯脱离马克思,1847年秋再次在布鲁塞尔与马克思交往,翌年年初最终与之断交。

以往,关于对早期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的人物,多数情况下,都是根据马克思自身的批判和恩格斯的证言而进行。正如对鲍威尔的评价是从马克思的单方面的意见一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赫斯的情况也不例外。以往关于赫斯的研究,基本上或者否定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或

者即使肯定也是极为限定性的。不过,广松在其值得瞩目的劳作《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至诚堂,1968年)中提示了关于这一点的大胆而独特的论点。如果按照其第一篇论文《早期马克思像的批判的重构》(最初发表于《思想》1967年第10期)来归纳广松的论旨,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对黑格尔左派内部的三大潮流进行综合、扬弃而形成。所谓三大潮流就是宗教批判的系列(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黑格尔历史哲学批判的系谱(切什考夫斯基、赫斯)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系谱(卢格、马克思)。马克思—赫斯关系不是作为横向的影响关系,而是作为黑格尔左派的自我展开过程的一个契机,并且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的追认必须理解为纵向的。

二、《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在黑格尔左派中是最稳健的,可以说是偏右,对赫斯也敬而远之。

三、在《德法年鉴》中开始能够看到赫斯的影响。在那里,马克思通过学习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主词和谓词进行颠倒,志向于类作为实存存在的共同社会。

四、《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马克思学习赫斯的先例对费尔巴哈的类的存在进行“改释”,将既是自然存在也是社会劳动主体的人理解为主体概念。《经济学哲学手稿》虽然处在赫斯的影响下,但只要还残留着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的含义,那么就还是处在费尔巴哈和赫斯的中间的立场。

五、《神圣家族》中的哲学立场也基本上与《经济学哲学手稿》相同。但是马克思已觉察到费尔巴哈式的人不无外是所谓“果实”。

六、到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基本完全过渡到了赫斯的立场。这里已看不到作为自然存在规定的影子,跟随赫斯把人的存在规定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伴随这一主体概念的转换,现在已由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的立场转变为唯物论的立场。

七、《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共同写作的过程是对黑格尔左派的三极进行综合、扬弃,也是从赫斯的思想的立场和水准摆脱出来的“自我了解”的过程。

如上述这样,广松把马克思从《莱茵报》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发展,尤其是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式的现实的人道主义的克服过程,单纯地以主体概念的转换为基轴而加以把握。而且他将这种转换的动力求诸于赫斯的压倒性的影响。广松以主体概念为轴心对早期马克思的发展重新作出宏观的把握,确认了以往解释不明的早期马克思的发展的继承与断裂的关系,这是极为独到的把握。不过关于赫斯—马克思关系的理解,他也多少有点勇气不足。首先尤其是,如果要对马克思与赫斯的关系不仅是作为横向的影响关系,而是还要在黑格尔左派的思想的展开中作纵向的把握,与作为其基础作业而对马克思作纵向把握的同时,也必须对赫斯作纵向的把握。通常在广松那里——不只是广松,专业的赫斯研究者也多数如此——将“赫斯的立场”这种东西加以固定的、静态的把握,使之对质于马克思的发展的各个阶段。在那里,缺失研究赫斯本身发展史的视座。当然,广松的劳作既不是以赫斯研究为根本目的,也不是以赫斯—马克思关系的解明为主要主题。进而,早期马克思像的批判的重构,大概也是为了构筑他的认识论的一条线索。然而构筑物越是宏伟,立足点即使稍微有点错位也不好办。因而在本文中,我想在重新把握赫斯的思想的发展史的基础上,使之与关于赫斯—马克思关系的广松的论证相对质。间接上这一作业反过来应该有助于马克思的主体概念的理解。因此,本文既包含对广松的论点的批判,也具有对广松缺失的视座加以补充的意义。

二 赫斯与《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关系

在讨论赫斯早期著作的内容之前,我想首先从赫斯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影响关系开始。当中成为问题的对象是,《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1843年7月刊)刊登的赫斯的三篇论文和为《德法年鉴》而写但是直到1845年才发表于《莱茵年鉴》的《论货币的本质》(以下简称《论货币》)。众所周知,虽然马克思在《手稿》序言中列举了《二十一印张》上刊登的赫斯的诸论文是“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之一,^{[2](P.46)}但是在《手稿》执笔时恐怕他并没有涉及已在手头的论稿《论货

币》。而如果根据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评语,虽然赫斯那里的问题是“非常模糊的和神秘主义的”,但是在当初,即《二十一印张》中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承认”。而由于当中叙述的情况已经落后于时代,还在《德国公民手册》、《新秩文集》、《莱茵年鉴》等不断重复,问题就变为“枯燥的和反动的”。^{[3](p.479)}《论货币》虽然也确实是《莱茵年鉴》上的论文,但是,对1844年的马克思来说这篇论文还不是“已经陈旧了的”,这一点是确切的。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为《二十一印张》的诸论文和为《德法年鉴》而写的诸论稿(包括《论货币》),虽然执笔时间前后只有半年,但是其方法有着原理上的不同。如下一节将指出的那样,在赫斯早期的诸著作中,既有费希特的历史的主体的展开,同时还掺杂着斯宾诺莎的比较静态的实体论。这两个支流在《二十一印张》和《论货币》中开始产生分歧。具体而言,《二十一印张》的诸论文,特别是《行动的哲学》是赫斯将费希特—鲍威尔的路线加以纯化后的无政府主义,《论货币》是立足于斯宾诺莎—费尔巴哈的潮流而克服费希特的主观化的出发点。

实际上,从《二十一印张》的主要论文《行动的哲学》的用语来看,在那里并不使用例如“类”这样的术语(在《论货币》中类概念占有中心的位置),模仿鲍威尔主观主义地展开“行动的自我”论(虽然这里同样掺杂着斯宾诺莎)。那么,这样的《二十一印张》的论文是如何具有与马克思的《手稿》的接点的呢?为了弄清这一点,首先应把方法的原理作为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赫斯那里涌动的费希特式的潮流在《手稿》中为何已经不再占据地位?可是,1843年的赫斯自不待言,即使1844年的马克思也依然处于鲍威尔的影子之下。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明了为什么《手稿》之后马克思对付“神圣家族”的理由。因为马克思的斗争往往是与在自己的头脑中落下深深的影子的人的斗争。不过这一点先姑且不谈,如果就《二十一印张》而把赫斯—马克思关系作为个别问题的话,解明的线索是共产主义的概念规定。赫斯批判的是施泰因的共产主义观。即,施泰因仅仅是对平等作物质的、外在的思考,只知道共产主义的未成熟的形态。“共同体的状态,是认识自由的活动中真实的唯一的享受,是认识所谓的至善的哲学的伦理学的实践的现实化。反过来说,分裂的所有的状态,是利己

主义和非伦理性的实践的现实化,一方面,否定了自由的活动及将其贬低为奴隶的劳动,另一方面,设定了取代人的至善性,把动物的享受作为与同样动物的劳动相适应的目标。”^{[4](p. 204)}

对赫斯来说,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个体(活动的自由)和普遍(财产的平等)的统一。因而,他把与此对应的以往的历史理解为“作为抽象的普遍者的国家与作为各个个人的利己主义的市民社会之间的盲目而自然发生的斗争的历史”。^{[4](p. 207)}不过这种个体和普遍的分裂与扬弃的主体是自我,是思考的自我,也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自我”。作为其本身而达到顶点的哲学,现在为了超越自己而必须过渡到行动。然而,这个行动的主体是精神。所谓行动,无非是精神通过设定与扬弃其双关的对象而确立同一性。在此意义上“生命就是活动”,活动就是精神的“自我创造”。^{[4](p. 211)}“历史只不过是这个精神的发展,从而只能是这个矛盾的表现而不是别的东西”。^{[4](p. 216)}在这里,有着对个体和普遍的分裂加以“革命与批判”的不断扬弃的历史的辩证法。虽然它在原理上不过是认识活动,但只有这种认识使自然的规定性转化为自我规定,而产生“自由王国”。^{[4](p. 224)}只有精神的自我规定成为行动原理,即使“社会的活动”这种用语在那里还能够看到,也是“与唯心主义的目的没有任何差别的社会主义的目的”。^{[4](p. 219)}

这里,斯宾诺莎的自由论被放大为鲍威尔式的自我意识的辩证法,纯化为自我的行动原理。而在同时期执笔的《我们希望的东西》中,自我意识或自我行动的辩证法无政府主义地发展为对“现存的东西”的“否定”,与“旧的状态”断绝的意识。一方面存在具有自我意识的“少数人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存在未受教育的、不具有自我意识的大众,这既是赫斯对现状的认识,也是鲍威尔的一贯主张。^{[4](p. 240)}

确实,《手稿》与《二十一印张》中共产主义和所有其他基础概念都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①但是,这里与其讨论各个概念和用语,毋宁说只有各自的方法的原理才是问题所在。如前面阐述的那样,《论货币》贯穿着

① 关于这一点的指摘,山中隆次写有“赫斯与马克思”(收录于《资本论的形成》,岩波书店,1967年版)。

与《二十一印张》完全不同的方法的原理。不过,当广松指摘《手稿》还处于赫斯的影子下的时候,首先忽略了这一点。他根据(赫斯和马克思的)主体概念的差异,将《手稿》判定为处在“费尔巴哈和赫斯的中间立场”。在他看来,虽然赫斯和马克思在把人理解为“作为社会的存在”、“作为劳动的主体”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马克思把自然理解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还“遗留着费尔巴哈的含义”,而“赫斯没有这一特点”,“马克思遗留着将类的存在实体化的倾向,赫斯在这方面比较轻微”。马克思认为作为自然的、类存在的“人”本身具有最高的价值,对赫斯而言“自由”才是如此。^[5]这里确实是在与马克思的对比中正确把握了赫斯的基本特征。不过,所谓正确,只是指关于《二十一印张》的赫斯。若要就《论货币》来说,那就不能够说是正确。因为在那里,赫斯处于费尔巴哈的视座的延长线。虽然人道主义—自然主义没有深入到像马克思那样的存在论的原点,并且自然概念也升华到社会生活中,但是这种观点也并不意味着是《论货币》的赫斯所欠缺的。例如,“自然力不再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同人相对立,人认识了自然力并运用它来达到人的目的”,^{[4](p. 333)}或“整个自然界都属于人的自然的或肉体的生命”这样的定式也并不是没有。^{[4](p. 341)}而且,在《论货币》中,与马克思同样,显然以类的存在或作为类的存在的人作为展开的轴心。这里,赫斯确认了所谓自由的活动实际上是建立在“类的行为,各式各样的个性的共同活动”的基础上,但另一方面,赫斯也发现,通过利己主义,“个体被提升为目的,类被贬低为手段”的“人的生活和自然生活的根本颠倒”这种普遍化的状况,^{[4](p. 333)}在理论上存在于基督教中,在实践上存在于小商人世界。“货币是相互异化的人的产物、外化的人”。^{[4](p. 335)}也就是说,如广松在别的地方指出的那样,赫斯这里是从费尔巴哈的立场把货币看做为实践中的上帝。如果那样的话,前面引用的广松对赫斯的理解与这里的指摘就形成分裂。不过广松的乍一看是分裂的两种理解各自作为其本身并没有错。因为,在从《二十一印张》到《德法年鉴》(包括《论货币》)的赫斯的步调中,横亘着从费希特—鲍威尔到费尔巴哈的原理的构想的明显而急剧的转换。广松只是忽视了那种转换。

如果存在从 1843 年至 1844 年初的赫斯的那种转换,那么马克思在

《手稿》中想以之为我所用的东西,是《二十一印张》,还是《论货币》呢?换句话说,是以自我意识的异化和扬弃为动力的变革的哲学,还是以现实的人道主义为基础将异化论展开到经济社会的尝试?《手稿》虽然列举了《二十一印张》的名字,但从构想、用语和定式来看,与《手稿》明显一致的,毋宁是《论货币》。不仅如此,如广松也指出的那样,从构想和用语上来看,领先于《手稿》,甚至存在一以贯之的接近《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部分,例如,“交往”或“生产力”的概念即是。(在那里,生产力和交往是在一种与唯物史观越来越接近的对应关系,即一方发展另一方也随之发展这一关系中来把握,当然在那里它们并不是作为根本的物质的东西来把握。“人与人的交往绝不是从人的本质中派生的,这种交往就是人的现实的本质,而且它既是人的理论本质,人的现实的生命意识,又是人的实践本质,人的现实的生命活动”。^[4](p. 331))如果《手稿》显示与《论货币》一致,那么赫斯对《手稿》的影响的理解^①在将费尔巴哈的宗教的异化论适用于社会经济的诸问题这一点上就接近科尔纽的解释。我想至少广松关于马克思-赫斯关系的理解,是属于这种解释。《手稿》中的马克思确实把人看做社会的存在,劳动的主体,同时也看做自然存在,因而以作为类的存在的人作为主体概念。这种意义上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成为当中的基轴。但是,马克思同时肩负将这种自然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世界史”即“历史的运动”,因而也成为作为实践的“批判”而展开的同时的课题。为了作为世界史而展开,不能停留于费尔巴哈的人的直接的、无中介的立场,而必须吸收黑格尔“现象学”隐藏的“批判的诸要素”。而且在这种含义上必须站

① 关于《论货币》对《手稿》的影响,我也与广松同样认为存在一定的影响。但是,从以往关于方法的阐述,以及各个的构想或概念作为特别的经济学研究的全面的水准的《手稿》远远处于更高的起点,以及从书信推测毋宁是赫斯从马克思那里学习经济学的方法来看,广松关于这一点的断定是草率的,需要进一步论证。虽然这里并没有逐一列举其他关于赫斯研究的见解的意思,例如 W. Mönke 等人的关于赫斯=马克思的影响关系的见解与广松正好相反。W. Mönke, *Neue Quellen zur Hess-Forschung*, Berl. 1964. S. 19 f. 关于这个问题的日语文献,有山中隆次《赫斯与马克思》(《经济理论》第 62—63 期),在那里山中提出经济的异化是小商品生产的异化而不是资本制生产的异化的理由,否定对《手稿》的影响。还有,从与山中基本同一的视角探讨基本同一主题的文章,有畑孝—《莫泽斯·赫斯关于人的自我异化的理解》(《一桥论丛》第 46 卷第 1 期)。——作者注

在“近代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不过,虽说如此,马克思即使过渡到要把费尔巴哈的人改造为《论货币》的社会的人的立场,在方法的原理上也并没有走出费尔巴哈的立场。如广松也指出的那样,解明私有财产的历史形成这一课题,阐明“人是如何外化及异化自己的劳动”这一问题,正是《手稿》主要的、然而《手稿》最终没能解决的课题。不仅要把人一自然纳入社会的视野中来把握,还有必要将其作为历史的“过程”的自我创造,作为“生成的东西”,而且是在“对象的人的自身的劳动的结果”这种形式中来把握。

如广松也经常引用的那样,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发现黑格尔中的三个要素。即斯宾诺莎的实体(脱离人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费希特的自我意识(脱离自然的形而上学的精神),以及作为其形而上学的统一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进而他举出使斯宾诺莎、费希特作为一贯的东西的是施特劳斯、鲍威尔,又举出使黑格尔作为完成的東西的是费尔巴哈的“人”。但是,如果重新把斯宾诺莎的实体理解为脱离人的“静态化”的自然,把费希特的自我意识理解为脱离自然的主观化的“自我运动”,即使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是一种神秘的统一,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道主义也难以是黑格尔的完成。实际上,如果不将人的劳动的异化和私有财产的形成放在历史的辩证法中进行批判地把握,可以说斯宾诺莎和费希特在《手稿》中就没有相互的接点。在此意义上,不仅费尔巴哈,甚至鲍威尔,也至少是作为反面教师的影子落在当时的马克思身上。

《二十一印张》的费希特—鲍威尔的立场和《论货币》的费尔巴哈的立场的赫斯的两极分解,作为上述那样的课题意识,进而也作为研究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关系的尝试(也是未完成的),也存在于马克思那里。因此我不能原封不动地接受广松的《手稿》处于“费尔巴哈和赫斯的中间的立场”这一规定。毋宁说如《手稿》“序言”所表明的,动摇于费尔巴哈的所谓“发现”和黑格尔隐藏的“批判”之间,并且马克思的那种未确定的立场是与赫斯自身的动摇相对应的。

接下来,在将问题推进到 1845 年阶段的马克思—赫斯关系之前,有必要联系赫斯早期思想来进一步阐明这种两极分解的方法原则。

三 赫斯方法的两极分解

1843年的赫斯表现出的方法上的两极分解,在此前的赫斯那里有着怎样的表现形式?在那里,具有把历史看做规律性的、必然的发展,因而作为决定论来把握的尝试,同时也有将之推向未来的实践的志向。不过,当中也存在缺乏中介的断裂。如果要将哲学从历史过程本身来解明,即如果不是对历史作超历史的原理的阐明,而是使范畴从历史本身来展开,哲学就不得不立足现在的地点,与现实和解。显然在这一点上有着黑格尔的现实的禁欲。然而,赫斯学习切什考夫斯基,突破黑格尔的与现实的和解而求诸行动原理。单纯从方法的意义上来看,这甚至可以说是革命的辩证法。但是,未来一旦被编入实践的计划,这就不得不超越历史,与辩证法的基础相断裂。这最多也不过是作为一个自然法的公设而与现在对质。

这一点已表现在赫斯的处女作《人类的圣史》(1837)和与此相继的《欧洲三头政治》(1841年)中。当他“把世界史放在其总体性和规律性中来把握”时,^{[6](p.210)}历史的事像就表现为“不是作为偶然的東西,而是作为预定的东西”,分裂和对立是为了面向未来的必然的发展原理。“他毋宁是将自然和历史的全部现象的必然性,看做生命为了到达其完全性而不得不经过的阶段。”^{[7](p.114)}只要赫斯把历史理解为意识的发展史、神的认识的发展史,那不用说,这是通过唯心史观来把握的,但是,只要这与经济的发展(人的意识的发展阶段的现象形态)相适用,那么,敌对、分裂、贫困、无政府状态正是发展的必然的因素这种命题也是妥当的。可以说,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伴随最初的原罪。

赫斯发现第二个原罪是所有权、世袭权的发生,人类的纽带的解体和分离,利己主义、种姓精神,人类的“盲目地降低为机器”,^{[7](p.29)}财富的集中和贫困的增大,工商业的垄断,中间阶层的必然的没落。^{[6](p.305)}但是,这种过程产生的混乱和穷困“在摄理的手中,不过是调和真理的王国的促进剂。这是因为,这使财富和贫困的对立在提高到顶点,到达顶点之后,必

然不得不进行调整。”^{[6](p. 304)}“分裂,为了达到其终局,为了洞察社会生活的必要的各种条件,不得不既向内也向外地尖锐化。”^{[7](p. 107)}

这里存在的是历史通过“规律”而展开的决定论。为了扬弃“金钱贵族”和“大众的贫困”的对立状况而具有通向一切人的财产共同体的逻辑的必然性,首先必须达到混乱、分裂、对立、矛盾的顶点。调和的世界,为了成为通过人类的主体而被“认识”,通过“理性”而被实现的东西,自然的、外在的被规定的原初的调和,首先必须被解体被分裂。并且,与分裂是不可或缺的过程一样,扬弃分裂的革命也是必然的过渡阶段。在此意义上,对赫斯而言,社会革命的进程是作为拯救的启示录而表现出来的。赫斯的思想的出发点正是这种历史哲学,在接下来的阶段中,其与费希特—鲍威尔的自我变革的命题,尤其是《二十一印张》的诸论文的主观主义的自我异化和自我扬弃的逻辑相联系。

赫斯要戳破黑格尔式的“与现实的和解”而探索未来的认识可能性,不能像黑格尔那样使精神停留于自我达到的现在之上,毋宁应当要超越自己,放飞于实践化的未来。但是,此时在赫斯那里,可以说陷入了现在作为“问题”,未来作为其“解决”的二元论,^{[8](p. 21)}历史哲学的命题被相对化。“我们以前发生的事情,即使对于其自身是自由的,但是只要不是通过我们而产生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也具有必然性。只有是通过我们而进行的事情,尽管其自身产生着必然性,但是对我们来说也是自由的。”^{[7](p. 14)}历史刚一到达现在,必然性的锁链就被切断,那里提示的实践进程,已经不是从历史中、通过历史的中介范畴提取的东西。历史和范畴是二元的对立面,在非辩证法的乌托邦中不得不反复“和解”。他的社会主义论,也在历史哲学中否定和断绝的革命命题已经不再具有接点,而通向自然法的永恒的规范转化,通向基于启蒙和教育的改良的进程。这种爱的伦理成为其结论。

如果说,以切什考夫斯基的黑格尔批判线索为基准的历史哲学的构想不久与鲍威尔相关联的话,那么,以斯宾诺莎的平行论为基轴的静态观点不久就被纳入到费尔巴哈现实的人道主义之中。不用说,这两个视座,在赫斯那里不是清晰地表现出来的,毋宁说是混杂在一起的。下面就以

他对黑格尔的批判为例来考察这一观点。

赫斯的批判首先指向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这显然是立足于斯宾诺莎。赫斯指出,黑格尔的这一定义即“自我异化”的上帝理念是自然是错误的。自然与精神一样是上帝的属性。因为两者自在地都是上帝的东西,异化难道不是仅仅在人的生活和发展中产生的?仅仅对于分裂的人而言自然才是分裂的?“我们正确的想法应该是,中介过程是思维的精神,即只是人的东西,黑格尔通过将其体系中的逻辑学放在自然哲学的前面,中介的东西,不仅是主体,连既是起点也是终点的实体也委身于中介是奇怪的。并非只有作为自然和精神的统一的上帝才能超脱所谓的中介,这些永恒的上帝的属性本身也能摆脱中介。”^{[7](p.10)}进而当他说“事实上,精神和自然是同一的本质”时,他的叙述,毫无疑问,一如原样地是《伦理学》^[9]的命题。如果实体及其属性是超越一切中介的,那么,它既与异化也与和解无缘。赫斯关心的是尘世的异化,以及尘世异化中社会与历史中介的隔绝,这些可以说都是“被建构出来的”。

不过,当赫斯的目光朝向尘世时,开始导出他的黑格尔批判的第二个论点,即黑格尔的唯心论批判。一旦深入考虑这一点,赫斯对黑格尔的批判就会同马克思《手稿》中关于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未经综合的观点,重叠地表现出来。黑格尔确实通过精神的自我展开来扬弃理念和实在、精神和自然、上帝和世界的分裂。“但是,和解现在也都只是观念的东西……无论什么地方、怎样的领域和解都不是实在的。……不仅大众的贫困和金钱贵族制还是现存,还没有克服,虽然已经能够充分感觉到的,但是革命却没有到来。”^{[7](p.37)}实在上还残留着分裂,哲学不去变革现实,而只是认识理念,是不能现实化的。“黑格尔的理念是最具体的。然而,他依然停留于理念。无论从黑格尔体系的哪个部分来看,到处可以发现理念是作为既是起点也是终极的东西。……当然,不是在把主体从客体分离出来加以表现这种意义上。不,这是绝对的思维,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维’,并且仅仅是关于此的思维。”^{[7](p.6)}当然,这种唯心论批判并非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主谓颠倒直接相关。而只是超越留于思维内部的哲学,即超越“静观”,使“理性”现实化,使现实提高到理性的“自由的

行动”来设定未来、面向未来。对赫斯而言,由于所谓“行动”并非“绝对的精神行动”之外的东西,因此黑格尔的自我完结的哲学才是行动哲学的出发点。

在早期的赫斯的思想中,虽然混杂着二重化的形式,并非不存在费希特和斯宾诺莎的方法的分化。并且这种分化的倾向在《二十一印张》和《论货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记住这一点的基础上,我们再来讨论1844—45年的赫斯-马克思关系。

四 赫斯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以上述关于早期赫斯的阐述为前提,下面过渡到本篇论文的最后论点。即,广松指出:推定为1845年春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表现为,马克思已从“费尔巴哈和赫斯的中间立场”基本完全过渡到了“赫斯的立场”。我想将这一点作为赫斯-马克思关系的最后的论点加以探讨。

广松首先提示这个《提纲》是以赫斯的论文《关于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同趣的文章”为机缘而写的。赫斯的这篇论文是应一家杂志的约稿而于1844年5月左右执笔,发表于1845年上半年在达姆施塔特发行的《新秩文集》。当时逃往于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在《提纲》写作前是否参照过赫斯的这一著作,这是个疑问,关于这一点我与广松一样没办法考证。为便于与马克思的《提纲》进行比较,虽然多少有点长,现把赫斯的相应语句翻译一下:

费尔巴哈说,上帝的存在是人的超越的存在,关于上帝的存在的真正的教义是关于人的存在的教义,即神学是人学——这是真理,但是,这不是全部真理。必须补充如下一点。即,人的存在是社会的存在,是为了同一目的的,为了完全同一的利益的各个个人的共同活动,关于人的真正的教义是关于人的社会的状态的教义,即人学是社会主义。^{[4](p. 293)}

广松将赫斯的上述语句与马克思的提纲第六条“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相对应。^{[10](p.5)} 为了进一步补充发掘广松将《提纲》与赫斯类比的意旨,我想再稍微引用一下赫斯的文章。赫斯把完成了的德国哲学,即费尔巴哈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看做“理论的人道主义与实践的人道主义的关系”,看做理论与实践的对立。(马克思的提纲第二条“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0](p.3)})费尔巴哈等人之所以在这种意义上与社会主义对立,是因为他把人道主义“看做人的共同活动一般,没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为人的生命活动,而是理解为思维活动。”^{[4](p.295)} 虽然费尔巴哈确实也“暗中承认”实践的自由,其“理论”是以“经验”为基础。也与后面的涉及的内容相关,关于经验,赫斯这样谈到:“经验是唯物论的宗教,没精神的事实的礼拜,因而是对于自由之学的反动。”^{[4](p.294)} 赫斯的这种实践论,显然与例如马克思的提纲第五条“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做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有一定的对应关系。^{[10](pp.4-5)} 提纲第六条的最后的章句“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共同性”,^{[10](p.5)} 也只是语句不同,确实与赫斯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在赫斯看来,费尔巴哈正如黑格尔那里的普遍那样,不是将个别“作为现存的东西的前提”,不是放在与人的内在融后中来把握,而只是将个别放在区别中来把握。因此,赫斯批判费尔巴哈是“绝对的唯物论”。^{[11](p.98)} 并且在别的地方,赫斯还批判费尔巴哈把“社会的人,看做‘类的人’、‘人的存在’,并且认为这种存在,隐藏于认识它的个人当中”。^{[4](p.384)}

从以上情况来看,这些重新验证了广松指出的《提纲》处于赫斯的范围圈,是对此结论的确认。关于《二十一印张》和《论货币》与《手稿》的影响关系,虽然以往也屡有指出,但是纵向地把握在赫斯—马克思关系中赫斯对《提纲》的影响的阐述,大概广松是最早的,他在设定论点时的敏锐也让人颇受启发。但是,尽管如此,关于广松的论证,在若干问题上我仍必须保留意见。确实,赫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在构想和语句上与马克思

的《提纲》屡有重叠。不过,另一方面,广松忽视了赫斯与马克思之间存在的根本的不同点。广松说,《提纲》中的马克思“通过与费尔巴哈拉开批判的距离”,现在“进入到能够追随”赫斯的地平,通过主体概念的转换而超越了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的立场,“采取了唯物论的立场”。但是,赫斯自身,不论在这个阶段,还是在此之前,恐怕并非唯物论者。赫斯确实从早期开始(部分是从《莱茵报》的时期开始)受费尔巴哈的影响,特别是《德法年鉴》以来,赫斯的思想甚至转化为能够规定为“费尔巴哈的阶段”(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将费尔巴哈的我和你扩大到社会的视点在赫斯那里也往往有所保留),在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阶段,费尔巴哈的影响在赫斯的诸论稿中是逐渐牢固地固定下来。不过,虽然赫斯——如果除了至少 1846—1847 年左右明显接近唯物史观的时期——将费尔巴哈的人学汲于自身,以此为思想展开的轴心,但是他并不曾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主谓颠倒的批判收为己用。因此,赫斯也不是以“感性确定性”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虽然他在费尔巴哈的阶段接近感觉论,但至少不是唯物论者。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在赫斯那里,“活动”或“实践”的概念不是“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提纲第一条)去把握。^{[10](p. 3)}例如赫斯在某些地方说,“‘类的行为’必须理解为从思维到行动的扩大的‘自然意识’,进而理解为‘自我行为’。仅有人思考是不够的,同时还必须像人那样过日子。”^{[4](p. 304)}问题是确实从停留于思维的内在性的哲学即静观走出来,朝向外在的、物质的世界。并且,因为这是从静观走出来的“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不外是与属于自己的类的其他各个个人的共同活动”,^{[4](p. 275)}哲学通向社会主义,理论的自由通向实践的自由。不过,在这里赫斯只是排除纯粹思维,“思维是人的自我活动”仍是不变的。^{[4](p. 86)}正因为如此,作为静观的完成的黑格尔,在原理上不是被主谓颠倒,而是成为赫斯的行动哲学的基础,成为出发点。所以赫斯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提纲第九条),^{[10](p. 5)}认为“当思考的时候,我在本质上是能动的行动,反之当具有感性的印象或表象的时候,我在本质上是受动的行动”这样观照地思考。^{[4](p. 86)}

与这种实践概念和由此导出的主体概念相一致,这一时期的赫斯直

接接受费尔巴哈的知识。例如赫斯的如下文章——“费尔巴哈从外化自己的存在、自我展开的人，是一切冲突、矛盾及对立的创造者，事实上，没有什么中介的东西，确立的东西不是对立的同一性，不是从人的与自身的同一性这个正确的根本命题出发。对立、矛盾只存在于思辨的神秘家的空想中。”^{[4](p.292)} 如果赫斯像费尔巴哈一样拒绝中介范畴，那么不论赫斯如何批判费尔巴哈缺少社会性，他所谓的社会仍然是脱离历史过程的教条化的、乌托邦化的形而上学。“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提纲第六条）这一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同样也适合于赫斯所说的“社会”。^{[10](p.5)}

广松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按照“将人的本质放在各个个人的社会的协动关系中的赫斯的路线将之规定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对社会经济上的“赫斯的先驱性业绩进行真正的评价”，“在短暂的时间内，沿着赫斯的路线解明‘尘世的秘密’”。^[5] 至少从现存的书简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很早的时期就经常对赫斯的唯心论进行批判，另外在 1846 年夏赫斯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赫斯表示在经济学方面自己是马克思的弟子。从 1844—45 年马克思经济学的读书笔记目录来看，不能否认 1844 年之后的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远远超出赫斯。但是，这些事实在这里尚且不论，首要的是必须思考关于“赫斯的路线”。虽然多少是带有点公式化的说法，但单纯从赫斯方法的缺陷来看，赫斯根本无法通过揭示历史的中介范畴，具体地解开历史的生成，洞穿经济社会的直接性、僵硬性、神秘性。

如广松再三指出的那样，赫斯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而将异化论适用于社会经济上的各种问题。但是，这些分析，与赫斯在另一方面追求的自我意识的辩证法始终没有结合起来。他的历史哲学的命题，即使是唯心的东西，也是作为永远的否定现状而走向未来。但是一旦他面向现实的社会经济分析，他就无法找到与其唯心的历史步调相协调的基点，结果，现实的社会改革进程被理解为与现实历史相对的超历史的规范。这种现实的经济社会也只能在拜物教的直接态中被把捉。在此意义上，不可能“沿着赫斯的路线解明‘尘世的秘密’”。

我对广松以主体概念为轴心对早期马克思像重构的尝试非常感兴

趣,也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为了突破习惯于在“常识”中进行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他大胆地提出了一些问题,这种做法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

在马克思从博士论文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发展中,当然存在观点的持续和转换,继续和断裂,对此以主体概念为轴心进行重构可以说是不可欠缺的作业。然而尽管如此,赫斯不是对早期马克思作纵向重构的坐标轴。

参考文献:

- [1] Moses Hess, *Briefwechsel* [M], Hrsg, von E. Silberner, S-Gravenhage, 1959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3] *Deutsche Ideologie, Bd. 3* [M], Berlin:MEW, 1969
- [4] Hrsg. Von A. Cornu und W. Mönke, *Philosophische und soziale Schriften, 1837—1850* [C], Berlin, 1961
- [5] [日]广松涉,早期马克思像的批判的重构[J],思想,1967(10)
- [6] Moses Hess, *Die heilige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M], Von einem Jünger Spinoza's, Stuttgart, 1837
- [7] Moses Hess, *Die europäische Triarchie* [M], Lpz. ,1841
- [8] G. Lukács, *Moses Hess und die Probleme in der idealistischen Dialektik* [M], Lpz, 1926
- [9] *Ethica, II, Propos VII* [M]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11] Hermann Puttmann, *Beachtungswerthe Schriften für die neuesten Bestrebungen* [A], in *Dentsches Bürgerbuch für 1845* [M], Darmstadt, 1845

(邓习议 译,单位:湖州学院;

中野英夫 校,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郑文吉教授的“马克思学”
研究专辑

写在前面的话^①

张一兵

初次遭遇郑文吉教授的思想，是在陶伯特女士所作的一篇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文章中。在那里，陶伯特提到，有一位韩国学者郑文吉对她的编辑方案持有异议。从陶伯特的评论中，我直觉到这个我们尚不了解的郑文吉很可能是一位重要的马克思文献学专家，这就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此后不久，我又在无意中拿到了一篇郑文吉本人所作的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日文版论文，并在南京大学日语系彭曦博士的帮助下，第一次与郑文吉的研究成果有了直接的接触。这一接触的结果，着实让我大吃了一惊。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研究领域，过去我所知道的只是巴加图利亚和陶伯特，以及广松涉。其中，巴加图利亚既是文献学专家、也是思想家，而陶伯特只是一位文献学专家；至于广松涉，则主要是一位思想家，只不过曾在早期就《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一些问题作过一定的文献学研究。而比之前三位而言，郑文吉的情况显然还要更有意思一些：早期，他曾是一位哲学研究者，其成名之作就是关于马克思和弗罗姆的异化思想研究（《异化论研究——以马克思、弗罗姆以及社会学上的异化论为中心》，博士论文），可是后来他却又转变成一位文献学专家，并且，一转就是 20 年。在这漫长的 20 年里，“孤独”的郑文吉只做

① 本文系张一兵教授为《尼伯龙根宝藏：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遗产》（于 2009 年底出版）撰写的序言，略有删改——编者注

了一件事,即从事 MEGA 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研究。

此处,我们不妨先对郑文吉教授的基本情况作个了解,有此基础之后再来看看他在马克思文献学研究方面的具体贡献。郑文吉(CHUNG, Moon-Gil),1941年11月20日出生于韩国庆尚南道陕川郡;1960—1964年就读于大邱大学(现岭南大学)政治系,1964—1970年为首尔大学政治学研究生,获博士学位;1971年起,任教于高丽大学,1975年任副教授,1978年开始任教授至今;2007年,从高丽大学的教职上退休。此外,郑文吉在1979—1980年为哈佛大学燕京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84—1985年为德国伯弗姆大学客座研究员,其间,曾两赴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aoeschiedenis,以下简称 IISG)访学;1991—1992年为日本东北大学客座研究员。1998—2000年间,郑文吉任高丽大学政治科学与经济学院院长。郑文吉的代表性论著包括:《异化理论研究》(1979年);《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1987年);《马克思的早期论著及思想生成》(1994年);《韩国的马克思学视域》(2004年)等。

2007年2月,我在首尔的延世大学见到了郑文吉教授,双方一见如故。当时,郑教授刚从高丽大学退休,当知道我们这些中国学者对他的研究情况有了解之后,他表示十分惊讶。在交谈中,我感到面前这位韩国人确实是一位具备踏实学术功底的严肃学者,他言谈之中流露出的那种谦逊温文的风度也体现出我们东方文化所特有的品格。比之一些腹中空空抑或仅略知皮毛就张牙舞爪的人来说,郑文吉是我更喜欢的一类学者。也是在那次见面时,我了解到郑文吉早先曾研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后来则一直在专门从事关于 MEGA,特别是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深入交流之后,我大体能够肯定,郑文吉的研究成果对国内正在兴起的马克思文献学研究而言,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系。于是我当即决定,要将这位韩国人的研究成果译介到中国来,事实上,在那次见面的后半段,我们即已开始讨论如何向中国学界译介他的研究成果。当时我们就已形成了共同的结论,即首先出版一部能够反映郑文吉教授这些年来研究和思考 MEGA 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成果的论文集。

郑教授的认真严谨是十分令人感佩的:回国之后不久,我便收到了他

托人带来的七八部专著以及相关文集,并且,在每部书中,他皆仔细地对相关章节或篇目做了遴选,并用贴纸做了显著的标记;在文集里,也列出了详尽的目录。于是,我们在2007年年中开始了对郑文吉教授文集的翻译工作;2008年9月,郑教授又传来了他为这部书所作的中文版序言。2008年10月,郑文吉教授应邀访问南京大学,访学期间他先后为学生作了两场学术演讲,与我们学科的教师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从内容上考察,郑文吉最早发表的一批论文大多是与异化理论的研究相关的。1966年,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内容是关于“人的自我异化研究”的介绍。从其时开始到1978年间,他陆续发表的多篇论文都集中在对马克思早期异化思想、弗罗姆的异化观点的评述和研究领域。我估摸着,这批文章大略应是他做博士论文的先期成果。1978年,郑的博士论文《异化论研究——以马克思、弗罗姆以及社会学上的异化论为中心》(*A Study on the Theories of Alienation*)正式出版。从1980年开始,郑的研究兴趣逐步转向对青年黑格尔派的研究。在接下来的五年当中,郑文吉的主要关注点一直在青年黑格尔派的诸多思想家,特别是这些思想对早期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上。很有意思的是,他尤其重点关注了施蒂纳和他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1984年,郑文吉赴德访学,期间曾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历史研究(IISG)所停留了两个月。这次访问,对他的学术思考而言可以说是一次影响深远的重要转折。

郑文吉教授自己提到,他是在上一世纪60—70年代研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过程中,第一次接触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的,并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下意识到了马克思第一手原始手稿文献对马克思思想研究的重要性。就在上文提到的那次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所作的为期两个月的考察和停留期间,他亲眼看到了《1844年手稿》以及其他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手手稿文献,此后便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学的学术研究。1986年,郑文吉在《韩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了第一篇介绍“IISG”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保存情况的文章;1987年,又出版了《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The Age of Epigones: The Young Hegelians and Karl Marx* (Moonji Publishing

Co., Ltd., Seoul 1987), p. 331)一书,这应该是他此前几年中关于青年黑格尔派研究成果的一个集成。同年,他发表关于马克思《1844年手稿》文献编辑与研究争论的论文。接着,在1990年,郑文吉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有关《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编辑历史的论文,文中重点对陶伯特编辑出版的MEGA2 I/5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的先行本作了讨论。次年,郑文吉发表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同版本的历史性研究论文(*Text Variations of the Chapter I. Feuerbach, the First Volume of German Ideology by Marx and Engels: Critical Comments on Various Editions since Rjazanov*),在该文中,他比较和分析了自梁赞诺夫以后有关《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手稿出版的各种不同的编辑方案。1993年,郑文吉发表了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动机的研究论文(*Die Deutsche Ideology Was Written as a Collection of Article of a Quarterly Journal? Recent Debates on the Genesis of Die Deutsche Ideologie*),在其中,他重点讨论和反驳了戈劳维娜的“季刊说”。次年,郑文吉又发表了评述日本学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手稿的出版和研究的文章(*Japanese Debate on Die Deutsche Ideology in the 1960s and 1970s*),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日本的出版史以及广松涉版之后的学术争论情况进行了一次综合性的全景分析。此后不久,他出版了学术份量很重的《马克思的早期论著及思想生成》(*Marx's Early Writings and Making of His Thought: Studies on "The German Ideology" and the MEGA-Publication Project*)。之后,郑文吉发表的论文就集中在对MEGA计划的讨论,以及对韩国马克思研究的历史分析上了。2004年,他发表《韩国的马克思学视域》(*The Horizon of Marxology in Korea: The Editorial Problems of Marx' and Engels' Texts and Researches on Their Works*)一书。

读者手中这部由郑文吉教授亲自为我们选编的文集里,收录了他最近20多年来在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和MEGA的研究中写下的最重要的一批论文。我想,这些论文当是可以整体映现出郑文吉在MEGA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水平的。

总体而言,我们可以从这本文集中发现以下几个重要的特点:

首先,我们不难看到,当今国外马克思文献研究的基本操作平台已经是直接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文献的基础之上的了。郑文吉教授熟练掌握德文,甚至可以直接识别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中的文字,这就使他的文献学考证和版本比较研究得以建立在可靠的第一手文本的基础之上。其实,自上个世纪60—70年代以后,除掉本来就是德国人的陶伯特(Inge Taubert)和佩格(Hans Pelger)之外,诸如前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日本学者广松涉和法国学者格朗炯(Jacques Grandjonc)等一批国外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学的文献学研究者就一直是原文或原始手稿,以及大量的第一手原始文献作为研究对象的。郑文吉教授访学南大期间,为学生作了一场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手稿的演讲,当时他所使用的相关引文就全部是原始手稿的复制件,并且,在这批复制件手稿上,我们看到了郑文吉教授留下的大量标识和批注。前不久才到南京大学讲学的巴加图利亚教授也是如此。后者既是MEGA2的倡导者,也是MEGA版的重要组织者和直接编辑者。用俄罗斯学者波洛夫教授的话说,巴加图利亚早就“嫁给”这些手稿和文献了。我觉得,他们这种扎实的科学文献学研究方式,与我们国内某些学者习惯性地研究建立在二手资料之上的伪文献学考证思路相比,是完全不同的。我以为,这也是郑文吉这部文集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究竟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献学和版本研究?!

其次,与我们先前已经熟悉的一些文献学家不同,郑文吉的文献研究常常是处在比较性的和历史性的语境之中进行的,因此,他的研究成果往往具有更大的可信度和参考价值。我们知道,从梁赞诺夫开始,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学的文献学家都喜欢标榜自己的研究成果具有某种独断的真理性,梁赞诺夫和广松涉应是其中的典型,而陶伯特虽然没有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诩为圣言,但我们也不难从包括她在内的一批德国学者身上看到一种不自觉地散发出来的日耳曼式的优越感。关于这一点,郑文吉教授在我们的交谈中表示,他也有同感。其实,就在前苏东体系崩溃之前,她(他)们的研究也都只不过是苏联意识形态话语的应声虫罢了。郑文吉的思想与上述倾向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郑的研究思路是对所有历史文献进行尽可能客观

的评价,找出其中的共同点和差异所在,从而才能更好地推进文献学以及对于文本本身的思想研究。在郑文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有版本的历史性比较分析中,在他对日本学者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争论的综述中,在他针对韩国马克思学的历史发展所作的研究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个显著的特点。我以为,这也是由文献学研究这一学科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文献学的资料分析并不是要生产出绝对真理,而是要为人们进一步的文本分析提供尽可能准确的资料和历史性文献依据。但是,历史文献中又总是包含着无法避免的不确定性,如历史当事人的不在场、文献的不完整、文献生成时间的不确定等等,这就使得任何文献学研究的成果都必然只是具有相对的意义。所以,以文献学的历史性认知结果来建构意识形态的拘役构架是一种让人无法发笑的现代学术笑话。

其三,虽然郑文吉的马克思文献学研究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当今马克思学的较高水平,可是他倒从来没有想到要去哪里指手画脚,鼓吹和标榜自己的权威,而是始终踏踏实实地做他的学问,为 MEGA 的编辑和出版默默无闻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对自己的研究所面临的处境,郑文吉不无感慨,他说他在韩国是孤独的:在过去的军事独裁时代,研究马克思不合法;即便到了今天,韩国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研究也还处于学术的边缘。不过,这并不妨碍郑文吉成为韩国最好的高丽大学的杰出教授。曾经在高丽大学留学的尹海燕教授告诉我,在学校里,学生们都亲切地称郑文吉作“异化教授”。不久前,我与到访的高丽大学前校长、著名经济学家鱼允大教授有过一次会面,后者也向我证实,郑文吉教授在高丽大学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南京大学举行的学术演讲中,郑文吉教授告诉台下的中国大学生们,他的学术研究生涯是“孤独的 30 年”,但而今,在退休之后,他的研究成果却在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得到承认,他觉得过去艰难而孤独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我想,郑文吉教授倾 20 年心血而为之的文献学研究,同样是值得我们向他表示深刻敬意的。

张一兵

2008 年 11 月 23 日于香港沙田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及编纂出版过程中的若干插曲

[韩]郑文吉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未能在两人生前出版,而以手稿存世,但这一著作不仅在两人思想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作为独立的著作,确立了其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和极高的学术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以手稿形态留存下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被陆续公之于世,至今已过一个世纪,然而现实却是该著作的文本仍未最终确定。

纵观过去百年间《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研究史和编纂史,穿插着各种各样的唇枪舌战与是非毁誉。尽管这些唇枪舌战与是非毁誉产生了许多副作用,但最终对于该著作文本的完美再现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尽管《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 MEGA2 I/5 按主题分卷(thematischer Band)出版遭遇到两次挫折,但其出版时间已预定在 2009 年或 2010 年,故本人把围绕《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论争和基于文献学细节的文本编纂问题,都留给此次出版的个人专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纂和 MEGA2》。而此次讲演,只介绍该著作研究史和编纂史上可能引发各位兴趣的若干轶事趣话,以图提高各位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关注度。

一 《德意志意识形态》部分手稿的公开与早期评价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合著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提到过该著作,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的序言,以及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序(1888)。他们明确阐明,《德意志意识形态》通过黑格尔之后的“哲学批判形式”,奠定了他们通往唯物主义“历史认识”的自我认识之路。然而,直到恩格斯逝世之后,伯恩施坦和倍倍尔一同,取代斯特鲁威(Peter von Struve)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继承其遗稿,这一手稿的真实面貌才由伯恩施坦作局部的公开。^①

即便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被梅林收入1902年出版的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选》的偶然性还是相当大的。这是因为,该《遗著选》的编者梅林在恩格斯生前,曾帮助恩格斯搜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并且他也是后来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官方文献《马克思传》(1918)的撰写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首次出版的梅林的这一《遗著选》,前三卷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41至1850年间的遗稿,最后的第四卷则收录了拉萨尔在1849年至1862年间寄给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信件。该《遗著选》在当时来说,在搜集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著作方面规模最大,因而在马克思研究史上,创下纪念碑式的业绩。但因《哲学的贫困》及《共产党宣言》这些重要著作早已曾出版发售,所以该《遗著选》并未予以收录,而作为手稿收入的,只有期间曾被认为已佚失了的马克思的学位论文。

我们由此可见,该《遗著选》向出版社的商业性作了妥协,对于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未出版手稿”过于轻视。虽然梅林有机会亲眼见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并有机会加以利用,但他却认为这些手稿“不过是已发表著作的一种有意义的辅助资料”,故而坚持自己的观

^① 1899年9月起,伯恩施坦分四次在《新时代》(*Neue Zeit*)上公开了《格律恩批判》,并想在以后继续刊载该著作,但刊载事宜却因他引起的党内修正主义论争而被搁置。为此,他分别于1903至1904年,以及1913年,将《圣麦克斯》的一部分连载于他本人发行的 *Dokumente des Sozialismus*、*Arbeiter-Feuilleton* 和 *Unterhaltungsblatt des Vorwärts* 上。参见 Bert Andréas,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Das Ende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Bibliographie*, Karl-Marx-Haus, Trier 1983, S. 146—147。

点——没有必要将这些手稿收入像《遗著选》这种并非全集的选集(*Sammlung*)之中,从而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刊载推给了今后将要出版的全集。梅林的这一观点在1918年出版的《马克思传》中也清楚地体现出来,该著作将《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未刊行手稿当做是他们二人思想训练课的习作。^{[1](p. 346)[2](pp. 115—122)}

但值得称道的是,梅林的《遗著选》和《马克思传》叙述到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流亡时期时,详细地说明了当时社会主义运动所处的思想背景,并具体介绍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二卷结构。

二 梁赞诺夫和迈耶尔的论争

——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重要性的最初认识及学术功名心的冲突

最早关注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之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古斯塔夫·迈耶尔,他于1920年出版了《恩格斯传》(*Friedrich Engels. Eine Biographie*, 1. Bd. 1920; 2. Bd. 1934)。在撰写恩格斯传记的过程中,他以传记作家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必须遍涉一切可能的资料为由,来说服伯恩斯坦,从伯恩斯坦那里借阅到其所保管的大部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3](p. 206)}

迈耶尔在《恩格斯传》第1卷(*Friedrich Engels in seiner Frühzeit 1820 bis 1851*)的“德国意识形态的清算”一章中,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缘起——从英国旅行“归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随即告别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的哲学,全面投入形成他们自己的新的唯物主义、经济学历史认识的工作中去”。迈耶尔进一步确认,该著作第1卷涉及布鲁诺·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第2卷则对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进行了批判——他们无法摆脱费尔巴哈理论上的人本主义,在陈词滥调的灌木丛中,找不到通往现实的道路。同时,迈耶尔尝试对这一未刊行手稿进行学术上的分析,引起相关学者对之空前的关注。因此,对于迈耶尔的这些努力,就连曾于恩格斯生前就已接触过两人书稿的考茨基也感到十分惊讶,他将自己所读到的迈耶尔《恩格斯传》中的这一部分叙述形容为

“崭新的(*etwas völlig Neues*)”。^①[4](p. 338)然而,对于迈耶尔在《恩格斯传》中所作的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具体介绍和较为详细的分析,另一方面却因为梁赞诺夫充满野心的努力——想要将莫斯科建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的新中心,而招致两人之间围绕《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之“发现(*Entdeckung*)”的论争。

俄国革命之前,梁赞诺夫流亡欧洲,以柏林和维也纳为根据地,埋头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研究。他曾在德国编纂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Gesammelt Schriften von K. Marx und F. Engels. 1852—1862, 2 Bde. Stuttgart 1917*),1917年俄国革命胜利后回国,1920年任新成立于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Marx-Engels-Institut)所长职务。该研究院有着列宁的全力支持,在梁赞诺夫的领导下,为了成为世界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史研究的中心而专事资料收集与研究。研究院经过不懈的努力,一方面计划着全四部共42卷的MEGA1的出版,一方面投入全副精力来搜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稿。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看到迈耶尔抢先使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撰写了《恩格斯传》,而《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连接《神圣家族》和《哲学的贫困》的环节,又具有重要的意义,梁赞诺夫当然是很难掩饰自己的不快。因此,他在1923年11月20日苏联莫斯科社会主义科学院的演讲中,贬低了迈耶尔的业绩。他说道:

……迈耶尔在他的(卷末)注释中报告说,伯恩施坦慷慨地让他使用了恩格斯遗稿中的一部分手稿。(但)迈耶尔以前是新闻工作者,任报纸通讯员,所以这次也没能摆脱新闻工作者或报纸通讯员的习惯,就连在撰写学术著作时,也未准确说明他所利用的究竟是怎样的手稿。(因此)各位若想要从中找到有用的信息——引用的究竟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哪一部分、哪一手稿?从哪儿找来的?引用了哪一手稿第几页上的引文?

① Gustav Mayer, “Die ‘Entdeckung’ des Manuskripts der ‘Deutschen Ideologie’”,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XII. Jahrgang (1926), S. 285上也引用了同样的表述。

这将是白费力气。^[4](pp. 388—389)

梁赞诺夫在批评迈耶尔的同时,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他通过最近的柏林之行而获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及有关成果。他报告说,自己在最近历时四周的柏林之旅中,一是搜寻了以往刊物上有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所有资料;二是确保了较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要更为庞大的《圣麦克斯 *Sankt Max*》手稿;三是发现在这一未完成的章节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将施蒂纳、鲍威尔,还将费尔巴哈作为受尊敬的论敌,体现了两人怎样克服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过程;四是在该手稿的其余章节中,讨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这之前只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才有所涉及。^[4](pp. 389—391)

梁赞诺夫在莫斯科的社会主义科学院所作的这一演讲,在当时提供了许多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遗稿的最新信息,因此格林伯格将之翻译并刊登在自己主办的《社会主义及工人运动史文库》第 XI 号(1925)上。梁赞诺夫的这一演讲报告了他自己广泛的研究成果,涉及 1948 年以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共产党宣言》草案,1848 年以后的马克思庞大的经济学手稿、恩格斯的科学论、两人的书信等,而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报告尤为详细。但问题是,梁赞诺夫在报告中批评迈耶尔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是非学术的,并认为是他本人通过资料的集中搜集,才使《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貌得以完美复原,从而夸大了自己的功劳。^[5](pp. 79—81)

梁赞诺夫对迈耶尔的如上批判和夸张的自我主张随即遭到迈耶尔的强烈反驳。格林伯格的后一期《文库》(XII, 1926)登载了迈耶尔的反驳文。迈耶尔在文中指出,梁赞诺夫是看了自己的《恩格斯传》后,旋即接近伯恩施坦,阅读并拷贝了其所保管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但梁赞诺夫却宣传得像是他最先发现手稿似的,这只不过是他的幻想罢了。对于梁赞诺夫作为迈耶尔的致命缺点而加以指责的手稿的引用问题,迈耶尔则揭示说,对于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现存状态的人来说,就会充分理

解这一点——要指出其具体页码来是不可能的。^①[3](pp. 284—287)

不管怎样,围绕《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而展开的梁赞诺夫与迈耶尔的论争,作为一段小插曲,体现出20世纪初思想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遗稿的好奇心和学术上的关心程度。当时这一领域中最高学者之间展开的功名心的竞争,促使梁赞诺夫努力想取得伯恩施坦所保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稿,尤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出版权。作为其努力的结果,MEI在德国的代表机构——法兰克福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公司在阿道夫·布朗的帮助下,于1924年12月与伯恩施坦达成遗稿拷贝及版权协议。为了获得该遗稿的出版权,MEI通过法兰克福社会调查研究所,向伯恩施坦支付了4200马克(US\$1000)。

三 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和莫斯科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之间的倾轧

——社民党内部关于在德国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部分手稿的论争^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使得梁赞诺夫获得了拷贝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一个转机,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手稿也成为引发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MEI)与柏林的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之间学术合作关系中断的一个重要原因。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29年初,雅各布·迈尔(Jacob Peter Mayer)向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发行的德国社会

① 事实上,梁赞诺夫拜访伯恩施坦,阅读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是在1923年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委任下,通过布朗得以实现的。伯恩施坦在题为《恩格斯的遗言》(1929年9月18日和20日,分两次刊载于《晚报》(德国社民党机关刊物《前进报》的晚报版))一文中回忆说,梁赞诺夫在伯恩施坦家中,每天几个小时,花了数周时间,阅读了这一手稿。且伯恩施坦记得,当时还未具体制定MEGA计划。参见Rolf Hecker, “Erfolgreiche Kooperation: Das Frankfurter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und das Moskauer Marx-Engels-Institut (1924—1928)”,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2*, 2000, S. 105—106。另外我们有必要记住的一个小插曲是,关于刊登于格林伯格《档案》XI(1925)的梁赞诺夫演讲的德语译文,编者格林伯格曾在编辑过程中说服梁赞诺夫删掉文中批评迈耶尔的部分,这个建议最终被梁赞诺夫接受了,并打算加以修改,但终因杂志已经付印而无法校正。Rolf Hecker, 上文, S. 68—74。

② 该节是笔者新著《厄伯龙根之宝——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及其出版》(首尔,2008),第211—255页内容的概括。

民主党刊物——《社会》(*Gesellschaft. Internationale Revue für Sozialismus und Politik*)询问,是否有可能刊载目前为止尚不为人所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部分手稿。该杂志的编辑人阿尔伯特·所罗门(*Albert Salomon*)接到这一问询后,因为知道《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已于MEI发行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Marx-Engels-Archiv*)第1卷出版,于是便产生疑问,这一稿件是否应该刊载在MEGA之中?他尤其清楚,MEGA的宣传册和MEGA第I部第1卷第1分册的绪论中明确注明,伯恩施坦将其出版权委托给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因此他似就这一问题与MEI的柏林通讯员进行了商议。而尼古拉耶夫斯基随即将这一事情报告给了莫斯科的梁赞诺夫。^①[6](pp. 99—100)

然而,1929年4月,迈尔将社会民主党档案馆还未公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制作成用于出版的原稿,正式向《社会》杂志的编辑人所罗门提出刊载要求,这样,问题便渐渐复杂起来。^②首先,迈尔从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亨瑞奇处听到的是,在原稿的出版上不可能发生异议;而《社会》的编辑人所罗门却告知说,因伯恩施坦已放弃出版权,他不想因此卷入与梁赞诺夫的法律诉讼,时为5月底。之后迈尔连同亨瑞奇,亲自找到伯恩施坦,就版权问题正式提出疑问。迈尔在6月4日给所罗门的信中写道:伯恩施坦明确答复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版权不是梁赞诺夫所专有的权利(*Alleinrechte*),对于出版其未发表部分,他没有资格提出异议。^{[6](pp. 100—101)}

如上所述,尽管伯恩施坦对于版权有过明确的发言,但迈尔的原稿刊载计划还是被《社会》6月号拒之门外。1929年6月12日,迈尔将事情的经过向社会民主党领导层成员、同时也是国会议员和《前进报》主编史坦菲(*Friedrich Stampfer*)作了申诉。他说道,“MEI对原稿的出版提出异

① MEGA的宣传册(Prospect)刊载于*Marx-Engels-Archiv*, I. Band (1925), S. 461—462.

② 据说当时迈尔打算刊载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原稿是“‘*Der Dr. Georg Kuhlman aus Hosltein’ oder die Prophetie des wahren Sozialismus*’”。*Rainer Nicolaysen, Siegfried Landshut. Die Wiederentdeckung der Politik. Eine Biographie*, Jüdischer Verlag, Frankfurt/M. 1997, S. 485 Anm. 232.

议,指责《社会》,MEI的柏林通讯员也向本人表示不满,要求停止该原稿的出版”。据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将自己的作业成果转让给了MEI。也就是说,原本是编辑人和撰稿人之间就原稿在杂志上的刊载所作的交涉,现在却从当事人之间的讨论扩大开来,发展到党内重要人士介入的地步。尤其是史坦菲,他接到迈尔的信后,在信的末尾留下批注,对社会民主党的软弱无力作了自嘲——“梁赞诺夫怎能从伯恩施坦那里买到什么权利?难道说我们只能让莫斯科来管理我们党的档案吗?”^{[6](p.102)}

事态的发展随着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管理负责人迪特曼(Wilhelm Friedrich Carl Dittmann)的介入而更加尖锐。迪特曼批评了双方当事人,首先,他严厉指责迈尔放弃刊载原稿、并将原稿转让给MEI的行动。迪特曼于1926年6月21日给迈尔的信中这样写道:“作为我来说根本无法理解您的态度。伯恩施坦同志同意您将马克思遗稿的一部分刊登在《社会》上,而莫斯科的通讯员却对伯恩施坦同志进行恶意谋划。没有什么证据显示他接受了钱,而您却将原稿‘转让’给莫斯科的研究院,使他们的主张合理化。这是无法容忍的事情。我们党的档案馆并不是为了向一个最可耻地反对我们的外国政党提供资料而存在的。”同一天,迪特曼还寄信给编辑人所罗门,所罗门曾就迈尔拟定的原稿是否刊载事宜与MEI驻柏林通讯员进行商议,信中说:“您对梁赞诺夫提出的诉讼心怀胆怯……拒绝原稿的出版,党领导人对此感到十分惊异。”^{[6](p.102)}

虽然当初拟在社会民主党杂志上刊登《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迈尔作如此尝试是件非常普通的事情,但随着六个月时间的流逝,事态却像滚雪球般膨胀起来,结果使MEI和社会民主党档案馆、进而和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之间产生了无法弥补的感情罅隙。尼古拉耶夫斯基对事态的发展感到十分吃惊,将之报告给MEI,MEI为了做自己最坏的打算,指示当时从法兰克福移至柏林的马克思恩格斯出版公司(Marx-Engels-Verlag; MEV)的负责人雅各(Hans Jäger),将1924年从伯恩施坦那里拿到的酬金收据(Revers)及伯恩施坦的声明书拷贝送至莫斯科。^{①[6](p.402)}也就是说,莫斯

① Brief 136. MEI (Ernst Czöbel) an MEV, 18. Juni 1929.

科的 MEI 开始着手准备与伯恩施坦、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以及社会民主党领导层进行一场无法避免的最终对决。

与此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方面也不得不为与 MEI 的最终决裂做好准备。1929 年 6 月 21 日,伯恩施坦与迪特曼会面,伯恩施坦明确表示说,对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遗言中嘱倍倍尔和我保管的手稿遗产,我未曾以转让为代价从梁赞诺夫那里收取过费用”。他还说,自己未冒充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遗产的所有者,而且他很清楚,自己只是这份遗产的保管人。他明确声明,遗产由党的执行委员会支配,且对于这一点,就连梁赞诺夫也未曾有过一丝疑问。他在同一天给社民党执委会的署名信中还称,“布尔什维克机构以恬不知耻的谎言来谈手稿的所有权——这本完全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所有——是不应该的”。而且如有必要,他已做好了在这种调查文件式的声明书上签名的准备。^{[8](pp. 149\156)}

迪特曼据此信于 7 月 4 日又寄信给伯恩施坦,表示对党执委会与伯恩施坦取得一致见解感到满意,但同时也提出意见——“我们的这种共同见解,与您数年前(1924 年 12 月)寄给法兰克福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公司……的声明书并不一定一致。您提交声明书时,法兰克福研究所和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关系并不像今天这么明确,当时您为了达成法兰克福研究所和我们之间的和谐关系,让党档案馆来协助出版,因此才答应提供我们党档案馆的所有资料。但如今法兰克福研究所和我们,以及党档案馆之间的这种和谐协作却因莫斯科的影响而无法再得以保障……因此我们希望您以书面形式写清原由,取消声明书上所作的约定以及自发接受的所有形式的义务,并将之传达给法兰克福研究所。”^{[6](p. 103)} ^{[8](p. 150)} 换言之,迪特曼是让伯恩施坦拟定一份新的声明书,从原则上撤回 1924 年 12 月伯恩施坦就自己所藏的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复制与出版所作的委托声明。

不管怎样,德国社会民主党和 MEI 之间的这一矛盾不断发展,到了 1929 年 9 月 14 日,梁赞诺夫和迪特曼在社会民主党档案馆谋面未成,从而使包括 MEI 对社民党档案馆资料的复制工作在内的学术合作关系划上了句号。1930 年 1 月,这两个机构之间开始进行情绪化的划界步骤。

由这一事件产生的社民党内的纷争,使得社民党彻底改变以往在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出版上对莫斯科研究院的支援政策。换言之,社民党朝着依靠自身努力来出版的方向改换了政策,其成果为兰茨胡特和 J. P. 迈尔共同编纂的 2 卷本《马克思早期著作集》(Karl Marx,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Die Frühschriften, 2 Bde.* Hrsg. von Siegfried Landshut und Jacob Peter Mayer, unter Mitwirkung von Friedrich Salomon [Krönertaschenausgaben 91 und 92], Leipzig 1932),该著作集于 1932 年出版,与莫斯科的 MEGA I/3(包括《经济学哲学手稿》)和 I/5(《德意志意识形态》)同一年发行。^{[7](pp. 132—149)}

四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 MEGA1 中的歪曲

——手稿的肆意编纂与部分佚失手稿的发现

1931 年,梁赞诺夫遭到肃清后,苏联的 MEI 改称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MELI),阿多拉茨基任院长,继续 MEGA1 的出版工作,直至 1935 年。这一时期发行的 MEGA 中,最引人注目的著作是 1932 年出版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EGA1 I/3, S. 29—172)和《德意志意识形态》(MEGA1 I/5)。

MEGA1 I/5 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编纂原则是,“按 1846 年 7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出版计划受挫之前所计划的形态来复原(文本)”。^{[9](p. XVII)}尤其是第 1 卷“I. 费尔巴哈”章,这一未完手稿的现存状态十分复杂,这一章的编纂是按以下方针进行的。

“I. 费尔巴哈”章虽以未完状态存世,但记在手稿上的许多边注却为该章的编纂提供了方向。也就是说,在正文之上或空出来的右栏中,有用于构思和推敲未完手稿的指示(Angaben)、主要是马克思所写的许多边注、恩格斯的笔记和边注,以及划分段落的分节线和插入指示;编者试图将这些积极地运用到编纂中去,从而阐明“著者们叙述方法上各文句的辩证法关系”。于是,MEGA1 的编者认为,只要先根据分节线将整个手稿分割开来,然后通过边注或编纂上的注释进行重构,这样是不会有问题的。因此,他们调换手稿页码,甚至将同一文段分割开来,排列在其他

标题之下,做法非常之大胆。^{[9](pp. 561—563)} ^{[10](pp. 209—214)}

大胆运用以上编辑原则的例子还可举“I. 费尔巴哈”章的“A. 2. *Über die Produktion des Bewußtseins*”(MEGA1 I/5, S. 26—39)。

编者首先采用基底稿第1束的S. 21(纸张9-b)右栏中间所记的“*Über die Produktion des Bewußtseins*”作为标题(MEGA1, I/5, S. 26),然后将手稿中的“*Feuerbach*”及写有“F”的边注(编纂者确信其为意识的产生)文本合在一起进行集中编纂。也就是说,编者连续提出S. 21(纸张9-b)的中间至第一束结束的S. 28(纸张11-b)的文本(但却无任何理由地将S. 23[纸张9-b]的中间至S. 24[纸张10-b]的部分排除在外),然后将S. 28的最后一句与当时遗存下来的基底稿第1束第1页S. 8[纸张6-a(M标记为6-b)]的第一句相接,连接后见下面的例文。

/28/... Wenn also Millionen von Proletariern sich in ihren Lebensverhältnissen keineswegs befriedigt fühlen, wenn ihr “Sein” ihrem [. . .] sich in Wirklichkeit und für den praktischen Materialisten, d. h. Kommunisten, darum handelt, die bestehende Welt zu revolutionieren, die vorgefundnen Dinge praktisch anzugreifen und zu verändern... (MEGA1 I/5, S. 32)

像这样肆意对文本进行分割与连接的情况,在MEGA1 I/5 “I. 费尔巴哈”基底稿的另一项,尤其是“*Geschichte*”项也是一样。^{[10](pp. 216—217)}

虽然MEGA1 I/5存在着这种肆意编纂的情况,但MEGA1 I/5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不仅载入了“历史的、批判的”全集——MEGA1,而且这一著作的全貌首次得以集中展现,因而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具有不容怀疑的权威。再加上二次大战之后,东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IML)出版了基于苏联第2俄文版全集(Söcinenija 2)的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arx -Engels, Werke: MEW, 1956—1968*),同时根据莫斯科IML提供的MEGA I/5修订版,编纂了MEW第3卷(《德意志意识形态》,1958),故在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MEGA1仍能维护自

己的权威。当初柏林 IML 的马克思恩格斯所为了编纂《德意志意识形态》，曾向莫斯科的研究院(IML)要求该著作的照相复制资料，但这一要求未被接受，所以只能完全依靠 MEGA1 I/5。这样，虽然 MEW 编辑组能从马克思 1844 至 1847 年期间备忘录中采录和刊载 5 个附录，但在文本的再现上，却无法超越古典。^①这是因为，可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之编纂所用的唯一资料，只有莫斯科 IML 送来的 MEGA1 I/5 的修订本(修改了 MEGA1 I/5 发行后发现的错字、漏字及判读上的错误)。

然而，1962 年，巴纳(Sigfried Bahne)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G)的文献中，发现了那时以为已佚失了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半纸纸页(blatte)，从而使 MEGA1 I/5(包括 MEW Bd. 3)的权威面临正面挑战。其中有一张纸页为基底稿第 1 束的 S. 1—2，还有一张为第 1 束的最后一张半纸纸页——纸张 11 - cd, S. 29 也包含在内。^{[11](pp. 93—114)}

因此再来看 MEGA1 I/5 的连接法——非要将 S. 28 右栏最下端的句子连至 S. 8(纸张 6 - a)左栏上端，而若与巴纳发现的纸张 11 - c(S. 29)的右栏上端句子相连的话，那么就成为以下这种非常正常的句子和表达了。

/28/... Wenn also Millionen von Proletariern sich in ihren Lebensverhältnissen keineswegs befriedigt fühlen, wenn ihr "Sein" ihrem /29/"Wesen" nicht im Entferntesten entspricht, so wäre dies n[ach] der erwähnten Stelle ein unvermeidliches Unglück, das man ruhig ertragen müsse.... (Vorabpublikation, S. 37—38)

我们通过上述 MEGA1 I/5(《德意志意识形态》)“I. 费尔巴哈”章文本编纂的例子可以看到，当做为手稿的文本因肆意的编纂被强行分割，前后位置颠倒时，会让文本产生巨大的扭曲。而正是因为 MEGA1 I/5 对

① 参看 Richard Sperl, "Die Marx-Engels-Werkausgabe in deutscher Sprache (MEW). Eine editorische Standort Bestimmung,"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5(2006), S. 237—238 Anm. 64); 郑文吉:“《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的文本编纂问题”,载《韩国的马克思学》,第 63—102 页,重点见第 78—91 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I. 费尔巴哈”章的歪曲延续了 30 多年,故而到了 1960 年代和 70 年代,将 MEGA1 I/5 视为伪书、为取而代之进行新的文本编纂成了必然之势。

巴加图利亚(G. A. Bagaturija, 1965)、陶勃特(Inge Taubert, 1972)、广松涉(1974)对《德意志意识形态》“I. 费尔巴哈”章文本的重新编纂,正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中开始的。

五 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推迟出版

MEGA 从其筹备阶段开始,就似以早日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念。因此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IML)的马克思恩格斯所择取当时《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在文本再现上争议最多的部分——“I. 费尔巴哈”章的文本,试验性地编入 MEGA2 的试编本中,期望得到有兴趣的学者们的批判意见。^① 1962 年,巴纳发现《德意志意识形态》佚失的手稿,巴加图利亚将之纳入自己的“I. 费尔巴哈章”新编辑版(1965),而陶勃特又将巴纳译成德语(1966)。^{[12](pp. 1192—1254)} 在陶勃特的主持下,柏林 IML 马克思恩格斯所的 MEGA I/5 工作组打算在 1989 年之前获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于 1990 年代初出版 MEGA2 I/5。然而,1989 年柏林墙拆除,东德 IML 解体,这使最初的计划未能实现。

1990 年,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取代苏联和东德的 IML,取得 MEGA 的发行权,MEGA2 I/5(《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纂任务也于 1992 年移交给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研究所(所长为汉斯·佩格, Hans Pelger)和法国普罗旺斯埃克斯大学的德国学学者格朗炯(Jacques Grnadjonc)所主持的德法 MEGA 工作组。之后,德法工作组将先前在柏林 IML 负责《德意志意识形态》编纂的陶勃特作为合作研究者吸收进来,进行 MEGA2 I/5 的编纂工作,这使得 MEGA2 I/5 有望最迟于 2000 年代初

^① MEGA 2 Proband, Berlin 1972, S. 33—119, 399—507. 从东德方 IML 的这些运作中,可见他们在 MEW 第 3 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纂过程中为超越先天局限而作的无意识的努力。

出版。但是,由于格朗炯博士的早逝(2002),以及德法工作组的另一轴心佩格所长的退休(2003),这第二次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编纂工作——MEGA2 I/5 又被迫中断,过去十余年里德法工作组的工作成果(包括MEGA I/4,I/6),被移交给前身为阿姆斯特丹 IMES 事务局的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BBAW)MEGA 工作处。^① 这样看来,MEGA2 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纂工作开始于 1972 年出版的 MEGA2 试编本的准备作业,至 2000 年代初的三十年中,尽管付出了长久的努力,但结果仍是未能完成,只留下 1972 年出版的陶勃特主导编纂的 MEGA2 试编本《德意志意识形态》“I. 费尔巴哈”,以及根据德法工作组的成果整理而成、并于 2004 年以 MEGA 的伙伴杂志出版的陶勃特和佩格的 MEGA2 I/5 暂定版(Vorabpublikation)《德意志意识形态》“I. 费尔巴哈”和“II. 圣布鲁诺”(Marx-Engels-Jahrbuch 2003, Akademie Verlag, Berlin 2004)。

MEGA2 文本编纂原本的目标是,在忠实于文本的完整性和本来面貌的 MEGA1 传统的基础上,吸取 MEGA1 之后文献学研究成果,一目了然地再现所有文本。因此,MEGA2 的文本编纂不是要制作出最接近著者意图的文本,而是要再现出文本从最早草稿到最后原稿的发展过程。所以,MEGA2 最重要的编纂原则是,所有文本在再现时都要尽可能地与原稿相一致,文本的展开要符合完整性、直观性、纸面的经济性。

如上所述,MEGA2 采用的是发生史式的文本编纂法,它摆脱了通常以具体体现作者意图的定本(*Ausgabe letzter Hand*)来进行文本编纂的做法,对于草稿、第 1 版及作者最终的定本都一视同仁,不赋予哪种以优先权,尽量选择早期文本作为编纂文本。对于未经编辑的 1/2 大纸的异文,则从完整性和严密性、直观性和简洁性、纸面的经济性来考虑;对于异文的明细(*Variantenverzeichnis*),则将当初计划的记述法(*deskriptive*

① MEGA2 I/4、I/5、I/6 这三卷网罗了 1844 年 8 月至 1848 年 2 月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论文、草稿,为此德法工作组进行了大量基础研究,1960 年代末以来,以瑞士的安德雷亚、法国的格朗炯、德国的佩格为中心进行了文献资料的发掘、调查,形成了工作的重头。他们的研究成果参见 Bert Andréas, Jacques Grandjanc und Hans Pelger, Hrsg., *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Brüssel 1847—1848*, Schriften aus dem Karl-Marx-Haus, Nr. 44, Trier 2004, S. 7—8。

Methode)改为论证法(*diskursive Methode*),这是因为编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写作方式及留存下来的遗稿更适合运用并列的记录形式(*parallelisierende Verfahren*)和共观的方法(*synoptische Methode*)。

不管怎样,在目前的情况下,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按上述编辑原则进行编纂并以 MEGA2 I/5 出版,预计要到 2009 年或 2010 年。可是,将要刊载《德意志意识形态》的 MEGA2 I/5 的出版,在过去曾遭受两次挫折,曾被一再推迟。为了完成 MEGA I/5(《德意志意识形态》),2006 年 11 月 24—28 日,在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BBAW)召开的德日专家工作会议上,讨论了让包括我在内的日本学者(仙台组的大村泉等)参与 MEGA I/5 主卷编纂工作的问题。但 BBAW 方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卷编纂应由“德国人”编辑组进行。对此,日本专家则表示,当初《德意志意识形态》“I. 费尔巴哈”章曾在日本引发激烈的论争,并强调说,通过对之的数据化(CD-ROM)作业,自由的编纂是有可能的;他们愿意制作 CD-ROM,来作为 MEGA I/5 的附录(Bielage)。这样,不久的将来将要出版的 MEGA I/5 除了以往那样的 MEGA 主卷外,还根据日方的提议,作为附录附加上 CD-ROM,来再现构成“I. 费尔巴哈”章的手稿,手稿可以各种方法来排列,准确再现正文文本和稿内异文(修改、删除、插入等)。

参考文献:

[1] Franz Mehring, Hrsg., *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und Ferdinand Lassalle* [M], Stuttgart, 1902

[2] Franz Mehring, *Karl Marx. Geschichte seines Lebens* [M], 2. Aufl., Leipzig, 1919

[3] Gustav Mayer, *Erinnerungen. Vom Journalisten zum Historiker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M], Zürich/Wien, 1949

[4] D. Rjasanoff,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XI. [M], Jahrgang, 1925

[5] [韩]郑文吉,从编纂史看《德意志意识形态》[A],载郑文吉,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与早期著作[M],首尔,1994

[6] Rolf Hecker,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M]. Neue Folge, Sonderband 2, 2000

[7] Rainer Nicolaysen, *Siegfried Landshut. Die Wiederentdeckung der Politik. Eine Biographie* [M], Jüdischer Verlag, Frankfurt/M, 1997

[8] S. Bahne, *Zur Geschichte der erste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A], in *Arbeiterbewegung und Geschichte* [M], Trier 1983

[9] MEGA I/5, Einleitung, 1932

[10] [韩]郑文吉,“《德意志意识形态》I. 费尔巴哈章的重构”[A],载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与早期著作[M],首尔,1994

[11] Siegfried Bahne, *Die Deutsche Ideologie' von Marx und Engels. Einige Textergänzungen* [A], 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 VII [M], 1962

[12] *Neuveröffentlichung des Kapitel I des I. Bandes der 'Deutschen Ideologie'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A], in vorbereitet und eingeleitet von Inge Tilhei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M], 14. Jahrg. Heft 10, 1966

(赵莉 译,单位: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马克思恩格斯藏书中读书批注的意义及其出版问题

——关于 MEGA2 IV/32(先行版)的评述

[韩]郑文吉

1967年,柏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Institut für Marxismus-Leninismus/Berlin; 以下简称为柏林 IML)发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Ex Libris.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①1979年,莫斯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Institut für Marxismus-Leninismus/Moskau; 以下简称为莫斯科 IML)发行了《马克思恩格斯藏书中的俄语书》(*Russkie knigiv bibliotekach K. Marksai F. Engel'sa*)。^②而1999年底刊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以下

① *EX LIBRIS.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Schicksal und Verzeichnis einer Bibliothek*, Einleitung und Redaktion: Bruno Kaiser, Katalog und wissenschaftlicher Apparat: Inge Werchan. Hrsg. von Institut für Marxismus-Leninismus beim Zentralkomitee der SED (Berlin: Dietz Verlag, 1967), 共 228 页(《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藏书目录及其命运》,编辑与导论: B. 凯撒,目录与参考资料: I. 维尔婊,发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所,柏林:狄兹出版社,1967年版,共 228 页)。

② *Russkie knigiv bibliotekach K. Marksai F. Engel'sa* [*Russische Bücher in den Bibliotheken von K. Marx und F. Engels*] (Moskau: 1979)(《马克思恩格斯藏书中的俄语书》,莫斯科: 1979年版),共 272 页。

简称 MEGA) IV/32 的先行版,^①则是继两者之后最为引人注目的藏书目录。这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1920 年代 MEGA1 编辑组以德国社民党档案馆为中心,开始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稿和藏书进行调查与复原,该工作进行了七八十年后所取得的成果,便是这一 MEGA2 IV/32 先行版;先行版对所收录的藏书目录加以扩展,并且各藏书都有详细的说明,因此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可以借此来展望今后将要出版的 MEGA2 IV/32 的最终定本,或 MEGA2 的整体编纂。

对马克思恩格斯所藏图书进行调查和复原,并不是要将“科学共产主义的古典创始人”神化,而是想通过他们留在藏书上的阅读痕迹,来追踪其思想发展的过程。“著名作者的藏书及其对之的叙述,是研究作者毕生著述及其在同时代周围环境中的定位问题时所不可或缺的”。^{[1](p.18)} 这样的表述,对于以实践来深入当时的政治、社会事件,并专事研究活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可谓一语中的。

1840 年代初,马克思就已经开始拟定须购入或阅读的图书目录,并将读过的书籍加以概括或摘录,从而留下为数庞大的读书笔记。众所周知,他在写给恩格斯及友人的信中,经常提到他要读或已读书籍的信息及对之的评论。因此,研究者们若想系统地追踪两人著作和思想发展的过程,除他们的著作外,还应去探讨其书信、摘录笔记,以及个人藏书中的阅读痕迹,做到并重而不偏废。而事实上,当初 MEGA2 编辑组的编纂计划自与 MEGA1 不同,他们打算除第 I 部和第 II 部著作以外,第 III 部收录书

①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Vierte Abteilung: *Exzerpte. Notizen. Marginalien. Vorauspublikation zu Band 32. Die Bibliothek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Annotiertes Verzeichnis des ermittelten Bestandes*. Bearbeitet von Hans-Peter Harstick, Richard Sperl und Janno Strauss. Unter Mitarbeit von Gerald Hubmann, Karl-Ludwig König, Larisa Mis'kevič und Ninel' Rumjanceva. Herausgegeben von der Internationalen Marx-Engels-Stiftung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9), 共 738 页((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梅佳版)。第四部分。摘录、笔记、旁注。第 32 卷先行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附评注的已查明藏书目录。编辑: H. -P. 哈尔施蒂克、R. 施佩尔和 J. 施特劳斯。参与人员: G. 胡伯曼、K. -L. 柯尼希、L. 米施柯维奇和 N. 罗姆扬塞娃。发行: 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 柏林: 学院出版社, 1999 年。共 738 页。以下简称为 MEGA2 IV/32 (Vorauspublikation)。

信,第IV部的第1编收入书摘笔记,第2编则以边注本的形式,再现二人藏书及其中的阅读痕迹。^①为了更好地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可靠而充实的资料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MEGA2曾让许多研究者满怀期待。

然而,1989年以来,东欧社会主义体制瓦解,MEGA的编辑权也随之移交给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 以下简称为IMES)。规模庞大的MEGA出版计划一蹶不振,不得不随客观条件而变化。尤其是德国统一之后,柏林和莫斯科的IML遭遇到财政上的冰封期,IMES必须提供财政上的支援,并确保更多的研究职位给以前的研究者。这样,由于IMES在财源上的限制与时间上的紧缩,之前的MEGA出版计划不得不被压缩。^{[2](pp. 421—456)}1992年后召开了数次国际会议,商榷修改编辑原则。在此基础上,1995年9月15日,IMES理事会最终通过了修改MEGA2整体编纂计划的基本原则。在修改编纂原则以缩减MEGA规模的过程中,当初计划为30卷的第IV部第2编读书批注本,成为不同于其他部分的一个极端——被大大压缩,仅为1卷,即MEGA2 IV/32。^②

① 筹划MEGA的前苏联和东德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IML/Moskau und Berlin)将MEGA2第IV部划分为1、2编,第1编40卷,为摘录与笔记,第2编30卷,为读书批注本。Jacques Grandjonc/Jürgen Rojahn, "Der revidierte Plan d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Studien* (J. 格朗永克、J. 罗亚恩:“经过修订的马克思全集规划”,《梅加研究》),1995/2, 62页及73—74页的§ 2. 4. 1;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Vierte Abteilung (Exzerpte • Notizen • Marginalien. Probeheft). Marginalien • Probestücke. Text und Apparat* (Dietz Verlag, Berlin 198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梅加版)。《第四部分(摘录、笔记、旁注和试刊本)。旁注、试刊片段。文本与参考资料》,狄兹出版社,柏林,1983年)), 24*—25*页。

② 这里所决定的MEGA各部的缩减情况如下:第一部分(著作,论文):32卷(当初计划为33卷);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准备著作):15卷24册(当初计划为16卷24册);第三部分(来往书信):35卷(当初计划为45卷);第四部分第1编(摘录,笔记):31卷(当初计划为40卷),第2编(藏书与读书批注):1卷(当初计划为30卷)。Jacques Grandjonc/Jürgen Rojahn, 同上文,见62—89页。

二

马克思和恩格斯藏书中的读书批注,对于理解他们的思想形成与发展过程,是极其重要的文件之一。对读书批注的这种认识及评价,应该说是与梁赞诺夫(David Borisovic Rjazanov)的努力密不可分的。梁赞诺夫有体系地编纂并发行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据悉,1923年之后的数年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Marx-Engels-Institut; 以下简称为MEI)的苏联学者们进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出版的基础作业,调查并复制了德国社民党档案馆(Archiv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以下简称为社民党档案馆)所藏的两人的遗稿和藏书,并于1932年拟定了马克思恩格斯藏书的文献目录(*Liste der Bücher aus den Bibliotheken von Marx und Engels*),作为其研究院的内部资料。^① 梁赞诺夫便是在资料搜集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筹划MEGA1的,他在1929年MEGA1第I部第1卷第2分册(MEGA1 I/1.2)的序言(*Einleitung*)中提出以下值得我们注意的见解。

马克思是富有激情的读书家。这并不只意味着他阅读了为数庞大的书籍,还意味着他的阅读热情炽热而又旺盛。他这种精力旺盛的读书热情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他在读过的书上留下不计其数的下划线和侧划线、惊叹号和问号,以及读书批注;二是他终其一生不断地作摘录。

① *Ex Libris.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15页。这里调查的著作作为12525卷,17503册,此外还包括685卷报纸和杂志。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为1130种(Title),1414卷。131卷书上记有旁注(Marginalien)。MEGA2 Vierte Abteilung. *Marginalien · Probestücke*(梅加2,第四部分,《旁注与试刊片段》),20页。Richard Sperl, “Die Marginalien in den Büchern aus den persönlichen Bibliothek von Marx und Engels; ihr Stellenwert für biographische und wissenschaftsgeschichtliche Forschungen-Möglichkeit und Grenzen ihrer Edition,” *editio. Internationales Jahrbuch für Editionswissenschaft*, Jg. 9 (Tübingen 1995)(R. 施佩尔,“马克思恩格斯私人藏书中的旁注:对生平以及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对其编辑的可能性以及界限”,《国际编辑学年鉴》,第9发行年度,图宾根,1995年),152页,据施佩尔报告,尼古拉耶夫斯基(Boris Ivanovic Nikolajevskij)于1928年制订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目录(Nikolajevskij-Liste),且集中有旁注的131卷书籍也被制作成照相复制本。

与几近 250 卷的摘录笔记一样,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研究、尤其是对马克思个别著作的批判性历史研究而言,马克思所读书籍的自用本(*die Handexemplare*)是极其重要的资料典据。从这一角度来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藏书如若不能完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则不可不谓是马克思研究的巨大损失。^{[3](p. XVII)}

如上所引,梁赞诺夫提到 1840—1843 年间马克思的摘录笔记,同时指出读书批注的重要性。应该说,作为学者,梁赞诺夫第一个关注到读书批注对研究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具有的学术意义。也就是说,梁赞诺夫明确指出,马克思作为富有激情的博览主义者,其阅读痕迹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藏书中大量的下划线、侧划线以及各种符号与读书批注,二是马克思终其一生所保管的并用于写作的摘录笔记;为了从源头上考察马克思主义,批判地还原马克思个别著作的历史,就必须并行研究摘录笔记和藏书中的阅读痕迹。然而,尽管梁赞诺夫对于摘录笔记和藏书中的阅读痕迹的重要性有着自己明确的认识,但由于 MEGA1 项目的过早中断,摘录笔记只出版了极其有限的一小部分便停下了。^{[4](pp. 323—420)}

作摘录笔记和读书批注,这两项作业基本上贯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阅读与研究过程,因此在两者的相互关系上,我们认为很大程度上具有共同性。1983 年曾发行过《梅佳 2, 第四部分, 旁注与试刊片段》(*MEGA 2 Vierte Abteilung. Marginalien · Probestücke*),其编者指出,两人所阅读的书若若是个人所藏,则为了节约时间,自然要在书上划线,并加上边注。但若是从巴黎、布鲁塞尔、伦敦、曼彻斯特等公共图书馆所借的书,则基本上无法采用上面这种节省时间的方法。也就是说,对于后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采用下面的操作方法,即从所借书籍中将需要引用的部分笔录下来,做成摘录笔记。^{①[5](pp. 11—12)}

这样,1970 年代以前,一部分摘录、概要、笔记便得以公开,尽管这只

① 与另外作摘录笔记相比,直接在书上写旁注或划线要节省时间,但所有的公共图书馆都注重图书的保管,将这一做法视为“对书的犯罪”。参见 H. J. Jackson, *Marginalia: Readers Writing in Book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H. J. 杰克逊,《旁注:读者在作品中的书写》,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0 页、第 73—74 页、第 88 页。

是一部分；但是，读书批注却未曾公开过。MEGA2 第 IV 部计划将读书批注另外加以再现，并已在 MEGA2 的构思阶段就付诸实施，这件事情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和关注。^{[6](p. 41\pp. 45—46)} 虽然我们可从各个角度来讨论之所以在 MEGA2 构思阶段就强调读书批注重要性的原因，但以笔者所见，认为首先从逻辑上看，梁赞诺夫就已注意到读书批注与摘录笔记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之后的 MEGA1、MEGA2 编辑组对读书批注的重要性也有着学术眼光。也就是说，他们确信，随着全集编纂过程中摘录笔记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读书批注又与摘录笔记是同一水平上并行的，因而读书批注是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业现场和创造过程的宝贵资料。同时，还有客观的情况不容我们忽视。上世纪 20 年代后，即便是在二战时或战后的混乱时期，莫斯科和柏林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也未放弃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藏书的复原工作。还有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特里尔的卡尔·马克思故居等，在这些机构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到了 1960—70 年代，复原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①

马克思的藏书目录始见于马克思 1844—1847 年使用的笔记本上的记录；^{[7](pp. 5—30)} 之后在 1850 年，丹尼尔斯(Roland Daniels)拟订了马克思的藏书目录^②；1881 年，马克思本人制作了藏书一览表；还有 1882 年的藏书目录，以“我的书架上的俄语书”(Russisches in my bookstall)为题。^{[5](p. 17)} 虽然马克思的藏书似乎保管得井井有条，但 1883 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

-
- ① EX LIBRIS.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Russkie knigiv bibliotekach K. Marksai F. Engel'sa (《马克思恩格斯藏书中的俄语书》)；Maja Dvorkina/Boris Rudjak, "Karl Marx erbt die Bibliothek von Wilhelm Wolff, 1864. Zur Geschichte der Bibliotheken von Marx und Engels." *Nachmärz-Forschungen. Beiträge* (Trier, 1994) [Schriften aus Karl-Marx-Haus Trier. Nr. 47] (M. 德沃金纳/B. 鲁德雅克；“1864 年马克思对 W. 沃尔夫藏书的继承。论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史”，《三月革命后研究。来稿》，特里尔：1994 年[来自特里尔马克思之家的论文]，见 187—244 页等。
- ② 1848—1849 年三月革命期间，在德国进行活动的马克思回到英国时，将书托付给自己的同志丹尼尔斯，丹尼尔斯将之整理成目录。该藏书目录刊载于 *Ex Libris.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211—228 页。

斯继承其藏书,因无法全部收纳,曾将其中部分藏书分散他处。^① 恩格斯晚年向马克思的两个女儿——劳拉和爱琳娜建议,将马克思及其本人的所有藏书留给德国社民党档案馆。因此他们拥有的所有藏书在恩格斯逝世后的1895年10月运抵柏林。^{[5](p. 18) [8](pp. 203—204)} 然而,我们在此感到遗憾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藏书未能完整编目。更令人惋惜的是,这些藏书没有被单独保管,而是混藏在社民党已有的藏书中,被阅览和借阅。^{[5](pp. 18—19)} 这样,在这一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藏书被分散或佚失,有许多藏书被社民党的干部赠送给第三者,或外借后未予归还。直到1920—30年代,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研究员们在对社民党档案馆所藏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遗稿进行整理和复制的过程中,拟定了一份藏书目录。1933年,在希特勒的专制统治下,社民党遭到了取缔(6月22日)。^②

社民党被取缔即意味着社民党档案馆被查封,其藏书被没收。收缴的17500多册藏书并入普鲁士机密文件保管所(Preußische Geheime Staatsarchiv in Berlin-Dahlem)。其中部分藏书被享有优先权的普鲁士国立图书馆(Preußische Staatsbibliothek)、国立研究院(Institut für Staats-

① 这一时期马克思藏书的散失情况具体见以下报告:MEGA2 Vierte Abteilung. *Marginalien · Probestücke*(梅加2,第四部分,《旁注与试刊片段》),18*页; Hans-Peter Harstick, “Zum Schicksal der Marx’schen Privatbibliothek,”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XVIII (1973)(H.-P. 哈尔施蒂克:“论马克思私人藏书的命运”,《国际社会史评论》,第18卷,1973年),216—219页; Heinz Stern/Dieter Wolf, *Das große Erbe. Ein historische Reportage um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Berlin: Dietz Verlag, 1972(H. 施泰尔恩/D. 沃尔夫:《伟大的遗产。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著的历史报道》,柏林:狄兹出版社,1972年),第166—167页。

② 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MEI)通过该研究院的柏林特派员尼古拉耶夫斯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藏书进行了整理,共1130种,1414卷,其中131卷马克思和恩格斯记有读书批注的书被制作成照相复制本。MEGA2 Vierte Abteilung. *Marginalien · Probestücke*(梅加2,第四部分,《旁注与试刊片段》),20*页; MEGA2 IV/32 (Vorauspublikation)(梅加2,第4部分,第32卷,先行版),第61—64页,尤其参见第63—64页; Richard Sperl(R. 施佩尔),上文,152页。

forschung in Berlin-Wannsee)等用于填补图书缺本或扩充藏书量。^①然而,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1933—1945年战争期间失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当一部分藏书,虽然战后苏军及东德政府付出了有体系的、集中的努力,但还是很难完全复原。^②

尽管客观情况十分艰难,但1967年,柏林IML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Ex Libris.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共计504种、700册。1979年,莫斯科IML又发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俄语藏书(Russkije knigiv bibliotekach K. Marksai F. Engel'sa)》,共364种,526册。^{[9](pp. 172—174)}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史上有关二人藏书目录的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是MEGA筹划阶段作出的一个决定——出版藏书目录的同时,出版读书批注本。

三

MEGA编辑组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藏书中的阅读痕迹,与本子上的

-
- ① Stern und Wolf(施泰尔恩/沃尔夫),同上书,第168—170页; *Ex Libris.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第15—16页; MEGA2 Vierte Abteilung. *Marginalien · Probestücke*(梅加2,第四部分,《旁注与试刊片段》),第20*—21*页。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归并到后者的藏书中,一部分在战争中被移送至布拉格加以保管。而这些书中有相当多一部分在战后佚失。
- ② 关于停战后苏联和东德政府复原马克思和恩格斯藏书的努力,参见以下资料。MEGA2 Vierte Abteilung. *Marginalien · Probestücke*(梅加2,第四部分,《旁注与试刊片段》),第21*—23*页; MEGA2 IV/32 (Vorauspublikation)(梅加2,第4部分,第32卷,先行版),第69—73页。停战后,苏联对马克思恩格斯藏书的征收是有计划并集中进行的。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Marx-Engels-Lenin Institut; MEI为其前身)指派该研究院的学术合作研究员奥西波夫(M. V. Osipov),与苏联的德国占领军司令部(Sowjetische Militäradministration in Deutschland; SMAD)的亚历山大·斯托利亚罗夫少校(Major Alexander Stoljarov)一起,从1945年11月开始,搜集并征收德国境内的马克思恩格斯相关文件。至1946年2月,来自德国境内各图书馆的贵重图书(libri rari),以及可为研究院所用、对其所藏图书进行补充的书籍,被作为战利品运送至苏联;这样征收到的文件包括有普鲁士国立图书馆所藏的前社民党藏书1000卷(其中243卷盖有Karl-Marx-Haus Trier(特里尔马克思之家)的藏书印),以及柏林市立图书馆的《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等重要报纸的装订本。见MEGA2 IV/32 (Vorauspublikation)(梅加2,第4部分,第32卷,先行版),第70—71页,重点见70页的注153。

摘录笔记同样重要,并且是与摘录笔记并行的一种作业方式。MEGA2 筹划阶段提出的读书批注本出版设想便是从这一认识开始的。^{[6](p. 41)\pp. 45—46)}随着 1983 年《MEGA 第 IV 部,读书批注:试编本》的刊行,他们的这一设想得以具体实现。换言之,1980 年代初,编辑组决定将马克思和恩格斯藏书中的读书批注汇集成 MEGA2 第 IV 部的第 2 编。

MEGA 编辑组首先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读书批注及“划线”大致分为以下三种。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本人著作进行修改时画上的下划线和侧划线,这是最重要的部分。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在书籍或照片上的呈赠辞,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收到的呈赠辞。三是他人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读书批注和划线。^{[5](p. 24)}

MEGA 的编者对于第一种情况,即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对包括《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第 1 卷在内的著作、文稿所作的修改及画出的下划线和侧划线等标记,当然是尤觉重要。经确认,这一类共有 108 种,1687 页。这些文件中出现的边注和划线基本上被放在 MEGA 第 I 部和第 II 部的著作部分。而第二类的资料,因其对认识马克思恩格斯与当时人士的思想交流史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计划将之放在第 III 部中另卷出版。第三类情况则正好纳入我们所关注的 MEGA 第 IV 部第 2 编。1980 年代初所确定的留有马克思恩格斯阅读痕迹的藏书共有 655 种,36650 页。若要完整再现,则需要 18000 MEGA 页(MEGA-Seiten)。^①柏林和莫斯科 IML 的 MEGA 编辑组估测,随着目前发掘工作的继续进行,资料不断增加,算上附在剪报上的备忘录和第三者文稿上留有的二人的校注,大约计 25000 MEGA 页,收录这些资料需 30 卷的 MEGA。^{[5](pp. 24—25)}

另一方面,读书批注本究竟该以怎样的面貌问世,MEGA2 编辑组对之似乎是煞费苦心的。于是,他们选择了 5 卷马克思使用的藏书、2 卷恩格斯使用的藏书,以及 1 卷两人合用的藏书作为例子,编纂了《MEGA 第 IV 部,读书批注:试编本》,尝试对之加以再现的方法。

① 所谓“MEGA 页”,源于原东德和苏联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发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时,所采用的区别于以往版型的独特版型。因此,“MEGA-Seiten(梅加页), MEGA-Bände(梅加版)”这些名称是以这种新版型为前提的。

正如 MEGA 编辑组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他们对读书批注再现方法的设想,是以 1979 年开始出版的《伏尔泰的读书批注》(*Corpus des notes marginales de Voltaire, T. 1—8. 1979 ff.*)为范本的。^① 至今为止,读书批注的再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 著作文本和读书批注并行,加以再现;2) 不收入著作文本,单列边注;3) 对边注加以记述。MEGA2 编辑组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考证版”全集》——MEGA (*Marx-Engels,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中,采用 1) 的方法是理所当然的;并且提出以下 5 条原则。^{[5](pp. 41—42)}

1. 必须完美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读书批注。
2. 对于读书批注的再现,因著作文本对于理解读书批注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必须与著作文本联系起来加以出版。
3. 实际排列读书批注时,较之视觉上忠实的位置变化,必须优先体现与著作文本的关系。
4. 读书批注中不同笔迹的材料 (*Schreibmaterialien*) 必须准确地予

① *Corpus des notes marginales de Voltaire. T. 1—8*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79ff.)

(《伏尔泰的读书批注》,表 1—8,柏林:学院出版社,1979 年以后)。柏林科学院、牛津的伏尔泰基金会、列宁格勒的艾尔米塔什图书馆于 1961 年发行了《伏尔泰的藏书目录》(*Bibliothèque de Voltaire. Catalogue des livres. M.-L., 1961*),该旁注本再现了 6814 册书中出现的伏尔泰的所有读书批注,这一出版活动在全集的出版史上影响巨大。MEGA2 Vierte Abteilung. *Marginalien · Probestücke* (梅加 2,第四部分,《旁注与试刊片段》),41* 页。另一方面,对 MEGA 编辑组的读书批注本设想到参考作用的,除了伏尔泰以外,还有 H.-P. 哈尔施蒂克(H.-P. Harstick)的以下文章。*Karl Marx über Formen vorkapitalistischer Produktion. Vergleichende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Grundeigentums 1879—80. Aus dem handschriftlichen Nachlaß, hrsg. und eingeleitet von Hans-Peter Harstick* (Frankfurt/New-York: Campus Verlag, 1977)(《马克思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1879 年至 1880 年对地产历史的比较性研究。选自手写遗稿》,由 H.-P. 哈尔施蒂克编辑并附导言,法兰克福/纽约:大学出版社,1977 年); M. M. Kovalevskij, *Obščinoe zemlevladienie, pričiny, chodi posledstvija ego razloženiya, čast' pervaja* [*Der Gemeindeflandbesitz. Ursachen, Verlauf und Folgen seines Zerfalls. -Erster Teil*]. Unveränderter fotomechanischer Nachdruck der 1879 im Verlag F. B. Miller, Moskau, erschienen Ausgabe mit einer Einleitung von Hans-Peter Harstick (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Verlag, 1977)(《公共地产。其瓦解的原因、过程和结果。第一部分》,为 1879 年 F. B. 米勒出版社版本的影印本,未改动,莫斯科,当前版本附 H.-P. 哈尔施蒂克的导言,法兰克福/纽约:大学出版社,1977 年)。

以报告。

5. 表格形式的读书批注,尤其是注的记号,其相异形态在印刷时虽有固定格式,但必须尽量以(原来)相同的面貌加以再现。

但是,正如前文所述,1990年代以后,随着MEGA的编辑权移交给IMES,MEGA的整体规模被缩减,这一过程中,读书批注的再现不得不首当其冲地承受牺牲的命运。IMES在1991年编辑方针A. III. 1. 4. 1中规定,“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读书批注全部网罗进[MEGA]各部的附录中。至于怎样从学术上来利用这些读书批注,则在规定的时期中再予决定。”随即,IMES决定“用第IV部中的一卷,来记述新发现的贴有马克思恩格斯藏书票的书中所包含的阅读痕迹”。^{[10](p. 19)}换言之,当初预计出30卷的MEGA第IV部第2编,在MEGA2第IV部中被缩减为1卷。在再现方法上,也有悖于“历史性批判性”全集,将中心转移到对边注的“记述”上。这样,虽然在MEGA的编辑权移交给IMES的1990年代前期,MEGA2第IV部第2编(读书批注本)的计划还不甚明确,但是到了1995年,IMES在最终修改制定MEGA出版计划的过程中,还是决定以一卷正规形式的MEGA2 IV/32来刊行,而非在第IV部中另外立编。^{[11](pp. 73\89)}

然而,当初预计出30卷的读书批注本,却以仅只一卷、正规形式的MEGA来出版,这不可不谓是勉为其难。编纂计划的大幅缩减,实际上是强迫MEGA2 IV/32编辑组对资料作出选择。但是,正如IMES新修订的编纂计划中所指出的:无法有一个普遍而又妥当的标准,来筛选资料、决定是否载入MEGA。这一缩小的MEGA——尤其是读书批注本——的发行计划当然很难使所有严肃而执著的学者都感到满意。^{[11](p. 75)}

于是,我们关注到1995年制定的MEGA出版修订计划的2. 4. 5. e项:“该书[MEGA-Band IV/32]包含有目录,对新发现的贴有马克思恩格斯藏书票的书籍加有注释。该书以体系化的形式,网罗了藏书出现的阅读痕迹。对于‘无字’边注(侧划线、下划线、注释记号),会予以叙述;对于‘有字’边注(栏外注、惊叹号、问号),则根据文脉的要求,采用恰当的形式进行编辑。”^{[11](p. 76)}同时,我们也对MEGA2 IV/32的出版寄

予期望。也就是说,MEGA2 IV/32除了加有注释的藏书目录以外,会以何种形态的读书批注本来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阅读痕迹?我们对此非常关心。

四

正如标题《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附评注的已查明藏书目录》(*Die Bibliothek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Annotiertes Verzeichnis des ermittelten Bestandes*)所示,MEGA2 IV/32的先行版不过是马克思恩格斯藏书的加注目录。该先行版将收有马克思和恩格斯阅读痕迹的读书批注本(*Edition der Marginalien*)排除在外,而是收录了分散在世界二十余处的马克思恩格斯藏书1450种、2100册的目录。这些目录复原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部藏书的2/3,体现出规模的宏大。^①

首先,该藏书加注目录按著者姓名的字母顺序排列。若著者姓名不详,则利用书名或册名。其次,目录附有详细的注释,具体描述了个别藏书(完整并具体复原了著者姓名、著作名,卷号以及卷号上附加的标题、出版刊物、出版社、发行日期、页数等),然后叙及原本所藏处、图书馆藏书印、呈赠辞、马克思恩格斯的读书批注、书页是否折角、文本是否受损、藏书人、标题标记、摘录、是否提及等。当然,正如赫克尔所指出的那样,该先行版是在MEGA2还未完成的状态下出版的,在标题(*Title*)的摘录、标题(*Title*)的言及等项中,混杂着MEGA与MEW^②等;另外,早先已经介绍的资料也未加充分整理,有可能引起混淆。但从整体上来看,这些缺陷

① 1979年以后陆续出版了8卷本《伏尔泰的读书批注》,而该先行版的出版让人联想起之前1961年刊行的《伏尔泰的藏书目录》。

② 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40卷,43本书,柏林:狄兹出版社,1956—1968年)(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40 Bände, 43 Bücher. Berlin: Dietz Verlag, 1956—1968)。该普及版著作集以前苏联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俄文版(Socinenija²)”为底本,虽然无法与1975后陆续刊行的MEGA2相匹敌,但目前仍作为涵盖面最广的著作集以资利用。郑文吉,“未竟之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版”,郑文吉,同上书,见373—378页。

有望在最终的完本中得以修正。^①

然而,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应收入读书批注,即有字边注(*sprechende Marginalien, Randnoten*)的文本编该以何种形态出版? 1997年,施佩尔曾就 MEGA2 IV/32 的文本编中怎样编辑有字读书批注提出过策略与范例。他在自己的编辑方针中指出,超过 1300 种的目录(先行版中确定为 1450 种)中,以有字、无字边注形态出现的阅读痕迹计 40000 页,仅有字边注就达到 300 种、3000 页,若将之换算成 MEGA 版型的页数,则有 1000 页;包括文本编的藏书目录,共计 1800 页,因此读书批注本至少要以 2 卷的文本编出版,并在附录编中对无字边注加以全面的记述。^②

然而,这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1983 年估算为 25000 MEGA 页的资料,到了 1997 年,却缩减为 1800 MEGA 页,这如何来说明呢? 更何况 1983 年的《MEGA 第 IV 部,读书批注:试编本》提到,655 种、共 36650 页(1800 MEGA 页)的阅读痕迹已经确认(按主题搜集到的报刊剪报及其中出现的笔迹、对第三者文稿的校注除外)。^{[5](pp. 24—25)} 施佩尔也于 1997 年报告说,1300 种、40000 页上的有字、无字的阅读痕迹已经确认。他更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建议:查验 300 种、3000 页(1000 MEGA 页)上的有字读书

① Rolf Hecker, *MEGA IV/31: Naturwissenschaftliche Exzerpte und Notizen. Mitte 1877 bis Anfang 188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9) (R. 赫克尔:《梅加第 4 部分第 31 卷:自然科学摘录与笔记。从 1877 年中至 1883 年初》,柏林:学院出版社,1999 年); *MEGA IV/32 (Vorauspublikation): Die Bibliothek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Annotiertes Verzeichnis des ermittelten Bestandes*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9). [Rezension]. Bücher Zeitschriften (n. d.) (《梅加第 4 部分第 32 卷(先行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附评注的已查明藏书目录》,柏林:学院出版社,1999 年, [书评],《北德书刊杂志》,4—5 页。他在这里还指出了俄语翻译上的错误。

② MEGA2 IV/32: *Die Bibliothek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Annotiertes Verzeichnis des festgestellten Bestandes und Edition der Marginalien. Textband. Richtlinien und Muster für die Edition der sprechenden Marginalien. Ausgearbeitet: [Richard] Sperl. Juni 1997; Bestätigt in der Beratung vom 10. September 1997 [MS]. I. Allgemeine Ausgangspunkte* (梅加第 4 部分第 32 卷: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附评注的已确定的藏书目录与经过编辑的旁注。文本卷。旁注编辑的原则和样本。编辑:[理查德]施佩尔,1997 年 6 月;在 1997 年 9 月 10 日的[手稿]咨询中得到确认。第一节:一般的出发点)。笔者在此向 MEGA 编辑组致以谢意,使笔者得以将该稿用于本文的写作,同时也感谢仙台组的大村泉教授。

批注,将之编辑为2册的文本编。^①可是,当编辑方针经历了以上变动,我们又怎样才能从现实上接受读书批注的巨幅缩减呢?这使我们感到无措。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消除心中的疑问——MEGA作为“历史性批判性”全集,却以如此简拙的方式处理读书批注,这能体现原来的编纂意图吗?能充分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吗?如果说读书批注本收纳的资料并非全部,而只是有限的一部分,那么选择的标准又该如何?是否会如IMES的MEGA2编辑组所担心的那样,在选择时采用权宜之计?^{[11](p.75)}再从MEGA2 IV/32的结构来看,根据目前的作业准备过程推断,其结构——1册藏书加注目录、2册文本编构成读书批注本,以及1册附录编——会异常窘迫。

笔者并不想在这里纠缠于IMES和MEGA编辑组对读书批注本采取的不自然的、过分紧缩的编辑方式,而是期待着是否能够率先推进目前正在着手进行的MEGA数据库作业。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BAW)MEGA工作组的赫勒斯曾经指出,1990年之后的MEGA面临内容、组织,以及同样重要的技术,这三方面结构调整的挑战。^{[12](p.4)}1990年代以来,电脑的使用得到普及,MEGA工作组不仅将电脑积极地引入编纂工作,而且对之作了进一步的发展;1998—1999年间,同时发行了EDV(电子数据处理版)支援下的MEGA版(*die elektronische Datenverarbeitung-gesetzt Edition*)。换言之,他们在1993年修订的编辑方针中已有所阐明,强调了以下原则:第IV部不仅要马克思恩格斯所作的摘录笔记和各种摘抄、记录、备忘录,还要对印刷物和手稿中出现的二人的读书批注以及其中的划线,考虑利用现代技术的出版方式,采取恰当的方法予以网罗;^{[10](p.19)}同时报告说,1998至1999年正在进行电子化运用的先导研究。^{[13](p.60)}这也就是说,他们关注到整个MEGA的分主题综合编纂、综合目录、马克思恩格斯藏书书目的电子化,并正在着手准备。现在MEGA编辑组正在具体探讨的,不仅是1998年之后出版的MEGA,还有之前已出版的MEGA的

① Richard Sperl(R.施佩尔),同上文(1997),见注37。

CD-ROM化。但对于将电子化、数字化工作扩展到读书批注本的问题,却还未有提及。^①因此,笔者要在这里强力推举 CD-ROM 或 DVD-ROM 化的方法,来挽救 MEGA 第 IV 部第 2 编读书批注本的出版计划,其出版计划因数量的庞大和出版经费的过多而大幅缩减,已至形同虚设的地步。也就是说,既然 MEGA 第 IV 部第 2 编计划已经制定,而且目前已经进行了包括文字解读在内的相当程度的编纂工作,那么可以考虑采用 CD-ROM,而非用正式印刷的 MEGA 来出版。从现在的技术水平来看,这不是没有可能的,而且从出版经费这一最大障碍来看,比起采用正式印刷的 MEGA 来,CD-ROM 可以较为低廉的价格实现出版的可能。^②这一读书批注本若能以 CD-ROM 的方式完美地再现和出版,则不仅可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提供划时代的转机,而且也将为 19 世纪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作出重要的贡献。

笔者对于电脑技术问题,完全是一个门外汉。这里,笔者以一个门外汉的身份,欲就目前正在准备完本的 MEGA2 IV/32 的出版,提出以下几点愚见:

1. 目前作为 MEGA2 IV/32 的先行版出版的藏书加注目录应该做得更为详细、更为精确。对于各藏书,最好像《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1967)》那样,考虑链接读书批注的方法。这是因为加注藏书目录在即将电子化的读书批注本中,起到找寻二人阅读痕迹的向导作用。

2. 目前 MEGA 工作组正在进行的 IV/32 的读书批注本作业仍然继续,该作业在结构编纂上最好以读书批注本的 CD-ROM 化为前提。

3. 提议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留有边注的所有藏书以 CD-ROM 或

① 对 MEGA 电子化的讨论,参见 MEGA-Studien 1999(《梅加研究》,1999 年)特辑中刊载的论文。重点见 Jürgen Herres(J. 赫勒斯),上文,3—12 页;Gerald Hubman(G. 胡伯曼),上文,53—63 页;见 Regina Roth,“Marx verlinkt. Kritische Bestandsaufnahme und mögliche Perspektiven,”MEGA-Studien,1999(R. 罗特:“链接马克思。对当前的评述以及可能的展望”,《梅加研究》,1999 年),64—90 页。

② 今天的观点认为,电子编辑版的制作已不再是专家们的专业技术了。换言之,这是编辑工作普遍而必需的一部分。Gerald Hubman(G. 胡伯曼),上文,60 页。

DVD-ROM方式制作。这样,我们可以准确查找到有字边注和无字边注的所在之处。且按照一系列顺序,点击特定处出现的边注,则出现编者对之的叙述或有文字的注释。

4. 对于藏书中有字无字的划线或读书批注超过一定标准的书页,可考虑附加照片版。

5. 因那些留有二人阅读痕迹的藏书,如今都已成为珍稀本,无法阅读到,所以若采用 CD-ROM 来再现,将有可能为 19 世纪史或思想史的研究开辟出新的领域。

参考文献:

[1] MEGA2 IV/32[M],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9

[2] [韩]郑文吉,转换期的局面:苏东剧变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续刊工作[A],载[韩]郑文吉,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与早期著作[M],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94

[3] MEGA1 I/1, 2[M], Berlin: Dietz Verlag, 1985

[4] [韩]郑文吉,未竟之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版[A],载[韩]郑文吉,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与早期著作[M],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94

[5] MEGA2 Vierte Abteilung, *Marginalien • Probestücke* [M], Berlin: Dietz Verlag, 1988

[6] MEGA2 Proband, *Editionsgrundsätze und Probestücke* [M], Berlin: Dietz Verlag, 1972

[7] Karl Marx, *Notizen aus den Jahren 1844—1847* [A], MEGA2 IV/3. *Karl Marx, Exzerpte und Notizen. Sommer 1844 bis Anfang 1847* [M],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

[8] Hans-Peter Harstick, *Zum Schicksal der Marxschen Privatbibliothek* [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XVIII [M], 1973

[9] Heinz Stern/Dieter Wolf, *Das große Erbe. Ein historische Reportage um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M], Berlin: Dietz Verlag, 1972

[10] Hrsg. von der Internationalen Marx-Engels-Stiftung, Amsterdam, *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M], Berlin: Dietz Verlag, 1993

[11] Jacques Grandjonc/Jürgen Rojahn, *Der revidierte Plan d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A], *MEGA-Studien* [M], 1995

[12] Jürgen Herres, *Einführung. Die MEGA im Computerzeitalter. Rückblick, Stand und Perspektiven* [A], *MEGA-Studien* [M], 1999

[13] Gerald Hubman, *Digitale Editionen. Editionsmethodische Anmerkungen zum derzeitigen Stand und mögliche Optionen für die MEGA*[A], *MEGA-Studien*[M], 1999

(赵莉 译,单位: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方向红 校,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韩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以著作的翻译和研究现状为中心^①

[韩]郑文吉

要想理解韩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他们的著作的翻译状况,首先要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以及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韩国社会所具有的总体意义。

朝鲜社会在进入 20 世纪以后,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后,在持续了 30 多年之后,殖民地的状况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告终。但是,以盟国的胜利而告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给朝鲜带来解放,美国和苏联对朝鲜半岛进行了分割占领。其结果是使南北朝鲜在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在冷战体制的最前线相互对峙。而且,这样的对立具体归结为以马克思恩格斯为思想始祖的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的对立。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在朝鲜半岛的北面受到尊敬和礼拜,而在南面则遭到排斥和禁止,被人们敬而远之。

南北朝鲜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发展为 1950 年的朝鲜战争,那样的对

^① 本文原为韩文。中译文依据刊载在日本的《经济》杂志 2003 年第 5 期的立命馆大学故中村福治教授的日译文译出。——译者注

立即便在 1989 年拆除“柏林之墙”，1991 年苏联解体，资本主义获得全胜，以及在“世界警察美国”主导的当今的世界秩序之下也依然没有消除。结果是以 38 线为界的南北朝鲜之间一触即发的军事对峙的状态现在也没有克服。处于这种状态下的南北朝鲜的知识分子要想获得思想和研究的自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北朝鲜，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被强制进行彻底的教条主义解释；而在韩国，从一开始就对接触以及研究这种思想的行为进行了彻底的禁止。换言之，在朝鲜战争以后的 30 多年中，在韩国，独裁右翼政权以战后重建和经济开发为国家目标，在源头上对就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所展开的探讨进行了封锁；而在北朝鲜，在一党独裁体制下，只能被强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主义的解释。再加上从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朝鲜化的名目下，在就各种思想进行论述时，金日成主席的“主体思想”占中心地位，所以马克思主义只能起到一种装饰品的作用（本文以概观韩国的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为目的，因此北朝鲜在这方面情况不在介绍的范围之内）。

韩国社会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探讨的梗塞状态在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之后，逐渐被打破。特别是韩国在几个社会指标上针对北朝鲜处于相对优势，思想自由和求知欲望作为反体制运动的一个环节，越过法律的蔽障而爆发出来了。在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之后，在共产圈的“全面解体”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实际上不再受到什么制约，因而得以广泛展开。但是，在规定以称赞、鼓舞反国家团体“为目的的出版、进口、复制、持有、搬运、颁布、销售以及获得文件或图书”将受到处罚的“国家保安法”依然存在的现实中，不得不说韩国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呈现出的是一种非正常的状态。^①

二

朝鲜人对共产主义的关注和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当初的关

^① 1991 年 5 月 31 日修改的“国家保安法”第 7 条第 1 项以及第 5 项。

注与独立运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居住在俄国以及日本的朝鲜人试图通过布尔什维克革命理念以及苏联的援助来实现祖国的独立,或者通过在日本国内的激进运动来表示对日本民族的不满。^①但是,直到1945年,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关注和接触方面,可以说韩国国内的知识分子与那个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大的差异。总而言之,殖民地时代的激进朝鲜知识分子的学术关注与日本激进知识分子是一脉相通的。但是,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的学术探讨之中,最终包含着他们对祖国朝鲜独立实践的关注。可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朝鲜的解放政局下广泛开展的左翼运动以及在分裂之后去了北朝鲜的知识分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关注与日本帝国主义时代的激进分子运动对实践的关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但是,在1945年北朝鲜和南朝鲜各自成立自己的政府以后,在韩国彻底禁止谈论、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1950年,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发生了长达3年之久的内战。在从那个时候起一直持续到现在的不是停战而是休战的状态之下,将探讨研究这些著作以及思想的做法本身视为对敌方有利的行为的“麦克阿瑟主义”得以蔓延。因此,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只能为各级学校的反共教育服务。因为大学里的讲义也是政治教育的一环,所以在解释上的歪曲甚为严重。原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就缺乏精通这个领域的专家,而这样的倾向又使得本来就所剩无几的潜在研究人员沦落为反共教育的中坚人物。再加上对被定为禁书的“理念书籍”的各种资料的彻底管理在源头上封锁了学者接触第一手、第二手资料的可能性,所以剩下的少数学者要不借助能够利用的极少的资料来编写反共教材,要不满足于编写图式化地列举政

① 斯卡拉皮诺、李庭植著:《韩国共产主义运动史》1(韩弘九译,首尔,石枕出版社,1986年)、金俊烨、金昌顺:《韩国共产主义运动史》1、2(首尔,清溪研究所,1986年)。另一方面,最近,根据间接资料确认,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在1921年已经有3种韩译本。即(1)吕运亨在1921年5月以前从英文版翻译,提供给上海的“韩人共产党”,印了3000册;(2)同年9月,首尔的“朝鲜共产党”从日文版翻译,印了85册;(3)日期不能确定,同年莫斯科的“韩人共产党”从俄文版翻译,印了1000册。参见崔甲寿论文(1999年,第23—24页的注1)。以上的译本目前在国内尚未发现,而只能通过第二次资料来确认。作为象征韩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事情,非常值得关注。不消说,努力发掘这样的资料在学术史上来看,也是必要的。

府的教条性主张的小册子。^①

因此,在1980年以前的这种学术上的不毛之地上出版的梁好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批判篇)》(1963年)、郑文吉的《异化论研究》(1978年)以及林元泽的《第二资本论》等等特别值得关注。梁好民的著作是在以反共主义的立场来谈论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之风蔓延的时期,在客观学术的立场上进行研究的难得的著作,成了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学术财产。而郑文吉和林元泽的著作,前者是对马克思的初期著作,特别是《经济学哲学手稿》,^②后者是对《资本论》进行专题研究的韩国最初的理论专著。

三

可以说在1980年代,韩国的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著作出版迎来了一个转机。直到1970年代,韩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反体制运动圈只能通过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从属理论,以及周边资本主义论来迂回地接近马克思主义。但在1980年初,以政府的极其象征性的措施,即公开解禁在那以前被归定为“左倾”理念书籍以及一部分外国书籍为契机,迈出了克服以往社会禁忌的第一步。^③

在1982—1983年,从理念书籍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了的一部分书籍被翻译出版。同时,在1984年,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研究论文集《马克思主义百年——思想和变迁》得以出版。由李洪九主编的此书分为“接受”、“改造”以及“在现代的展开”三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收录了对青年黑

① 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直到1980年代末,在大学图书馆都被列入禁书目录中,这是显示这个时期的思想不健全性的象征性事件。

② 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编者注

③ 1980年,在政府的默认之下,翻译得以进行。在刚开始解禁的1982—1983年翻译出版的“理念书籍”有:巴林《卡尔·马克思及其生涯》(福龙译,首尔,平民社,1982年);塔克《卡尔·马克思的哲学和神话》(金学俊、韩明和译,首尔,HANGIL出版社,);马克雷朗《卡尔·马克思的思想》(申铉译,首尔,民音社,1982年);阿比内里《卡尔·马克思的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李洪九译,首尔,喜鹊出版社);博巴《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李汉龟、李贤明译,首尔,民音社,1983年)等等,大都是稳健的入门书。特别是博巴的书甚至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格尔派(郑文吉,1984年 a、b)、历史唯物主义和分工(秦锡用,1984年)以及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论(卢在凤,1984年)、政治理论(李洪九,1984年)、技术经济论(朴宇熙,1984年)、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金弘明,1989年)等等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我们之所以特别关注韩国最初的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论文集,不仅是因为其成果很出色,还因为从中能够确认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成为狂热的麦克阿瑟主义牺牲品的、针对主流学界的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差不多在经历了一代人的潜伏期之后,勉强保住了最小限度的命脉。

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韩国,掌握针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以及研究主导权的与其说是学界主流的大学教授,不如说是反体制运动圈。在主流学界维护既得的研究优势,通过对整个共产主义以及共产圈进行研究,满足于逐步积累学术研究成果的时候,以反体制运动圈以研究会为中心,致力于翻译共产主义书籍并就之展开理论探讨。

上世纪70年代的高压维新政权将许多不适应体制的知识分子从体制中彻底清除,把他们驱赶到反体制一方,并使他们孤立。因此,除了屈辱性地投降以外别无其他方式与体制妥协的那些反体制知识分子在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成为反体制运动以及激进研究会的核心,引导了进步的社会运动和学术活动。特别是当他们看到1980年的“首尔之春”和光州流血事件成为建立另一个独裁政权的借口的时候,他们对缺乏合法性的新独裁政权从正面进行了挑战,作为其活动的理论基础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因此,这些进步势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完全没有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认,是独自展开的,在那里包含着对政治、社会现实的变革这样的革命情绪。

因此,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这些反体制运动圈所接受的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是革命教条路线的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北朝鲜的主体思想。在运动圈中,一方面与这些路线相关的许多书籍、论文、小册子等被翻译、复制并流通;另一方面,人们热心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著作。不过,只在反体制圈内流通的这些经典著作的译本得以公开出版,是在1987年的大规模反政府游行以市民的胜利而告终的“六·二九宣言”以后

的事情。因此,在1987年以后的几年中,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版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这只有在这样的政治社会背景下才能理解。

四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韩译本,除了《共产党宣言》(1945年)、《雇佣劳动与资本》(1946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947年)、《反杜林论》(摘译,1948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46年)、《资本论》(摘译,1948年)等等那些在独立后出版的少数著作(大部头的著作则是摘译)以外,基本上集中在南北分裂40年后1987年之后的三四年中。但是,这样集中在1987年以后几年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韩文版翻译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翻译对象的选定是根据运动圈的实践需要而随意进行的。成为翻译对象的著作与其说是为了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整体形成,不如说是出于理解运动圈的理论以及教条理论的现实必要性。《经济学哲学手稿》(4种)、《共产党宣言》(12种)、《雇佣劳动与资本》(6种)、《法兰西阶级斗争》(5种)、“1850年3月致中央委员会的呼吁书”(4种)、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5种)、“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5种)、“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5种)、《工资、价格和利润》(7种)、《法兰西内战》(6种)、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5种)、《哥达纲领批判》(包括相关文献,9种)、《反杜林论》(4种)、《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7种)、《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4种)等等可以说是代表性的事例。

第二,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时期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底本和译者所具有的特征。首先,相当部分译本没有说明是从什么底本翻译过来的。译者根据需要,列举了德文原文(主要是从MEW)以及英文版(莫斯科的进步出版社等)。但估计在不少情况下,参照了日译本。在这种状况下的韩国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不是在周密的计划下进行的,而是根据眼前的需要和一时的方便。另外,译者也不是专门的学者,而只是大学本科或者研究生毕业程度的运动圈内的理论家,可以确认参加翻译工作的是一些个人或小组。所以,译文质量因为译者水平高低的不同而

存在很大的差异。可以说,这是韩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一大特点。

第三,在从这样的脉络来看的时候,在韩国社会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史上划时代成果之一的《资本论》全3卷(1989—1990年)作为翻译底本所使用的不是德文版,而是以本·福凯斯(Ben Fowkes)的英译本为底本,并参照了日译本。

第四,在韩国没有韩国人自己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专集、选集。基于一定的主题以及观点来编辑涵盖马克思恩格斯全部著作的专集、选集需要对他们的著作以及思想有深入的理解和很高的眼光。因此,如果对韩国的研究史进行考察的话,像这样缺乏专集、选集的现状或许是顺理成章的。而且,在理解以及眼力方面的这种缺陷也从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随意摘录的作法中如实地体现出来了。

许教真的《法国革命三部曲》(1987年。1991年,又出版了林志弦、李钟勋的译本)、金浩均编辑的《经济学笔记》(1988年)、赵金安编辑的《女性解放论》(1988)、韩哲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关于党》(1989年)、松树编辑部的《无产阶级的党纲领》(1989年)、讲座编辑委员会的《劳农问题和农民问题》(1989年)和《武装起义》(1989年)、金正洙编辑的《住宅、土地论》(1990年)、金成汉编辑的《农业论》等便是这样的例子。那些译者估计是根据需要,从MEW以及英文版、日文版中选择一些文章翻译过来的。因此,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只能依靠外国人编辑的不同主题的专集、选集。在这一点上,权明植翻译的日本广松涉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论》(1988年)、莫斯科外语出版社的《殖民地论》(1989年)、原苏联科学院的《马克思恩格斯教育论》等等在一段时期,其有效性得到了认可。

进入1990年代之后,原东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6卷本以《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作选集》(1991—1997年)之书名翻译出版,这在韩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史上是划时代的事情。正如在前文中指出过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是以市民针对军事独裁进行抗争取得胜利的1987年为起点而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版的。因此,他们的主要著作除了马克思的学位论文及其准备笔记、为了撰写《资本论》的研究笔记和书信集以及各种摘录笔记以外,相当部分

都被翻译过来了。在没有韩文版全集以及整体性选集的情况下,学者和读者难以把握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貌。在这样的状况下,这一《著作选集》的出版对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学习具有重要的意义。^①

在这样的关联中,在此要指出的是,郑文吉发表了介绍上世纪 20 年代以来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的历史事实,以及《全集》的具体编辑方式和内容的论文(郑文吉,1991 年,1992 年)。这两篇论文对 1850 年赫尔曼·贝卡(Herman Backer)以来的《全集》出版史从整体上进行了眺望,不仅对旧 MEGA、MEW 以及新 MEGA 版的出版经过,而且还对在 1989 年东欧瓦解以后,以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 IMES)为核心的新 MEGA 版继续出版事业进行了介绍。这两篇论文先驱性地介绍了这个领域的学术活动的情况。

五

1998 年值《共产党宣言》发表 150 周年。韩国的报纸以及杂志对在法国、德国举行的国际性纪念活动进行了报道。但是,韩国的进步阵营以及杂志未能准备任何纪念这一历史性大事的活动和专辑,那一年就过去了。只有一个进步研究小组翻译了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集,并以《宣言 150 年之后》的书名出版。

我们从迎来《共产党宣言》发表 150 周年,韩国学界的进步阵营没有主办任何学术活动这样的现状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能力。韩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成果自 1980 年代以来,在各种学术杂志和人文社会科学相关杂志上发表。但是,其中高举激进派旗帜,在 1980 年代后半期创刊的《产业社会研究》(不定期,1986 年)、《经济与社会》(季刊,1988 年,现在已经发行了 37 期)、《现实与科学》(1988—1991 年,已发行 10 集)、《社会经

^① 估计朴钟哲社出版的基于新 MEGA I/2 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91 年)和悦音社出版的基于 MEW Band I 的《马克思初期著作——批判和言论》(恩格斯的论文除外)(1996 年)是考虑到了全集的单行本。但是,这样的计划,在前者被 6 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集》(1991—1997 年)所继承,后者只表明了将继续出版的含糊的期待就中断了。

济评论》(1988年创刊,一开始是年刊,从1999年起改为半年刊,截至2000年4月,已发行18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杂志《理论》(季刊,1992年创刊,截至1997年夏季已发行17期)当中,一部分刊物在上世纪90年代因为围绕运动的方向而产生意见分歧以及经费上的原因而废刊,或者陷入发行困难的状态。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研究成果的发表或讨论的良好平台的《创作与批评》(在1985年连载了关于社会构成体的论争,在1988—1989年连载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争)、《文学与社会》(1991—1996年连载了郑文吉的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成果),以及一年发行两期的《社会评论》(1991年发行了“分析性马克思主义”特辑)等等刊物在近几年,这一类主题的论文日趋冷清,没有发行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这一历史性大事的专辑,这些可以说是显示韩国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降温的事例。

当然,这些杂志的发行中断以及编辑对这类主题的关注度的降温虽然也意味着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关注的降温,但这在另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显示了韩国的研究水准本身的极限。换一句话说,这是关系到韩国学术界是否确保了能汇集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的论文,并将之以特定杂志专辑或者单行本发行出版的客观的学者的根本问题。这是因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运动圈内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基本上都是与对政治、社会现实的革命变革这样的实践课题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学术探讨总之是薄弱的。通过这样的事实,我们足以确认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十余年间在韩国展开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研究成果是多么缺乏底气(在只以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和翻译为对象的本文中,为了方便,笔者想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撰写年代顺序进行整理。另外,单独对与《资本论》以及研究笔记相关的经济学研究成果进行叙述)。

作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初期著作以及思想相关的研究,一方面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青年黑格尔派在思想史上的联系进行了探讨(郑文吉,1980年,1981年,1997年),致力于通过与施蒂纳和鲍威尔的关联来把握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在思想上的关联(郑文吉,1981年b,1982年,1984年

a, 1984年b);另一方面最近对马克思的学位论文给予关注的青年学者的成果受到了人们的瞩目。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以康德的要求思维方法论(*Postulats Denkmethode*)来探索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哲学的金辰的《卡尔·马克思和希腊哲学》(1990年),从共同体的人类观和伦理的政治理念的视角进行研究的朴珠媛的论文(1997年),以及从阿尔都塞和德勒兹出发,对反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整理的高炳权的论文“马克思和伊壁鸠鲁”(1997年)等等。另外,自1932年在旧MEGA I/3第一次公开之后,成为马克思对人类主义和异化论进行论述焦点的《经济学哲学手稿》被韩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者广为研究、引用。通过对手稿进行考证,从文本批评的观点对撰写顺序和撰写时期(*Datum der Fassung*)问题的最近论证争进行论述的郑文吉的论文(郑文吉,1987年a)是韩国最初对马克思的手稿进行研究的成果。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共同撰写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他们青年期的唯物主义观点第一次具体化了。郑文吉从1990年起对该书第一章“费尔巴哈”的成立史从进行了深入的文献学研究,并一直持续到现在(郑文吉,1990年,1991年a,1993年,1994年,1996年b,1996年c,1998年,2001年)。但是,《共产党宣言》虽然有多种韩译本,在这方面却没有积累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这与对三月革命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活动基本上没有展开具体研究这样的状况也是有关联的。不过,在这里有必要提到的是,在迎来《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的第二年即1999年,在《进步评论》创刊号^①上发表了崔甲寿的论文“《共产党宣言》的现代意义”(1999年),该论文阐明了撰写《共产党宣言》当时的德国的落后现实和在未来应该到来的革命的特征。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后期著作中,被集中翻译、介绍的有关于法国革命的3篇论文:“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法兰西内战”(1871年)以及与德国革

^① 1997年夏季停刊的这一杂志经过两年多的休刊,在1999年秋又重新组织原来的阵营,以《进步评论》的名称重新出发。该刊截至2002年末发行了14卷。

命相关的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1852年)等,与革命相关的著作引人注目。这样的情况表明这些著作的翻译、介绍与当时的韩国激进主义者的运动倾向紧密相关。不过,对于那些革命史的学术研究却极少。将马克思关于“土地国有化”问题的短论文(1872)和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的论文(1872—1873)以《住宅、土地问题》这样的专集出版,《哥达纲领批判》也有多种译本,但却完全没有对那些进行详尽解说和学术研究。可以说,这样的事实一方面体现了激进运动所关注的方向,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那些运动的急功近利性。在这里,我们只提及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进行了详尽解说的崔章集的“独裁主义的展望和理论”(1990年)。另一方面,恩格斯的后期著作在1980年代基本上都被译成了韩文。例如有《反杜林论》(1876—1878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等等。但是,在对这些著作的扎实研究以及恩格斯的学术成就、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等方面,除了金弘明的研究(1984年,1993年a)以外,可以说没有特别值得一提的。

下面要介绍的,不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某部著作,而是以他们的思想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在韩国,最受关注的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民族问题的内容。

首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1980年代以后,在进步学界被广泛论述,并成为论争的主题。特别是1988—1989年由季刊杂志《创作与批评》所主导的关于历史规律性的论争是1985年由登载在《创作与批评》复刊号上的朴玄探和李大根之间的论争所触发的关于社会构成体论证的延续。^①那

① 朴玄探:“关于现代韩国的性质和发展阶段的研究——围绕韩国资本主义的性质的从属理论批判”,《创作与批评》,不定期刊第1号,1985年,第301—345页;李大根:“关于韩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收录于上书,第346—373页;朴玄探等《韩国社会构成体论争》I—IV,首尔,竹山,1989—1991年;郑文吉:“进步主义的接受和展开——1970年代以后韩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和研究动向”,参见金炳冀、郑文吉等编《当今韩国的知性——解读其历程:1975—1995》,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95年,第352—370页,特别是362—366页。

场论争在扩大和加深韩国社会对马克思理论理解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柳在建,1988年 a,1988年 b;金光铉,1988年;李青山,1988年;具承喜,1989年;李基弘,1989年)。而且,在这一论争的延长线上所展开的林志弦(1988年)、秦锡用(1991年)、柳在建(1993年)、姜声湖(1993年)等人的研究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重要成果(尹亨植,1994年;李世永,1994年)。

另一方面,面临南北分裂现实的韩国激进知识分子希望克服这种状态以实现统一,他们试图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中找到解决办法。因为《共产党宣言》中有“无产阶级没有祖国”这句话,所以有人认为马克思将阶级置于民族之上。但是,阶级和民族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把握历史时有机的构成部分。因此,基于他们的理论来解决民族问题,对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韩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样的脉络中,朴鲁英所提出的问题(1988年)以及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问题论述的研究(1990年,1992年,1994年)可以说是重要的研究成果。

除了这些主题以外,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思想中体现出来的财产问题(金弘明,1993年 b)、平等(朴虎声,1994年)、阶级问题(徐宽模,1992年),以人性论为中心的各种哲学论题(金在基,1992年;金昌镐,1991年;梁承兑,2000年)、政治理论(崔亨益,1999年;朴珠媛,2001年)、国家论(金世均,1992年;金弘明,1993年 c)、文化理论(郑楠泳,1992年;李春吉,1993年;朴雪虎,1995年)等,展开了多种多样的论述。不过,这方面的研究大概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出高水平的成果,因为在欧美各国接受了训练的青年学者以及在国内获得学位的研究人员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推进在上述各方面的扎实研究。特别是在考虑到前面所列举的韩国学界的成果大部分是青年学者的学位论文这一事实的时候,可以说那样的可能性很高。

最后,我们要对与《资本论》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在韩国社会,《资本论》与《共产党宣言》是将理念书籍分类为禁书的马其诺(Maginot)线。1987年出版社不顾违反“国家保安法”,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的第1分册。但该书马上被禁止销售,而且发展为出版社经营者被立案拘捕的

政治事件。但是,以这次事件为契机,1989年以来,《资本论》不再属于禁书,变得可以自由出版了。正如在前文中提及过的那样,以福克斯英译本为底本的《资本论》全3卷由金秀行翻译(1989—1990年),基于MEW译本的第一卷由金永敏,第二、第三卷由姜信俊翻译(1987—1990年),而且金浩均在2000年翻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纲要》(全3册),相当于《资本论》第4卷的《剩余价值理论》则影印了1966年在北朝鲜发行的版本,第一、第二部在1989年出版。而且,由斯卡姆巴克斯(Hamnes Skambarks)编辑的《关于资本论的书信集》于1990年出版。因此,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即便在韩国,学习、研究《资本论》的客观土壤也已经形成了。

但是,真正研究《资本论》的学者却非常有限,我们能够列举的研究成果很少。在这样的状态下,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韩神大学研究经济学科的教授为中心的韩神经济学研究所的《经济学讨论》是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①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难得的是,发表了一些与《资本论》相关的研究成果(金秀行,1993年,1994年;金成九,1994年;郑相敦,1996年),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韩国社会经济学会为了摸索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出版了《价值理论论争》(1995年)(柳东民,1995年a;朴光锡,1995年,李采彦,1995年;赵元熙,1995年;洪勋,1995年),季刊杂志《理论》发行了特辑“资本在今天的意义”,研究者呈现增多的势头(金成九,1994年;金秀行,1996年、1997年;赵铨洙,1996年、1997年)。但是,关于《资本论》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与其他国家为数众多的情况相比,我们只能列举金秀行的《资本论研究》(1988年)以及他的《资本论现代的意义》(2000年)、郑云暎的《劳动价值理论研究》(1993年)、洪勋的《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构造和局限》(1994年)等等最近的研究成果。不过,韩国的《资本论》研究只以论文以及论争的形式体现出来,以系统的专著的形式加以具体化估计还需要一

① 在韩神大学经济科学研究所发行《经济学讨论》上,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理论相关的成果有:郑云暎(1985年a,1985年b,1986年)、金秀行(1986年a,1986年b,1986年c)、姜南勋(1986年)。在检索这些资料的时候,得到了该研究所的中惠英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另外,在这些资料当中,郑云暎的1985年a、金秀行的1986年b、姜南勋的1986年收录在韩神经济科学研究所编《价值理论》中。

段时间。而且,那些学者大部分都是在欧美以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而获得学位的人,在国内接受训练的学者在 1990 年代后半期才出现。

而且,就韩国的《资本论》研究,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与计划在 2006 年完成刊行的新 MEGA 的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工作)相关的研究成果完全没有出现。实际上,由德、俄、日的学者编辑的新 MEGA 部分出版了《资本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撰写该著作而做的大量准备工作(*Vorarbeiten*),另外也根据这些资料陆续发表了新的研究成果,但韩国学者现在仍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资料和研究成果。

像这样,对新发掘出来的资料以及具体文本缺乏关注并不只限于研究《资本论》的学者。可以说,这种状态说明韩国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以及思想的研究现在仍然集中在宏观方面,而没有获得理论的严谨性。

六

正如在前文中指出过的那样,韩国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和对他们的思想研究是 1980 年代中期之后的最近的事情。而且,最近翻译以及研究与其说是学术研究的对象,还不如说是与政治、社会的现实变革这样的实践的,而且是党派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期待在韩国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进行系统编辑和完美翻译还为时尚早。而且,关于他们的著作以及思想的学术的、客观的研究成果估计在不久的将来还难以出现。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在共产主义国家的瓦解以及意识形态的降温明显体现出来的现实状况下,这样的事实会更加显而易见。尽管如此,在韩国,这个领域的研究今后还会持续下去,另外研究成果也会由积累,理由有以下两点:

第一,1945 年二战结束后,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分裂状态虽然是国际政治的产物,但在背后有由来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共产主义思想作为一个尺度在起作用。因此,韩国知识分子要想正确理解分裂 50 多年的历史,进了为了准备应对统一后的政治、社会的现实,不可避免地要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

第二是学者的问题。在上世纪 80 年代形成的运动圈势力的核心,积极地参与理念书籍的翻译和学习的许多人成为这样的学者的潜在的供给源。因为对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韩国社会的独裁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深化进行抵抗的运动圈知识分子以及通过在国外留学来对那些矛盾进行学术探讨的一群知识分子现在成了韩国学界的中坚力量。当然,我们也看到,因为东欧共产圈的没落所带来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对这些出身运动圈的知识分子正起着消极作用这一事实。但是,上述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重要成果大部分是青年学者的学位论文,或者是在国外接受了这个领域专业训练的学者的钻研成果,从这一点来看,在确保这一领域的研究人员方面并非全都是消极因素。

最后,要谈一谈改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思想的研究环境的问题。限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而言,在“国家保安法”依然存在的韩国社会,对于这一研究的法律上的制约并没有完全消除。但是,因为共产圈的瓦解所导致的意识形态对立的钝化,以及在南北朝鲜各项指标的比较中韩国呈现优势,使得体制方面以及保守派产生了一种自信,觉得即便在这个领域公开进行讨论、研究,也不会对他们造成威胁,这在客观上使研究环境得到了决定性改善。特别是在金大中政权所推行的对北朝鲜的“阳光政策”和 2000 年 6 月在平壤公布的金大中与金正日的“南北共同声明”明确了与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的研究在今后不存在任何障碍这一点。因此,因为全球化时代的信息实时共享和国际学术交流的扩大,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韩国学者今后将不再会在接触研究特定资料以及发表成果方面受到制约。这样的事实使我们对今后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充满期待。进而要指出的是,现在面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不断蔓延的现实,我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将被人们刮目相待也充满了期待。

但是,在韩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现在致命的弱点是应该结集、统合这个领域的学者和资料的组织以及研究机构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对此,韩国的政治现实应该负有相当的责任。不过,这个领域的学者必须建构横向的网络,通过相关文献数据库来实现资源共享,以开展比较多样化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韩]姜南勋,关于转型问题的重新探讨[J],韩神经济科学研究所《经济学讨论》第 860 号,1986
- [2] [韩]姜声湖,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发展和变迁论的研究[D](高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3
- [3] [韩]庆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马克思的方法论和价值论[C],首尔: HANUI 出版社,2000
- [4] [韩]高炳权,马克思和伊壁鸠鲁:反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J],进步评论(创刊号),1999
- [5] [韩]具承喜,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论批判——以金光铉、李青山的论文为中心[J],创作与批评,第 17 卷 3 号,1989
- [6] [韩]金光铉,历史规律和自由主义——读柳在建先生的“历史规律论和历史学”[J],创作与批评,第 16 卷 2 号,1988
- [7] [韩]金成九,关于《资本论》中的垄断的理解[J],理论,第 10 号,1994
- [8] [韩]金世均,国家、大众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J],理论,第 1 号,1992
- [9] [韩]金秀行,利润率的降低的规律和恐慌[J],韩神大学经济学研究所《经济学讨论集》第 8603 号,1986
- [10] [韩]金秀行,关于特别剩余价值[J],韩神大学经济学研究所《经济学讨论集》第 8604 号,1986
- [11] [韩]金秀行,剩余价值、利润以及平均利润[J],韩神大学经济学研究所《经济学讨论集》第 8605 号,1986
- [12] [韩]金秀行,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J],韩神大学经济学研究所《经济学讨论集》第 8610 号,1986
- [13] [韩]金秀行,资本论研究[M],首尔: HANGIL 出版社,1988
- [14] [韩]金秀行,《资本论》为什么不全面? [J],理论,第 3 号,1993
- [15] [韩]金秀行,《国富论》和《资本论》之间的理论继承和断裂[J],理论,第 9 号,1994

[16] [韩]金秀行,《资本论》的金币和现在的中央银行券[J],理论,第16号,1996

[17] [韩]金秀行,《资本论》的现代解释[M],首尔:首尔大学出版社,2000

[18] [韩]金秀行、申贞完编,现代马克思经济学的诸争论点[C],首尔:首尔大学出版社,2002

[19] [韩]金在基,哲学、科学、阶级斗争[J],理论,第2号,1992

[20] [韩]金辰,卡尔·马克思和希腊哲学[J],韩国神学研究所,1990

[21] [韩]金昌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人性论[D](首尔博士学位论文,1991年以同一书名由竹山出版社出版),1991

[22] [韩]金弘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A],李洪九编,马克思主义百年——思想和变迁[C],首尔:文学与知性出版社,1984

[23] [韩]金弘明,资本制时代的思想[M],首尔:创作与批评出版社,1993

[24] [韩]金弘明,恩格斯和唯物辩证法[A],金弘明,资本制时代的思想[M],首尔:创作与批评出版社,1993

[25] [韩]金弘明,卢梭和马克思的所有权[A],金弘明,资本制时代的思想[M],首尔:创作与批评出版社,1993

[26] [韩]金弘明,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理论[A],金弘明,资本制时代的思想[M],首尔:创作与批评出版社,1993

[27] [韩]卢在凤,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论[A],李洪九编,马克思主义百年——思想和变迁[C],首尔:文学与知性出版社,1984

[28] [韩]柳东民,关于价值理论的整合性和分析意义的研究[D],首尔大学博士论文,1994

[29] [韩]柳东民,关于资本储蓄和雇用的价值理论分析[J],经济学研究,第43卷第1号,1995

[30] [韩]柳东民,劳动市场分析的微观构造[A],韩国社会经济学会编,价值理论论争——为了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新探索[C],首尔:草色出版社,1995

[31] [韩]柳东民,马克思价值论的理论构造和现代意义[J],庆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00

[32] [韩]柳东民,价值和价格的微观联系——新解释的观点[J],社会经济评论,第17辑,2001

[33] [韩]柳东民,价值和价格[A],金秀行、申贞完编,现代马克思经济学的诸争论点[C],首尔:首尔大学出版部,2002

[34] [韩]朴观锡,通过区分价值概念对马克思价值以及货币理论重新进行考察[J],社会评论,第7辑,1994

[35] [韩]朴观锡,通过还原问题看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双重性[J],韩国经济学会,1995

[36] [韩]朴鲁英,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阶级和民族[J],文学与社会,第2号,1988

[37] [韩]朴雪虎,济金根论争研究[J],理论,第12号,1995

[38] [韩]朴宇熙,马克思的技术经济观[A],李洪九编,马克思主义百年——思想和变迁[C],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4

[39] [韩]朴珠媛,马克思的共同体的人类观和伦理的政治理念——以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异(1840—1841年)》为中心[J],政治批评,第2号,1997

[40] [韩]朴珠媛,关于马克思在自由主义批判的研究[D](梨花女子大学博士论文),2001

[41] [韩]朴珠媛,马克思思想中的生产和政治的概念——以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判为中心[J],韩国政治学会报,第35卷3号,2001

[42] [韩]朴虎声,平等论[M],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94

[43] [韩]安铉镐,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A],金秀行、申贞完编,现代马克思经济学的诸争论点[C],首尔:首尔大学出版部,2002

[44] [韩]梁承兑,对马克思的人类论本性重新考察[J],韩国政治学会报,第30辑第4号,1996

[45] [韩]梁好民,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理论)[M],首尔:内外文化

社,1963

[46] [韩]柳在建,历史规律论和历史学——关于最近被介绍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J],创作与批评,第16卷第1号,1988

[47] [韩]柳在建,再论历史规律论——针对历史规律和自由主义的答辩[J],创作与批评,第16卷第3号,1988

[48] [韩]柳在建,马克思的历史观研究[D](首尔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3

[49] [韩]尹亨植,作为总体的实践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J],理论,第4号,1994

[50] [韩]李基弘,为了科学的历史认识——对历史规律论争的反省[J],创作与批评,第17卷4号,1989

[51] [韩]李基弘,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和构造的研究[D](首尔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2

[52] [韩]李世永,马克思和历史——时代划分问题和亚洲生产方式理论[J],理论,第9号,1994

[53] [韩]李采彦,三个抽象问题 *re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D](伦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0

[54] [韩]李采彦,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J],现在社会科学研究,第3辑,1992

[55] [韩]李采彦,重新审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J],剑桥经济学报(G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第17卷,1993

[56] [韩]李采彦,劳动价值理论中的几个争论点[J],经济和社会,第24辑,1994

[57] [韩]李采彦,关于马克思的抽象劳动重新解释[A],韩国社会经济学会编,价值理论论争——为了政治经济学的新探索[C],首尔:草色出版社,1995

[58] [韩]李青山,社会构成体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有什么作用[J],现实和科学,第1号,1988

[59] [韩]李春吉,作为文化学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J],理论,第4

号,1993

[60] [韩]李洪九编,马克思主义百年——思想以及变迁[C],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4

[61] [韩]李洪九,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A],李洪九编,马克思主义百年——思想以及变迁[C],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4

[62] [韩]林元泽,第二资本论[M],首尔:一潮阁,1978

[63] [韩]林志弦,马克思恩格斯和民族问题[D](西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8

[64] [韩]林志弦,马克思的后期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单线论的阶段论的批判性考察[J],历史学报,第126号,1990

[65] [韩]林志弦,马克思的帝国主义理论和爱尔兰的民族问题[J],科学和社会,第56卷第2号,1992

[66] [韩]郑楠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艺理论[J],理论,第2号,1992

[67] [韩]郑文吉,异化论研究[D](首尔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8

[68] [韩]郑文吉,青年黑格尔派研究序论——科学运动的时代背景及其主导人物[J],法律行政论集,第18辑,1980

[69] [韩]郑文吉,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史的意义——以批判理论的展开为中心[J],韩国政治学会报,第15辑,1981

[70] [韩]郑文吉,麦克斯·施蒂纳的生涯和著作[J],法律行政论集,第19辑,1981

[71] [韩]郑文吉,施蒂纳和他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对思想的展开和异化论的解释的可能性的探讨[J],世界的文学,第7卷第4号,1982

[72] [韩]郑文吉,青年黑格尔派对马克思初期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布鲁诺·鲍威尔和马克思的学术联系:1837—1843年[A],李洪九编,马克思主义百年——思想以及变迁[C],1984

[73] [韩]郑文吉,青年黑格尔派对马克思初期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的布鲁诺·鲍威尔和马克思的论争[A],李

洪九编,马克思主五义百年——思想以及变迁[C],1984

[74] [韩]郑文吉,追随者的时代——青年黑格尔派和卡尔·马克思[M],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7

[75] [韩]郑文吉,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批评——以关于撰写顺序和日期问题的最近的论述为中心[J],省谷论丛,第18辑,1987

[76] [韩]郑文吉,通过编纂史看《德意志意识形态》——新MEGA I/5(作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刊行的期待)[J],文学与社会,第11号,1990

[77] [韩]郑文吉,《德意志意识形态》,I. 费尔巴哈的重构——关于梁赞诺夫版以来的各种版本的比较研究[J],世界的文学,第59号(春季号),第60号(夏季号),1991

[78] [韩]郑文吉,未完成的梦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版[J],文学与知性,第14号(夏季号),第638—697页,第15号(秋季号),1991

[79] [韩]郑文吉,转型期的景象——共产圈瓦解以后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继续刊行事业[J],文学与社会,第18号(夏季号),1992

[80] [韩]郑文吉,《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作为向季刊的投稿而撰写的吗?——以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成立史的最近的论述为中心[J],文学与社会,第22号(夏季号),1993

[81] [韩]郑文吉,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和初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究[M],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94

[82] [韩]郑文吉,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日本学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论争——作为理解日本马克思学的一个具体事例[J],文学与社会,第25号(春季号),1994

[83] [韩]郑文吉,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的文本编辑问题,文学与社会,第33号,1996

[84] [韩]郑文吉, Einige Bemerkungen über die Papiere der Spezialkonferenz Die konstitution der Deutschen Ideologie[J], Trier, 24—26, Oktober, 1996

[85] [韩]郑文吉,新MEGA I《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构成——参加《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问题专家会议的报告[J],韩国政治学会报,第

30—34 辑,1996

[86] [韩]郑文吉,19 世纪初的德国知识分子的运动——以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轨迹为中心[J],韩国政治研究,第 7 号,1997

[87] [韩]郑文吉, Einige Probleme der Textedition der Deutschen Ideologie, insbesondere in Hinsicht auf die Wiedergabe des Kapitels“ I , Feuerbach”[J],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1997

[88] [韩]郑文吉, Zur Neuausgabe der Deutschen Ideologie in Japan [J],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2001

[89] [韩]郑相敦,对马克思的劳资关系的批判性考察——以在《资本论》中体现出的方法论为关联[J],韩国政治学会报,第 30 卷第 4 号,1996

[90] [韩]郑镇相,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和实践[J],庆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00

[91] [韩]郑云暎,商品和价值——单纯商品生产中的价值形成[J],韩神大学经济学研究所《经济学讨论集》第 8507 号,1985

[92] [韩]郑云暎,再生产公式的理论和构造[J],韩神大学经济学研究所《经济学讨论集》第 8613 号,1986

[93] [韩]郑云暎,重新确认价值理论的根本前提[J],理论,第 2 号,1992

[94] [韩]郑云暎,劳动价值理论[M],首尔:喜鹊出版社,1993

[95] [韩]赵元熙,从价值理论的视角看动态竞争、垄断资本和国家[D](伦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9

[96] [韩]郑云暎,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哲学的、理论的基础的重新探讨[J],韩国社会经济学会,1995

[97] [韩]赵铉洙,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资本论》[J],理论,第 16 号,1996—1997

[98] [韩]秦锡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分工[A],李洪九编,马克思主义百年——思想和变迁[C],1984

[99] [韩]秦锡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人道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D](首尔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2 年由文学与知性社以同名出

版,1991

[100] [韩]崔章集,独裁主义的展望和理论[A],崔章集编,马克思[C],首尔:高丽大学出版部,1990

[101] [韩]崔亨益,卡尔·马克思的权力的政治理论——以劳动和社会的时间策划的活力为中心[D](首尔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

[102] [韩]韩国社会经济学会编,价值理论论争——为了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新探索[C],首尔:青林出版社,1995

[103] [韩]韩神经济科学研究所编,价值理论[C],首尔:草色出版社,1986

[104] [韩]洪勋,马克思经济学的两个轴心——劳动价值学说和内在理论[J],现象和认识,秋季号,1991

[105] [韩]洪勋,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和斯拉法价格体系的理论出发点[J],产业和经营,5月号,1991

[106] [韩]洪勋,马克思的经济思想的构造和局限[M],首尔:HANUI出版社,1994

[107] [韩]洪勋,关于价值形态论中存在的一个异质性的[J],延世经济研究,第1卷,1994

[108] [韩]洪勋,价值和经济的自律性[J],韩国社会经济学会,1995

[109] [韩]洪勋,关于马克思的批判方法的研究——以对斯密和李嘉图的批判为中心[J],经济学研究,第45卷第4号,1997

[110] [韩]洪勋,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中现在还留有什么? [A],经济学的历史和思想[M],1998

[111] [韩]洪勋,马克思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思想[M],大宇学术丛书,2001

[112] [韩]洪勋,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和哈耶克的规则[J],剑桥经济学报,第26卷第5号,2002

(赵莉 译,单位: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
当代重建**

应当重视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 资本主义理解史的研究^①

张一兵

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征途上，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就从未中止，其间伴随着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曲折道路。今天，站在改革开放 30 年来所取得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时机也成熟了。因为，20 世纪 80—90 年代以来围绕“当代资本主义”所进行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已经为深化资本主义的理解提供了宽广的理论视野和丰富的学术储备。为了更好地推进“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理论借鉴，我们择取了“资本主义理解史”这一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认识和批判的思想史全程作为研究对象。该研究上起马克思恩格斯，经第二国际和苏联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到当代欧洲激进思潮，力图梳理 160 年来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左派对于资本主义认识和探索的历史变迁。

① 本文选自张一兵主编《当代资本主义理解史》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科学批判构架的历史生成》（张一兵、周嘉昕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的导言。——编者注



一 我国改革开放后对“资本主义”重新认识的突破与发展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在中国能有今天的繁荣，首先与20世纪80年代对于传统资本主义理解的反思和现实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有关。从大处着眼，这植根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稳步推进；于细处觅微，这同走出传统斯大林教条主义教科书体系、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的思想历程息息相关。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理论成果是：自觉摒弃对于资本主义的教条主义式的僵化理解，倡导以开放的心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及其当代发展，同时反对矫枉过正，强调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研究中的指导性地位。在此过程中，重新反思科学理解资本主义的出发点。

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也曾得出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但从社会主义改造中提出“让资本主义绝种”的口号开始，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念影响下，我们逐步采取了一种对资本主义进行简单否定的非历史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只限于政治决议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中的抽象概念，更不用说对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承认和正视了。总的说来，这种假想中存在的资本主义形象是直接作为社会主义将克服和超越的对象而存在的。这一理论形象的主要来源有三。

其一是经前苏联教科书原理反注过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理解。在“两个必然”的旗帜下，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被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规定下来。

其二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对资本主义发展所做的分析，即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这也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究其经济本质来说是垄断的资本主义，这一点也就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而且正是从自由竞争成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制度进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过渡。”^{[1](p. 683)}

其三是斯大林对“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看法。在1952年出版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2](p. 26)}直到1986年,这种观点还在前苏联和东欧具有广泛的影响。

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直接相关,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考察就成为资本主义研究的焦点。邓小平在1980年就曾敏锐地指出:“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3](p. 338)}这是一个重要的新的理论起点。在党的十三大上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更是把加深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再认识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本理论课题。相应地,“重新认识”或“再认识”资本主义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形成了一股学术热潮。

虽然在这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运动中不乏对立与交锋,但它对于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力、拓展和深化“资本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且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学术成果,在某些方面甚至奠定了今天“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关键性理论基础。

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获得了新的认识。首先是资本主义历史分期划分的标准更加全面,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外,反映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也被作为划分的标准。其次,有关阶段的划分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两阶段论”,分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古典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初级阶段—高级阶段等不同划分方式;二是“三阶段论”,包括原始积累—自由竞争—垄断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等观点;三是“四阶段论”,其中又有原始积累—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形成—发育—成熟(当代)—衰亡等不同的看法。

对现代资本主义特征和历史地位有了新的看法。首先,现代资本主

义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时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除了利用新技术革命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建立有效的市场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机制外，现代资本主义在政治运作、文化形态、所有制形式和阶级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因此，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解也出现了改变：有的学者在坚持基本矛盾不变的基础上强调对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政治体系和文化形态的再认识；有的学者认为随着政府对经济操控的增强和股份制的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到了缓和；有的学者注重考察上述变化所带来的部分质变；有的学者结合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定位，这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诸多不同观点。

不难发现，在针对现代资本主义所进行的“重新认识”或“再认识”过程中，出现了一种错误的理论趋向，即认定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马克思、列宁等经典作家所生活的时代，试图以此证明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失效，并且提出一种对于资本主义未来发展及其同社会主义关系的所谓“新”观点。其中，尤以“趋同论”最为典型，即开始强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特征，并用它来代替传统的“扬弃论”和“垂死论”。

正如同时期及后来许多学者已经撰文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再认识过程中所出现的这种趋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偏离。“趋同论”的本质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边界的混淆，也是对马克思所开创的资本主义科学理解的误读。^{[4](pp. 22-24)}在我们看来，之所以出现这种理论上的错误倾向，存在着两个内在相关的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研究中借助直接的经验事实来反思传统教条框架而导致的“矫枉过正”。出于对斯大林教条主义体系的反动，但又无法及时消化纷繁芜杂的新情况、新变化，并且缺乏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甄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能力，势必要在研究上走弯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多年来受苏联教科书体系的钳制，先前对于资本主义的很多观点都直接来源于前者的抽象结论，而根本无法科学地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理解的科学范式，同时没有掌握西方左派学者已经进行过的有益探索，因而在这种“再认识”过程中一时无从形成

独立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明晰的正确方法论指导——这是内在于前者的更加根本的原因。

尽管在理论上仍存在诸多不同意见,甚至是争论,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错误倾向,但从总体上看,20世纪80年代前后所进行的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理论探索,成绩是很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首先,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跳出了既有的理论窠臼,这是新时期迈向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面向世界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当代资本主义科学理解的第一步。其次,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真正进入中国学者的理论视野,同时随着相关理论成果的译介,为形成新的资本主义科学理解奠定了初步的学术基础。再者,也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反思前面提到的错误倾向的过程中,已经开始有学者自觉吸收既有的理论资料和研究成果,审视反思“资本主义再认识”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并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发点上寻找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科学基点。^[5]在我们看来,这是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推向深化的科学路径,也是今天“资本主义理解史”的最初思想缘起。

二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回顾与展望

20世纪90年代开始,面对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新的全球化历史态势,无论是从研究视域的拓展还是就分析程度的深化来说,“资本主义研究”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江泽民同志提出把“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作为“需要全党同志共同深入研究,从思想上政治上进一步取得科学认识和做出正确解答”的“四个如何认识”问题之一,学术界也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6](p.54)}围绕“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等主题,数量颇丰的经验资料和研究文献被译到国内,针对相关主题的系统研究和综合分析也纷纷问世,并且在多角度、不同层次的对话和反思中,国内学界关于资本主义研究的理论基础得到夯实,探索的新方向也日渐澄明。

较之80年代的“解放思想”和“重新认识”,这一阶段“当代资本主义

研究”的显著特征是对丰富的文献材料的进一步占有，即通过相关译介工作将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现实及其理论反映更为全面地展现在中国学者面前。毋庸赘言，90年代以来围绕该主题所进行的翻译、评介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这些译著、译文的数量是如此之大，种类是如此之多，在这里我们无法一一列出。同时还应看到，随着当代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很多80年代讨论还未曾触及或未得到展开的主题，也只是到了这个阶段才逐步进入学界的讨论域，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等问题。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资本主义研究”本身所具有的跨学科和多视角特点，除了专门以“资本主义研究”为主题的译丛外，不同形式的“西学译译”也都或多或少对促进这一研究产生了积极意义。总的说来，这些译介的作用场域主要包括：第一，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转、政治操作和文化意识形态功能的直接分析；第二，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观念发展中透析出来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解；第三，在批判和捍卫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争论中折射出来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解。

在充分占有新材料的基础上，国内“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开始进入消化并运用这些材料的阶段。除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一如既往地予以跟踪观察外，学界同仁也开始系统地总结既有的研究成果，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和特征进行全面的分析和阐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包括《当代资本主义论》（李琮主编，1993）、《现代资本主义论》（陶大镛主编，1996）、《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社会主义新课题》（胡连生、杨玲，2000）、《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论》（刘昫献，2003）、《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徐崇温，2004）、《当代资本主义新论》（靳辉明、罗文东，2005）等。我们认为，以这一系列论著为代表，“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正在理论上不断走向深化，较此前获得了研究上的重大进展。

具体说来，9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所取得的这些理论成果可以分为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分析、对其历史定位的把握和历史趋势的判断。这些研究一方面继承了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再认识”所取得的先期成果，另一方面也由于客观对象的新变化和自身研究的反思而展现出

新的特点。

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特点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阶级结构等领域中的反映。就直接的社会现实而言,当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处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这些新的变化,国内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从生产力层面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随着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社会财富迅猛增长,呈加速增长趋势。在产业结构上,出现了信息化、服务化、高科技化趋势。在生产力要素内部,脑力劳动比例攀升,随着生产管理中新手段和工具的获得,如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等,劳动工具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劳动对象的范围也因为新材料和新资源的开发而得到了拓展。有学者用生产力总量、生产社会化程度、生产力的质三个大飞跃来描述这些新变化。

从生产关系层面来看,当代资本主义因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呈现出新的特点。简单说来,在所有制关系上出现了资本社会化的趋势,在劳资关系上形成了允许工人阶级加入企业管理的多种形式,在分配关系上实行了社会福利政策。有的学者则将其概括为:政府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进行干预,推行雇员持股计划,实行福利政策,用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另外,在生产关系新变化的讨论中,已经涉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化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讨论。

从上层建筑层面来看,研究者普遍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在以下四个方面变化显著:一、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二、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国家的调节作用越发突出;三、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四、意识形态中左翼与右翼的分歧逐渐减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虽然未变,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却更加鲜明。在我们看来,其中的核心要旨是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形式更加完善、精巧,这与资本不断为自己创造出再生产的条件息息相关。

从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层面来看,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显然不同于

经典理论家所处的历史阶段。随着资本运转和企业管理方式的转变，资产阶级的内部结构呈现出经理资本家阶层人数上升、作用增加的特点，传统资本家对企业由直接控制过渡到间接控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少已经看到这一点了。工人阶级构成也日趋复杂化，工人的生产和生活地位得到了明显改善，第三产业工人的比例上升，出现了以“白领”为代表的新“中间阶层”。相应地，两大阶级的矛盾有所淡化，并开始纠缠于种族、性别、地域、宗教等冲突之中。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研究在传统框架的拓展与新近观点的引介中得到了深化。除了对现实变化的研究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所处历史阶段的定位也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一方面是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将具体的经验事实和既有的理论框架结合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等理解。实际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等提法在 80 年代“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已然出现。这些讨论（争论）的源点都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论述，特别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对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理解。另一方面，在吸收借鉴西方学者研究的过程中，运用新的资源和方法，形成了新的理论判断，如“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后福特制资本主义”、“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等概念就是在学界具有一定影响的舶来品。

很多学者赞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说法，认为资本主义在“二战”后从一般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换言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能被涵盖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内部，而就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有的学者虽然认同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说法，但是反对上面提到的“新阶段说”，依然坚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因为，虽然帝国主义控制、剥削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并没有超出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

还有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进入了一个新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跨国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

是资本主义经过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之后的新发展，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但又在一个新的全球“尺度”上加剧了这一矛盾。

另外一种不同于上述观点的看法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社会资本主义阶段。持这种观点的学者首先批评上述观点仍局限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之中，强调以三次科技革命为线索，着眼于社会的整体结构变化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他们认为，“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与信息技术革命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极大发展相适应，并且可以恰当地解释前面提到的那些新变化。

除了以上四种观点之外，在当下的资本主义研究中，还有这样一些理论观点，它们虽然近年来才被介绍到国内，但已经进入了学界讨论的话语系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观点、厄内斯特·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观点、米歇尔·阿格里塔的“后福特制资本主义”观点和让克罗特·德罗奈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观点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观点不仅在直接的“当代资本主义”讨论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还延伸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后现代思潮的讨论就无法绕开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的观点则直接启发了我们用“晚期马克思主义”概念来指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之后的西方左派理论发展，“泰勒制—福特制—后福特制”的理论框架也逐渐成为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隐性历史线索。

除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全面介绍和评述、对其本质特征和历史地位的理论推敲外，这一阶段研究中所取得的另一项成果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方法论的自觉思考。尽管比起前几个方面研究成果的汗牛充栋来，围绕资本主义研究的方法所进行的探讨并不算非常多，但是无论如何，对于自身研究方法的反思和省察已经开始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在我们看来，关于资本主义研究方法论的反思之所以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原因有二：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着的现实和传统理论框架之间的冲突。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再认识”的讨论中已经凸现出来，近年来

更是直接推动着资本主义研究方法论的反思。面对这一冲突,学界早已达成理论共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基本理论依然有效,但有的具体判断不再适应于现实。经过多年的探索,科学理解资本主义当代变化的几个最重要的元方法论指导,或者说理论边界也得到了确立。这就是必须正视变化了的历史现实、区分复杂现象的不同层次、全面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异”与“同”、坚持理论和实践相联系的观点。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在对现实的不同理解中,已经包含着“回到马克思”的理论诉求。一方面自觉反思经过斯大林教条主义中介了的传统资本主义解释框架之不足,另一方面带着新的问题意识重新阐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解,其中,“全球化”与“世界历史”的研究最引人注目。

再就是随着新理论视域的开启,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不同理论方法之间存在的竞争和冲撞。正如前面的历史回顾已经看到的,同样是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这样一个客观现实,竟然存在多种不同的概念定义。其中固然包含研究视角和理论层面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差异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不同的理论框架和形态。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被摆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前台:在回答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什么之前,还要应对什么是当代资本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提问。这是一个“新”理论域中的“老”问题,对这一抽象问题的回答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及其相应研究的历史展开,而获得了具体的丰富性。换句话说,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现实,外在的理论斧削固不足取,但仅仅依靠经验的实证分析也是不够的,必须回到思想史的历史进程中,把握不同资本主义理解形态的内在逻辑和外部作用场域。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在我们看来,有关历史上资本主义研究不同理论形态的批判性研究,既是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发展到今天必然遭遇的困扰,也是这一研究走向深化的新的理论起点。

概而言之,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反思和积累,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追踪、理论分析和方法论自省,“资本主义研究”已经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话题和新理论进展的重要推动。其中,对于资本主义认识和批判的理论史的梳理是整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既

有的研究成果,形成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借鉴西方左派资本主义理解得失、激活马克思理论当代意义的资本主义研究方法的内在要求和历史任务。

具体说来,各卷的主题和内容如下:

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科学批判构架的历史生成”,内容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理解与认识的发生和发展的全程研究。简言之,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布尔乔亚社会”的政治关系入手,批判性地生成了对现代私有制经济结构“异化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马克思恩格斯从现代性的物质生产出发,进一步透视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剥削本质。而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过程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权力关系在生产总过程中支配机制的揭示,确立了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本质性认识,从而最终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认识。

第二卷“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演变”,以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研究对象。按照历史线索,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从1869年到1898年:巴黎公社失败和1873年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开始从古典时代向现代过渡;以1869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为基础,第二国际于1889年成立。这一阶段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延续,具体包括从经典理论的阐释与传播,经过应用和发展,再到历史变迁带来的经典理论模式转变等内容。(2)1899年到1914年:以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出版为标志,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主义批判出现了理论上的断裂,并且出现了在“修正”的旗号下否定、抛弃经典批判理论的倾向、具体内容分别是伯恩斯坦在经济方面和伯恩斯坦、福尔马尔等从上层建筑即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对修正主义的阐发。(3)1898年到1918年:面对同样的历史背景,希法亭、卢森堡和考茨基等人从发展经典批判理论、构建现代批判理论出发应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断裂,并且分别提出了“金融资本主义”(希法亭)、“资本积累的世界形态和最后阶段”(卢森堡)、“超帝国主义论”和“国际分工”(考茨基)等新观点。

(4) 1905年到1914年：俄国1905年革命将落后国家发展道路问题摆在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理解的前台，内容涉及考茨基、卢森堡和普列汉诺夫的理论贡献。

第三卷“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观”，分六个阶段系统研究自19世纪90年代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近一个世纪俄国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1)从19世纪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前后到1905年俄国革命前夕，是初步运用马克思的经典资本主义理论回答与解决俄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时期。(2)从1905年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摆脱第二国际的资本主义理论解释框架，首次真正独立地思考与解决本国实际问题的时期。(3)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俄国十月革命，是从根本上动摇与突破第二国际理论范式，形成全新的资本主义理解逻辑的认识论断裂时期。(4)从十月革命胜利到战时共产主义，再到新经济政策时期，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上的重要过渡时期。(5)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也进入一个完全同质性、体系化、成熟型发展时期。(6)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苏联理论界对资本主义的理解进入了一个“非斯大林化”但始终未能取得根本突破的教条僵化时期，主要特点是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现实变化。

第四卷“经济哲学视域中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立足于经济哲学的视域，详细考察了西方左派经济学界在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方面的代表性观点。通过对保罗·斯威齐、保罗·巴兰、厄内斯特·曼德尔、米歇尔·阿格利塔、阿兰·利比兹等五种代表性的资本主义批判观的分析，致力于解读从经济哲学视域入手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本质内涵。(1)斯威齐早期通过资本逻辑批判中有关消费不足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研究。(2)巴兰与斯威齐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批判。(3)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批判”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规律与具体的资本主义历史之间的中间环节的探寻。(4)法国调节学派阿格利塔对资本主义调节模式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转型的分析。(5)利比兹对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分析及其政治生态学建构。

第五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以国家资本主义批判、消费社会批判、晚期资本主义批判和全球资本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国家及其意识形态霸权批判五种模式描绘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体形象及其历史逻辑。(1) 国家资本主义批判是卢卡奇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批判理论的基础，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格罗斯曼和波洛克的分析，指向对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批判。(2) 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法兰克福学派以消费社会批判为主要理论倾向，与之并行，列斐伏尔和鲍德里亚亦在以消费为中心的日常生活批判上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3) 20世纪70年代，曼德尔和哈贝马斯从不同的方向发展了两种不同的晚期资本主义批判，前者直接影响到美国的杰姆逊等人。(4) 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话语的扩散和后福特制研究的兴起，全球资本主义分析开始成为左派的显著动向，重要代表是德里克的全球资本主义分析模式。

第六卷“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激进话语中的资本主义观”，内容涉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思潮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主要包括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后马克思思潮以及当代欧美一些重要的左派思想家关于资本主义理解和批判性认识的重要内容。

三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派关于资本主义理解的历史兴替

基于上述理解，自2004年南京大学“985”二期工程建设中，我们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平台)“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立项以来，以教育部百所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为依托，我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资本主义理解史”的研究中来，并首先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派关于资本主义理解的历史发展”这一专题上。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派资本主义理解史”作为我们的突破点，除了不得不承认围绕资本主义的相关研究历史线索太过丰富、具体内容十分庞杂外，更重要的是，这段长达160年的历史与我们的当代资本主义

探索在理论上最为切近，却从未得到系统的历史梳理。

“资本主义研究”的出现和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当然是以现实社会历史变革为基础，但从具体的理论层面上来说，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马克思主义和欧洲左派社会理论的历史演进。无论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问题进入思想史语境、传统资本主义理解在争论中形成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茧化”，还是“当代资本主义”问题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中的凸现，都直接来源于那些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探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出于种种原因，这一理论上的富矿却从未得到全面的勘探和开采。

第一，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形成缺乏清晰的界定。当资本主义研究需要回到马克思那里寻求思想支撑的时候，却常常遭遇到理论上模糊甚至是冲突的情况。这固然要由斯大林的僵化教条主义体系负责。但必须看到，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获得对资本主义的科学理解也非一蹴而就。不同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在援引马克思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认识上的差异。这样，对于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历史形成的回顾就成为我们的第一个理论任务。

第二，对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和历史缺乏应有的重视和研究。受斯大林教条主义判断的影响，这一研究在国内十分薄弱，很多方面甚至是空白。第二国际既是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经典批判理论的完成和全盛时期，也是经典批判理论向现代批判理论过渡以及现代批判理论分化的时期。缺失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发展的这关键一环，就无法了解这一理论的完整历史谱系，无从真正把握当代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实质和历史作用，也不可能准确地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规律。因此，第二国际时期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研究具有学术上的补白价值和理论上的关键意义。

第三，对苏俄（联）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这样一种特殊的理论模式缺乏历史的分析。这种研究模式不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理解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与形态，而且由于苏俄（联）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特殊地位，它甚至长期处于领先或核心位置。然而，这种产生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研究模式在历史的展开中却被抽象地上升到一个它自

己所不能胜任的理论高度。随着苏联学界以马克思“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为构架,以列宁《帝国主义论》为历史起点,以斯大林“总危机”理论为现实指向,形成关于资本主义理解的基本观点和看法之后,其研究重点基本上放在对经典思想遗产的固守、辩护、阐释上,而或多或少忽略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新现实的客观认识。实际上,结合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再认识”的理论得失,这一历史梳理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四,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从资本主义理解这一特定线索出发理解其理论逻辑的历史发展却依旧是一个“新”课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和终结,本身就是同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解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这一复杂理论思潮的内部,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知和不同的理论资源相结合,形成了历史关联着的多种理论形态。概言之,国家资本主义批判、消费社会批判、晚期资本主义批判以及全球资本主义批判等四种模式构成了20世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左派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历史线索。针对这些模式的形成及其转换的研究,对于我们更好地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经验教训具有直接意义。

第五,对20世纪西方左派经济学视域中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认识不足。虽然不少西方左派经济学理论已经陆续被介绍到国内,但是立足于经济哲学视域,历史地考察西方左派经济学界在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方面的观点和方法却刚刚起步。一方面,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更多关注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客观存在的学科边界硬化摆脱不了干系。因此,这一研究不仅对历史地整理西方左派经济学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而且对缝合“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的理论间隙,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六,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思潮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的研究仍在进行的过程之中。包括后马克思思潮在内的很多激进理论也都处在形成和变化的过程之中,其中隐含着当代资本主义理解的最新理论成果。从资本主义理解的角度出发同他们展开对话,对于我们占据理论最前沿、深入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具有重要的借

鉴意义。

综上所述,按照历史和逻辑的展开,《资本主义理解史》将包括以下六卷内容: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科学批判构架的历史生成、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演变、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观,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左派经济哲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四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理解经典模式的历史生成

本书是六卷本《资本主义理解史》的第一卷,我们之所以如此命名,在最直接的感性层面上与20世纪末一个令中国学者感到意外的文本事件相关。这就是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指出的,马克思从来没有在名词意义上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术语。切而考之,只是在维尔纳·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出版之后,并且随着作为其对立面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展开,“资本主义”(Kapitalismus)概念才真正进入学术界的话语体系。

20世纪90年代,围绕马克思是否使用过“资本主义”、*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应译为“资产阶级社会”还是“市民社会”等问题,国内学界曾发生过几次争论。在我们看来,这些争论的实质是传统研究模式所必然遭遇的理论反思。以往资本主义研究的最大不足是简单地以结论作为研究的前提,进而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理解范式的历史性生成过程,造成了理论与现实关系的外在性和抽象性。反思这一问题,应该首先诉诸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与“资本主义”相关的术语的考察。然而在这些争论中,传统研究在方法论上所遗留的预设论和非历史性倾向并没有获得根本性的清理。

因此,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站在社会历史和思想史真实进展的基础上,通过文本的深度耕犁,把握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来说便具有了重要的理论奠基性意义。

正如多布已经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资本主义的根本方法在于从生产方式这个特定角度出发,换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在物质生产方式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规律,并科学地预测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但是,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和“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在内的许多术语在马克思著作中的运用本身存在一个客观的变化过程。我们认为,正像术语的变化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观念上经历了深刻变革一样,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变化也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解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进展。结合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历史展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经验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到1844年初,青年马克思恩格斯从批判普鲁士封建国家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探索,并经过接触现实问题发生了思想上的急剧转变,最终确定“市民社会”为研究的出发点。他们最初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欢呼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并以之批判普鲁士封建国家。经过《莱茵报》时期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他们受费尔巴哈哲学变革的影响,决心颠倒黑格尔的国家观念,同时在法国大革命历史的研究中开始探索“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即“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并逐渐转向一般唯物主义和哲学共产主义。这一阶段中与资本主义理解相关的重要作品有:马克思恩格斯《莱茵报》时期的政论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及《德法年鉴》上的文章等;《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标志着这一阶段的结束。

马克思恩格斯本身处在不断的探索和转变之中,并且对社会经济关系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并未形成对资本主义的完整认识。即便如此,他们已经敏锐地把握到与资本主义批判直接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如市民社会这一分析对象的确立,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新革命形式,向代表普遍利益的无产阶级立场的转换等等。这些理论探索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即认识“市民社会”。

马克思在现实政治活动中,遭遇到物质利益的苦恼,接触到财产和等

级制与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哲学上费尔巴哈的影响使马克思坚定了以唯物主义批判“黑格尔自然法”的信念，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克罗茨纳赫笔记》的研究中，马克思更是确定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国家和整个社会。《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可以看做这一阶段最后成果的表达：实现整个社会的革命以获得人类解放，革命依靠代表普遍利益的无产阶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阶段马克思对很多问题的论述表现出强烈的思辨色彩，而恩格斯由于较早接触到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英国工业社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马克思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第二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初步接触经济学，并运用异化劳动理论考察、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由此，他们把现实社会宣判为非人（社会）的、分离的、工业统治的。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作品包括，马克思在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下初次研究经济学所写下的《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贫困、贸易保护等现实问题的评论。

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相同，马克思在《巴黎笔记》的摘录中贯穿着一条红线：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基础上，即建立在私有制是不可动摇的并且是合法的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上。可是它既没有说明私有财产，也没有揭示私有财产的实际内容。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私有财产看做劳动异化的产物，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私有财产的运动，剖析现实社会中出现的阶级对抗结构、预测历史的发展。尽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哲学出发点和许多经济学上的具体结论尚表现出不成熟的特征，但就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而言，已经取得了三项重大进展：首先是资产阶级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对抗性阶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笔记本中，马克思通过对工资、利润、地租的分析，得出了“在居民中大体只剩下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结论，^{[7](p.44)} 这是在对社会结构的认识上取得的重要成果；第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其内部关于“需要”的争论触动了马克思，使他开始对资本主义的工业现实和客观历史进程有所体认；第三，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之间的交换，形成了一种作为人的类

本质外化的统治一切的抽象力量，即货币。尽管对货币的分析并不能实现对资本本质的科学认识，但就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对社会的统治而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确实做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判断。

第三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从物质生产出发科学分析方法，承认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进步性，同时强调其灭亡的必然性，并把阶级斗争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要手段。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稍长，从1845年春到1848年革命时期，代表性作品有：《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共产党宣言》前后的一批政治作品。主要的成果表现为确立理解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社会历史的一般方法，对于生产方式的分析逐步精细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问题展开详细的论述。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尚未形成剩余价值理论，故而在解释资本主义剥削问题上仍有欠缺；对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把握不够；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主体问题分析不足等等。

具体说来，经过《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布鲁塞尔笔记》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了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方法，即从物质生产出发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别是马克思哲学历史观中两个不同的理论逻辑视角，前者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物质生产基础，即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这一理论定位是张一兵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中最先做出的，^[8] 以此奠定了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基础。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直接指认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历史进步性，并将社会革命建立在客观历史的进步之上。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便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同反动的、保守的和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潮区别开来。

另一方面，马克思坚持从物质生产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并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分析框架。通过《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指认了生产关系的历史本性，这为资本主义研究的深化奠定了基础。

再者，面临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马克思恩格斯直接投身革命实践，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并发表了大量作品。在这些

作品中，马克思恩格斯直面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灭亡的道路。但是，革命很快陷入低潮，这迫使马克思恩格斯重新进行理论研究。

第四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资本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全面布展，在此意义上，《资本论》及其手稿集中展现了对“资本主义”理解的经典形态。实际上，这一阶段始于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对大革命反思。随后，马克思第三次研究经济学，并写下“伦敦笔记”，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资本论》这一全面阐述资本主义理解的经典著作。《资本论》从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出发，全面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以此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解剖。对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研究历来是学界的重心，但是从资本主义理解的角度来看，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和研究方法的疏忽，以下两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

5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探索。1848年大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恩格斯重新开始经济学研究，其间也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反思，主要包括：一、革命进程的长期性以及资产阶级国家与意识形态问题；二、作为革命主体的塑造以及对经济周期的分析，涉及资本再生产过程；三、东方社会与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展；四、反对蒲鲁东主义，特别是其货币理论的消极影响。我们看到，围绕这些主题，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开展了大量的理论工作，但是由于资料所限，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

全面看待《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1857年开始，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而创作了四个草稿，其中最重要的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其间还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工资、利润和价格》等作品。这些作品为我们展示了马克思如何一步步分析资本主义，并确立《资本论》的结构形态。但对于这些作品，由于学科分工的差异，以往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或是强调《资本论》中辩证法的哲学意义，而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最重要的理论域——社会理论。

虽然《资本论》落脚于政治经济学,但其主旨是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并由此展开对社会历史的整体分析。因此,从资本主义理解的角度把握《资本论》,必须打破学科壁垒,恢复总体性视角。

第五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资本主义理解的拓展和深化。《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除了继续修订第一卷并准备第二、第三卷的出版外,马克思恩格斯还直接参加了与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有关的革命运动。同时,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变化以及人类学、历史学的新进展(如人类学对原始社会的最新研究成果),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学研究和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为中心,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资本论》取得的理论成果,并把它们运用于具体的社会历史分析和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

在写作《资本论》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马克思积极地投身到革命实践中,一方面是为第一国际的组建和发展做出努力,另一方面还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其他流派,如蒲鲁东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和拉萨尔主义者进行理论斗争。面对资本主义新的发展,以《法兰西内战》和《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献论述了阶级斗争、民族解放、国家和革命、向共产主义过渡等新形势下的重大问题。

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布展的延伸,原始社会和东方道路问题成为马克思晚年关注的主要对象。这既是资本主义发展在理论上提出的新问题,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契机。从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留下的《晚年笔记》,即《古代社会历史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来看,这是他们面对新资料、新问题而力图拓展在《资本论》中已经获得的成果的理论努力,从内在联系着的两个方面出发可以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研究的延伸:一、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包括原始社会和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内在机制和发展规律;二、运用科学的社会理论指导现实的社会革命运动,特别是研究东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革命道路。

参考文献：

- [1]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4] 徐崇温,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 [5] 张一兵等,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科学基点的思考[J],南京社会科学,1990(2)
- [6]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 [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8] 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

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演变^①

姚顺良

所谓“第二国际”，是一个历史称谓。在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史上，曾出现过三个国际：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加的“国际工人协会”（1864—1876），二是马克思逝世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在其前期以恩格斯作为精神领袖和政治顾问的“社会党国际”（1889—1914），三是列宁创建的、以列宁主义为旗帜的“共产国际”（1919—1943）。这三个“国际”在历史上依次被称为“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在同斯大林斗争失败被驱逐出苏联后，曾试图建立同“第三国际”相对立的“第四国际”，即托洛茨基主义（“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的国际联合组织，但一直未能完全如愿。

“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是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的。直到1900年前，“社会党国际”并无常设机构，以各国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代表大会的形式存在；1900年以后设立了“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尽管在恩格斯逝世后“社会党国际”从1899年开始在思想理论上分化为“修正派”和“正统派”，在1905—1910年间又进一步在实践策略上逐渐分化为

^① 本文选自张一兵主编《当代资本主义理解史》第二卷《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演变》（姚顺良、夏凡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的导言——编者注

“左”、“中”、“右”三派，但在组织上并未完全分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社会党国际”停止活动，并最终导致组织上的分裂。因此，史学界一般都从狭义上将第二国际时期界定为1889—1914年。

不过，从广义上说，第二国际时期的时间跨度似乎应向前后延伸一些。首先，从起点来说，第二国际同第一国际不同，它是一个各国社会党和工人党的国际联合组织，其主体是欧洲各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群众性工人政党。而这些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群众性工人政党是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就在欧洲各国逐步建立起来了。如60年代末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1869），70年代的匈牙利工人党（1873）和法国工人党（1879），80年代的意大利工人党（1882）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889）等等。特别是后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整个第二国际时期的实践策略和理论探讨中占有中心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新时代》杂志，也先后创刊于1879年和1883年。因此，完整地论述第二国际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至少应该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其次，第二国际的终结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就有过恢复第二国际的企图，从1915年起先后举行了“协约国社会党国际会议”、“同盟国社会党国际会议”和“中立国社会党国际会议”三次国际会议。即使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左”派，也同“中”派一起从1915年起多次共同参与过“齐美瓦尔得国际”的活动。“左”派同“中”派在政治上的决裂，实际上应以1918年苏俄解散“立宪会议”以后，考茨基发表《无产阶级专政》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发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为标志。而第二国际在组织上的最终分裂，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先是“右”派企图恢复“第二国际”（伯尔尼，1919.2），紧接着“左”派另立“第三国际”（莫斯科，1919.3），而“中”派则一度成立“第二半国际”（“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维也纳，1921.2），不久又与“右”派合并（“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汉堡，1923.5）。由此社会主义运动分化为“社会民主主义”和“革命共产主义”两大派。因此本书在时间跨度上将第二国际时期的时间跨度界定在19世纪70—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初。

第二国际时期，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

中,资本主义在欧美主要国家有了巨大发展。继英国在 19 世纪 30—40 年代完成了产业革命以后,法国、美国和德国等相继完成了产业革命;美国南北战争以及德国在统一战争和普法战争中的胜利,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特别是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和重化工业的狂飙突进,以铁路为代表的现代交通运输业的迅猛发展,使欧美发达国家进入了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新现象:工业中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股份公司的大规模发展和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越出民族国家的范围,欧洲列强瓜分殖民地特别是非洲大陆的高潮,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对中国的入侵,资本主义列强军国主义的发展和美西、英布、日俄三次争夺殖民地或势力范围战争的爆发,特别是 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等。这一切都表明,第二国际恰好处于两个时代(古典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两个世界(西方和东方)的交叉点。

第二国际所处的上述历史的时空背景,决定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解史上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可以概括为“两个阶段”、“三个方面”:

第一,第二国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完成期。这主要是第二国际前期(1898 年以前)。从 19 世纪 60—70 年代起到 19 世纪末,是资本主义古典形态的完成期和其在欧洲范围内的全盛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第二国际的主要功绩是继续推进和完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核心文本《资本论》第二、三、四卷的整理、编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的其他经典文本的再版、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评介、阐释和通俗化,为捍卫经典批判理论而对资产阶级经济、政治和社会学说的批判,特别是应用经典批判理论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工人运动实践,促成了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形成和实践中无产阶级政党纲领、组织和策略问题的建设。可以说,第二国际前期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完成期,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 19 世纪的全盛时代。

第二国际使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19世纪和欧洲范围。列宁曾经说过，“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培养了俄国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以考茨基为主要代表、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的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的著作培养了许多国家的好几代马克思主义者。就从我们中国来说，第一个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有关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达尔文相一致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来自考茨基的《伦理学与唯物史观》，不过是经由日本学者转口的。而毛泽东在陕北同斯诺谈话时也回忆说，促成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三本书。而《阶级斗争》正是考茨基所写的《〈爱尔福特纲领〉理论部分解说》一书的中译名。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第二国际在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过程中，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理解模式实质上的蜕变。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并不是一种纯粹实证科学意义上的经济学—社会学理论，而是一种“历史—辩证”理性批判的学说，它不仅从逻辑上建构了资本主义生产机体和社会形态的理想模型，而且提供了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独特理解模式，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法论和历史观。而在第二国际的主流派那里，资本主义的理解模式被实证主义化，唯物辩证法被解释为经验主义发生学，历史唯物论被解释为经济决定论，进化主义和折中主义成为流行的倾向。以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教皇”——这是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最先采用的略带嘲讽的称号——考茨基为例。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哲学，而是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具有同样性质的“经验科学”；^{[1](p.452)}所谓“辩证的唯物主义”或“历史的唯物主义”，就是唯物主义方法和辩证(或历史)方法“这两种考察方式”的统一：前者即经验归纳的方法，是要“把作为科学出发点的概念确定下来”^{[2](p.27)}；后者即“发生学方法”^{[2](p.27)}，“了解现象的唯一方法就是研究现象怎样发生”^{[3](p.17)}。从这种观点出发，就必然会抹杀马克思主义范式的批判精神。这种蜕变不可避免地将会引发第二国际后期在资本主义理解模式问题上的分化。

第二，第二国际构成了从马克思的经典资本主义理论向以列宁为主

要代表的帝国主义理论的过渡期。资本主义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开始于19世纪60—70年代,完成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纵向来看,资本主义自身形态发生了变化,在一般商品生产领域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在资本产权领域从垄断发展到自由竞争;二是从横向来看,资本主义拓展了自己的空间领域,从民族国家范围扩展为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现象,同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一些具体结论之间出现了矛盾和反差。这些矛盾和反差使得第二国际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解模式实证主义化的局限充分暴露出来了,终于在第二国际后期(1899年以后)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断裂和分化。

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派”,从根本上否定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他们不仅用“边际效用论”来“补充”和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来否定和反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用“中间等级”论和“小农经济稳固”论来“证伪”和反对马克思的“两极分化论”,在反对“崩溃论”的旗号下否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而且力图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基础,用实证主义、折中主义、进化主义、新康德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解模式,实际上完全变成了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应声虫,其根本目的是要将社会民主党变为资本主义的改良派。马克思的批判的资本主义理论,在他们那里完全变成了改良的保守的资本主义理论。

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解模式研究资本主义的新现象、新特点,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发展为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从19世纪末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拉法格最先注意到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现象,并开始创造性的研究,到1910年代这一研究进入了高潮。第二国际理论界异常活跃、创见迭出,最后形成了分别以鲁道夫·希法亭、罗莎·卢森堡和卡尔·考茨基为代表的三种现代资本主义理论。这三种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直接构成了后来以列宁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理

论来源和思想背景。

长期以来，苏联、东欧和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一直把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常简称为《帝国主义论》）奉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空前绝后”的经典文本，完全否定了该书形成的历史语境和理论前提。实际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正是以布哈林为中介，在基本继承希法亭、部分借鉴卢森堡、全盘否定考茨基、同时批判地吸取非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森一些观点的基础上完成的。重新审视第二国际理论家在探索资本主义现代形态理论中的是非得失，不仅有助于恢复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理解的真实历史，而且有助于我们在充分肯定以列宁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历史贡献的同时，正视这一理论或者从其先驱者那里继承并加深了的、或者由对其先驱者拒斥和摒弃所带来的理论缺陷。不能不承认，正是这些缺陷，导致了以列宁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痕，最终无法正确解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进而无法为全球左派和进步人类的斗争制定合理有效的政治战略。

第三，第二国际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分化期。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开始了从经典一元形态向现代多元形态的过渡。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模式的分化，萌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西方，人们常常把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实证化归因于恩格斯。诚然，与马克思不同，恩格斯的世界观确实带有实证主义倾向。早在19世纪70年代的《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就认为，哲学将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而趋向消亡。他说：“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他把唯物史观同达尔文学说等量齐观的说法和晚年通信中正确强调上层建筑反作用时的某些提法也在某种程度上诱发了进化主义和折中主义的倾向。

不过，把恩格斯仅仅看做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实证主义理解模式”的源头是不公正的。实际上，后来分化出来的“第二国际实证主

义”、“苏联辩证唯物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三种资本主义理解模式都可以追溯到恩格斯。恩格斯在同普列汉诺夫和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通信中对两人的肯定,表明他同样是另外两种理解模式的源头。

普列汉诺夫正是通过与恩格斯的通信,确立了“斯宾诺莎和 18 世纪唯物主义——费尔巴哈——马克思”的解释路径,经过列宁进一步向黑格尔辩证法的返回,最终在斯大林时期形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解释模式。正是这一哲学解释模式同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主义”理论的结合,形成了从列宁到苏联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科尔施就曾说过,列宁对哲学唯物主义的强调“与他关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有密切的意识形态关系。两者都在俄国特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在看来短期内实际上必须完成俄国革命的特定实践和理论的政治任务中,有其物质的基础”^[4](pp. 79—80)。我们对此只需补充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那就是列宁 1914—1915 年间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也直接为其写作《帝国主义论》准备了方法论的前提。

而另一方面,拉布里奥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解读也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新路径的源头。拉布里奥拉认为,“实践哲学”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在其最后一批哲学著作中,拉布里奥拉更是明确指出,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回到康德去,同某些“正统派”鼓吹回到斯宾诺莎和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去一样,其含义在于:不是摒弃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毫无益处地重复陈旧的东西,或者纯属折中主义的混乱。^[5](pp. 297\299) 从这一哲学立场出发,拉布里奥拉强调了社会生活和历史认识的“总体性”和“综合性”,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中第一个批判了实证主义的“历史因素”论;强调了“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和“社会心理学”在历史认识中的作用。^[6](pp. 55—63\pp. 80—90) 拉布里奥拉开启的“实践哲学”的解释路径及其对“社会心理学”作用的重视,不仅在意大利直接导致了后来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和“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而且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 20 年代的卢卡奇和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范式的黑格尔式解读方向一致。特别是他对“因素论”的批判和“总体性”的强调,实际上与罗莎·卢森堡为卢卡奇“总体性”范式的形成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和理论

资源有异曲同工之妙。这表明，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解模式，实际上已经孕育于第二国际内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解模式，不仅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在批判第二国际对资本主义的实证主义理解中产生的；而且也是第二国际内在矛盾和自身解体的产物。

国内对第二国际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十分薄弱，甚至许多方面是空白。这主要是因为，过去我们从教条主义出发，从1918年列宁与考茨基决裂以后，特别是在斯大林强调“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间隔着第二国际独占统治的整个时代”。^{[7](p.186)}这样一个论断之后，也就是把第二国际看做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种断裂以后，我们对第二国际的理解和研究就已经打上了很大的“主观色彩”。对第二国际，只能否定和批判，只能作为反面教材来为列宁主义和苏联模式作论证。特别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初以来，我国在毛泽东“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旗帜下，对第二国际的否定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连列宁、斯大林承认的第二国际前期的功绩，比如对考茨基等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也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特别是随着中共同欧洲各国社会党建立和改善关系，随着2001年以来总结各国工人政党建党经验教训，对第二国际的研究有所加强。但是，总的来说，这种研究主要局限在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以及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领域。

第二国际研究方面的缺陷，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人们一直忽略了其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解史上的地位。一提到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人们马上就会想到两个阶段或两种形态：一是马克思的经典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二是以列宁为代表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实际上，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与第二国际有着直接的联系。前面我们已经作了较为系统的说明，这里不再重复。

总之可以说，考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离开了第二国际这一环，就不可能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完整历史；也不可能真正把握这一理论由经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真实过程和这一理论演化的真实谱系，从而真正把握当代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的实质和历史作用；也不可能准确地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规律，认清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实质和趋势。

正是从上述目的出发，我们力图从当代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第二国际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解史上的地位，尽可能地挖掘相关资料，对文本进行比较系统的深层解读。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资本主义理解史》第二卷，就是我们研究的初步成果。

本卷共包括七章，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三章）着重评述上述第一个方面，即第二国际构成了马克思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完成期。这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是《资本主义理解史》第一卷的延续。其中，“第一章”是资本主义经典批判理论本身的完善、传播、阐释和辩护；“第二章”是经典资本主义理论模型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应用，以及其在某些方面的深化和发展；“第三章”则从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理论内容和具体结论，转向这一理论的深层即理解资本主义的方法论模式，并进一步揭示这一方法论模式的悄然转型根源于历史观上哲学范式的变化。

第二部分（第四、五章）着重评述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断裂后出现的两种选择中的第一方面，即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在“修正”的旗号下否定、抛弃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以及由此引发的“正统派”对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及其方法论模式、历史观基础的捍卫。具体来说，“第四章”是围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展开的争论；“第五章”则是就上层建筑即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双方在资本主义理解方面的分歧和斗争。

第三部分（第六、七章）着重评述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断裂后出现的两种选择的第二方面——发展经典批判理论，构建现代批判理论的种种尝试。这两章以19世纪60—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为背景，在全面梳理第二国际理论家对资本主义新形态探索过程的基础上，着重从当代的新视角深入开掘和重新审视了第二国际理论界最终形成的三种有代表性的现代资本主义理论。其中，“第六章”是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论，“第七章”是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

和考茨基的“工业资本国际分工”论。在这一部分中,不仅全面比较了这三种现代资本主义理论在理论内容上各自的特点,而且进一步深入分析了它们理解资本主义的方法论模式及其世界观根源,并从当代视角对其理论贡献和历史局限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反思和评价。

参考文献:

[1] [德]考茨基,关于马克思和马赫的一封信[J],维也纳《斗争》杂志,1909年第2卷第10期

[2] [德]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一分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3] [德]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M],上海:三联书店,1955

[4] [德]卡尔·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5] [苏]纳尔斯基等,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6] [意]安·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 [苏]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

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模式及其当代反思^①

刘怀玉

本书系五卷本《资本主义理解史》第三卷，研究自19世纪90年代初到20世纪90年代初俄国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百年理解历程。其中包括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普列汉诺夫、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论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论，一战与十月革命时期列宁与布哈林的帝国主义论，十月革命后布哈林的过渡时期论，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斯大林与苏联学界的资本主义危机论，以及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学界和苏共历届领导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等六个理论发展阶段或理解模式。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历史逻辑总体上是对列宁本来正确、但有历史局限性的资本主义观的片面理解与发展过程。

—

19世纪中叶的俄罗斯，是一个政治上相当专制、经济上比较落后、思想上严重禁锢的庞大的封建军事帝国。初看上去，它似乎是最不可能会

① 本文选自张一兵主编《当代资本主义理解史》第三卷《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观》（刘怀玉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的导言。——编者注

发生革命、也最不可能传播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国度之一。但恰恰是在这块横跨欧亚大陆、幅员辽阔的广袤而寒冷的土地上，成长起来了世界上第一批用马克思的古典资本主义理论来思考与解决西欧之外的社会历史发展问题的革命知识分子。众所周知，俄国是最早传播与介绍经典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理论的国家与地区之一（西方曾把这种现象称作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1]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1867）的第一个外文译本就是俄文版（1872，圣彼得堡）。而《资本论》第二卷（1884）和第三卷（1894）的俄译本也是在德文版刚刚出版后就分别于1885年和1896年问世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思想开始在俄国著作中的系统传播，是同当时基辅大学经济学教授季别尔（1844—1888）的名字分不开的。他所著的《大卫·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1871）和《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研究》（1885）是普及宣传马克思《资本论》思想的最早的和非常成功的著作。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中就曾对季别尔的工作明确给予嘉许。^[2]（p. 111）《资本论》三卷的俄文版的传播深刻地改变了俄国（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整个思想文化界几代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历史观与价值观。

早在19世纪40年代，别林斯基（1811—1848）就读到了刊载有马克思恩格斯论文的《德法年鉴》（1844），巴·瓦·安年柯夫（1812—1887）则可能是从马克思寄给他的信中最早知道了马克思刚刚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1847）的人之一。而民粹主义的革命家特卡乔夫（1844—1885）在19世纪60年代就读了马克思的著作。更不用说巴枯宁（1814—1876）这位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早在1844年就通过卢格与马克思相识，随后与马克思争吵了大半生。但就是这样一位马克思生前遇到的很难缠的理论政见上的冤家夙敌，巴枯宁同时还是《共产党宣言》一书的俄文第一版（1869）译者。巴枯宁的俄译本连同后来普列汉诺夫的译本（1882）在相当程度上扩大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在俄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俄国民粹派经济学家弗列罗夫斯基（1829—1918）在1869年出版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被马克思誉为在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之后“最重要的一本书”，^[3]（p. 421）客观上也扩大了马克思主

义思想影响。尤其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之后,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俄国先进知识分子(诸如拉甫洛夫、洛帕廷、丹尼尔逊、柯瓦列夫斯基、查苏利奇、普列汉诺夫等人)之间的频繁、热诚而深入的书信与私人交往,更使得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资本主义研究进程与俄国知识界对它的了解宣传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当然,毫不奇怪的是,俄罗斯同时也是最早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理论模式提出批评与挑战的地区之一。

由于俄罗斯知识界有着一个长期的跟踪、接受与研究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理论的思想“前史”或学术传统,俄国及尔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才具备了良好的基础。苏俄的资本主义研究不仅构成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与形态,甚至长期处于领先地位或成为核心地区。已有学者指出: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19 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理论发展的重心在德国,而从 20 世纪初也就是 1905 年前后则转向俄国与苏联,而到了 1929 年大危机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心再一次转向了美国、日本与英语国家,直到苏联解体。^①但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首先并不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已经达到的思想理论高度基础上的直接继续,而是从本国的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中和远远低于西欧现代文明进步水平的情况下重新开始的。正像青年马克思很早针对“德国式的现代问题”时所说,“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所以,“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pp. 6\11)}或如列宁更加准确地指出的那样:“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5](pp. 274—275)}列宁还说过:“在分

① Cf. M. C. Howard and J. E. King,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Volume I . 1883—1929*,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9, pp. xi—xii, p. 129; 并参看[英]M. C. 霍华德、J. E. 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1929—1990》,顾海良、张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 页。

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具体特点”。例如，“如果我们要懂得民族自决的意义，（那么就）不是玩弄法律上的定义，‘杜撰’抽象的定义，而是去研究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条件”。^{[6](pp. 371\375)} 19世纪下半叶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特点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保留农奴制的条件下产生与发展的。俄国资本主义的艰难发展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19世纪上半叶德国那一幕历史的重演：“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它除了“现代的”灾难，还有“古老的”灾难。^{[2](p. 100)} 这个历史背景深刻地影响着19世纪后期先进的俄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理论的接受与理解的过程。当时，在革命知识分子队伍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资本主义并不是俄国发展的必经阶段，俄国由于村社而比西方更接近于社会主义。故从一开始，俄国思想界就缺少对资本主义客观全面的历史性认识的气氛。

其次，俄国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理解不仅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带着强烈的时代内涵与阶段特色。这是“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迫切的直接行动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6](p. 279)} 比如，在1905年之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关心的重点是把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应用到本国实际中；从1905年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国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政治与哲学；而到了一战期间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重心又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经济批判问题上。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6](p. 785)} 应当说，列宁的以上论述完全适用于俄国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理解的真实发生过程。

二

从19世纪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前后到1905年俄国革命前夕，

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上的第一个阶段,是初步运用马克思的经典资本主义理论回答与解决俄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时期。用列宁的话来说,当时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理论工作的方向应当是具体地研究俄国经济对抗的一切形式,研究它们的联系和一贯发展,凡是这种对抗被政治史、法制特点和传统理论偏见所掩盖的地方,都应把它揭示出来。理论工作应当把我国现实作为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系给以完备的说明,应当指明劳动者在这个体系下遭受剥削和剥夺的必然性,指明经济发展所昭示的摆脱这个制度的出路”。^{[5](p.77)}这一时期理论问题的焦点是,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历史命运如何,即到底有没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是否适用于俄国的国情?在这一阶段参与问题讨论的是意见极端分歧的几个阵营:首先是以普列汉诺夫与列宁领导下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早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其次是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持抵制拒绝态度的民粹派,还有非批判地接受与拥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派与合法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一书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次阐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和反对民粹派关于俄国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理论的重要经济著作。他针对民粹派提出的俄国应不应当经过资本主义这所“学校”的问题,以大量的经济社会发展事实回答说:“俄国将经过资本主义的学校吗?那末我们毫不踌躇地用一个新的问题来回答,为什么它不在它已经进了的学校里毕业呢?”。^{[7](p.313)}但他只是理论地证明了俄国与西欧经济发展的共同性,却没有具体地历史地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特殊性。列宁在1895—1899写出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巨著是该时期的代表作。它的主要贡献是运用马克思《资本论》基本理论模型与方法,充分肯定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及其进步意义,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消极、黑暗、矛盾的方面。但这本书仅从国内市场的角度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而且只限于分析改革以后的时期,只限于分析俄罗斯各省的资料和分析这一过程的经济方面,而没有专门研究俄国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社会发展问题,没有进一步思考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后果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策略问题,选择什

么样的革命道路问题。

从1905年革命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俄国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理论理解进入第二阶段。这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真正开始摆脱第二国际的资本主义理论解释框架，首次独立地思考与解决本国实际问题的时期。由于革命的失败以及斯托雷平所推行的政治上高度专制的改革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社会意义以及俄国革命道路认识发生了明显变化，这就是不再抽象和一般地肯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步意义，而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明显存在着“美国式”的进步道路或者“普鲁士式”的反动道路两种抉择；并认为前者只是一个“低一级”的问题，而后者则是一个“高一级”的问题。^{[8](p. 296)}进而，列宁强调资本主义发展在历史本质上的腐朽反动性及其必然灭亡的趋势；不再泛泛一般地强调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与前途，而是历史地突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以及进一步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策略，并预言：“俄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信号。”^{[9](p. 296)}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俄国十月革命，俄国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理解进入第三个阶段，这是从根本上动摇与突破第二国际理论范式，形成全新的资本主义理解逻辑的认识论断裂时期。从此，第二国际走向破产，第三国际或苏俄马克思主义反成“教主”。诚可谓“正统忤逆”而“别子为宗”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资本主义发展所出现的新特征，列宁对资本主义的现实认识与理论理解也发生了明显地裂变与重构，即形成了后期资本主义观，其代表作就是1916年写就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此时断言，人类历史已经进入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他把帝国主义当做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帝国主义的出现，从本质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与前途命运，即从竞争的、具有强大推动力的、前进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垄断的、垂死的、腐朽的垄断资本主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既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方法论的继承，也是对第二国际思想家们的帝国主义理论范式的突破与创造性综合；是在基本继承霍布森的“资本扩张本质论”、希法亭的

“金融资本垄断论”，部分借鉴卢森堡的“积累规律论”，直接吸收布哈林的“寄生资本论”，全盘否定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基础上完成的。本书以深入细致的文本解读为基础，比较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艰难而卓越地创生过程：即历史地再现了列宁如何把关于帝国主义的“三个提纲”、“二十个笔记”转换为《帝国主义论》一书的微观心路历程。自此之后，俄国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理解的历史逻辑便基本确立，即是在列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所形成的关于“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的（最高的）阶段”的核心观点指导下进行的。略微夸张一点说，长达七十年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在某种意义上乃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垄断资本主义论的一连串注解而已。到上世纪70年代为止，苏联学界关于资本主义理解的基本观点与方法论的主要特点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他著作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结论为构架，以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论断为历史起点，来概括历史、诊断当代、预见未来。实际上前苏联与东欧学界把理解资本主义的重点基本上放在对马克思和列宁经典思想遗产的固守、辩护、阐释上，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对不断变化着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现实的客观认识。

三

本书共分九章。前四章以列宁的思想发展为主线分别集中论述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初俄罗斯与早期苏联马克思主义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资本主义观及其明显而深刻的转变过程。其中第一章研究从19世纪末到1905年革命之前俄国思想界的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派”和马克思主义等几方围绕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命运问题的争论历史过程。第二章概括总结从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1914）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这一时期俄国思想界的民粹派、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以及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派之间围绕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与资产阶

级革命道路选择等重要问题发生了尖锐分歧与重新组合的复杂局面。第三章探讨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时期列宁的资本主义历史观。这三个时期的基本情况与内容上文实际上已作交待，故不在此重复。第四章则追踪十月革命之后列宁领导俄国与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七年间对资本主义的最后认识成就（这个七年并不构成列宁对资本主义理解的独立阶段）。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大胆地突破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与教条，坚持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比较全面系统地构建了俄国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与帝国主义理论以及建党、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列宁是根据变化着的历史客观环境，而不是从理论书本和主观的政治意愿，来制定自己的政治思想纲领的。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是一个根据客观实际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是一个根据客观实际变化而及时调整与改变革命与建设政治方案、寻找革命主力军与同盟军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设计师。总体来说，十月革命之后的七年列宁对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规律问题并没有专门的系统研究。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先进文明成就并努力将其用于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这是晚年列宁资本主义观的主要内容。列宁明确指出，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的西方。”^{[10](p. 501)}但在重视利用发展资本主义文明的同时，列宁又提出对资本主义要采取本质上的否定和限制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双重认识逻辑结构。从发展的过程上看，晚年列宁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否定、肯定、再否定和最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肯定的四个发展时段：即从1917年底到1918年初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1918年春天，由全面否定到部分肯定；1918年下半年至1921年春天“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再次全面否定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重新肯定阶段。

第五章专题评析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从十月革命胜利到战时共产主义，再到新经济政策时期，这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上的一段重要过渡时期（总体上属于第四个时期）。布哈林是这一时段最重

要的理论家。布哈林既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也是从列宁到斯大林的政治与思想的历史性过渡的重要环节。布哈林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可以大致概括为三个发展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提出的“帝国主义是全世界范围的资本积聚和集中过程的再生产”理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提出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与“消极扩大再生产”理论,以及“新经济政策”时期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进入“相对稳定阶段”理论。第六章历史地解读斯大林对列宁的帝国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系统阐释与发展。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斯大林以其强有力的个人影响打造出一个在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高度集权统一的斯大林主义体制与时代,苏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也因此进入到一个完全同质性、体系化、成熟型发展时代(总体上属于第五个时期)。斯大林紧紧抓住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这个前提而大大提高了列宁主义的时代意义与价值,指出列宁主义即“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解,也经历过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这就是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相对稳定论”^①到20年代末以后的“总体

① 俄共十四大(布)这里需要说明,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通常所说的俄罗斯与苏联“共产党”及其全国代表大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俄国“共产党”最初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8—1918,习惯中也称“俄国社会民主党”),这20年间共召开了七次代表大会和七次代表会议。其中,自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拉格召开第六次代表会议之后,该党便从组织上公开分裂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由于孟什维克派被当场开除出党,从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又称“布尔什维克党”,简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更名为“俄国共产党(布)”。从1919年3月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到1925年12月召开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这七次党代表大会一般依次简称为俄共(布)八大至俄共(布)十四大。1925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又决定把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从1926年10月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始到1952年10月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为止,斯大林主政期间的这五次代表大会通常依次简称为联共(布)十五大至联共(布)十九大。1952年10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原来的“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改名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因此,从1956年2月赫鲁晓夫主持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一直到1990年苏共最后一届大会即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为止,这34年间所召开的九次代表大会通常依次简称为苏共二十大至苏共二十八次。此外,从俄共(布)八大(1919年3月)到联共(布)十八大(1939年3月)这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还分别地召开了相应的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但自从1941年召开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会议后,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停开了47年之久,直到1988年6月才召开了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参看鲁鲁、舒祖武等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大事录(1847—1990)》,黄河出版社1991年版)。

危机论”^①。整体而言，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上原创性最少但影响力最大的经典思想家。

本书第七、八章分别考察苏联学界在斯大林执政的上世纪 30—50 年代初期和斯大林逝世之后的 20 世纪 60—70 年代这两个时期对资本主义危机问题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研究成果。在 20 世纪 30—50 年代，苏联学者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中心问题，就是怎样理解西方经济大危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与新趋势，尤其是在危机与二战期间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应急出现、战时特征。该一时期以瓦尔加和门德尔逊为代表的苏联学者一方面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对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细致地阐述与完善，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有史以来各个阶段周期性的危机进行了全面描述，并对经济危机的根源、表现、不可避免性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形成了相当完整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

自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的资本主义理解史进入了一个有重要突破、但始终未能取得根本突破的教条僵化时期（总体上属于第六个时期）。换言之，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半期至 70 年代，苏联理论界对资本主义理解进入了一个“非斯大林化”时代。这是一个打着“回到列宁”的旗号（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在新的意识形态教条和冷战思想视野中理解资本主义现实新变化的历史时期，其关键词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如此，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本质问题的理解也发生了明显的范式转变，这就是从苏共二十大之前占主流地位的“国家服务于垄断组织”的“工具论”开始逐步转变为国家与垄断资本的“相互结合论”，或者国家与垄断资本的“相互独立论”。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更多的苏联学者注意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因而提出所谓国家与垄断组织之间“经常是矛盾的”观点。其次，苏联学者还研究了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国际垄断主义发展的现实历史过程与特征。第三，学者们还研究了科学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结构所产生的

^① 从联共十五大（布）开始直到他晚年。

强烈影响,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革命是战后资产阶级社会的状况、结构和面貌发生改变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并把其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战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第九章将专题总结讨论自斯大林 1953 年逝世到 1991 年苏联解体近四十年间苏联共产党历届执政者对资本主义认识的成败得失。如果说在上世纪 60—70 年代,苏联学术思想界一直面临着如何给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与发展趋势重新加以定性、定位的比较抽象的理论问题;那么,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体制共存条件下,是与资本主义根本对抗,还是与之和平共处?这则一直是后斯大林时期(苏共二十大至二十八大)的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总体来说,后斯大林时期苏共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大致上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阶段:1953—1964 年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的所谓“和平竞赛”论或“有限缓和”论;1964—1985 年勃列日涅夫等执政时代(苏共二十三大至二十六次)为争做“超级大国”而实施的军备竞赛战略和“冷战思维”;1985—1991 年(苏共二十七次至二十八大)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所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思维”,这是一种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原则与底线的、因而是极端错误的改革思想模式,它固然彻底冲破了苏共过去长期坚守的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尖锐对立起来的僵化封闭的意识形态框架与治国方略,但最终却断送了苏联与东欧的社会主义历史。

四

本书通过研究近一个世纪的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将初步得出这样一些基本结论。

(一) 研究列宁资本主义观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列宁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论不仅是列宁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政治思想基础;进而言之,也是理解苏联模式成因与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一个重要理论源泉。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及其所缔造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基于他对第一次世界

大战前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某些特征规律的正确把握与利用。苏联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体制一方面是列宁思想的实践,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这种具有时代特征与历史局限性的科学理论的片面化与僵化理解倾向。列宁对资本主义基本特征、发展规律及其趋势的判断虽然难免有时代精神氛围与俄国历史经验的局限性,但他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规律特征及其垄断的必然性所做的基本判断,仍然是我们把握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规律与社会主义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理论与方法。反思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总结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经验教训,形成对21世纪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科学新判断,展望思考21世纪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社会主义基本问题,从历史与逻辑上讲都不能不从重新研究列宁的资本主义观开始。

(1) 从最表层和最初的原因来看,关于列宁思想的意义与价值之争是因斯大林模式评价问题而起,因为列宁思想是斯大林思想及其体制的最重要来源。如何对待斯大林最终就是一个如何对待列宁的问题。(2) 稍深一层就是如何对待整个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问题,是由苏联的成败而引起的问题。因为列宁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缔造者,对苏联解体成因的反思势必涉及到对整个列宁政治思想与社会主义理论的评价问题——究竟是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歪曲了他的社会主义观,还是列宁的社会主义观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就注定了苏联社会主义道路与制度是空中楼阁,是不可行的?(3) 再往下追第三层就涉及到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也就是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判断正确与否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列宁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与现实判断是俄国革命与苏联制度得以可能的思想前提与基础;如何评价列宁的社会主义观(政治思想)最后就是如何评价他的资本主义观(经济社会理论)的问题。(4) 最后,从今天资本主义全球化强势发展与社会主义暂时陷入低潮这个大背景来看,如何评价列宁的资本主义观之功过是非显得尤其突出。列宁思想在今天还有没有现时代价值,说到底就取决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他对资本主义本质特征、前途命运的判断还有没有可取性。实际上列宁在今天之所以充满争论,就是因为他在近一个世纪以前已经宣布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

“最高”阶段，是“垂死的”、“腐朽的”、行将灭亡的社会。而今天现实却是资本主义表面仍然一片强盛，甚至达到了从来没有过的现实影响力。许多人攻击列宁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应该怎么看？是列宁的断言从开始就错了，还是列宁没有充分估计到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形势与潜在能力，抑或是列宁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宣判仍然没有过时？所以综合起来看，如何认识列宁的资本主义观成了理解列宁思想当代价值的一个关键问题。

本书认为，列宁资本主义观中的两个基本范式在当代仍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一是“资本主义发展论”：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先进成果发展落后国家的现代化事业；二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形态论”：垄断资本主义仍然是当今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形态与规律。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之说公正而言，列宁不是“最高(或最后)阶段论者”。他关于帝国主义历史定位的最准确说法是：“各先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11](p. 12)}；“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定的发展阶段。”^{[12](p. 141)}他当初于1917年出版这本书时用的书名并非“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是模仿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副标题“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采用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这个标题。直到列宁逝世十多年后，即1935年书名才首次被改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个改动决非细枝末节，而是意味深长，且影响后果深远。固然成为历史，但目前全球化资本主义仍然具有垄断的、帝国主义的特征，国家垄断与跨国垄断仍然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与现实特征。

(二) 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观的历史意义、局限及其当代启示

贯穿整个20世纪的列宁主义与苏联模式的资本主义理解史的基本逻辑是：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到垄断的资本主义，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跨国资本主义。本书的研究任务之一就是要反思苏联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问题认识上的历史教训。应该说，造成苏联解体、苏联与东欧剧变的原因很多，对资本主义现实过于简单而武断的认识，即并没有按照列宁所说的“我们要在认识与利用资本主义过程中发展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办事，则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可能趋势的能动利用，导致了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胜利与社

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批判与基本正确、但有片面性的认识利用导致了苏联体制，而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又反过来导致对资本主义现实新变化的静止封闭认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历史逻辑总体上是对列宁本来正确、但有历史局限性的资本主义观的片面理解与发展过程。

苏联学术思想界长期处在僵化封闭的意识形态教条控制之下，在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理解上更是打上了两大军事政治阵营对抗所造成的沉重而鲜明的时代烙印。到上世纪70年代为止，苏联学界关于资本主义理解的基本观点与方法论的主要特点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他著作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结论为构架，以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论断为历史起点，来概括历史、诊断当代、预见未来。实际上，前苏联与东欧学界把理解资本主义的重点基本上放在对马克思和列宁经典思想遗产的固守、辩护、阐释上，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对不断变化着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现实的客观认识。应当说，上世纪70年代之后，苏联与东欧学界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也有一定的进展，有不少突破，主要表现在试图超越机械的意识形态对立模式，对新科技革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这也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理论界思想界解放思想、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重要参考资源。

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状及其理论研究，历来是我党和我国宣传理论界密切关注的对象。但由于时代主题的不断变化，关注的立场、方式、情况等前后自然有很大的不同。改革开放前，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尽管与苏联官方学界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道路问题的认识上一度存在着尖锐而根本的意识形态分歧，但在关于资本主义问题的理解与认识上却基本是跟着苏联模式走。其主要特点是站在所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大阵营”对立的立场上，从“两个必然性规律”的政治信念高度来理解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趋势与本质。当时的学界主要关心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腐败面、消极面的批判攻击上，关注重点不可能是如何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点与长处来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而是长期处于“抨击敌人、歌颂自己”这样的极端、片面的认识模式影响之下，因而

缺少全面而客观的科学的规律性认识成果。

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们坚决实行对外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时,就必须超越传统的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的片面观点,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同时,又要时刻警惕西方敌对势力西化与分化我们的图谋,坚守发展社会主义。这种“借鉴论”与“防止‘西化’与‘分化论’”并举的发展战略日益迫切地要求我们必须把全面地科学地研究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课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新的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适时而果断地提出“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而不能回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这种“重新认识论”就开辟了我国思想界学术界客观而全面地认识资本主义问题的新时代。

历史业已证明,从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上半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再到今天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或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这既是资本主义社会一次次不断地陷入矛盾与危机的过程,也是逐步自我完善的成熟进步过程。比如,今天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表现在生产力方面的变化,就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走向知识经济;表现在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是所有制形式出现多元化趋势,经济运行出现政府宏观调控的趋势,收入分配关系出现了兼顾公平的趋势。当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出现了多层次的特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出现了民主化的趋向,民主选举制度更为完善,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因素大大增强;公民参与政治程度越来越广泛深入。发达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出现了新的变革。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在于科技革命的推动,社会主义的影响,对经济危机的恐惧等。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关系的自我调节,国家的社会职能大为增强,它不仅以各种政策手段从外部干预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而且还以大量的国家投入与国家消费直接地介入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国家干预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

国家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要求，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的自我调节。^[13]

从这样一种开放而深入的历史反思角度来看，在苏联解体之后研究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对于中国学界的启示意义就在于：

正像资本主义总是一个不断地超越自身固有的界限、矛盾和危机而盲目地扩张的自然历史过程一样，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一个不断地自我更新哲学方法论历史观的认识过程。相应地，社会主义作为超越资本主义历史局限性的自觉而宏伟的历史发展进程，也必然地是一个不断与变革着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现实相适应的、自我超越历史局限性的反复的、漫长的过渡过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往的社会主义制度形式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影响的局限性；而从未来的发展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所采用的暂时的局部的资本主义成果形式，完全可以被合理地理解为超越资本主义历史局限性向未来更高级社会主义过渡飞跃的历史性、当下性的具体表现。

参考文献：

- [1] [苏]列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发表和出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7]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M]，上海：三联书店，1959
- [8] 列宁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9] 列宁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0]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1] 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2] 列宁全集,第 2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3] 刘昫献,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论[M],石家庄: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

经济哲学视域中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①

唐正东

自卢卡奇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学者一般都从文化的角度来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一线索无疑弥补了“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所留下的理论空缺,从而在社会批判理论史上产生了应有的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首先,它并不足以代替马克思的思路,因为尽管马克思在社会批判理论的建构中的确相对侧重于对经济逻辑之历史效应的论证,但他并没有忘记文化线索的重要性。这不但表现在他对作为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哲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上,而且还表现在他对日常生活层面的“意识形态”和观念拜物教的批判上。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像有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弱化文化批判线索在整个社会批判理论中的重要性,他只不过没有把文化批判和经济批判割裂开来而已,而这正是其社会批判理论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原因。在弱化或放弃经济批判线索的前提下展开单方面的文化批判线索,不管是对文化工业或文化霸权的批判,还是对与“科学”相对的“意识形态”的批判,都潜藏着一个理论前提: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线索中已经无法生成批判理论的思想动力了。这是一个准确的理论判断吗?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难道真

① 本文选自张一兵主编《当代资本主义理解史》第四卷《经济哲学视域中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唐正东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的导言。——编者注

的已经摆脱了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本质矛盾的困扰,从而可以一往无前地展开其文化殖民的过程了吗?还是因为当代西方左派学者为了保持自己的左派形象而需要建构出一种学术景观?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西方左派学者都认同单纯的文化批判思路的,本书所要论述的就是那些坚持从经济线索出发来展开其批判理论的思想家的观点。这些学者没有循着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家所散布的观点而相信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已经挣脱了矛盾,而是坚持从生产过程或者说劳动过程的角度来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他们更没有过分扩大资本的文化霸权,而是始终从经济的层面来引出文化的社会效应。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坚持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不过,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他们必须解释当代资本主义所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尤其是“二战”之后出现的福特制资本主义相对繁荣的现象,因而这对他们在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上准确地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能力提出了挑战。从理论上说,他们只有充分地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贯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才有可能准确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所出现的新现实。也就是说,只有像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做的那样,把理论精力主要集中在对“抽象”是如何通过“中介环节”而在“具体”中得以转型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获得对资本生活过程的科学解读。但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这必须建立在对新事实的本质而不是现象的准确把握上。而上述经济学线索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都在对上述问题的解读中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不管是斯威齐的“消费不足”、巴兰的“经济过剩”、曼德尔的“自主变量”,还是阿格里塔的“调节模式”、利比兹的“社会矩阵”,都是用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情况的。这一点本来是没有错的,就像马克思曾用生产价格来解释资本生活过程的具体情况一样,但问题是,他们并没有把这些范畴当做资本主义本质规律的中间环节来使用,而是试图用它们来取代反映资本主义本质规律的剩余价值理论等内容。客观地说,这跟他们急于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经验层面上直接解释资本主义现实相关联。就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而言,一方面跟前苏东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拘

泥于抽象的本质规律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有关，另一方面也跟西方理论界在 20 世纪盛行的反本质主义思潮有关。在对“本质”不加区分的前提下，或者说，在对形而上学的“本质”和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本质”不作任何区分的前提下，盲目地追随西方哲学中的反本质主义思潮，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产生误读，从而把弱化或抛开“抽象”并全面转向经验层面上的“具体”，理解为对马克思科学方法论的“发展”。只要掉进这样的理论框架，那么，即使你仍然想坚持“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也无济于事了，因为你在基本方法论上已经站在了经验主义的层面上，而这是无助于准确理解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的。

譬如曼德尔，尽管他在整个西方左派学者的线索中是最坚持“抽象”与“具体”之间的辩证统一的，但由于急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直接面对“二战”之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现象，因而在方法论上也全面地倒向了“具体”，即以“自主变量”来支撑起的经验性解释框架，而所谓的“本质规律”只起到了把各种自主变量的作用连接起来并使其发生相互作用的功能。至于这种“本质规律”在历史发生学的意义上对这些自主变量的决定作用，则远远地被抛在了曼德尔的视域之外。再譬如法国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阿格里塔，尽管他的确也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意义上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并且客观地说，他的理论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种理论努力，但由于他在出发点上只是站在回过头去解释福特制资本主义是如何走出危机的这一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深入地剖析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转型形式的立场上，因而他在其理论的第一步，即分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嬗变的时候，就犯了一个错误：把劳资之间的关系只是当做交换关系，而不是当做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关系来看待，从而使其后来的理论展开过程越来越具有经验主义的特征。法国调节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阿兰·利比兹透过对《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同样重要的指认，试图在这一问题上有所作为，但由于他在基本方法论上同样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生学思路，因而最终也只能以对这一问题的模棱两可而告终。

由此而导致的理论后果是，不管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剖析，还是在对

危机之后的出路的指认上,都显得过于简单化。阿格里塔是这批学者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剖析得最为详细的,但即便是他的理论,也没能很好地说明为什么金融危机必然导致资本的私人所有制向资本的社会所有制转变,以及为什么资本的社会所有制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危机问题。更不要说像曼德尔这样被人指责为“顽固拒绝面对现实”的学者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简单化指认了。^{[1](p.142)}从根本上说,经验主义的解释方法使这些学者无法理解马克思意义上的那种“抽象”与“具体”之间的“上升”关系,因而或者把经济危机理解为某种经验现象,如经济过剩、金融危机等的结果,而看不到这些经验现象背后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相关联的本质,并进而在对危机之后的出路的认识上过于简单地偏向经济增长的维度,弱化甚至忽视了马克思“自由王国”范畴中所包含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维度;或者把经济危机僵硬地解读为资本主义本质规律的必然结果,但又不对这种本质规律在具体历史层面的内在化过程作出解释。

有的学者也许会说,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论是根源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换的客观事实的,即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当代西方社会中的工人都只是“挣工资的人”而已,他们已经没有了马克思所希望的那种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意识。既然如此,基于劳资对立关系的那种“抽象”层面上的范畴,如剩余价值等,不但不应该被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基始性范畴来演绎出整个批判理论的丰富内涵,而且还应该彻底地予以抛弃,代之以直接从经验现象层面能够抓到的理论支点。说实话,在当代西方左派理论界持上述观点的人还不少,这一方面当然跟“二战”结束以来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相对薄弱这一客观事实有关,另一方面也跟这些学者把太多精力集中在对前苏联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上,而较少关注对马克思、恩格斯本身思想的深刻研究有关。这种学术思路必然面临如下这一问题:一旦资本主义的经济不再像今天这么繁荣,并进而推动劳资矛盾的增长和阶级斗争的加剧,那么,社会批判理论是否就得重新改变?事实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这种情况已经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如法国、美国等国家中的工人由于利益受损而发动的大规模的罢

工运动等。如果社会批判理论真的会这样变来变去的话，那它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对社会形态之深层本质的洞察能力，从而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具有的那种科学性品格。也许，那些为了保持自己的左派形象而“为批判而批判”的人，会十分乐意接纳这种理论范式上的“随风飘动”，因为这能给他们提供足够多的“创造”新思想的源泉，但问题是，对社会生活过程之本质的认识却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推进。实际上，只要仔细分析就不难看出，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依然存在，它所内含的基本矛盾就不会消失，由它所主导的社会形态就不可能一直繁荣下去，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一点会表现得更为清晰。因此，真正的社会批判理论就应该在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繁荣的时候仍然能清晰地看出其内含的本质矛盾，并梳理出这种本质矛盾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从而揭示这种社会形态的未来走向。只有这样，社会批判理论才能够出现在社会公众最需要它的地方，才能昭示出自己的科学品格。

上述这种基于经济学线索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还有一个理论缺陷，那就是忽略了对历史主体的研究。应该说，自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基于文化线索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这一领域作出了很大的理论开拓，只是由于他们或多或少割裂了经济线索与文化线索之间的辩证关系，才不得不在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上高举“乌托邦”的旗帜。但可惜的是，就像文化线索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太多地吸收基于经济线索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有益观点一样，后者对前者观点的吸收也是少得可怜。这最明显地表现在这些学者只从客体的维度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必然被超越性，但并没有说明作为历史主体的工人阶级为什么必然能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使命。在这一点上，日本著名哲学家广松涉曾说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

让我们先从真伪性的问题来看吧。物象化的误认对于马克思的学知来说，在面向我们方面始终是倒错。但是，直接的当事人对于原本就是没有超出系统内视角的人们，即现体制下绝大多数的人来说，那看上去才是现实—真实。即使学知突然指出那只不过是误认而已，那大概也只会落

为永无休止的争论吧。对于体制内意识来说大体上是必然的物象化的误认,不是像被他人稍微指出便引起注意的谬误那样极为简单的、偶然的问题。从体制内的范例来看,甚至可以说那反倒是真理。〔2〕(p. 115)

我们认为广松涉的这段话的确指出了历史主体的复杂性问题。要想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必然会被超越,除了要从客体维度对之进行深入的剖析外,还必须从主体维度为之提供逻辑上的依据。否则的话,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效应与现实实践效应都会大打折扣。其实,在马克思那里,这些问题都是讲得很清楚的,尤其是在1848年欧洲大革命之后。对马克思来说,工人阶级完全有可能被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形态所束缚,从而沦为“消费者”,但这只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繁荣的时代才会出现的情况。一旦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临,也就是说,一旦工人无“物”可“拜”的时候,残酷的实践必然会迫使他们起来既反对资本拜物教的物质形式,又反对其观念形式。当然,与当代资本主义的观念拜物教相比,马克思时代的观念拜物教肯定要简单得多,但这应该更加激励社会批判理论家投身到对工人有可能遭遇的观念拜物教的复杂性的解读中去,而不应该对之视而不见。

从经济学的线索来传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尤其要注意,切不可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演绎的从商品的价值到生产价格、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的逻辑线索,理解为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的全部运用。应该说,这只是他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分析中对上述科学方法论的运用。除此之外,在马克思对社会历史过程的分析中同样也内含着上述方法论的内容,从生产方式理论,通过社会实践的“中介”,上升到对拜物教的物质形式和观念形式的双重研究,并从中引导出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必然性。虽然这一线索并不像前一条线索那样清晰明了,但只要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一点。而正是这一线索使马克思不仅清晰地解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规律,而且还准确地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在日常生活层面所出现的新现象,而更为可贵的是,他还对生产方式的本质规律与日常生活层面的新现象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科学的界定。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并非仅仅局限于经

济的线索,同时还包括了日常生活过程、历史主体的文化观念等线索,而把这些不同的理论线索串联起来的,正是其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因此,如果真想从经济学的视域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须清晰地看到马克思理论中的经济学线索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与包括历史主体线索在内的其他理论线索辩证统一在一起的。显然,本书所论及的这些学者都没能很好地从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中吸收足够的思想养料。

客观地说,真正对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进行准确把握和科学运用的,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理论这一科学层面的理论“抽象”,被中国共产党人“上升”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具体”的层面,并由此而实现了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透过对本书所论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家的观点的分析与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学术思想史意义。

参考文献:

- [1] [英]M. C. 霍华德 & J. E. 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第2卷[M],郑吉伟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 [2] [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M],彭曦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

西方左派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①

胡大平

作为《资本主义理解史》的第五卷，本卷研究范围已经在全书序言中交待过了。为了简单而清晰地勾勒出本卷所涉内容的历史逻辑的变迁，我们没有采取一般历史叙事的描述性时间框架，而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批判、消费社会批判、晚期资本主义批判、全球资本主义批判等四种模式来叙述。这四种不同的模式形成于不同的时期，尽管在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中作为一种共时性理论资源在不同的话语中得到反映，但前四种之间大致存在着一种历史替代关系，可以看做列宁“帝国主义论”之后西方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试图把握资本主义变化而依次作出的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期以及建立其上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主流类型。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及其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性质和意义

尽管资本主义批判是一种可以独立地观察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发展及其性质的视角，但它不仅受制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所概括的

① 本文选自张一兵主编《当代资本主义理解史》第五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胡大平、张亮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的导言。——编者注

对象范围的定义，而且亦反过来对其形成实质性理论竞争，从而进一步使这一论域的许多重大争论复杂化。因此，在展开这一主题讨论之前仍然有必要对相关基本问题进行界定和探讨。

就国内研究来说，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开始，一直到今天，一个有趣的问题始终占据着争论的中心，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算不算马克思主义”。在国外相关争论中，类似的问题也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基础性问题的长期存在，既见证了思想史研究的某些普遍性问题，例如相关人物、学派、思潮之间的内在连续性及其逻辑标准问题，也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研究的独特性，例如由恩格斯开辟而由列宁强化的阶级立场和哲学党性问题，并且这两类问题都因为具体人物、学派和思潮内部之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张力而复杂化。在传统研究中，消除这些张力曾经构成思想史叙事的基本目标之一，而在今天，尊重甚至维持这种张力似乎成为思想史研究的独特价值之一。甚至，这也使得黑格尔-马克思传统的辩证法以及福柯的知识(思想)考古学大放异彩，例如，以后现代历史叙事学著称的海登·怀特就基于此不仅提出了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 19 世纪欧洲史学的再评估，而且提出一种具有宏大抱负的“元史学”视角。^{[1][2]}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研究来说，这不只是从外部提出一种研究参照问题，而是从内部以不同的方式重新提出了处于其核心的“意识形态”及其产生的“现实基础”(即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关系问题。无论如何，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叙事(即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不仅面临着自身与其现实基础之间的关系，而且就是对这种关系的协调和干预。不理解这一点就试图说明马克思主义及其在 20 世纪的曲折发展，这几乎不可能。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这同样特别重要。

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算不算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在东西方研究中的长期存在，这个事实不只是见证了在思想史叙事中长期对绝对的或同质性思想标准(即已经完成的既定正统观点)的依赖，而且说明这种依赖本身对思想(理论、话语)历史性质的误解。从资本主义批判角度来观察和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发展时，我们将更加直接地面对这类问题。这是因为，这一角度更加强烈地突出了对象对话语的制约作

用。如果说马克思早已强调意识形态本身“没有历史,没有发展”,它的变化所折射的正是“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物,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3](p.73)}那么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之后形成东西方历史分野——“十月革命”道路同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化和西方化,这种分野不正是改变着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实践的产物吗?^[4]这并不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纷呈及其与东方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本人的差异都可以直接还原成它们的形成条件,而是说,这一不断变化着的条件始终是那种差异的中轴:它不仅实质性地催化了第二国际内部的分裂以及修正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基本精神的背叛,推动了前苏东和中国道路的历史形成,而且确实造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发展和代际差异。在此,首先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批判确实可以成为在理论上解决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围界定、逻辑变迁厘定和基本价值判定等基本难题的有效视角。在本书中,我们实际涉及的理论范围便是在此视角中规定的,因此既与安德森的经典定义也与国内流行观点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实际上,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围的理解,基本原则一直遵循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的思想。在那本书中,张一兵和胡大平指出,作为一种哲学文化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承袭了马克思之资本主义批判立场和关键性理论资源,汲取了当代西方哲学文化所提供的思想财富,包含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甚至整个西方文明的独特理解,“正是在这些资源的互动、接合和冲突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内在逻辑极为紧张而外在表现十分庞杂的理论思潮”。这种外部特征与其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诉求“革命”极其困难是直接相关的,正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替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才提出了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新道路”,这种“新道路”:虽然带有时代变化的要求,但总体上却也并非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或方法逻辑对时代的把握,而是其基本理论依赖转移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例如,从布洛赫(Ernst Bloch)到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从科学到乌托邦”,即是以颠覆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提为背景的。正是在他们的理论逻辑上,我们将看到,无论是因为文本依赖而

带来的马克思哲学解释问题，如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公开发表而带来的“两个马克思”论战或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反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问题，还是因为现实变化而带来的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问题，如“苏共二十大”引发的西方对马克思主义态度的变化和广泛的争论，这些问题都超出了马克思哲学理论本身，而和不同代表人物的政治态度直接联系起来，更进一步，政治态度的变化又直接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哲学所涉及到的诸如自然、历史、实践、社会、人等基本问题的看法。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马克思只是问题的线索之一。^{[5](pp. 7-8)}在那一本书中，由于哲学这个主题的限制，我们没有直接把资本主义批判作为其主题，而是作为叙述的两个基本中轴之一（另一个是哲学观念的内在史线索）。我们将这两个中轴看做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6]那本书例证的文本学研究方法论的基本支持，这种支持将产生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自觉性。由此，我们可以摆脱那种惯常的话语表象的诱惑而深入其原初语境，在原初语境中分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逻辑，在时代的断裂之中考量它们的文化内涵和实质。在近几年中，张一兵教授不仅提供了大量此类研究的范例，例如《无调式的辩证幻想——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文本学解读》（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版）、《文本的深度耕犁》（第 1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等，而且在理论上更清晰地描述了其历史叙事的基本特征和意义。正是基于这种方法论，我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许多基础问题上形成了比较独特的理解，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既深化了对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研究，又拓展了对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动态的分析。

在概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特征时，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7](p. 117)}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分离表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故意闭口不谈那些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传统最核心的问题：如详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认真分析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机器以及推翻这种

国家机器所必须的阶级斗争战略。”^{[7](pp. 60—61)}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表现出“形式的转移”，也就是说，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等人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他亦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密切关注上层建筑，注意的焦点转向了文化、美学和意识形态等领域。这种转向相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来说促成了“主题的创新”。但是，当安德森把“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作为焦点的时候——这既构成其同情这一“创新”理论动态的基本原因，又是其批评它的前提——并没有实质性地理解战后（实际上是 19 世纪 90 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变迁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基本意义。这也造成两个问题。

一方面，在描述出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主题的创新”时，并没有更深地揭示这种创新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批判旨趣之间的关系，从而亦没有阐明它们在资本主义理解方面的实质意义。然而，就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精神和核心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是它定位新时代理论运动方向（即批判理论）的基础，而且正是对资本主义研究的深入决定着批判理论的每一步深入，不仅在其早期以德国为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批判与以工具理性批判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批判理论建构之间、在其以美国消费社会为中心的观察与新人本主义的启蒙辩证法之间、在其对战后资本主义的整体理解与反人本主义的否定辩证法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而且其早期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格罗斯曼与波洛克之间关于国家资本主义观点的分歧（当然，在战后这些分歧已经由于现实的检验而具有了不同理论价值）实质性地影响了早期霍克海默、阿多诺这些第一代成员与哈贝马斯这些第二代成员之间的立场差异，可以说，波洛克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生命力的看法构成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国家资本主义批判和哈贝马斯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规范分析之间差异的核心。可以说，正是这一维度的缺失不仅形成了基于纯粹哲学逻辑（概念史）视角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意蕴和理论价值的一些误判和难解的争论，例如，早期卢卡奇之物化理论与马克思异化理论之间的关系，启蒙辩证法与海格德尔哲学之

间的某种“亲缘性”等，而且实际上贬低了诸如此类论点的理论价值与实际社会影响，这些影响不只是局限于在理论和思想上拓展了人们的历史视野，而且更深地影响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变迁以及更进一步间接影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决定视野。在这一点上，不仅正如卢卡奇早就指出的那样，在20世纪初社会主义的计划视野甚至成为资产阶级精英意识形态的内容，而且通过霍克海默、阿多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杜威等人批评性的一致性清晰地看到，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亦成为纠正资本主义“单向度”发展的必要思想前提，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中，我们就不难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左派之间有关对方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共谋指责的普遍性。虽然说并不是批判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改良，但是如果不注意它们之间的潜在关系，我们就不能在今天正确地提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发展及其价值。由于问题本身的重要性，我们在此提出两个重要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霍克海默提供的。1968年4月，即在后来史称“红五月”的前夕，批判理论接生婆霍克海默留下了这段话：

好心的人，想从批判理论中得出一些结论，以便采取革命政治行动。然而，并没有什么确定的方法去促成这一点。唯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是：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责任有深刻的洞察。在变化繁复的历史环境下，不假思索地和教条地把批判理论运用于实践，只能有助于批判理论旨在谴责的那个过程。这是那些严肃对待批判理论的人，包括同我一道发展它的阿多诺在内，都同意的。^[8](序言)

这段话实际上解释了阿多诺等人既然作为造反青年的思想导师又为什么直接作出反对大学生运动这种反常举动。另一个例子是鲍德里亚，他在左派中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激烈批判。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体系已经接近它的完美性，这种完美性使得历史地出现过的最激进批判——马克思和精神分析等——无一例外地成为体系自我繁衍的资源。^[9](pp. 3—4) 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通过用象征交换来替代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使资本主义批判再激进化的思路。

另一方面,涉及对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问题。安德森在这个主题上亦留下了重要的指南性论著,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10]但是,我们也看到,安德森以及绝大部分研究者都流于对现象的罗列,而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内在逻辑的把握。实际上,无须强调马克思主义,我们亦能够坚持,理论逻辑的变迁与理论所指向的现实对象变迁是内在相关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问题,即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经历 1968 年运动的检验便失败了。也因此,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新型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生长和扩散,其多元化和碎片化特征,都与这种失败联系在一起。为适应当代研究的需要,在(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我们界划出后马克思思潮、后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新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5](pp. 409—425)}这些思潮与马克思的理论之间存在着难以沟通的距离,但是它们都能够而且必须构成今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参照。这是因为,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之资本主义批判的旨趣,并且基于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为我们在今天评估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提供了重要参照。在本书中,我们区分出四大模式来叙述西方马克思主义之资本主义批判,这种区分的含蓄意义之一便在于,面对资本主义的不同方面或者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实际上产生了不同的资本主义话语,而这些话语之间的内在沟通便在于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连续性和断裂。这一分析立场提出更广泛的方法论要求,也能够大大地拓展既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路。这与安德森研究的路径便有了很明显的差异。实际上,基于我们的思路,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理解安德森本人的有趣变化。在 2000 年,他领导的《新左派评论》在四十余年宗旨不变之后作出了引起左派批评的重大调整,产生了所谓“第二系列”。然而,这种变迁并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为安德森政治立场的易弦更帜,而是一种更现实的努力,并且正是从这里更清晰地看到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结中仍然保留那种“立场优先”的影子,而没有真正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之资本主义批判的潜在意义。当然,这并不是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

上是唯一具有发言权的话语,而是说,通过这一视角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当代理论的状况及其趋势,从而对自身发展理论的前提和基础有更加自觉的认识。

总体上,我们讨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政治上有别于西方共产党组织和非西方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条资本主义批判思潮。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运动,它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播散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现实发展及其冲突性和压迫性社会后果的直接征兆(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可能合理地理解萨特这样的思想家,为什么大谈马克思主义而不管其性质和基本精神究竟如何,才可能合理地理解为什么德里达这样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并没有实质性关系的思想家却大谈“马克思的幽灵”)。在这样的视角中,尽管我们出于规范学术研究需要而区分出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70年代之后多种新型的与马克思相关的思潮,但实际上采取了更为广泛的理解。例如,直接在安德森之外提出一个理论问题,即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范围。我们应该注意到,安德森在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时并没有包括他本人所在的英国理论动向,然而包括雷蒙德·威廉斯、爱德华·汤普森等一批重要的英国思想家在全世界20世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话语的发展无疑具有显著的地位。

当然,这种理解也将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并且由于实际目标限制,本书所选择的讨论对象也并非完全与这种理解一致。正如已经在国内学界产生的争论所表明的那样,有人担心,这种定义可能排除了一些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而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学者。实际上,这个问题影响极小。因为,极少存在着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一方面努力经营一种现实可行的(或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无视这种理论与资本主义现实批判之间的关系。相反,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表述和发展无不受到其对资本主义现实理解的影响,并且多数都形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理论著述。例如,在我们把柯亨、埃尔斯特和罗默等人所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纳入讨论框架时,绝不是因为它们仅仅基于某种规范理论(分析哲学或功能分析)提出了对

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独特理解,而是因为他们确实在这种理解与资本主义批判分析之间作出了重要沟通。例如,罗默就长期致力于以实证经济学思路对资本主义不道德性进行批判,亦试图沟通马克思本人经济学与伦理学立场。^[11]柯亨则推动了英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运动,这一运动长期致力于平等和自我所有制问题。^{[12](p. 725)}因此,在此,这一理解视角真正排除的是我们称之为“西方马克思学”的那一类研究,它们或囿于纯粹的学理或出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无视马克思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前提和历史使命的规定,试图在逻辑上描述出一种与社会主义运动自我理解不一样的马克思形象。^[13]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深化与资本主义批判的关系

在前文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围的分析中,我们实际上已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发展中的一个重大断裂,即以 1968 年为界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结。这只是一个显著的历史标志,就实际理论逻辑来看,在 1973 年左右,断裂后的新动向才明显地突出出来。例如,在 1973 这一年,鲍德里亚发表《生产之镜》,哈贝马斯出版《合法性危机》,这两本著作从不同的方面不约而同地攻击了生产方式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内核,从而彻底释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张力,同时也充分打开了从生产理论向文化理论转变的道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思潮终结之后,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呈现出社会理论或文化理论的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发展作出了四个阶段的划分。^{[5](pp. 17-19)}在本书中,我们提出了新的更具综合性的划分。在这种划分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转移、逻辑深化、形态变迁与资本主义批判之间的关系更加显著地呈现出来。在更为深层的意义上,这种划分,一方面注解了卢卡奇曾经作出过的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判断——“任何想对社会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的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尝试,必须与对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经济分析联系起来。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结构中的科学与哲学所具有的不可分割性也绝

对要求这样做”，^{[14](p. 295)}从而强调了资本主义批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意义；另一方面，亦揭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整个 20 世纪从革命美学到话语政治学的转向，在终点上说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总体特征及其理论价值。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突出资本主义批判意义的时候，我们不只是重复强调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全部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原动力和历史使命，而且旨在重申从生产方式变迁来理解历史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视角对于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意义。我们确知，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的理论成果（如恩格斯所言“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的发现）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前提和基础。在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资本主义理论不是某种一般哲学（如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资本主义研究而产生的理论成果，相反，如果存在着这样一种一般性哲学，那么它恰恰是资本主义研究的产物。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以一种独特的经验见证了上述问题。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再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各种各样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版本，尽管它们一直受到某种一般的或特殊的历史哲学纠缠，但其理论始终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整体或局部表述，因此受他们对资本主义判断的严格限制。我们看到，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物化的焦虑决定了其对黑格尔主客体辩证法的依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否定辩证法”是围绕整个学派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同一性暴力这个中心运转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确切地说是其有关晚期资本主义危机认识的回响，而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包括高兹、鲍德里亚、拉克劳和墨菲、齐泽克等等在内的各种比马克思本人还“激进的”后马克思理论动向，无不清晰地表明：今天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理论表述对当代资本主义之阶级结构、媒体（技术）、民主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实际上，也正是这些方面的变化改变着人们对资本主义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甚至，也正是这一点决定着今天各种版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价值与意义。因此，如果离开这一维度，我们就会流于那些激进学者的惊世骇俗的话语，在追逐新的理论表述过

程中丢弃自己的立场,自满于一些“新的”理论“发现”,甚至动不动就宣称“补白性”研究成果。今天,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历史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展又进入一个新的整合阶段,我国相关研究也大大深入。在这一背景下,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大大加强了。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不理解西方激进左派对当代权力机制分析的失败,不理解他们在寻求政治动员过程中主体和手段的缺失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抽象权利和抽象革命的依赖,我们就不能理解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帝国》及其产生的明星效应。

实际上,从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在起点上的相近思考,到今天甚至不能相互沟通的群口辩论,其实质性转向是从反资本主义政治学到抗议资本权力的话语。这种变迁,不只是表面上的政治旨趣、理论主题甚至论域的差异,事实上,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理论前提出现的历史认识论变化。后一方面的变化也包括多个方面和层面的问题,例如其批判逻辑从客体到主体、从历史性向共时性、从内容到形式等变化,而核心则表现为从主客体同一性辩证法向差异逻辑的变迁,前者试图为反资本主义政治策略中不能协调的主客体矛盾提供一种理论的解决方案,而后者则是在不能解决那种矛盾的背景下对问题本身的悬置,即在理论上将问题取消(按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的说法,即虚假地克服矛盾。这正是为什么今天多数激进理论仅仅是一种抗议话语的原因)。一旦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理解,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体发展历程中呈现的与西方主流思潮一致的多种“话语转向”,例如“语言学转向”、“后现代转向”、“文化转向”等,各式各样的“转向”并不只是形式上发展的面貌变化,而是骨子里的历史认识论变迁。离开这种历史认识论的变迁,在批判资本主义时,究竟应该是从生产出发还是应该从消费出发,最好从生产力出发还是从生产关系出发,从实在(商品)出发还是从景观(影像)和符号出发更有力度,从价值入手还是从使用价值入手更为可行等等这些问题就无法得到正确的理解和回答。所有这些变化,都并非思想家在书房里闭门造车的结果,而是与不同的思想家关于现实资本主义的认识联系在一起。在这里,我们提一下伯恩斯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直接关

系,而是说他为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供了某种重要的参照。可以说,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直接预示了《霸权和社会社会主义战略》,这不仅是这两本书标题语法结构的一致性,实际上,在逻辑上,它们是完全同构的,即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前提和现实战略的再探讨,当然这种再探讨的对象都是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亦与这两本书同构,如果它没有那个“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副标题限制的话。我们强调这种一致性,也不是为了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伯恩斯坦一样,都处在“修正主义”的处境之中,而是为了揭示:在脱掉意识形态帽子的“修正”或“发展”语境中,理论的转向并非如其表现的那样,仅仅是思想史的内在逻辑,而是外在史的环境变迁结果。在总体采取哲学姿态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其显著的话语力量压抑了后一方面,但是伯恩斯坦的例子帮助我们重视这一点。尽管他的实际理论结论和政治策略选择,在可以检验的水平上明显是错误的,无论当时还是今天都不会具有其自我评价的那种价值和意义,但我们却不能因为其失败而忽视如下事实:在明显变化了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需要新的理论表述,社会主义运动需要更新自己的指导方针和具体策略。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发展到“千面”(华勒斯坦语)的程度,并且“在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在所有那些自称或被称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之间是没有任何可能达成一致或同质性的了”。^{[15](p.507)}在此处,德里达指的是伊格尔顿、詹姆逊、斯皮伐克、艾哈迈德、路易斯、奈格里等在今天西方具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说,他们以显著例子说明了那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特征。也正是那一事实,为我们理解这一状态和识别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转向及其内在于同一性,提供了基本前提。正如德里达的例子所表征的那样,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社会主义革命纲领与挑战一切话语霸权的激进“解构”理论之间,如果存在着某种联系,那么这种联系绝非是理论逻辑上的,而是19世纪末以来的全部世界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人类解放形势。正是这种形势的不断变化,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被迫从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无产阶级解放撤退到抽象的人类解放或者进攻至具体的微观领域(如种族、性别等少数族群),

并且,在分析战略上从生产方式转移到消费、符号和话语,与之并行的便是更为深层的历史认识论变化:黑格尔-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那种历史性、总体性、本质主义的逻辑逐步被各种共时性、差异性和反本质主义逻辑所替代,揭示历史内在矛盾的科学被反抗话语霸权的“知识考古学”所替代。这第三个方面,既是前两个方面带来的自然诉求,又是进一步促成前两个方面的根据。如果对这三个方面加以完整的考察,我们亦能够更清晰地描述卢卡奇以降的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及其理论转向的核心。

第一个阶段在时间上大致从1920年到1964年,前一年份是卢卡奇在理论上实际开始一种既不同于第二国际又不同于列宁的道路的起点,而后一年份是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公开出版。这是一个从阶级意识到意识形态的圆圈,卢卡奇的《阶级意识》一文写于1920年,该文构成《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主题。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副标题是“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在这一圆圈中,革命主体从由历史的经济地位决定的无产阶级转变成在“被管理的社会”中的“保守的大众”之中的某些“亚阶层”(如失业者、在政治上边缘化的人以及有色人种等),因此意识形态问题亦从直接源自工业生产的物化转移到全面社会控制的技术合理性。尽管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受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等多种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影响,但总体却是第二国际失败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响。因此,在理论焦点上,资本主义变化的实质(是否是以及是怎样的一个新的阶段)、资本主义的界限以及革命策略是其重心,物化(异化)及其克服这一显著的理论中轴正是在政治上无望的革命在理论上的曲折表达。安德森所言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政治转向哲学(美学),指涉的便是这一点。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定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逻辑的转向上,因为可以观察到的后一转向恰恰是一个结果。必须肯定,尽管卢卡奇、萨特以及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有着自身独特的理论起源,但在资本主义分析(以及更深的历史认识)上还是主要采纳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姿态,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依赖集中体现了这一点,他们在历史辩证法(主客体同一性辩证

法)上的复杂甚至矛盾的探索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正是后一方面决定着他们普遍地把生产(实践、劳动)作为分析的入口,例如,萨特后期的《辩证理性批判》仍然围绕劳动实践这个中轴来展开自己的讨论,即使远离了马克思的弗洛姆也都把雇佣劳动(劳动力)作为自己社会性格理论的基础。构成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基调的批判理论,如霍克海默所强调的那样,正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前提的,因此即使他们把自己理论研究的直接对象投放到远离工厂的领域,他们也不会忘记作这样的强调:“办公室和工厂以外的生活被当做是为了恢复精力再到办公室和工厂的生活;因而是一种纯粹的附属物,是一种劳动的彗星之尾,像劳动一样用时间来衡量,而且被称为‘自由’。”^{[16](p. 214)} 如果与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激进理论对比,我们将发现,不必说鲍德里亚这种极端论者,大多批判理论家早已把这种深刻的洞察抛到了脑后。当然,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一声叹息——“到了 20 世纪,工厂像铁幕一样,消解了一切文化”^{[17](p. 5)}——所传递出的矛盾那样,我们在面对这一实际情况时,仅仅依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不够的,毕竟马克思没有遭遇到这种情况。

因此,在推进、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过程中,这一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始终面临这个问题:资本主义到底有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然而,这个问题又始终晦暗不明或充满矛盾。例如,他们一致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已经深化了,法兰克福学派也明确使用源自第二国际的“垄断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等不同的提法,但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阶段。有趣的是,晚年的卢卡奇非常明确地强调了当下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新的阶段,但由于他向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恢复,反而更加明显地从资本主义一般这个抽象水平来进行资本主义批判。^[14] 与之对照,我们发现,当萨特和法兰克福学派以更充分展开的资本主义这个“人体”作为参照来发展资本主义批判时,同样是向更抽象水平的理论恢复,“辩证理性批判”和“启蒙辩证法”无疑都是如此。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可以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历史认识论并没有超出黑格尔-马克思,尽管也正是他们率先揭开了对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整个现代性的批判。所以我们看到,尽管他们的现

代人本主义逻辑(特别是启蒙辩证法)开始直接把启蒙本身作为批判对象,但它们实际并没有超越启蒙,或者更精确地说,他们把启蒙逻辑推到了制高点,从而也最充分地表征了启蒙思想本身的矛盾。

我们把这一阶段的终点定位在《单向度的人》,原因也由于此。这一文本扩展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开辟的工具理性批判等核心创见。尽管其仍然强调“至关重要不是心理学或美学问题,而是统治的物质基础”,^{[18](p. 207)}但恰恰也正是在这里,解放政治倒转成美学、心理学或伦理学。在这之后,不仅美学的维度成为压倒一切的批判中心,而且立即产生了《否定的辩证法》和《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等两类从不同的方向宣布那种思路破产的著作。前者是内部爆破,其灰烬仍然是一种美学,只不过是一种伪浪漫主义的伪美学,例如大量围绕审美现代性而诞生的各种叽叽歪歪的美学话语。后两者是外部的攻击,它借助了在反对萨特过程中诞生的结构主义理论并使这种理论成为其后马克思主义论域中弥漫性的幽灵。从这一角度来说,1968年5月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的实践检验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套用霍克海默的一句话来说,“理论与时间的相关性在于理论家的社会存在判断的不断变化,因为这种判断取决于它与社会历史实践的有意识的关系”,^{[16](p. 204)}如果理论家本人已经在理论上作出自我裁决,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实践的裁决已经无所谓了。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阿多诺等“五月革命”的思想领袖却以冷漠的姿态来对等这场革命本身。

第二个阶段是一个漫长的整合阶段,它从1965年一直延续到1984年。在后一年份中,多种不同风格和主题的著作直接揭开一个更新的阶段。先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判官佩里·安德森出版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新探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肯定了一个更加多元化阶段的到来。吉登斯出版了《社会的构成》,尽管不能将之视为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这本书却是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阐明的那个历史认识原则——“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对话^{[18](pp. 40-41)},并且其综合性视角和挑衅性理论

姿态对其后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批判被加强；另一方面它的某些核心原则又更明显地融入宏大社会理论建构中，这使得在不少人看来吉登斯本人就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确实，在下一年（1985年），他推出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三部曲之二《民族国家与暴力》时，不再直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而全面转入自己的现代性社会理论构建。詹姆逊发表了《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在文化批评上清晰地描述了“晚期马克思主义”基本框架，并且把自己从《政治无意识》（1981年）开始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确切地置于后现代主义语境之中，从而亦推动了一种影响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形成。大卫·哈维在这一年出版《资本的界限》，以显著的方式呈现了从空间角度重构《资本论》的成果，在马克思主义空间化道路上设置了一个重要的标志。差不多同一时期，哈贝马斯出版了《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初版于1981年，第二卷初版于1985年），从而基本完成了自己对批判理论的重构，这意味着他以一个独特的案例再度说明了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出走而可能达及的理论范式。1985年，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出版并引起争论，这个局部的范例尽管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追随者，但它却见证了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阿尔都塞—葛兰西转向，在霸权成为左派行话这一背景中，他们的言说无疑又代表着一种无法用传统概括的路向。还有，1985年，埃尔斯特与柯亨、罗默共同主编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理论研究丛书》，并且出版了自己的《理解马克思》，这使得柯亨1978年出版《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之后开始形成的具有严格意义学派特征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思潮，这一思潮在今天的英国仍然占据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导地位。林林总总，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例子。在总体上，这见证着先前的多样化探索开始凝结成多个竞争性的理论版块，意味着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那种（接近自发性质的）无意识竞争最终变成由几种新的话语引领的派系竞争（套用经济学术语即垄断竞争，这与当前的经验全球化十分相像）。

在这一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那种无意识竞争不仅由这样一种过

渡性所标志——卢卡奇、阿多诺等大师的谢世，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在学院获得生长，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引领性的原创思想却还都未能确立自己的地位，这在许多个体思想家身上表征出来，例如，哈贝马斯、鲍德里亚、詹姆逊等等。这些人都是在这一阶段成长起来的，并且都直接受惠于早期马克思主义，并且在确切的意义上，其最初探索都是受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所限（当然，他们独特之处也在于同时挪用了在这些框架之外的思想资源）。哈贝马斯受卢卡奇和霍克海默等人影响，在 60 年代末采取了一种进化论框架，经由韦伯的合理化思想支持，逐步过渡到以结构为重点的建构主义交往行动框架。鲍德里亚最初两本著作——《物体系》和《消费社会》——明显在物品生产和关系、差异生产之间动摇，前者来自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后者则源于巴特等人的结构主义，直到《象征之镜》才克服了这种动摇，毅然转向象征交换理论并同时告别马克思主义。在这两个人的理论中，我们看到，借由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异化的批判，马克思曾经基于人—自然/人—人关系内在一致性而将之作为历史前提的生产被重新剥开，在哈贝马斯那里成为劳动（生产）—交往，在鲍德里亚那里则成为商品生产—象征交换，并且他们同时抬高后者而否定前者，并把重建后者的理解环境作为解放话语的目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的生产理论、生产方式理论被否定。

尽管包括哈贝马斯、鲍德里亚等人在内的许多新颖话语具有异常的复杂性，但是在更大的理论氛围中，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仍然是这一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总体转向的一部分，尽管他们占据更显著的地位，并且直接引领着这种转向。转向本身，在理论焦点上，不仅把无产阶级当成一个“伪问题”——因此就会把无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当成纯粹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且作为回答上述问题的资本主义历史动态问题亦不复存在，为批判当下社会状态（这总是不合理的）而建立一种不受时间干扰的纯粹理论模型成为其潜在目标，直接的目标便是维持理论的批判性本身。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些批判理论可以为不同立场的人们拿来共同讨论甚至得到他们认同的基本原因。就分析的入口来说，马克思的商品生产显然被取消了，在一般意义上，通过消费、媒体、意识形态、理性等这些早期西

方马克思主义已经开辟出来的入口，最终汇集成以意识形态或权力话语或霸权为内核的文化。这一点进一步产生了重大而复杂的理论和政治影响，因为在下一阶段上，我们将看到，由此出发的许多有影响的重要左派话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际上与资本主义现实（生产方式）已经没有关联。说到历史认识论这个层次，借由象征、语言（意义）规则、心理（认知）结构等等而客观化的主体与主体之间关系（即主体间性）成为社会（历史）认识的前提和中心，建构主义开始占据历史叙事的中轴位置。

如前所述，总体上，这一阶段只是一个漫长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在基本的历史叙事上，通过结构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开始普遍地受到来自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各个领域的思想的影响。与此同时，受第三世界经验支持的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依附论、不平等交换理论、世界体系论等等也开始产生重大影响。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研究方面，包括法国调节学派等新理论在内的许多政治经济学研究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增添了一些新的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处在一种多样性整合之中。从理论上讲，这种特征多表现为一种理论自身发展的结果，特别是经过 60 年代末文化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不断寻求突破的结果。确实，我们也很难在那种隐约开始的历史认识论转向与资本主义现实之间建立某种直接的关系。特别是，我们已经强调，在多种哲学或文化理论中，我们也很少见到这些理论自身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判断。因此，我们不应该机械地在理论发展与现实发展之间画出某种近似的等号。不过，理论上的这种无意识竞争，难道不正是先前理论失败而对当下分析的无能的标志？在哈贝马斯和鲍德里亚等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对更高抽象水平的一般理论的诉求，难道不正是逃避具体困境的直接征兆？我们将看到，新的阶段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正面肯定而开始的。

第三个阶段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至今。我们把起点定在 1984 年左右，前面已经从理论表象上说明了理由。实际上，从全球社会经济政治的宏观变迁情况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国家受到普遍质疑，随后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思想获得了胜利；“进口替代”的经济独立道路并没有把拉美带入预期的美好图景；以苏联为代表的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也都

在谋求新的发展思路,特别是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等等。这些宏观历史条件并不会在多数社会理论论著得到详细研究,或者它们泛泛地构成80年代之后全球化话题的背景。尽管以大尺度长时段为基本特征的世界体系理论逐渐成为在社会科学中具有广泛影响的主导范式,但多数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愈来愈走入微观层面,这在表面上是普遍地受到(后)结构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

一般来说,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话语在历史认识论上也存在着一个“后现代转向”,那么这种转向正是1984年以来的事。这种转向从不同层面把传统的解放政治学作为一种宏大叙事给打发了。受这种转向影响,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微观”的斗争。当然,在我们把微观打上引号的时候,表明自己对它的基本性质的怀疑。这是因为,这种转向并不只是一个层面的影响。其中,它更深刻地包括把现实文本化的那种趋势,即在叙事的名义下,以对话语的研究替代了对社会历史进程的研究。因此,在那种“微观”的斗争中,奇特的是,“微观”本身并不具有我们在通常意义上理解的那种具体的政治学属性。例如,女性主义在理论上失去了早期玛丽时代(《女权辩护》)那种争取广泛而具体的政治权利斗争的性质,它变成了一种关于女性在话语上表述自身主体性的权利问题(如斯皮伐克)以及其他什么问题,这使得它在文学作品研究中比在现实政治中更为重要,同时使理论家对讨论文学作品的重视更甚于讨论政治现实。同时,在诸如女权主义运动、环境运动等等这些新社会运动——这些运动本身即是激励那些微观叙事的源泉——越来越务实地落脚于那些微观事件,比如垃圾处理、家装材料的化学毒性等,为之辩护的理论却越来越集中于抽象和普遍性,即话语或文化的层面。在这一点上,詹姆逊是一个例子。他对波拿文彻宾馆、电影《热天午后》、康拉德的小说的分析等等,确实都是文化研究的精彩的微观案例。不过,这种案例与其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目标之间的联系却是那样宏大,因为资本主义在这些案例中不再是一种具体生产方式,而是一种抽象的话语。所以,他的这句话很具代表性:“我们只能在世界本身已经变得抽象的情况下才能抽象地思考这个世界”。^{[19](p. 55)} 确实,对于许多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理论来说,资本主义不再是一种具体的

生产方式，而是一种抽象的话语结构。或许正是这一原因，J. K. 吉布森格雷汉姆的对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才成为今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一类型。

当然，我们可以简单地拒斥这一种类型，因为它们与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一样，都是关于资本主义的话语批判而非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批判，当然也都是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过，我们不厌其烦地例证，是为了说明何以话语的批判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之一，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仍然可以拿詹姆逊来举例，他对文化研究在今日的合理性留下了重要的论证，在这种论证中，左派批判的一切都具有政治性，因为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中，一切都是政治的。当然，我们不应该把詹姆逊的泛政治化理解成他为自己坚持文化定义权的斗争而进行的辩护，实际上，这是为全部文化研究在当代的合理性的辩护。当然，詹姆逊本人试图借由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在作为历史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作为乌托邦的人本主义之间进行协调，并且确实证明了为什么文化问题在今天如此重要。但是，矛盾恰恰也在这里展开，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的第三个阶段——即詹姆逊所言的“跨国资本主义”阶段上，文化失去了其半自主性，那么，一方面，他所乐观地估计的这种丧失带来的对革命具有积极意义的“爆炸效应”如何能够产生对资本主义的颠覆呢？另一方面，他所言的批评距离又在哪里呢？他自身的理论实践不是恰好否定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吗？在前一个方面，与鲍德里亚一样，当他们成为理论或学术明星的时候，他们理论的破坏力恰恰是减弱到最小的时候，因为信息的“内爆”使他们的反抗姿态被体系吸收；在后一个方面，他那种把理想化的“第三世界”作为飞地的做法恰恰如许多评论者指出的那样是源自霸权中心的压抑性权力操作。

无论如何，20世纪80年代之后，从60年代开始诞生的对景观、符号、话语霸权的批判，借由更精致的话语理论和霸权理论，全面地支配了左派理论，产生数不胜数的变体。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中，“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成了问题，而《马克思的幽灵》则成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言说。这个例子，以清晰的方式说明了今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类型与“债务国家”、“新

国际”这些资本主义现实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种发展，就如莎士比亚的《哈雷姆特》一样，无论是否具有历史原型，它本身都只是一出戏剧。

当然，上述讨论只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显著倾向，它在历史认识论上以叙事替代了主客体之间的实际作用，其理论旨趣甚至和解放无关，只是对霸权的解构，而其分析的入口是话语（意识形态）。这种倾向，并不否定真实的资本主义环境，但它们把资本主义本身看成为一种权力话语。

与上述倾向并行的是以社会正义和个人平等权利为中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种倾向中，“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占据显著的位置。这种以分析哲学为工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具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矛盾目标——“科学地”分析伦理、道德和正义问题，但作为一种思潮，它并非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有着深刻的政治和道德关怀，这便是追求自由民主和平等正义的真正实现。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英国柯亨所领导的学派自称“分析的社会主义”。当然，这也意味着，至少在柯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工作和约翰·罗默的绝大多数著作中，这种思潮的分析入口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在历史认识论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主要采纳了西方经济学、政治学中流行的那个以个体主义方法论为特征的理性选择模式。在直接的意义上，这一松散的学派（实际上包括部分代表和许多重要研究者都不认为这是一个学派）并非从马克思主义政治旨趣出发，其分析的入口与历史认识论假设也都不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限制，这就像其在 2005 年不再自称“分析的社会主义”而把“平等理论和实践”作为自己的旗号这个行动所表征的那样。实际上，在今天，只是因为剥削、压迫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而非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分析，才产生了许多与马克思主义高度相关的理论（无论它们是否自称“马克思主义”）。这也提出一个问题，即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也不能简单地将之看做为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辩护，就如他们以同样的力度宣称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那样。作为典型例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显著地说明了许多在今天致力于社会正义和个人权利的左派理

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这种关系。从这种关系出发，我主张重视这些思潮，但不提倡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它们提出要求。实际上，它们是一种理论参照，说明了今天西方人们普遍追求的价值。马克思主义不应该反对这些价值，但在根本上，马克思主义更不应该像这些思潮那样，在充分“尊重”资本主义权力的前提下通过与更加复杂化的资本力量的谈判来获得这种价值。作为一种参照，它们事实上也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已经彻底失败——在局部已经堕落成少数左派知识分子的行话，在总体上仅仅是在口头抗议资本权力的知识话语。

这个问题最为突出地反映在源自解构的幽灵化马克思主义言说上，德里达曾经为之作辩解：“我以为，在对马克思的‘存在论’的这种解构之后得到的，正是一种去政治化或政治效应之幻灭的反面。毋宁说，在我看来，对‘马克思’、理论、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之前提的重新检验的关键，在于在理论和政治层面上为对种种灾难性、历史性的失败进行的考察提供（一个）开端，也在于实现对来自马克思的特殊遗产的一种不同种类的重新政治化。”^{[15](p. 501)}德里达的这段陈述，不仅精彩地指出了诸如阿尔都塞那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实际意义，而且极为生动和准确地阐明了一切“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政治学的界限。德里达、伊格尔顿、斯皮伐克，以及齐泽克、拉克劳、巴特勒等等不同组别之间的内部口角充分说明了这种界限是什么。这便是文字。这是因为，既然左派政治学的普遍性前提在“现实上”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并且由于世界本身总是逃避我们语言的控制而使得表述这种种前提成为一种不可能性，那么，剩下的事只有一件：在文字游戏中努力地追寻那个纯粹理论性的假定存在的前提。我们无须提出另外的例子，他们之间的争论已经足够精彩地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德里达在《马克思和儿子们》中对斯皮伐克的反批评，在《偶然性、普遍性和霸权》中巴特勒、拉克劳和齐泽克之间的自说自话。

由于提问本身总是会带来新的问题，所以我们似乎只能通过反反复复地“把问题置于质问中”来触摸问题本身，甚至，自觉地背叛原初的提问似乎成为达及问题真境（如果存在的话）的唯一正途。这就是我们的宿命！在这种宿命里，许多当代“政治学”著作的作者，都矫情地模仿了海德

格尔的那种叹息,使之成为左派的和抗议的政治恶习,他们的政治意图“仅仅是让人们听到一声呼唤”,^{[15](p. 9)}通过这声呼唤,他们自己占据那个据说被剥掉了弥塞亚主义外衣的弥塞亚位置。这似乎便是马克思主义在今天西方理论中的状态。

在今天,就个案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无疑是最为复杂的,即处在华勒斯坦称为“千面马克思”的状态中。但是,在全部复杂甚至不可理解的话语之中,这一点同样也是清晰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种政治学,而是一种知识话语,它为反霸权的知识实践和争取权利的话语实践提供着思想动力,但显然亦不是现代性自我反思的核心思想资源。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但我们必须面对它。面对它,也即是面对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可能性。这个将把我们带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之中的重要缺失,即对具体的权力、它的产生机制和发挥作用的方式、它的内在矛盾和界限的研究,也即是对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建立在其上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最低限度地保证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在最好的情况下写出后马克思时代的“后资本论”。如果需要强调本书研究主题在中国语境中的意义,那么将是:如果不认真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如此类的教训,无论是否追随其理论逻辑,我们也将同样面临类似的失败。今天,我们的研究中理论的繁荣掩盖着其自身的匮乏,现实的透明造就着其自身的复杂。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的类型或模式

尽管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具有确定边界的思潮从而可能从上述阶段性发展来透视其逻辑的变迁,但是,如果按照传统思想史叙事方式以单质逻辑来展开这种变迁,也存在着巨大困难。我们已经强调,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名称所标识的,实际上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思潮,而是多种并不同质的理论动向,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由于它们都与马克思相关这个性质维持的。并且,尽管在这些不同的理论动向之间可能清晰地看到内在的逻辑相关性,例如在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批判理论与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之间，甚至哈贝马斯亦强调自己确定地受到了卢卡奇的影响，而在詹姆逊那里也会看到卢卡奇的某个方面影子，但是在这些思潮之间同样并不存在严格意义的继承与发展关系。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总体和某种共同纲领或学派（如法兰克福学派）内部的多样性，构成其显著的特征。这一点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理论气质直接相关，他们在整体无产阶级或革命主体“衰落”背景下关于这一背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山之作中已经十分显著地暗示了，而葛兰西在狱中思考无产阶级斗争时把霸权问题置于中心，也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状态。在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中，这成为突出的背景，他指出：“《共产党宣言》时代劳工和雇工的生活条件是赤裸裸压迫的结果。今天，它们则成了工联组织的主要课题，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和政治集团之间讨论的话题。无产阶级的革命冲动，早就变成了在社会框架内的现实主义行为。至少在人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已被融合到社会中去。”^{[8](p.2)}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告别无产阶级”则似乎成为一个标准的左派口号。大多选择了精英主义的策略或个体体验式的理论表述（这一点即使在萨特这样热衷于大众运动的思想家那里也十分突出）。在这一点上，他们甚至比西方主流哲学更崇尚个体话语。由于这种气质，他们在面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时候——实际上，这种现实与通过标准的经济学、政治学或历史学理论描述的作为某种社会构型的资本主义完全不一样——直接表现为由资本主义生产产生的生活体验。可以说，正是这一原因，伯曼挪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切凝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作为其论述现代性著作的标题极具代表性。在面对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之际，无论是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其后的多种变体，都可以说是在马克思所描述的物化结构之上诞生的个体反抗话语而非阶级斗争话语，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性质大相径庭。在前文，我们从总体逻辑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存在着从革命美学到话语政治学的变迁，实际上就已经充分强调了用同一框架来叙述这些具有内在张力的激进话语的困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又避免传统的按照人头罗列的账本式叙事，

我们在本书中采取了模式化思路。这一思路的具体构想是,尽管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间存在着沟通的困难,但是只要他们以同一种性质来描述自己批判的资本主义,那么在他们之间就存在着逻辑的同构性。这样,焦点问题就不在于描述理论家个体的独特性,而是理论类型之间的差异,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研究的基本意义所在。这样,我们把话语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本身作为一个需要理解的问题植入到资本主义批判过程之中,围绕资本主义变迁以及对其批判的逻辑变换来把握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独特言说,从而亦为其评价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参照。

在模式化讨论中,我们将首先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性质的定位,而对这个问题的澄清不仅可以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解资本主义的方式,而且直接有助于理解马克思本人关于资本主义分析的理论特征,从而进一步判定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实质。实际上,在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无论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存在着一个被绝大多数研究者忽视的问题,即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存在着三个逻辑层次,并且这三个层次之间存在着从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结构,而对于每一个层次的科学分析都有对应的独特的方法论要求。这三个层次分别是:第一个层次,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地出现的特殊生产方式。这个层次表明,资本主义是一种具体的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从生产方式出发勾勒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一般图式,它是具体的。第二个层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纯粹(理想)类型。这种纯粹类型,类似于物理学研究的那种“纯粹形态”,不仅排除了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假设其最发达的状态(或最后的形式)。韦伯的理想类型便是指这样一种理论假设。实际上,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出现的诸多理论模型亦是这种性质的理想工具。也如马克思“资本一般”这个概念那样,这种资本主义是抽象的。马克思自己也说,在他的时代,最接近这种理想类型的是英国。正是在这种模式中,劳动过程表现为资本增殖过程,商品生产以其物化的形式把资本和劳动之对立的社会关系生产出来,从而为自己的扩大再生产产生出前提,并在这种对立构成的最后界限中

瓦解。第三个层次才是资本主义的具体历史演进及其实际形态。在马克思那里，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从商业形态到工业形态再到 19 世纪 90 年代之前的金融形态，从盎格鲁—萨克森模式到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再到东亚模式等，所有这些都是实际形态。必须承认，在马克思那里，第二个层次都没有真正完成，更不必说第三个层次了。值得强调的是，阿历克斯·卡利尼考斯非常重要地强调了《资本论》分析的后两个层次，并由此回应了包括调节学派在内的诸多理论。^[20]然而，这并不妨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意义，因为马克思已经从方法论角度清晰地阐明了自己的一种历史科学，使之成为现代历史科学和社会理论之可检验的“科学研究纲领”（拉卡托斯语）。

通过这种区分，我们将看到，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实际上是在不同的层次上运行的。例如，卢卡奇谈到资本主义时，直接涉及的是第二个层次，他是直接从《资本论》及其手稿来描述资本主义一般逻辑的，所以他精彩地把握住了物化问题，但是他在逻辑上缺失了第一个层次，因此他并不能在自己强调的历史发展科学（在他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性质）意义上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具体的生产方式，在社会与历史之间存在着理论的混用。后来，鲍德里亚批评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时，不仅把前两个层次都给废了，而且只是从当下的具体经验出发重新定义资本主义，并将之作为与象征交换相对立的社会关系构型。从这两个例子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突出强调社会批判理论之所以是个缺点，关键在于其社会发展理论的缺失（这是孙伯教授的一个并没有详细展开的重要论点）。因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阐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是历史分期理论的重要意义所在），才能够为真正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机制阐明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我们也将看到，尽管哈贝马斯后来告别了马克思主义，但他确实更明显地突出了社会发展理论（尽管他实质上以社会进化理论代替了历史唯物主义），所以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研究更具规范性，也最容易证伪。

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进行资本主义批判时，不管其任一代表是站在何种层次上的，在他们的理论中确实也存在着某种具

体的资本主义模式。而在总体上,我们将看到,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批判理论是围绕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建立的,格鲁斯曼和波洛克等经济学家沿袭第二国际传统所作的分析起着关键的作用,而其理论建构的方向则是在这种资本主义模式中拓展对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理论倾向中,以美国为原型的消费社会则构成了其资本主义的基本模式,与之并行,法国的列斐伏尔及受其影响的鲍德里亚亦是如此,他们都在以消费为中心的日常生活批判上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20世纪70年代,曼德尔和哈贝马斯从不同的方向发展了两种不同的晚期资本主义批判,后来,前者直接影响到美国的詹姆逊等人,当然这种晚期资本主义与其他资本主义模式相比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所以难以形成一种具有严格边界的理论话语;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话语的扩散和后福特制研究的兴起,全球资本主义分析开始较为广泛地成为左派的显著动向,在其基础上产生了一些具有灵活性和包容性的理论。在这些直接指出或含蓄包含资本主义历史分期的理论模式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重要而特别的研究,其中核心之一便是从卢卡奇开始便一直强劲地存在着的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这种批判因为意识形态现实的复杂化和分析的理论前提变迁而明显地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从葛兰西对文化霸权问题的揭示到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问题的分析,再到拉克劳和墨菲基于霸权问题对社会主义战略的重新规划,以及以意识形态批判作为实际旨趣的文化政治学的建构,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洋洋洒洒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因为理论本身的复杂化,也产生了一些与众不同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例如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多种模式,其中重要的有,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话语模式的研究,例如吉布森-格雷汉姆的女性主义视角。这些林林总总的资本主义模式为不同的资本主义批判话语之间的沟通提供了重要基础。不考虑这些模式在经验上的检验问题,我们可以围绕这些模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格式化。

当然,作为具有边界的资本主义批判模式,任何理论本身都不只是包括资本主义的理解。一种理论模式,特别是左派理论模式,它关于资本主

义模式的定位只是提供一种对自身进行定位的时空语境，在理论上，它的核心是理论框架，即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的历时性和共时性框架，以及政治期待——即基于历史可能性理解而得出的实际政治结论或革命策略。除此之外，在那些模式中，也包含着与马克思的关系等内容。在本书中讨论的四种模式，实际上，每种模式都是围绕一个核心主题展开的，因此它们对资本主义所作的定位，也都是突出了 20 世纪资本主义的某一核心特征，如国家调控、消费主义文化、全球化等。围绕这些主题，他们阐述了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整体性理解，也因此具体的资本主义特殊形态定位上直接挑战马克思的结论，并且进一步提出替代马克思分析的元理论之逻辑诉求。

当然，上述各种倾向并非完全各自独立的，由于源自马克思的政治期待（虽然不同学者实际上存在着复杂的立场）以及与马克思基本逻辑的关系，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并且，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为一种本质主义分析的话，那么，我们将看到，全部的分析实际上是马克思基本分析范式在两个方向上的变迁：一方面是马克思之后新出现的内容所造成的主题创新，即理论内容的深化；另一方面便是由于主题创新而直接带来的元理论扩展，即分析模式的扩大。在这一点上，曼德尔与哈贝马斯虽然都谈论晚期资本主义，但恰恰代表着上述两种不同的理论诉求。前者在具体的世界经济规模上（这与马克思的分析不同，马克思是在抽象的同质资本主义之理论层次上来推断同质化的世界市场）——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的多种生产方式的接合——从利润角度来阐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特征及其前景，但较严格地受制于马克思主义政治诉求，采取从生产出发关注内在危机的分析思路，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因此可以说它扩大了分析的内容，但并没有直接带来分析模式的增加；后者则从改写危机概念开始，从社会整合的角度把对资本主义的结构分析引入到文化之上，而在其自己的社会进化立场上直接提出了以交往为焦点的分析模式，这是逻辑框架上的突破。当然，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解放政治诉求亦因此变成一种（虚假的）人道主义的伦理诉求。从这一例子看，在具体的分析中，我们坚持同时从任何一个可能成立的模式的时空经

验、学理逻辑和政治诉求之统一性出发,来考量不同模式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进一步对比,来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今天所直接面临的问题,从而亦因此形成各种不同评价的基本标准之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探索的全部历程再次从理论上证明,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凝固的结构,而是一个流动的空间构型,只要资本主义不终结,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和替代探索就不会停止。我认为,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因此,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对资本主义的多数理解都直接超越了马克思本人的框架,有一些还直接对马克思提出了尖锐和激烈的批评,但我们并不因此简单地拒斥和否定这些理论。在我们看来,将这些理论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环境中的曲折发展更为可取,甚至可以说,正是通过这种曲折性,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对资本主义的科学研究远未完成,基于这种研究对资本主义进行实际替代的实践任务更是艰巨。

参考文献:

- [1] [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M],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 [2] [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陈永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胡大平,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5] 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6]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 [7]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高铨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8] [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李小兵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9] Jean Baudrillard, *The Transparency of Evil: Essays on Extreme Phenomena* [M], Verso, 1993

[10] [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M],高铨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

[11] [美]约翰·罗默,在自由中丧失[M],段忠桥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12] Self Ownership, History and Socialism: An Interview with G. A. Cohen[J], *Imprint*, vol. 1, no. 1, 1996

[13] 胡大平,穿越“马克思学”神话,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处[J],福建论坛,2006(4)

[14] [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M],白锡堃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15] [法]德里达,《友爱的政治学》及其他[M],胡继华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16] 曹卫东编选,霍克海默集[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17] [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8] [英]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

[19] [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 V[M],王逢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0] 资本主义的阶段化与帝国主义分析:古典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演化[A],载罗伯特·阿尔布里坦等编撰,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繁荣、危机和全球化[C],张余文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

生产与再生产理论研究

历史与文本中的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

周嘉昕

可以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其他一种哲学思想像历史唯物主义这样引发了那么多争论、非议和捍卫。回顾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确立以来 160 多年的学术历程,误解、反拨、纷争、质疑和辩护竟构成了这种批判性哲学方法论的主要历史境遇。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在理论和实践辩证关系问题上的特殊性——按照巴加图里亚教授的话说,“实践中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存在方式”,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自身理论探索的特殊性使然。马克思在世时并没有给后人留下多少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充分阐释,更多是在具体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批判^①——的论述中,通过运用的方式将其内在的哲学思辨展现出来。

即便是在马克思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为数不多的总结和阐释中,“生产方式”总是承担着一个关键性的理论角色。正是围绕这一概念,马克思

① 不可否认,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得以形成并发展的。但是,正如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生产方式”概念有自身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理论认知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总的说来,这一过程同“生产方式”概念的形成和推进内在一致,并且外在地表现为马克思理论术语的改变,如“市民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等等。思想上的进程也已充分证明: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独特的理论问题是在马克思之后才真正成型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有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所具有的可能只是一种学术史的意义。

将不同的理论范畴结合起来并在这些范畴的相互关系中展现了现代社会历史运动的本质及其在现象层面上的再现。或者说,就是“生产方式”概念的运动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现代社会历史的存在方式。因此“生产方式”概念并不构成一种可以在抽象层面上得到讨论的观念体系,而就是马克思用来分析批判社会历史现实的理论方法。^①套用科学哲学的话说,“生产方式”概念在马克思的理论分析中是借一种“述行性”语言而非“描述性”语言的方式展现出来的。这就提示我们,理解这个概念进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都不能以抽象的教条方式,而必须在马克思的理论逻辑运演中加以把握。

一 不同论域中的“生产方式”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生产方式”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得到不断阐释的概念。随着历史唯物主义进入不同的理论话语环境,这个概念也被不断重构,形成了一种不同模式不同论域交相叠映的状况。这种“生产方式”概念上的复杂“地质构造”本身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传播所构造起来的,其中既有不同理论模式的构建与竞争,又有不同论域的侵蚀与交叠。这就为我们梳理“生产方式”概念自马克思以来的思想流变制造了非常大的困难。

有鉴于此,笔者将首先概括性地指出“生产方式”概念在当代左派激进话语体系中发挥作用的三大理论域:作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规律证明的生产方式,作为资本全球化视域中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分析的生产方式,以及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工具的生产方式。这三种不同论域之间并不是一种共时性的竞争性关系,也非一种历时性的替代关系,仅仅是“生产方式”概念复杂“地质构造”在“表层地貌”上的展现。这一区分是我们进入“生产方式”概念的最初理

① 南京大学孙伯鍈教授曾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方法而非体系。参见孙伯鍈等:“体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孙伯鍈:“再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与方法”,《江海学刊》2001年第2期。

论准备。

(1) 作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规律证明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就是证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有限性存在,并为共产主义扬弃资本主义提供科学的说明。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出发点也是“生产方式”分析的最终目标。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有关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分析就成为历史唯物主义传播的直接动力。“生产方式”概念就首先担当起证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之必然性的理论使命。然而,这种证明在后来的从第二国际到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那里却无意识地背离了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不仅没有识别出“经济决定论”这一潜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且最终作茧自缚地把“生产方式”概念限于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作为教科书体系组成部分的政治经济学讨论之中。

在马克思那里,“生产方式”概念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确是用来说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工具。但这种工具发挥作用的方式是:通过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典型的一定的生产方式的自我矛盾展开,来实现一种当下社会历史的“内爆”并打开面向未来的可能性。然而,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机械唯物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泛滥,有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与这些理论的争论和互涉。同时,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经过拉法格、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的理论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一种带有强烈的进化论和经济决定论色彩的“历史哲学”。十月革命前后,虽然有列宁在实践中对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反拨,但这种“经济决定论”观点仍最终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由斯大林主义加以完成。“生产方式”概念也就被限定在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运用的部门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围之内,并且被明确定义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从此,“生产方式”概念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内——这也是国内学界上世纪80年代有关“生产方式”概念争论的直接理论出发点。

既然作为马克思革命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被作为一种部门哲学加以

讨论,并且带上了强烈的经济决定论色彩,那么其核心范畴“生产方式”概念也就难逃其责,成为一种在政治经济学上证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工具。相应的,原本“生产方式”概念所具有的社会整体分析的维度也就被削去,只剩下作为经济运动过程分析的含义——前苏联学界在上世纪 30、40 年代有关“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的争论就是在这个大的思想背景下进行的;尽管后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一些具体结论上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但却没有从根本上克服这种范式的束缚。

(2) 作为资本“全球化”视域中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分析的“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马克思那里具有典型的“世界历史”含义,这一方面首先讨论的是资本主义剖析中的历史理解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内在地涉及到后来出现的“全球化”问题。所谓的“全球化”问题,尽管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才出现的一个理论问题,但在笔者看来却最初肇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域拓展。19 世纪 50 年代,“亚细亚生产方式”方式概念进入马克思的理论语境就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这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而马克思晚年的原始社会分析和东方道路探索也可以看做是资本“全球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理论反映;第二国际内部有关“帝国主义”问题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同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布展直接相关。

进入 20 世纪,有关资本主义的形成和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和作用的分析更是成为一个理论热点。在 30、40 年代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中,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一个焦点问题,争论的核心在于如何看待这种过渡的发生和本质——这一争论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中得到了延续,今天英美学界有关“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纷争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的。对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有学者坚持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从生产方式变迁的角度来理解这一过渡,有学者强调市场组织原则的变化,就是资本成为市场过程中的统治力量因而推动了历史的变迁,还有学者从人(实际上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化身)的理性和伦理精神的角度为资本主义作辩护。在左派学者的讨论中,前两种观点

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理论竞争。

这种竞争实际上延续到或者说漂移到二战之后出现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形成高潮的有关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道路的分析。特别是在资本“全球化”的尺度上,如何看待那些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者”的非资本主义或者说就是落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就成为“生产方式”概念的一个重要讨论域。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转折点是阿尔都塞的“结合”概念被引入这一争论之中。“结合”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分析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时所着力强调的一个概念,是在结构主义的意义上对一定的生产方式内部构造的分析。但是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是一个时间范畴而且是一个空间范畴)和落后国家地区的发展道路分析中,这一概念被挪用到针对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及其中发生的两极分化的批判性说明之中。

在这一讨论域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有关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精彩分析。但“生产方式”概念却已经是一个经过多次阐释的复杂“再生岩”,很难成为我们把握马克思原初意义上的“生产方式”概念的直接出发点。

(3) 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工具的生产方式

如果说“生产方式”概念在前面提到的两种论域中已经离开了哲学的地基,进入到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具体的学科讨论之中。那么这里所讨论的第三种论域则仍然保持了哲学的外观,但却是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发挥作用的。这就是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工具的生产方式。

所谓“晚期资本主义”,也就是近来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马克思生逢其时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主义。这不是什么新的观点,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已经接触到了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发展,这在列宁那里被定义为“帝国主义”阶段。此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又被描述为福特制—后福特制资本主义(阿格里塔)、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消费社会(鲍德里亚)等等。“晚期资本主义”的观点是由曼德尔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提出的,坚持用马克思《资本论》的观点

分析上面提到的那些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笔者选择这个概念来定义当代资本主义意在表明：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仍然适用于今天的资本主义批判，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工具仍然有效。

然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之后，^①“生产方式”概念要么在“后马克思思潮”中被或明或暗地抛弃，要么在“晚期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坚持，要么在“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中被改换门庭重新加以利用。因此，在这一讨论域中“生产方式”概念可以看做是一个理论混战的焦点，也是今天国内学界尚未形成定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些争论背后具有奠基性作用的是马克斯·韦伯的技术理性分析。从卢卡奇颠倒性的运用韦伯开始到阿多诺以“否定的辩证法”力图超越这种技术理性之上的同一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兴起、发展到终结的历史全程中一直在同这个潜在的理论对象对话。以至于在阿多诺、阿尔都塞之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已经几乎完全被看做是资本统治的“铁笼”，其中的对抗性维度竟也被去势为碎片式的喧嚣。只有真正回到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找到历史唯物主义内部的自批判性维度，才能彻底地反击这些“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不是仅仅看到它们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依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终结哲学”的口号依然振聋发聩。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论域中还派生出三种对于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直接批判或替代性范式。它们分别是阿伦特、哈贝马斯用以取代生产范式的交往范式，鲍德里亚、萨林斯以原始社会为蓝图来否定马克思的生产主义批判，以及波斯特、卡斯特尔包括齐泽克对于信息时代和知识产权的分析等。

① 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的观点，是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和胡大平教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逻辑》中最先提出的。按照这种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宽泛称谓，而是自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经过人本主义思潮、结构主义思潮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阿多诺那里走向终结的一种哲学思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之后，当代西方左派激进思潮按照理论观点的不同可以区分为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后马克思思潮与今天国内学界讨论的后马克思主义有交叠之处。参见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二 对“生产方式”概念的误解与挑战

在上述三个“生产方式”概念的讨论域中,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都处于理论纷争的漩涡之中,与之相关的,是“生产方式”概念所遭受的误解和挑战。大致说来,自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提出(《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并为世人所熟知(《资本论》,1867年)以来,这一概念所遭受的误解与挑战可以归结为:“经济决定论”、“市场组织论”、“技术异化论”、“功利生产论”和“信息方式论”五种模式。

这五种模式分属不同的理论形态和思想阵营,并且产生于不同的社会 and 思想史语境之中,因此这五种模式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可以等而始之的并列关系。恰恰相反,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和斗争史中去,这五种模式之间往往以一种混战的方式作用于上文提到的三个不同讨论域之中。笔者在这里之所以这样的叙述方式,全是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以来的思想史发展,这五种模式在理论话语中的出现或者说占据焦点位置大致呈现为这样一个前后相继的顺序——以之为管,亦可窥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发展之豹的一斑。

(1) “经济决定论”模式对“生产方式”的流俗理解

这种模式首先发端于19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实际上受到了当时作为主流社会思潮的进化论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影响,并在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被确立为一种科学体系的基础。对于“生产方式”概念的经济决定论式理解直接服务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政治论述,在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中实际上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应用,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出现。同时,在作为这一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中,“生产方式”概念也扮演了重要的理论角色并且进一步石化为“生产力(技术)决定论”。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上,“经济决定论”模式的“生产方式”概念阐释产生的理论影响最为深远,同时也激发了最为广泛的理论争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代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无一例外都是在同这种模式争论的意义上阐述自己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理解的。对于这种模式及其理论变形的批评不仅见于马克思主义内部,而且也是资产阶级学者着力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乃至马克思本人的主要出发点。实际上,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也已经意识到这种模式存在的理论缺陷,并力图在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问题上加以扭转。但这只是一种不触动总体逻辑框架的修修补补,因而未能从根本上超越这一理论模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国内学界发生的围绕“生产方式”概念内涵所进行的争论,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进行的。但即便如此,这些分析已经为后来反思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进而“回到”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原初理论语境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2) “市场组织论”观点对“生产方式”的最初挑战

这种模式是在20世纪初期的社会史和经济史研究中形成的,强调的是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中,并不是“生产方式”的变迁而是市场组织形式的变化。这种观点反对把历史的发展归因为“简单的”生产方式(实际上是生产力或者说技术生产方式)的变迁,而是社会经济过程中的市场组织原则的转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在商业资本统治手工业和工业生产的意义上形成的。

在这种模式中,“生产方式”实际上仍然是被理解为一种直接的“技术”或“经济”力量,而不是作为一种从一定生产出发构成社会总体存在的体系和机制。这也应和了后来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所出现的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道路的问题。以布罗代尔、沃勒斯坦、阿瑞吉等人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观点虽然在理论倾向上持一种左派立场,但在“生产方式”概念的理解上却并未真正超出“经济决定论”的模式。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第二种讨论域中阿尔都塞的“结合”概念被挪用到一定历史中的社会形态和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分析之中。因此,这种理解模式对于我们把握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在某些理论问题上(如全球化和世界历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等)具有启发意

义,但却无益于真正解释这一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哲学内涵。

(3) “技术异化论”模式对“生产方式”的内在反拨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和二战后的资产阶级主流学界,“技术异化论”模式是理解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一个主导性理论思潮。也是今天在国内学界引发最多争论和误解的一个模式。诚如前文已经提到的那样,这一模式的思想史渊源可以追溯到韦伯对于技术理性的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虽然接受了这种有关“生产方式”概念的理解,但仍然为其植入了一种批判性的理论张力,这就是对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的强调。当阿多诺看到了这种主体向度本身无法避免“技术异化”(工业生产)的沾染并转而强调非同一性以期打碎这种物化总体时,也就开启了后马克思思潮否定“生产方式”本身的潘多拉之盒。

要克服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向逻辑终结的历史宿命,就必须“回到”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本身,揭示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的自批判性维度。但是以哈贝马斯和霍奈特为代表的批判理论第三代学者却在批判“极权主义”的反向路径上退回到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之前,也就是到“私有财产”的运动中重新发现一个克服“技术(生产)异化”的公共领域。这种倒退的逻辑产物就是在青年黑格尔那里发现的所谓“交往范式”。实际上,这一理论路向在此前的阿伦特那里就已经明晰地展现出来。沿着晚期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所开启的逻辑路向,阿伦特在批判极权主义的过程中“顺道”批判了那种导致异化产生的“劳动”和“工作”。尽管哈贝马斯和霍奈特引入了语言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分析,但其内里逻辑在根本上并没有超出这种“私有财产”交互承认的范式——这在马克思那里恰恰是用“生产方式”概念超越了的东西。

(4) “功利生产论”模式对“生产方式”的彻底抛弃

同样是反对“经济决定论”,但却不同于流俗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尤以人道主义为最,也包括上面提到的“技术异化论”),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功利生产论”模式提供了迄今为止对于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最为恶毒攻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对“功利生产论”的批判是今天重新进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分析的一个有效阶梯。

站在结构主义的肩膀上,阿尔都塞正确地看到了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同源,即现代工业的发展,并且敏锐地指出了“生产方式”概念只有在功利性的交往之中才能确立这一理论事实。但是受莫斯和巴塔耶的草根浪漫主义影响(张一兵语),鲍德里亚力图以原始社会的非功利性交往取代“生产方式”概念所浸淫其中的功利性交往,这就离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相去甚远。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的确是从私有财产的交互运动中找到了历史发展所凸显出来的客观抽象——生产成为社会历史的存在基础。但是这种凸显一方面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基础的客观指认,另一方面也包含着通过生产方式的内在对抗性质所展现出来的自批判维度。换言之,以“生产方式”来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存在本身就包含着对当下(作为历史发展人体的工业现代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批判。也只有坚持“生产方式”概念才能从根本上展现并超越这种有限的历史存在。鲍德里亚在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只看到了其一,却错过了其二,其理论下场注定是越激进、越反动。

然而,鲍德里亚对于“生产方式”理论的很多分析对于那些仍沉浸在“经济决定论”模式之中或者说跟着“技术异化论”模式力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来说,无疑是一针猛烈的清醒剂。因此,鲍德里亚虽然是我们真正回到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理论之路上最难翻越的一座大山,可是一旦越过我们就将面对一片坦途。

(5) “信息方式论”模式对“生产方式”的可能替代

“信息方式论”模式是最近出现的一种对“生产方式”概念的替代倾向。这种模式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是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或者说网络社会的崛起。主要的理论代表是马克·波斯特用“信息方式”取代“生产方式”的理论努力、曼纽尔·卡斯特尔对“信息时代”的阐述以及齐泽克等人对于“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的分析。这种模式仍处于一种正在发展的状态,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模式却也是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所必须着力回答的一个问题。在笔者看来,齐泽克自己倒是对于这种模式的发展给出了一种

“后马克思式”的理解：他认为信息方式的基础是精神的私有财产，这种私有财产的运动也将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分裂，即一种更加复杂的容纳与排斥之间的对抗——在他看来，这是马克思《资本论》资产者与无产者对抗逻辑的最新发展。

三 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

为了纠正或应对上述五种理论误解与挑战，第一步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地平那里寻找“生产方式”概念形成发展的真实历史进程。这是深层历史解读的文本学分析方法的第一个要求。有关“生产方式”概念的研究首先是按照这个要求进行的，即通过对社会宏观历史背景和具体文本语境的分析把握马克思理论逻辑的转变。但是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笔者也开始意识到科学的文本学研究方法更深一层的含义，这就是文本解读中阐释者的在场。

张一兵教授在《回到马克思》中区分了马克思理论写作的三种文本，即笔记(亚文本)、手稿和书信(生成性文本)、完成论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献三类，并且专门强调了前两类文本在马克思思想阐释中的重要地位。这种区分在他的《回到列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这就是包含了后人理论建构在内的批注，张一兵教授将其称之为前文本或拟文本。在笔者看来，这种对于文本类型的区分本身是同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的指认和自身研究方法的反思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文本学研究过程中首先要剥离出研究对象自身理论逻辑的进展同后来的理论建构之间的差别，进而要在承认研究者不可能直达本真意义上的文本之基础上对文本进行“客观的”分析。换言之，就是研究者自身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所具有的“解释学前件”，并时刻惊醒自己不能独断论地妄称自己就拥有了原始文本之本真含义。

这显然是一种理论推进，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两个层次本身就已经蕴含在深层历史解读的文本学研究方法之中。因为这种文本不仅仅是指实物性的“著作”、“书信”、“笔记”、“手稿”或是“批注”，而就是那种包含了一

定的社会历史文本在内的作者的特定理论话语情境,这种情境只能由研究者通过上述的物性存在加以重构并激活。但同时必须谨记的是:这种重构或激活本身已经是一定的有限的研究者根据自身所持有的理论架构所进行的再阐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本的阅读同时也就是一种意义的生产。

在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探索中,深层历史解读的文本学方法的这两个内在结合的理论层面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出来。从最直接意义上说,这是由前面所提到的“生产方式”概念在马克思理论话语体系中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方式决定的。首先,马克思本人并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学院理论家,而首先是批判异化的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者。马克思的理论文本很少有专门的正面阐述性作品,大多是针对其理论对手的论战性和批判性作品。再者,具体到“生产方式”概念本身,虽然这个概念是马克思哲学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但对于这个概念的内涵具体是什么他本人从来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明。更进一步,我们可以发现“生产方式”概念在马克思自身理论发展的不同时期也表现出相异的理论特点,这些特点不仅仅是通过“生产方式”概念本身,而且是通过与这一概念相关的其他一系列范畴的出现或消失或是重组内在结合在一起的。

因此,想通过单纯文字训诂的方式来阐释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做法在一开始就注定是不可能的。笔者所能做的就是根据马克思自己的理论阐述、结合特定的思想史背景,在重构马克思一定时期的理论情境的基础上把握“生产方式”概念的特定含义。更确切地说,就是透过“生产方式”概念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全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不是可以为知性所认识的教条体系,而就是一种用以批判性的分析人类社会历史特定阶段的方法论指导,“生产方式”概念只是逼近这种方法的意义上方才凸显出其理论的重要性。这样,在有关“生产方式”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探讨中,也就是这个重构马克思特定思想情境的过程中,作为研究者自身所持有的理论储备和方法论自觉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除了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地平并自觉反思研究者自身所具有的方法和理论资源外,深层历史的文本学解读还包含第三个层次的含

义,这就是在文本学研究过程中通过文本解读所实现的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自觉体认与追寻。在笔者看来,深层历史解读的文本学方法的思想真谛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阅读方法,这种方法不仅仅是一种面对文本外在技术路径,而且就是在阅读(意义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同时面向文本和研究者本人的认识方法,或者说就是文本意义的科学的生产方式。

具体说来,历史唯物主义不同于一般(哲学)唯物主义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单纯地强调客体对象的优先性,而是将这种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同针对对象运动的分析结合起来。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在“实在论”之前加了一个“历史的”形容词,而是在自身范畴的结合中再现社会历史的运动本身。这些范畴都必须在一定的历史情境下加以理解,一旦加以凝固,历史唯物主义就从这些范畴的缝隙中溜走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阅读文本,就不仅是对文本本身的一种机械复制,也不仅仅是主体自我意识不加限制的膨胀,而是在文本本身和研究主体的对话过程中将文本的意义生产出来。这种生产的方式是由一定历史阶段上存在的思想语境与研究主体意识相互交叠而构成。这种意义的生产既不能脱离文本原初理论情境的历史遗迹,也无法超脱研究者自身所处的思想史语境,同时还必须在阅读的过程中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自悬于研究者的头顶,保持对自身理论方法的自觉意识。

四 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鸟瞰

大致说来,“生产方式”概念在马克思文本中的发生和发展,是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和进一步完善内在一致的。如果考虑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变革依赖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和实践展开,那么就不难理解的是,“生产方式”概念的提出和叙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资产阶级”、“资本”或是“资本主义”这些特殊的限定结合在一起的。不难发现,马克思很少讨论抽象的讨论“生产方式”,而总是将其置于一定历史条件下(首先是资本主义的)加以分析。

(1) 马克思文本中的“生产方式”概念

纵观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全程，“生产方式”概念的首次出现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在那里，“生产方式”还只是一个偶然出现的范畴，是在与“需要”相近的意义上进入马克思的讨论域的。“生产方式”成为马克思理论分析的核心范畴并得到集中阐述，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之中。此后，“生产方式”概念就开始扮演马克思理论分析标尺的作用。在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理论探索中，马克思用来修饰“生产方式”的术语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宣言》前后的一批著作中，“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成为马克思现实社会批判和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分析中的两个关键词。此后，虽然“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概念仍然得到使用，但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却逐渐为一个新概念所替代，这就是《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

在笔者看来，“生产方式”概念的使用情况在马克思的原初理论文本中所存在的这种变化是同马克思理论探索进程中自身存在的范式转变结合在一起的。“生产方式”概念的确立和发展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自身推进的逻辑坐标。简而言之，“生产方式”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成为马克思理论分析的核心范畴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确立；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现实社会历史批判方法的进一步雕琢，同时也是“生产方式”概念自身的进一步深化。^①

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面对早年“苦恼的疑问”，他最先接触到市民社会，并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对它的解剖，进而得到了用于指导自己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生产方式”概念的得出，也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①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当我们强调“生产方式”概念的确立和发展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的同时，必须看到：这个概念在马克思文本中的出现及其含义转变，并不是一个孤零零的理论事件，同体发生的是相关概念群的“跃迁”。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完善本身表现为一系列新概念或者是相关概念的新含义（包括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突现。

可资佐证的是，“生产方式”范畴在马克思理论框架中开始扮演一个关键角色，就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的。自此之后，马克思对于社会历史的批判性认知就获得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然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新理论建构仍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旧有的理论范畴，“生产方式”概念并未获得之后它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展现出来的明晰性。同样，这个概念的理论锋芒也未能真正触及直接生产过程的内在秘密。这种理论上的不足直接表现为马克思所据以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不同理论资源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概念中所发生的理论龃龉，或者说是一种过于直接而简单的结合。虽然“生产方式”概念的形成已经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性原则。但是在具体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和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说明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概念仍然表现出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当然这种理论局限性的根源还是内在于当时社会历史存在自身展开的特定情境。

简单说来，“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概念所再现的历史情境是这样的：从工业生产出发，马克思在分工的发展中说明了私有财产的形成和本质，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发现了资产阶级社会分裂为资本家和无产者两大阶级的历史趋势；其中竞争是一个关键环节，由于私有财产和竞争的存在，资产阶级生产的必然结果就是阶级对抗和斗争的尖锐化；特别是伴随无产阶级的普遍贫困和工商业危机的发生，革命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从而扬弃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上述分析在总体上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但是对于具体社会结构的运动以及当下“社会形态”中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不同层面上的不同因素作用的见解却在 1848 年革命后遭遇了自身理论的滑铁卢。这既要从现实“资产阶级社会形态”的变化中找原因，又要反思马克思“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概念所代表的那种当下社会历史批判观点的理论不足。从根本上说，这种不足在于资本剥削被简单而直接地链接到工业生产所导致的分工和竞争之上，而没有说明资本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在技术生产过程、社会生产关系和总体社会意识形态中完成自身布展的复杂机制。

只是在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随着马克思第三次经济学研究的推进，

生产方式内部的隐秘结构才得以通过剩余价值理论(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这可以看做是劳动价值论的完成)大白于天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出现就是这一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当然,在后文的分析中我们还将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不仅说明了资本剥削的内在本质,而且为剥离这种历史性本质到它的非历史性现象的上升过程提供了更为精致的科学方法论路径。在笔者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产方式”概念所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中的最高成果,是现实社会历史批判科学理论的再推进和精细化。

另外,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并不是一种错误到正确的简单修正,而是“生产方式”概念所提供的科学方法自身发展的结果,毋宁说二者就是“生产方式”概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存在方式。二者都是“生产方式”分析在对现实社会历史运动的说明中所形成的理论产物,但它们又不是一种作为抽象理论的“生产方式”概念在不同时段上的运用。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那里区分“生产方式”概念即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理论维度。

(2) 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双重维度

回顾马克思的思想探索过程,不难发现:历史—社会存在基础的理论分析路径和社会—历史运转主导的逻辑批判剖析这两重维度始终共生于“生产方式”概念之中。无论是在这一概念的确立还是在它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进之中,这两个理论维度总是呈现为一种内在的“缠绕”。这一点其实并不难理解,无论是生产凸显为社会历史的存在基础还是生产方式成为社会历史运动的主导逻辑,都是工业现代性的产物,也是工业现代性的“阿基米德之点”。要想发现并真正站在这种“阿基米德之点”上,就必须反过来否定性的批判这种工业现代性本身。这也是“生产方式”概念的内在批判性张力所依。

物质生产活动作为人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这一点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自然事实,但是生产作为社会历史存在的基础进入社会历史的运动并成为分析这种运动的出发点这一社会历史事实却是一个晚近的发明。这是两个分处完全不同的逻辑层面的事实。无论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还是狭义

历史唯物主义都首先承认前一个自然事实,但是对于后一个社会历史事实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两个不同的理论维度却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了一种“共轭式”的耦合分析。

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即说明人类历史—社会存在一般基础的理论路径,强调的是从生产出发把握一定的历史—社会的过程性存在。这既是“生产方式”概念的总体性框架的第一原则也是第二重理论维度,即对于一定社会—历史运动主导逻辑批判剖析的科学前提。广义历史唯物主义适用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但这种观点并不是在一般的历史哲学的意义上说的,而只有结合当下一定社会—历史运动的展开才能成立。这是因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理解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主体所进行的认识和重建,这种重建并不能脱离那种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在工业现代性这一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生产作为人类历史—社会存在的基础与前面所提到的自然事实获得了重合,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是当这种自然事实被用来建构历史—社会的运动时,历史就真实地表现为不同生产方式的转变和跃迁,这种跃迁是在向着工业现代性走来并揭示这种特定社会历史存在之有死性的意义上才得以绽现出来的。因此,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蕴含着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以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旨归。

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即批判人类社会—历史运转特定主导的逻辑剖析,首先是在面对现实存在的工业现代性,进一步说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意义上存在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依赖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科学前提,但它从特定生产方式运动的主导逻辑出发对于这种一定的社会历史存在进行内在的剖析。这是对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历史—社会存在基础说明路径的细化和推进,也就沟通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针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批判。因此,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运转主导逻辑的批判中,虽然在根本坚持着从生产出发的科学方法,但在具体的分析中往往采用的是能够真实再现这种特定社会情境的理论叙述方式——按照马克思在1857年《导言》中的话说,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概念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推

进,在直接的意义上就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自身完善的理论表现。因此,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建基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并且以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为自身的科学前提和保证。

简单说来,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总是要落到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之上,否则就成为一种抽象的教条体系;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总是不能离开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保证,否则就无法超越资本主义拜物教的限制。总之,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之中,这两个维度缺一不可,否则就会从不同的路向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明或暗的理论同谋。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

孙乐强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内涵是什么？它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存在什么关联？在这些看似自明性的问题背后，隐含着不同的提问方式。由于国内学科界限根深蒂固，马克思的再生产被划归于政治经济学的门下，而它的内涵也仅仅等同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中的两部类相互流通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图式，在这种思路中，再生产完全被看做为一个经济学概念。而本文则试图证明，再生产不仅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而且也是一个哲学范畴，再生产理论的形成不仅在客体向度上深化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在主体向度上也把历史唯物主义推进到一个更高层次。

一 再生产理论的六种解读模式

自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发表以来，关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但从总体上来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这也是关于再生产理论所出现的两次大的讨论高潮。

第一阶段就是自《资本论》第二卷发表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征是立足于《资本论》第二卷来阐发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内涵即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将再生产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将这种模式界定为**政治经济学的解读模式**。1902

年,俄国经济学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发表了《英格兰的危机和历史》一书,试图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中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模式来论证资本主义的工业危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会发生经济危机,最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消费需求不足,而是在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个别部分的比例失调。针对这种观点,罗莎·卢森堡做出了尖锐批判,先后于1913和1915年发表、写作了《资本积累论》和《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卢森堡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中的扩大再生产模型存在着严重的不足,^{[1](p. 119)}而杜冈的整个理论基础都是建立在这种模型之上的,因而断定,他的比例失调进而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结论也必然是站不住脚的。在此基础之上,卢森堡阐发了自己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的理解。他认为,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是建立在一个形而上学的假设即资本主义仅仅是由工人和资本家构成的“纯粹资本主义”之上的,这种假设根本不适合资本主义的客观现实。如果资本主义仅仅是由工人和资本家构成的,那么,他们根本没有办法为那些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找到实现的途径,因而,摆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消费不足问题。^{[1](pp. 116—119)}对此,卢森堡指出,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途径即抛弃马克思的纯粹资本主义模型,引入“非资本主义”第三市场理论。可以说,卢森堡的这一结论一经发表,就在思想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布哈林于1924年写作《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对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的核心观点一一作出批判。布哈林认为,卢森堡首先误解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将科学抽象与现实具体对立起来,这是他误解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科学意义的方法论根源。实质上,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模型是一个具有自足动力的机制,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必然会带来消费的增加,即对不变资本需求的增长和工人消费的增长,这是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2](p. 178)}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本身具有一个自足性的内在动力机制,根本不需要一个“第三市场”的外在动力。因此认为,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背叛。

第二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以后。如果说第一时期的讨论主题还仅仅局限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内,那么,

这一时期无论在主题上还是在范围上都远远地超过第一次,形成了再生产理论的多元化格局。首先,在参与讨论的学术队伍上,已经不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而是囊括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以及社会学家,讨论规模空前宏大;其次,在讨论的主题上,再生产已经越出来政治经济学的边界,成为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其他学科讨论的核心话题,而再生产的内涵也不断地超出马克思的语境,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格局。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以下五种解读模式。^①

第一种模式是完全否定的“反再生产模式”,即完全把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看做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幻象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名词,彻底否定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这种模式主要以海德格尔和鲍德里亚为代表。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概念是完全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中抽象而来的,“对于马克思来说,存在就是生产过程。这个想法是马克思从形而上学那里,从黑格尔的把生命解释为过程那里接受来的。生产之实践性概念只能立足于一种源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3]。以此为基础,海德格尔断言道,马克思的再生产概念根本不是对历史本身的客观抽象,而是对人的生命过程的一种思辨抽象,因而,生产的含义无疑就是人作为社会体的自身生产,而再生产恰恰就是人本身的再生产,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在资产阶级社会还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生产者”,这显然是与其“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形而上学的论述完全一致的。但可笑的是,马克思却把这种思辨概念当做自己全部哲学的支点。立足于此,海德格尔叫嚣道:“如果没有黑格尔,马克思不可能改变世界”,“马克思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3]而鲍德里亚也同样如此,他在《生产之镜》(1973)中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做出了全面地、彻底的批判。他认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看起来是要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并没有

^① 在这里需要指出一点,在这一时期,西方左派经济学家比如保罗·斯威齐,厄内斯特·曼德尔等也试图对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作出一些积极的探讨,但是,他们对再生产理论的理解并没有超出卢森堡等人讨论的范围。在他们这里,所谓的再生产指的就是两部类之间的再生产图式,如果从模式来讲,他们仍然隶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解读模式。

达到这一理论目的,生产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当马克思以一种高生产率超越资本主义时,只是完成了生产主义的另一种解释,他在根基上并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而指责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人类学基础之上的理论幻想,是一种带有“种族中心主义”的强制,是一种在镜像中的秀才革命。而再生产恰恰是以这种资产阶级最大同谋的生产逻辑为根基的,因而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在本质上完全是一种有待废弃的形而上学。

第二种模式是“均衡增长-再生产模式”,这主要以西方学院派经济学家,比如,英国经济学哈罗德(Roy Harrod)、美国经济学家多马(E. D. Domar)、牛津大学埃克斯特学院埃尔提斯(Walter Eltis)、剑桥学派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等为代表。这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奠定了宏观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但由于马克思缺乏现代分析方法,他的再生产理论比较幼稚,因而主张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来弥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缺憾,具体做法则是将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理论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嫁接起来,弥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不足,进而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服务,这就是当代学院派经济学家研究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根本目的。这种解读模式完全忽视了马克思本质层面上的再生产即生产关系再生产理论,仅仅根据《资本论》第2卷中的扩大再生产数学图式,将其与凯恩斯总投资-总需求理论嫁接起来,认为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实际上与凯恩斯总投资-总需求一样,在本质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均衡增长的模型,以此让马克思来“分享”凯恩斯的荣誉。这种单纯的嫁接,在赋予马克思过多荣誉的同时,更是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一种误解,完全抹杀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真实意图。

第三种模式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再生产模式”,即引入一种新的参照系来修正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这主要以阿尔都塞(葛兰西+拉康)、列斐伏尔(尼采)为代表。阿尔都塞在《再生产》一书和《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详细阐述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承认马克思本质层面再生产理论(劳动力再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科学价

值,将劳动力再生产理论看做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根本核心,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意识形态与劳动力再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在理论史上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在其根基之处,阿尔都塞并不是站在马克思的肩膀上的,而是站立在葛兰西文化霸权和拉康的“意识形态建构主体”理论之上,无限地放大了意识形态对劳动力的建构,这是对马克思劳动力再生产理论的一种修正式,在理论根基上已经溢出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范围。列斐伏尔虽然也承认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但是他这里的“生产”,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的生产,而是一种尼采式的“生命(身体)的生产”。在他看来,这种身体本身就是一种空间,“空间的生产,开端于身体的生产”^{[4](p. 170)}。通过这种变形,他提出了自己的空间的生产 and 再生产理论,实现了再生产理论的空间化转向。在他本人看来,这是对马克思生产关系再生产理论的一种发展,但实际上他已经扭曲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本质含义,陷入了空间拜物教的窠臼之中。

第四种模式是女权主义的“后再生产模式”,这主要以 Mary O'Brien、Susann Himmelweit 等为代表。这些学者一致认为存在两种再生产理论,一种是社会再生产理论(*social reproduction*),一种是人类再生产理论(*human reproduction*),二者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而在马克思逻辑建构中,仅仅分析了社会再生产理论,忽视了人类再生产理论,这是导致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存在重大缺陷的根本原因。他们指出,人类再生产理论并不是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是一种自然的不变的客观前提,相反,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社会形式,并以这种独特的社会形式参与社会本身的再生产。^{[5](p. 212)}其次,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本身也是不完善的,它忽略了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即家庭,忽视了女性和家务劳动在人类繁殖和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本质上是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霸权逻辑,因而主张重新诠释生产劳动的内涵,将女性生育和家务劳动囊括到生产劳动的范围之中,力图为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增添一个人类再生产的维度,来重构再生产的政治学。^{[6](p. 8)}

第五种模式是“反本质主义的再生产模式”,即完全抛弃整个社会的

物质基础,把再生产过程理解为文化和符号权力的再生产过程,这主要以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为代表。布尔迪厄的逻辑出发点就是反对主客二分、本质与现象的对立,他将现象学与结构理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他指出,社会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而是与个人经验和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习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通过这种习性才形成属于个人的文化资本的权力,从而将自身同其他阶级区别开来,形成自己的文化场。也正是立足于此,布尔迪厄认为,社会结构本身的生产实际上是通过文化和符号权力的生产实现的,社会的再生产就是文化的再生产。

二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内涵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追问一下,在上面几种解读模式中,哪一种真实全面地反映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内涵?要想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求我们对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有一个全面准确的理解。我认为,上述六种解读模式都只是简单地抓住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一个方面,将其泛化为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全部,以此来修正和批判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上述几种模式都没有真实再现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精髓。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再生产概念不仅仅只是个经济学概念,而且还是个哲学范畴,它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在马克思那里,哲学与经济学是紧密联合在一起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当我们用今天的学科界限(比如哲学、政治经济学)来一一分割马克思再生产内涵的时候,我们已经远离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原初意义。通过对马克思后期经济学著作的研究,我认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它包含了三个不同的理论层次。

第一,狭义再生产理论即直接生产过程的再生产。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将资本主义总生产过程分为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而这里的再生产理论指的就是作为四个环节

之一的“生产过程”的再生产,我们将其称之为狭义的再生产理论。这种再生产理论主要目的是为了科学地解剖资本主义的内部结构,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本质规律,完成对资本主义的生理学剖析。具体而言,这个层面的再生产理论又包括三个方面内涵,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已经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般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历史规定的形式。而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过程。^[7](pp. 924--925)

狭义再生产的第一个内容是指“物质生存条件”的再生产。马克思指出,从劳动的物质形式来看,任何社会首先都是使用价值的再生产过程,这是一切社会的“自然必然性”,资本主义也不例外。但是,马克思立即发现,这样一种物质生产过程在资本主义条件却采取一种不同的社会形式。由于这种物质生产是建立在普遍的货币流通以及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注定了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并不像前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把使用价值的生产看做为再生产的根本目的,相反,而是要服从于资本,因此,这里占统治地位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劳动本身也不再是单纯的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而是取得一种二重性的存在,即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生产价值的抽象劳动,因此,资本主义的直接生产过程本身也取得一个双重性质,即一般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的过程。马克思把这部分由工人创造出来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那部分增殖价值称之为“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在本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正是这一概念泄漏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形态的本质秘密,成为马克思解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最根本的依据。也只有在剩余价值这个层面上,资本主

义的一切秘密才会得到最根本的体现：所谓的资本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物化劳动，只有那种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才能称之为资本，因而，在本质上，“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8](p. 510)}；雇佣劳动也不是一种简单的主体活动，只有那种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真正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不是那种独立主体之间的契约型的交往关系，而是一种资本剥削、吮吸工人的剩余价值的血腥的奴役关系。也就是建立在剩余价值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才形成了一种资本作为主义的生产方式，

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9](p. 151)}

狭义再生产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伴随着剩余价值的形成，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拥有资本的人成为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而出卖劳动力的人则被生产为雇佣工人，“可见，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产生，是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主要产物”^{[8](p. 508)}。“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8](p. 450)}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就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工人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他们要想生活下去，就必须不停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自己生活基金来维持自己的生计，不断地让自己从属于资本，源源不断地将剩余价值生产出来，从而不断地将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这种奴役性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为根本的内容。而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出隐藏在外在假象背后的真实本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的科学剖析，才能真正地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的依据。

狭义再生产的第三个层面就是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在这一层面上,马克思着重分析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在资本主义生产确立的地方,是什么保证了工人不断地被作为劳动力再生产出来?这一问题是一个关系到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一个核心问题。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认为,只有通过教育、通过意识形态才源源不断地把工人作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劳动力再生产出来,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建立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和拉康“意识形态建构主体”的基础之上的,已经背离了马克思的初衷。马克思认为,对于劳动力再生产的机制划分为两个时期,在原始积累时期,是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强迫工人成为劳动力,“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10](p. 805)}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的地方,暴力已经沦为次要的手段,经济的必然性将迫使工人不断地作为劳动力再生产出来。

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10](p. 806)}

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成为当代众多学者,比如女权主义者、波兰尼、Lovell 等等,指责马克思的突破口,因而,全面再现马克思的劳动力再生产理论成为我们应对这些批评的最基本的要求。

第二,广义再生产理论,即包括生产、分配、消费和交换四个环节在内的广义生产过程的再生产。如果说狭义再生产理论是从内容上而言的,那么这里的再生产理论则是从形式上界定的,换句话说,就是资本主义在形式上如何实现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再生产的。在这里,马克思以剩

余价值为基础,区分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并在魁奈经济表基础上,将整个社会划分为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两大部类,详细地考察了两大部类内部及它们之间交换和分配,科学界划了年产品价值和年价值产品之间的差别,批判了斯密把年产品价值等同于年价值产品、把“工资、利润、地租看做为商品价值源泉”的教条,真实地揭示了交换、分配和消费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中所起的作用:交换、分配和消费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但绝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它们都根源于生产,由生产来决定。同时,马克思的广义再生产理论详细探讨了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正常运行所需要的条件,科学说明了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如何实现自身更新的确切过程,真实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危机的内在根源,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科学证明。

第三,马克思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日常意识的再生产过程,确立了资本主义日常生活再生产之批判理论。在这里,马克思分别揭示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资本家及其代理人 and 工人的日常意识再生产的过程。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看不到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而只是把资本的外在假象当做永恒的真理,结果,真的成了假的,假的成为真的;主体物化为客体,客体翻转为主体。资本家及代理人就是在这种颠倒的、着了魔的现象中,形成了将资本主义永恒化的日常意识。因为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体现着这种统治的肯定的一方,所以这些假象不是使他们感到不安,相反,只有处在这些假象之中,他们才感到很美好,感到如鱼得水,并在这种“美好”中将这种日常意识日复一日地将再生产出来。他们永远不会起来反抗这种日常意识,反抗这种日常意识得以产生的假象世界。与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相反,虽然工人在他们没有认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实本质之前,也会“受着同一种歪曲了的观念束缚”,^{[11](p. 258)}但是,“工人作为这个过程的牺牲品却从一开始就处于反抗的关系中,并且感到它是奴役过程”,^{[12](p. 49)}是一种痛苦。这种奴役性的实践必然迫使工人起来反抗“与这种观念相适应的观念、概念和思维形式”,与这种拜物教日常意识实行彻底地决裂,实现从日常意识到阶级意识的转变。

可以说上述三个层面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内涵,我们只有将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领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才能真正地回应当代学者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批判,坚实地捍卫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三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兼评上述几种模式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法论原则。

第一,科学抽象的原则。在哲学的发展史上,存在着三种抽象:思辨抽象、经验抽象和科学抽象。所谓思辨抽象就是以—一个固定的、自明性的本质出发,借助于思维的逻辑预设,抽象性地推演世间的一切。黑格尔就是这种抽象的最典型代表,他借助于神学的目的论预设,将世间万物的“多”归置为绝对精神这个“—”之中,消解掉所有经验性的存在,把整个哲学装扮为纯粹思维的王国,进而把绝对精神推上了最高的王位,建构起一种形而上学的神学大全。他的这种抽象决不是现实本身自我显现的结果,而是研究主体的理性强加的结果,是一种逻辑泛神论的纯粹抽象。与这种抽象相反,经验抽象则是建立在对客观事实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它指的是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即研究者借助于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将所有经验材料具有的共同属性抽象出来的方法。这种抽象与前者相比,已经具有唯物主义的基础,但是这种唯物主义绝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只能是一般唯物主义,因为这种经验抽象本身就像科学研究中的理论假设—样并不—定就是真实的或正确的,而是可错的。庸俗经济学就是很好的例证,这种经济学就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经验现象的抽象之上的,但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现象都只不过是一种拜物教的假象,因而,建立在这种假象基础之上的经济学只不过是把反映流行的肤浅观念的经济学术语翻译为教条的语言,绝不可能是对资本主义真实本质的科学认识;同样,以这种假象为基础的经验抽象只能是“科学的真正坟墓”,绝不可能构成马克思语境中的“抽象”真正内涵。我认为,马克思所

说的“抽象”既不是个人头脑中发生的主观心理现象的同义词，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纯粹思维的思辨抽象，也不是一种对现象材料归纳总结的经验抽象，而是一种奠基在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基础之上的科学抽象。如果说黑格尔是借助于神学目的论预设实现了由“多”到“一”的过程，那么，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过程已经真实地发生了：首先是以工业为基础的生产一般、无差别的劳动一般，然后是市场交换中出现的价值一般，价值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走向整体性的真正开始，从劳动到价值、货币再到资本，这是一个完整的客观历史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成为一种特殊的形态。这种过去在神幻中出现的“上帝之城”的“一”，现在由工业历史地创造了出来，这一次决不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的世界历史，而是资本开辟的真实的现实世界历史，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种“抽象”统治的无人社会，这恰恰构成马克思所说“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的真实语境。这种抽象决不是思维的形而上学的虚构和纯粹经验的归纳，而是一种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机理科学解剖之上的本质抽象，是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发展的客观必然结果。只有这种科学抽象才真正构成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方法作为根基，马克思是不可能从资本主义重重假象中剥离出资本主义的本质关系，更不可能得出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在本质上就是剩余价值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科学结论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海德格尔把马克思的生产逻辑归咎于黑格尔的劳动的形而上学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抹杀了马克思的科学抽象与黑格尔思辨抽象之间的本质差异，将马克思的科学抽象还原为黑格尔的思辨抽象。这种指责既扭曲了马克思科学抽象的内涵，又否定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革命性意义。另一方面，海德格尔作为一个哲学家，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多少的了解，因而，他也根本看不到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科学抽象的方法论意义，看不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影响。一旦忽略了这一点，他必然无法看到黑格尔的思辨抽象与李嘉图、马克思的科学抽象之间的本质差异。同样，当卢森堡批评马克思的“纯粹资本主义”的理论抽象，力图用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第三市场”来

弥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时候,他已经割裂了抽象与具体之间有机统一,将它们僵硬地对立起来,用一种现实的具体逻辑来对抗马克思的抽象逻辑。可以说,不论是卢森堡、戴维·哈维还是女权主义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即马克思的再生产逻辑在本质上是个抽象逻辑,当用它来解释客观现实的时候,本身是不充分的,必须运用现实的具体来进一步弥补、甚至修正这种抽象的逻辑。如果说,卢森堡力图用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第三市场来修正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那么,戴维·哈维则主张为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提供一个外在动力即剥夺性积累;而女权主义则力图为马克思增添一个人类再生产的维度,将家庭和家务劳动纳入再生产的范畴。所有这些都是从抽象到现实具体的一种延伸,我们既要看到他们理论的积极意义,又要看到他们理论的不足,在实践中坚持、发展和捍卫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

第二,本质原则。英国学者 Scott Meikle 在其著作《马克思思想中的本质主义》一书中肯定性地指出,马克思实际上是一位本质论者,他的历史辩证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历史本质主义,只有科学揭示马克思历史过程的本质论内涵,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精髓。^{[13](p.4)} 我认为,这种指认在某种程度上是准确的。马克思始终坚信一点的,即每一个非本真的现象背后都存在一个真实的本质,这个真实的本质不仅真实的存在着,而且是可以认知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何来理解马克思的“本质”概念呢?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解,存在着两种互为反对的观点,一种是以哈贝马斯为代表,他认为马克思哲学中的“本质”就是形而上学认识论中作为绝对本原的本质,是一种不需要证明的自明性概念。第二种观点则以意大利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德拉-沃尔佩为代表,他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从具体到抽象然后再回到具体的一种循环运动”,本质上是与伽利略的实验方法是完全同质的,因此认为,马克思哲学视域中的“本质”并不是绝对的真理,而仅仅只是一种假说,它必须要回到现实的具体,接受具体的检验。^{[14](pp.188-194)} 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本质”范畴的真实内涵。第一种解释重新把马克思拉回到近代意义上的本质主义的框架之中,把马克思宣判为一位

近代的哲学家,这严重地窒息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意义。马克思的本质主义与西方近代哲学意义上的本质主义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可以说,西方近代哲学的问题并不是出在对本质的探寻这一点上,而是出在对本质探寻的方法的形而上学性,西方近代哲学家——包括黑格尔——他们的本质主义路线其实都是一种理性本质主义,即用一种逻辑的概念体系,来一步步地推演出生活世界的内在本质,这种本质并不是现实生活自我显现的结果,而是研究主体的理性所强加和预设的,这种思维方式恰是西方哲学自律神话的根本表现。而马克思“本质主义”则与此不同,他认为现实的生活世界不是一种自然的静止状态,而是一种能动的自我展开的过程,而它的本质也就是在它自我的运动的过程中予以凸现出来,是现实生活本质的自我显现。“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道路”,也就说这种本质并不是马克思通过理性的支架予以强加的,而是现实生活本身内在矛盾自我运动的结果,是一种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本质论。这种本质论正是对近代以来的这种理性本质主义的一种有意的拒斥,是对后者的一种革命。而第二种理解显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自然科学的意义上理解“本质”的内涵,将其判定为一种可错性的理论假设,这种观点既没有理解马克思“本质”问题的出场语境,也没有理解马克思哲学“科学性”的真实含义,仅仅通过那种归纳与演绎的实证理性,是不可能真正透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内在精髓的。

很明显,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奉行的一种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本质,只有坚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线索,才能真正找到历史辩证法的内在动力,才能真正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也正是立足于这种本质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实质上就是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矛盾的再生产,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在本质上也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断言的是一种均衡增长—再生产模式,相反,而是矛盾和危机的不断再生产模式。他们之所以会得出与马克思相反的结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在灵魂深处已经抛弃了马克思的这种本质论的线索,而仅仅停留于再生产的表层图式上,这是抛弃历史本质论一种结局。而抛弃

历史本质论另外一种结局则会滑向经验论的文化社会学,布尔迪厄的再生产理论就是这种结局的表现。他的出发点是力图缝合本质与现象之间的二元对立,但是当他不分青红皂白把马克思的本质线索与西方理性主义本质线索一同抛弃的时候,他必然会走向文化社会学的途径,以一种经验性的习性概念为中轴,建构起文化资本一场的理论来代替马克思再生产的经济逻辑,进而将文化和符号权力的再生产看做为社会再生产的根本途径。这种再生产的路径是不可能真实地揭示一个社会的内在矛盾的,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一条认识社会再生产的科学之路,而只会让人陷入到文化—符号权力的盲目崇拜之中。

第三,边界原则。再生产究竟有没有边界?这是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与其他学者(理解)的再生产理论的根本差异。当海德格尔把马克思的再生产等同于人一社会的形而上学式的再生产的时候,他已经把马克思的再生产的边界原则忽略掉了,进而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无论是在古代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永远都摆脱不了“生产者”的标签,这种生产者的再生产是没有边界的,除非有一天人类全部灭亡。同样,阿尔都塞借助于拉康和葛兰西的理论资源阐发了马克思的劳动力再生产理论,但是,当他运用意识形态作为中介来寻求劳动力再生产的机制的时候,无疑已经否认了劳动者从睡梦中觉醒成为真正革命“主体”的可能,因为在阿尔都塞的逻辑中,主体永远都只是意识形态传唤的结果。而“意识形态是永恒的”^{[15](p. 352)},是人永远无法摆脱的他者,只要有人存在,意识形态就永远存在,那么,借助于意识形态把劳动者再生产为劳动力的机制就永远存在。而列斐伏尔则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还原为尼采的身体的生产,将空间根植于身体之中,提出一种空间的再生产,实际上,他已经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压缩为一种身体实践的辩证法。^{[16](p. 404)}尽管他认为相继存在着自然空间、抽象空间和差异性空间,但由于他抛弃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线索,这就使得他无法为各种空间的相继发展找到科学的动力机制,而只能通过乌托邦的想象来建构一种空间再生产的激进政治学,在现实中既看不到世界的尽头,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同样,西方主流经济学家

根据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数学模型将其与凯恩斯总投资—总需求、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嫁接起来,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解读为一种均衡增长—再生产模型,把均衡增长看做为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最根本特征,将再生产变为一个永恒持续的过程。这些做法实际上已经阉割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边界原则,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再生产绝对不是一个永远持续的或均衡增长的过程,相反,它有着自己不可克服的边界。

首先,资本主义再生产受到生产力的绝对限制,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利润率趋于下降而引发的资本主义内在不可克服的冲突。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生产技术的日益进步,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从而同被推动的总资本相比不断地相对减少,社会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不断地提高,从而产生了平均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尽管有多种因素(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相对过剩人口,对外贸易,股份资本的增加)发生作用来阻挠和抵消这种下降的趋势,但是它仍然无法改变资本主义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的一般规律,这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证明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历史局限性的客观证明。因为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动力,只有那种能够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出来,否则,资本主义生产活跃的火焰就会熄灭,生产就会进入休眠状态。利润率的下降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刺激积累的条件和原动力,受到生产本身发展的威胁。这种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证明了,资本主义再生产本身具有着内在不可克服的限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遭遇它自身的边界。

其次,从实现剩余价值的条件来看,资本主义再生产面临着生产力和购买力之间的矛盾。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惟一目的,这种内在规律必然会通过外在竞争强加给每一个资本家,他们为了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必然会不断地改进自己的技术,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然而,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与实现剩余价值的条件完全不是一回事。前者受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而后者则受

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商品的出售,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消费需求的限制。”^{[17](p. 352)}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规律。这就导致剩余价值必然无法全部实现,最终的结局只能是生产过剩,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当然,资本可以通过扩大再生产来为自己开辟市场,但是,固定资本的更新本身最终又将造成比自己所提供的购买力更大的生产力。因此,资本用来对付危机的手段,归根结底只不过是危机在更大规模上的再生产。

最后,总体说来,资本主义再生产永远无法克服生产力与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包含着绝对地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这种生产借以进行的生产关系如何;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的价值。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只能在生产手段与生产目的的相互冲突中运动,把生产力的发展限制在攫取剩余价值这种资本主义的特定形式之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有目的地发展生产力必然与生产力绝对发展的趋势产生了尖锐地对立,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不是别的,就是资本本身。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突破资本的限制,摆脱资本主义特有的形式,发展出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从而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扫清障碍。

四 再生产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了生产范式,建立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完全成熟,相反,在一些问题上,比如阶级意识、无产阶级的革

命策略等,都存在着很大的不足。而科学再生产理论在这些问题上进一步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

首先,在主体向度方面,再生产理论深化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客观地说,马克思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宣告了“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之后,在其早期思想阶段,他并没有对工人的这种阶级意识与资本主义异化社会中的观念形态之间的历史性关系做出深层的剖析。直到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才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在阐述唯物史观的具体内容时,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发展除了必然导致与交往方式之间的矛盾外,还会产生出无产阶级,“这种阶级形成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个阶级还会在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中“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使自身“成为社会的新基础”。应该说,马克思此时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发生学的思维构架,但显然还不具体,他还没有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发展所导致的工人对资本拜物教观念的解构的过程阐释清楚,也没有真正地分析无产阶级拜物教化问题,这种缺陷显然是与他此时在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线索上理解得还不够彻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8],要想真正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从生产过程进入到再生产过程之中,这恰恰是马克思后面要完成的任务。

1848年欧洲大革命的失败应该说给马克思一个极大的触动,促使马克思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而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的过程,如果只是直观地面对生活世界,即只是站在生活世界的现象层面,不仅不可能理解生活自身的内在本质,相反,还会堕入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牢笼之中,陷入对当前生活的不自觉的崇拜之中。随着第三次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逐渐地完成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的科学剖析,并在此基础之上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指出,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工人并不是生而就能看到资本拜物教的欺骗性的,在资本主义的内

在结构和内在矛盾尚未充分展开之前,雇用工人必然会受到资本拜物教这一“歪曲了的观念所束缚”。但是,马克思坚信这种蒙蔽只是暂时的,认为随着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奴役性实践必然迫使工人阶级起来反抗资本主义物质拜物教和观念拜物教,使工人阶级真正剥离那些掩盖在历史本质之上的颠倒的假象,从而抓住那些感官无法达及的隐藏在物相背后的社会的真实本质,进而冲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牢笼,上升为自为的革命主体。

从上述分析来看,如果马克思仅仅停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逻辑之中,而不进入到再生产过程之中,马克思是根本不可能科学解决无产阶级与拜物教的关系问题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工人的幼稚的判断就是最好的例证。马克思也只有进入到再生产的层面,才能真实地揭示出“无产阶级”概念的经济内涵——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的现代雇佣工人,才能科学地说明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内在关系,才能真正地建构科学的无产阶级理论。从这意义上来说,再生产逻辑并不是像女性主义所指责的那样完全从属于生产过程,相反,再生产理论在马克思的逻辑布展中是有其自身的理论地位的。

其次,在客体向度方面,再生产理论实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策略的科学结合。马克思的理论任务就是为了党的胜利寻求科学的依据,这就要求马克思必须要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的生理结构,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客观机制,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理论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要想揭示资本主义的内部结构,就必须进入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真实本质,而马克思狭义再生产恰恰完成了这一任务,为无产阶级认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奴役性本质及其内在无法克服的矛盾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而广义再生产理论则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无法达到真正的均衡,“矛盾”、“停滞”才是资本主义的常态。只有建立在再生产之上,才能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内在不可克服的边界,才能为资本主义的灭亡提供科学的依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在科学的再生产理论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哲学和政治策略才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

能真正地把社会主义置于科学的根基之上,使之成为一门科学,而不再是一种悬在空中的幻想。

再次,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科学地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层面:历史本质论和历史运作论。就像曼德尔所说的那样,作为一门科学,必须既要科学地揭示社会的内在本质,又要对社会的外在现象做出科学的说明。^{[19](p.9)}而马克思的再生产恰恰如此。马克思的狭义和广义再生产理论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真实本质和社会运行机制,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理学的解剖,是对资本主义历史本质论的科学说明。但是,马克思也认识到,这种历史本质论的路线是一种精英路线,仅仅把理论论述停留在这个层面是不可取,因为没有人生活在本质层面,特别是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也不会生活在本质层面;另一方面,马克思认识到现象世界也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惰性,生活在其中人也会把这种现象当做真理,陷入对当前生活的不自觉的崇拜之中。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就必须要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本质拉回到生活的层面上,让无产阶级在现实的生活之中去领会着真实本身。这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要求,更是现实革命的要求。因此,马克思在揭示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内容和形式之后,并没有停止自己的探讨,而是以历史本质论为依据,真实地揭示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假象是如何一步步地再生产出来的。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颠倒是如何一步步进入到外部现象中的:拜物教、流通的假象、竞争的颠倒,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转化、生息资本的形成以及资本主义三位一体的公式,实现了对“着了魔的世界”的历史现象学批判。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一方面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内涵,另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拜物教的再生产过程做出科学剖析,实现了历史本质论和历史运作论的有机结合,无疑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面。

参考文献:

- [1]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 [2] 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社,1982

- [3] 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J],丁耘摘译,哲学译丛,2001(3)
- [4]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trans.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 Ltd, 1991
- [5] Susan Himmelweit, *Reproduction and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A feminist Critique*[A],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x*[C], edited by Terrell Carv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6] Mary O'Brien,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M],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13] Scott Meikle, *Essentialism in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M], Duckworth, 1985
- [14] Della Volpe, *Logic as a Positive Science*[M], NLB, 1980
- [15]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A],哲学与政治[C],陈越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 [16] 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8] 唐正东,自然的生活世界与能动的生活过程:一种历史性剖析[J],河北学刊,2004(2)
- [19] 厄内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 [20] 布尔迪厄,再生产[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追忆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思想家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及文化转向^①

[英]斯图尔特·霍尔

我们都承认,如果没有理查德·霍加特,就不会有文化研究中心。但人们并不都认为,如果没有《识字的用途》,就不会有文化研究。在早先的一篇文章中,我称它为文化研究的三大“奠基作”之一,^[1]而在本篇中,我则借机进一步详细阐述我的这个看法。因此,本文提供了对《识字的用途》所处的“特定时刻”的一些思考——早期文化研究从该书中汲取了什么,并且它在方法上的哪些成就又可以归功于《识字的用途》?本文也描述了它与那时更广泛的论争之间的联系,以及该书在我们称之为“文化转向”过程中起到的构形作用。这里的后一个短语“文化转向”其实是一种不那么得体的提炼,理查德·霍加特并不会使用这个短语,而我在这里也没必要从概念上阐述它。“文化转向”只不过记录了一个与我在他处称之为日益发展的“文化中心性”(centrality of culture)有关的不可避免的事实——一种令人惊讶的全球性扩张与文化工业的复杂性;文化对社会及经济生活各个方面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它对不同批评、理性话语及学科的调整作用;它作为一种主要的建构性分析范畴和方法的出现,这个方法是一种“文化渗入当代社会生活每一角落,创造出一种次生环境的扩散,并

① 本文译自 Stuart Hall,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and The Cultural Turn”, in Sue Owen ed., *Richard Hoggart and Cultural Studies*,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译者注

调停一切事物的方法”。^{[2](p. 215)}我这里的观察以一个假定为前提,即诸如“文化转向”这样的东西确实跨越整个西方社会出现,它的知识场域恰恰在二战之前就已形成,并在二战之后的英国以愈演愈烈的态势出现;因此,以其独特的方式属于那一时代的《识字的用途》的确是文化转向早期的一个实例,同时也在产生这一现象过程中发挥了开创性的作用。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识字的用途》这个计划是筹划已久的。它的最初计划是分析大众出版的各种新形式,而它在第一部分所提出的激进革新——即试图在一种对其读者及受众文化的深度“阅读”中将之语境化——只是后来才加入的。不过,到1957年出版之前,它的大致意图已经变得很明确了。该书试图对以下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综合性答案:大众报纸杂志与它们重点针对的工人阶级读者的各种态度之间是什么关系?更为紧迫的是,新兴而又更受商业驱动的大众交往形式如何在改变着旧的工人阶级态度及价值观;简而言之,这种新的“识字能力”是在被用于什么“用途”?

请注意,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中,“工人阶级文化”这个术语可以交替地运用于典型态度、价值观、战前数十年中工人的生活的方式,以及在他们之间流行的出版、娱乐和通俗文化的各种形式。批评家们已经指出,上述这些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来源——后者不是由工人阶级自身生产,而是由商人阶层为工人阶级生产出的;并且,正如雷蒙·威廉斯在很早以前关于《识字的用途》的一篇评论中所谈到的那样,“‘工人阶级文化’与已经日益支配我们这个世纪的大众商业文化等同”,这导致了破坏性的后果。^{[3](p. 30)}无论如何,即使理查德·霍加特并没有把一种简化至另一种,他也确实假定:在早期,一种十分紧密的联系在出版物及其读者之间已经开始出现,这让他可以将它们描述为构成了某种诸如“‘旧’秩序”的东西。他声称,在工人阶级与大众文化的新形式之间,这种相互强化的关系不能再进行假定;并且,这正是关于文化转变之总体判断的核心,而这种文化转变也正是该书整体上最终所提供的东西。

人们所读、所思以及他们如何生活三者之间的关系缺省始终是一个复杂而又争议颇多的问题。然后,《识字的用途》第二部分并没有一直努

力去“描述普通工人阶级生活的性质，以便对出版物更为仔细的分析可以置于现实语境之中”，^{[4](p. 324)}结果更加剧了这种关系缺省。这导致《识字书的用途》前后两部分显然不同的两种表述之间出现了无法解决的张力。当然，霍加特当时就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下文中将会看到这两种书写”），并且他后来也经常承认这一点。^[5]可无论如何，它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与其他人提供的许多简单化、还原性的、怀旧的或经验主义的说明相比，在这里有一种复杂而又充满差异的文化转变概念起作用。这场争论不是由新/旧、有机/无机、精英/大众、好/坏之间的简单对立来推动的。霍加特意识到了“证据”的无系统性，并敏感于怀旧的诱惑：“我来自于工人阶级……这种非常情绪化的牵连显示了相当重要的危险”。^{[4](p. 17)}他既没有掩饰日渐丰裕的生活的影响，也没有夸大变化的速度和程度。涉及文化衰落命题的语言表达都做了谨慎地调整：

（我）坚持于如此强大的一种古老的言语形式，这并不说明古老传统强大而活跃的持续性，但传统并不会完全死亡。在如今这个难以理解的世界里，作为一种确定的、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值得依赖的参照，它得到了重温并受到依赖。^{[4](p. 28)}

“态度的改变比我们通常所意识到的更为缓慢。”^{[4](p. 13)}尽管如此，其诊断的总体大意仍然毋庸置疑：

我并不是认为，在上一代的英国有过一种还相当“民享的”城市文化，而现在它只有一种大众的城市文化。我是说，由于很多原因，大众宣传家所提出的诉求比早期提出得更为迫切有力，并采用了更加全面而集中的形式；我们正在向缔造一个大众文化的方向发展……并且，与它正在取而代之的那种总是未加修辞的文化相比，新的大众文化在某些重要方面并不如前者那么健康。^{[4](p. 24)}

在这里，“诊断”是一个有用的术语——这也就是“健康”一词所表明的——因为它提醒了我们这一结论应归于什么，以及它受到了利维斯及《细绎》(Scrutiny)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多大影响：即在 F. R. 利维斯自己的文化著作中所采用的陷于纷争的立场；在 Q. D. 利维斯颇有影响的《小说与阅读公众》(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1932)的核心部分所说的衰落的叙事；文化抵抗的艰巨规划，这种文化抵抗提供了有关《细绎》之教育方案和诸如《大众文明与少数文化》(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利维斯, 1930)之类宣言的一些信息；以及，《细绎》影响下的作者诸如丹尼斯·汤普森(Denys Thompson)等人提出的对低劣的广告语言的批判。该书也享有由保守批评家和作家(其中有些是美国人)所提供的对大众文化悲观主义批判的一般基础。它的引文来自于托克维尔(de Toqueville)、阿诺德·本达(Benda)、劳伦斯、艾略特、约翰·杜威、奥尔特加·伊·加塞特(Ortegay Gasset)等等，这些引文给予了文化衰落叙事的权威性。在对各种形式的文化研究的不断攻击中，马尔赫恩(Mulhern)竭力指出，无论任何人——雷蒙·威廉斯除外——努力从他所谓的“文化批判”(Kulturkritik)的元文化话语(meta-cultural discourse)中挣脱出来，他们都注定是要重复它。虽然他承认霍加特对反抗这一趋势做出了重大努力，但马尔赫恩仍坚持认为，霍加特与这一传统的“松散联系”仍然未曾改变。^[6]

然而，正如马尔赫恩自己所承认的那样，“谱系并非是命定的”。^{[6](p. 174)}撇开支配马尔赫恩话语的那一假定不谈——即一种始终已在(always-already)的可供选择的文化理论已是颇有成效，并且，在一种错综复杂的马克思主义中，它已经了解到自身向着简化主义发展的趋势——看似更为有趣的是，注意到在努力与这一文化衰落的主导话语决裂的过程中，《识字的用途》正好成为“一个断裂的文本”的方式(正如马尔赫恩承认雷蒙·威廉斯的《漫长的革命》亦是如此)；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识字的用途》开辟了文化研究与“文化转向”其后所基于其上的可能性。

主导性的《细绎》叙事是紧接着一个未曾说出的假定来建构的，即工

人阶级读者和受众享有有限的文化资源与道德体系。只有《细绎》在拯救昔日之遗风,在和文学传统提供的权威著作的长久共处之下,其感性已经被精细化,而它的道德风骨也已经因竭力一直从事批判性文学批评而变得僵硬。“这就是如此,不是吗?”,它提供了一个抵抗那种大众诉求和新兴的低劣文化之劝诱的阵地。霍加特的陈述显然很了解那一出发点的局限性。

我倾向于认为,论述流行文化的著作经常会丧失它们的某种力量,由于它们没有充分地澄清何谓“人民”,也由于不适当地将它们对“人民”生活之特殊方面的考察与人民所生存的更广泛生活联系起来,并将之与人们带到娱乐中的一些态度联系起来。^{[4](p. 9)}

乔治·奥威尔对流行文化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一个例证,即使是他也“从未完全丢掉从爱德华七世时期音乐厅的舒适内室来看待工人阶级的习惯”。^{[4](p. 15)}

相反,《识字的用途》中所暗含的一个主张认为,工人阶级受众并非中产阶级与大众媒介可以加以规划的空洞容器——一张白板——无论他们是想要什么。他们并不仅仅是“虚假意识”或“文化麻醉剂”(cultural dopes)的产物。他们有其自身的“文化”,尽管它可能缺少由文学传统所提供的精密性和权威性,当然也并不是统一的,但是,这种“文化”以其自身的方式,与有教养阶层的文化一样致密、复杂、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并且具有道德。因此,文化产品的作用不能被“读尽”或直接从为他们消费而生产出的产品内容来推断,因为,为了具备一切深层的“社会效果”,它们必须进入已经得到充分阐释的社会文化世界并积极地与之相协商。在此意义上,阅读总是一种文化实践。

其他的姑且不论,这个思想包含了一种有益的经验,甚至是一种深刻的思想洞察,即社会意识形态在实际上如何起作用?无论“旧”流行文化在商业上如何具有组织性,并在诉求上是天然的,如果它看似少了种“外来的攻击”,那并不是因为它是那一文化的真正产品,也不是因为它能简

单地被强加在工人阶级受众之上，而是因为，它更接近于——更忠实地反映，或更好地说，更为“确实地”根据以下常规来运作——工人阶级文化的习惯、态度以及未曾言说的假设。而且，在一个城市工业的全部阶级的复杂形成史中，它通过长期共处实现了自身更充分的“本土化”。如果大众文化的种种新形式影响了变革，那这只能是因为，这些文化形式过于让自己置于一种文化活生生的肌理和复杂的态度中——它们正是寻求将自己纳入于这一文化中。这些形式根据这一文化的常规来运作，而这一文化同时也从内部改变并中断它们、驱离它们，并将它们归于新的情感、习惯及判断模式——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拉直行动的弹簧”。

于是，我们不仅是追问这如何归功于“文化批判”的话语，如何源自于它，而且还要追问它在多大程度上与那一话语决裂，以及以哪些重要方面与之相决裂？这样才是恰当的。在它的写作实践与思想实践中暗含着什么方法上和概念上的革新，而新的方向可以基于这些实践之上？人们无须苦心推敲也可以列出它们。有一种“文化”概念在这里起着作用，它很不同于激励了文化批判传统的那种文化概念。对于“文化”，霍加特意指工人阶级如何言说和思考，他们在谈话和行动中分享着有关生活的何种语言和一般性假设，怎样的社会态度提供了他们日常实践的信息，他们使用了什么道德范畴，从而对他们的自身行为及他人行为做出评判——当然，这包括了他们如何把这一切用到他们阅读什么、看什么和唱什么上去，即使只是格言式的。这种关于文化作为“使之有意义”的实践的看法确实与“文化”作为评判的理想法庭的看法大相径庭，后者的标准是“业已得到思考和诉说的最好东西”，也正是这个标准鼓舞了自阿诺德直至艾略特及利维斯的传统。这一目标让这晚近意义上的文化成为研究对象的中心和必要部分，无论实现得如何断断续续，它就和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的第三个定义——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一样界定了一种断裂，而且，尽管有着重大的差异，但它还是界定了一种沿着平行方向迈进的断裂。对文化研究来说，这是一个形成时刻。

这其中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洞见，它就如一条线索贯穿于随后文化研究的曲折发展和转向之中。它提出了一个批判性的挑战。它让文化分析

不可逆转地反对任何还原论趋势——无论是向纯粹意识形态、“经济”还是“阶级利益”还原。不过，它并没有否认社会利益影响到意识形态和文化如何发展，也没有否认社会定位对哪种观念得到采纳并获得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这对它的理论工作也产生了影响。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能被假定；并且，因为它不能机械地操作——就像马克思曾经说的思想领域之内对经济的“反映”那样——所以，它不得不在自己所有的具体性和历史特殊性中重新概念化。文化不是由自由流动的观念所组成；它不得被理解为是嵌入在社会实践中的。但它并不是更为决定性的“基础”在某种依赖性的“上层建筑”中的反映。文化研究中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问题在这一概念上的难题中得到了展示，并也由此表明中心为什么会绕一个如此漫长的理论“弯路”。

有人坚持认为必须对“生活方式”加以自在自为的研究，这种坚持是对所有理解文化变革之尝试的一种必要的语境化，而不只是从文本分析中推导出的。我们可以称这是存在于霍加特方法核心的社会责任；并且，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特征（这一特征后来多少有些被人文学科的洪流所遮掩）正是来自于这一源头。第三，也有人强调文化主要是作为一个意义问题：不是作为自由流动的“价值观”的意义，抑或是作为体现在文本中的观念的意义，而是作为活生生经验之一部分的意义，它塑造了社会实践并铭刻在各种社会结构、体制和关系之中：文化分析作为“对一种生活的独特方式中暗含而又清楚表明的意义和价值观的澄清”。^{[7](p.57)} 对此，E. P. 汤普森在他对阶级更为敏锐的意识之下，强调为“生活方式”(ways of life)。

霍加特让“细读”的文学—批评方法适应了阐释一个文化的活生生意义这一社会学任务，在此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方法论上的革新。有人说它是“社会学的”，但显然，这要求某种比一般经验社会学方法更具有革新性的东西。在这些阐释过程中暗含着一种不折不扣的“社会解释学”：“我们必须努力超越习惯而看到这些习惯代表了什么，必须透过各种陈述而了解这些陈述事实上意味着什么（那可能和这些陈述本身正相反），必须察觉掩盖在惯用习语和仪式化仪式背后不同的情感压力”。^{[4](p.17)} 当然，在霍加特有其工人阶级背景，并有着丰富的童年记忆和经验可以借鉴的情

况下，“从内部解读文化”对他来说是可能的。学生们试图按照《识字的用途》的方法论规则，而老师们则试图教会学生如何将之运用于一部作品——这是“一个中心”建立所要求的東西——这些做法不会是侥幸的，而需要更为严格的教学协议。这个方法论要求从一开始便暗含在“中心”的建立之中。中心在早期就建立了两个工作小组来探讨这样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我所主持的——它试图阐明社会/文化关系，以及这种关系该如何去思考——在这个小组中，阅读广泛地涉及“其他学科”：跨学科和文化研究的观点首先在这一点上结合起来。而在第二个小组中，理查德·霍加特领着学生完成了对许多文本的细读，例如布莱克的《老虎，老虎》，《儿子与情人》的开篇，奥威尔的《射象》，西尔维娅·普拉斯“为语调而阅读”的《父亲》——也就是说，为了演讲模式和对受众的隐含态度而阅读。但这些都是早期的做法。

《识字的用途》作为一个“断裂的文本”提供了这种混杂而不完善的开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研究发展中接着出现的许多思想因而都是这一开端的发展：抵抗其文化叙事，然而却加深了认识论上的断裂，而这种断裂则得到了它的方法论变革的例证。诚然，这里的许多主线都没有在概念上得到充分的发展，即使是在“英国与当代社会学派”演讲中也是如此，这篇演讲制订了中心最初的计划。^[8]然而，当文化研究中出现对“转向理论”的抱怨时——霍加特他自己就以最为尖锐的方式做了这样的抱怨——人们很难设想，除了通过借助概念上的不断质询和方法论上的自我反思——可以说是“研究这一断裂”——来加深这些转变，中心还能从哪里开始。

因此，可以举例说明，向一种充分跨学科规划的文化研究的转向，以及与其主导话语的“文学”的决裂，这些都暗含在研究社会和文化——与其文本共“处”——的律令里，并且，它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心的工作中以各种方式得到了广泛应用。尽管《识字的用途》没有什么像威廉斯“文化理论作为一种对整个生活方式之中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研究”^{[7](p. 63)}那样吸引我们，或者说，像我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试图转化它时那样吸引我们，即在一种社会结构中研究“文化”及其与其他实践的关系。

“文学”的痕迹依然残存在霍加特对语言的精细而敏感的关注中,也存在于他(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所坚持的主张中,即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文本必须被理解为起到了“作为艺术——即使作为坏艺术”的作用:这个评论强化了对语言作为一种文化模型和符号形态的关注,文化正是在其中操作的,同时,它并没有完全回避大众文化争论中传统的高雅/低俗、好/坏范畴。通过与符号学、后结构主义及话语理论的对话,它和坚持回到必然的“经由符号的延迟”建立了联系,没有这种延迟,所有的文化研究都有成为还原主义的危险。^[9]受众积极地把某种东西引入文本中,而并非只是文本的听众——也就是说,“阅读”是一种社会实践,一种能动的交流。在大众交流研究中——它组织了中心早期研究的许多方案,这个观念在对主导“功效”传统的批判中被采纳。这当然也支撑了我自己有关“编码/解码模式”的研究,^[1]并随后在与巴赫金对话观念具有建设性的接触中,在“能动的受众”、读者—反应路径中得到复兴,这甚至可以追溯到所谓“民粹主义”关于受众与流行文化的晚近研究重点之中有些过火的各种要素。

文化是对内嵌于“生活方式”中的意义的阐释性研究,这一遗产在许多研究中都可以发现。这些研究运用了人种学、参与观察和结合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谓的“深描”的其他人类学手法,除此之外,它们把我们带到“表意实践”的语言。当文字材料“按照”现存态度“研究”,并在各种新的方向上改变它们时,这些文字材料才拥有真实的社会功效,这种观点包含了社会意识形态实际上如何实现其功效的一种模式,而这种功效比影响力、意识形态控制、虚假意识等现有模式要先进得多;它预见到许多将效法多音性和转码理论,并预见到对各种文化研究的冲击,即发展得更充分的“霸权”和文化权力的葛兰西模式——它依赖于“共识获胜”,阿尔都塞的“三大实践”和“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以及一种截然不同的流行概念,^[10]等等。

《识字的用途》的出版产生了巨大反响:部分是因为它本身就令人感兴趣,以及它在方法和论点上的优秀和创新;部分也是因为其牵涉到更宽泛的有关战后社会变化步调及方向的讨论。大众文化商品化的增长,电

视的诞生,青年文化的萌芽,以及大众消费的增强都是被称之为“丰裕争论”(the affluent debate)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些力量对工人阶级产生了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工党、其选举前景以及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在他预言性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中所称“社会主义的未来”有着特殊的反响。工党支持的阶级基础是正在被社会—文化变革所侵蚀吗?确实,文化在工党思想中起到某种残留作用。直到被新近的阶级态度以及随着攻击商品化而显现的价值观揭示出为止,在工人阶级文化密集的、防御性的、次级的法人结构中,工党主义的这一根基并没有成为很严肃地反思的主题。霍加特的著作直接参与了这些焦虑。这些问题刺激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工党的修正主义论争,并且它也是诸如艾布拉姆(Mark Abrams)的影响深远的《工党必定失败吗?》(Must Labour Lose?)这类著作的语境——这本著作否定性地评价了社会变革之后,工党在其核心工人阶级拥护者之中的前景,它也在盖茨克(Gaitskell)1959年著名的工党大会发言得到了总结,在这次发言中——它把我们带到了文化与政治论争的核心,盖茨克尖锐地质询了工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是否可以在“汽车、电视、洗衣机和冰箱”的来临中幸存下来。托尼·布莱尔的“新工党”及仰慕文化(aspirational culture)在这些争论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前因。

理查德·霍加特并没有直接地提出这些问题,而在此书中也没有大量地描绘工人阶级政治。众所周知,他选择致力于多数人,这是大众宣传者的诉求主要所针对的人群,他也有意地贬低他所谓的“有目的的、政治的、虔诚的、并自我改进的少数人”的作用^{[4](p. 22)}:比如说,他与雷蒙德·威廉斯正相反,后者把政治视为是“高级工人阶级传统”的一部分,并把政治机构的建立视为其最杰出的文化成就之一(“一种基本价值观向社会领域的延伸”)^{[3](p. 31)}。然而,《识字的用途》的开篇表明,霍加特的论点从更广泛的关于战后丰裕情况的争论中,并从被称为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的情况中确定了自身地位。“人们常说,现在英国并没有工人阶级,一种‘不流血的革命’已经发生了,它大大减少了社会差异,以至于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栖居于一种几乎平坦的平原中,一个中产阶级下层到中产阶级的

平原……我们可能会受到一种情况的打击，即工人阶级改善他们命运的程度，以及获得更多权力和财产的程度……（他们）不再感到自己是‘下等阶层’的成员……”。^{[4](p. 14)}当然，这结论是慎重而复杂的，但在其攻击上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至少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确实成了无阶级的……我们正在成为文化上的无阶级”。^{[4](p. 142)}这在早期新左派圈子中成为争论的焦点，尽管我所称的“某种意义上的无阶级”在其中获得了更为宽泛而批判性的意义。（霍尔，1958；拉斐尔·塞缪尔，1959；爱德华·汤普森，1959）^{[11][12][13]}

文化研究与“最早的”新左派的更广泛的联系已经得到了普遍地注意。^[14]特别是，《识字的用途》也已对我在该书出版期间所处的那个环境产生了形塑性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出于某些偶然的原因，如当代资本主义改变的性质，新消费主义的后果，战后社会变革的政治，以及政治与文化的关系，这类关注在当时的激烈论争中构成了关键的争论话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一个初生的“新左派”作为一种独特而非正式的学生构成已经在牛津大学出现。它后来与其他形式结合为一种运动，这是由1956年的一些事件所触发的——英国侵犯苏伊士运河，法国、以色列及苏联对匈牙利革命的反应，以及他们对展开政治辩论的冷战放松控制过程中的影响。^[14]

《识字的用途》的出版在这些圈子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来自牛津大学的各种左派倾向的学生之中进行了积极的讨论，这种讨论涉及战后资本主义的性质，福利国家所表现出的历史折衷特征，改变中的阶级性质，苏联试验的性质，冷战的冲击，帝国主义的复活，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以及在这些新历史条件下左派的前景。它的许多成员都是文学批评家，并熟悉利维斯/《细绎》有关大众文化的论点，尽管多数人都在很大程度上既拒绝它有关文化衰落的假设，也否定其文化抵抗规划的精英和保守特征。有些人已经与雷蒙德·威廉斯进行了交谈，并已经阅读了《文化与社会》早期章节的草稿。在此环境下，文化不是被看成一种独立价值，而是所有社会实践的一种存在条件，并因而也是政治与社会变革中的一种积极力量：它提供了我所谓的“完全不同种类的证据”（我在工党俱乐部杂志

《号角》的一期中提出这一点,并在1957年编辑了该文,而它正是由对《识字的目的》的回应所决定的。^{[15](p.3)}这一切都为霍加特此书的接受提供了深厚的基础,并激发了热烈的论争。《大学与左派评论》是后来两份奠基性的新左派杂志之一,它在1958年的第二期杂志就是由一组重要的《识字的目的》专题论文集构成,其中包括了雷蒙德·威廉斯颇具影响力的评论。霍加特和威廉斯都投稿给之后的期刊,而威廉斯则成为新左派之中的领军人物。

这些论争其后被批评家解读为,在文化研究话语中文化包容政治的证据;^[6]但这似乎是一种有些不当的发现。这是扩展文化和政治定义的努力的一部分——它毫无疑问仍然处于原始阶段,这种努力成为新左派和文化研究所特有的:把文化看成为一切社会实践的构成基础之一——包括政治——只要它们是“指意”的(也就是说,就像马克思·韦伯一度提出的那样,只要它们具有“意义相关性”)。除非社会团体和阶级通过“最终的经济决定”,并通过“在他们背上戴上政治牌照”而始终已在地铭刻在他们指定的政治位置上,正如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曾经生动描绘出的那样,招募社会力量到政治岗位、规划,以及他们在权力竞争中,这种动员如何能不——也——成为一个文化问题?并且,这些程序如何能出现,却没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意义的构成基础,而人们正是通过这些来理解其生活的意义的?马尔赫恩主张,这让“文化”成了一切事物——它有些过度了,“没有确定的构成或倾向……一大堆驳杂的可能性”。人们只能回答,并非一切事物:而是在一种维度上的,也是一种存在条件上的所有意指实践(这当然也有着存在的物质条件);并且,也不是毫无“倾向”,而是绝不会是最终决定了的,因而也总是向着多种可能性开放——并因而总会带有一定程度上的偶然性。认为政治的“建构功能”是“决定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关系的秩序”,^{[6](p.173)}这种主张只是把水搅浑了。

理查德·霍加特用“美国化”一词来暗指框架其主张的一系列更为广泛的变化。当新左派更为直接地讨论这些问题时,美国也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参照点——由于非常充分的理由。文化的商品化,大众文化各种新

的动力形式——电视、流行音乐、广告、青年文化，大众更充分地并入到市场之情况的扩张，以及大众消费主义现象，都以战后最强大的当代形式在美国发生。这标志了自英国到美国，在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领先例证”的目录中的一种转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看来好似已经解放了各种爆炸性的新兴文化力量；只有回顾性地说，才可以清楚地看出该书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一个新局面的开端，并以其自身替代性的方式提出了这一开端。

这里我们无法详细地讨论这一转向，但回顾起来，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它的粗略轮廓。一种战后的繁荣，并伴随着上升的生活标准是存在着的。长远的再分配转换通过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得到实现，但这种转换比提倡者所估计的更为有限（尽管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正确地指出，把资本吓破胆就足够了。并且，在这个时代，唤起了对全球化、市场力量、新的全球劳动分工、新自由主义革命和“世界新秩序”的强烈逆潮）。实际上，丰裕并没有这样来表征“无阶级性”（*classlessness*）；相反，它标志了那一长期转向的早期阶段（尚未完成的），也就是说，从旧的、分层的、植根社会的、等级阶级结构的和具有新教伦理特点的西方欧洲资产阶级社会，向美国被更加削平的“后工业”阶级结构转向，后者基于公司资本、货币、声望、生活方式、快乐主义和消费。隐含于其下的是一种长时期的转向，也就是说，从十九世纪的企业家资本主义，凭借帝国主义的“全盛时期”的神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无产阶级“时刻”的失败，以及两次大战期间的沮丧情绪，转向一种权力的汹涌激增，这由法人资本的集中、管理革命和二十世纪晚期的福特主义经济规模得到了表征。大众社会、大众文化、大众消费主义以及大众市场成为这一历史转向不可分割的方面。准确地说，如何理解他们真正的相互依存性，随后的演变、及其与文化的关系，这依然是文化研究尚未实现的任务之一——在日渐盛行的超理论（*hyper-theoretical*）氛围和后政治氛围中，或许永远丧失了。当然，在《识字的用途》之后紧接着的几十年里，事态的情况将要由福利国家与社会——民主共识的历史折中所支配。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并在全球化范围内得到了大规模地改组——我们正在试图理解的这种力量开始以势不

可挡之力,也以对文化的深远影响回归到这个舞台,并且,它的确改变了世界。

参考文献:

[1]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re: Some Problems and Problematics*[A], in *Culture, Media, Language*[C], ed. S. Hall, D. Hobson, A. Lowe and P. Willis, London: Hutchinson and The Centre For Cultural Studies, 1980

[2] Hall, 'The Centrality of Culture': *Notes On The Revolutions Of Our Time* [A], in *Media and Cultural Regulation*, [C]. ed. K. Thompson, Vol. 6 of the Culture, Media and Identities Course Books, London: Sage and Open University, 1997

[3] Williams, R. Working-Class Culture[J], *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 2, 1957(Summer)

[4] Hoggart, R. *The Uses of Literacy* [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58

[5] Hoggart, *An Imagined Life. Life and Times, Vol. III: 1959—1991* [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92

[6] Mulhern, F. *Culture/Metaculture* [M], The New Critical Idiom, London: Routledge, 2000

[7]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5

[8] Hoggart, *Schools of English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A], in *Speaking To Each Other, Vol. II* [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70

[9] Hall, 'Black Diaspora Artists in Britain: Three Moments', in 'Post-war History' [J],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61, 2006(Spring)

[10] Hall,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 [A], in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C], ed. Raphael Samuel, History Workshop Serie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1

[11] Hall,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J], *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 5, 1959(Autumn)

[12] Samuel, R., Class and Classlessness[J], *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 5, 1959(Spring)

[13] Thompson, E. Commitment in Politics[J], *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 6, 1959(Spring)

[14] Hall, *The "First" New Left*[A], in *Out of Apathy*[C], ed. The Oxford University Socialist Discussion Group, London: Verso, 1989

[15] Hall, S. Editorial, *Clarion*[C], Journal of the Oxford Labour Club, Abingdon, Oxon, 1957

[16] Leavis, F. R., *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M], Cambridge: Cambridge Minority Press, 1930

[17] Leavis, Q. D, *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32

(殷曼婷 译,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雷蒙·威廉斯与新左派政治学

[英]布莱克本

1月26日,雷蒙·威廉斯去世了,英国左派最具权威、最一贯、最激进的声音逝去了。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样一个人却在他的影响处于巅峰之时突然离开。许多报纸和杂志纷纷撰文纪念威廉斯,认为这位理论锋芒尖锐的批评家的去世是对英国民族文化令人痛心的打击。^①可以说,威廉斯开创了一种研究文学、文化研究、传播学和成人教育的全新方式,甚至开辟了许多研究和实践的新领域。与这种文化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他有关民主的“漫长的革命”思想。但即便如此,其合法性和重要性也已被那些此前与他的反资本主义政治学意见相左的人所承认。毋庸置疑,威廉斯的戏剧和小说中包含着政治主题,但同他其他所有著作一样,这是以一种与既有的政治话语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的。威廉斯的理论意义已经并且必将超出左派的范围。在这里(《新左派评论》),关注威廉斯著作的政治意义并着手考量这位思想家逝去的理论影响应该是最合适的——尽管后者是十分困

① 有关威廉斯的纪念文章可参见:Bill Webb, *The Guardian*, January 27th; Terry Eagleton and Frank Kermode, *The Independent*, January 28th; Francis Mulhern, *The Guardian*, January 29th; Blake Morrison, *The Observer*, January 31st; Anthony Barnett, *The Listener*, February 3rd; Tony Benn, *The Morning Star*, February 4th; Fred Inglis,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February 5th; Anthony Arblaster, *Tribune*, February 5th; Stuart Hall, *The New Statesman*, February 5th; Patrick Parrinder, *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12th; Judith Williamson, Anthony Barnett, Stuart Hall and Daffyd Ellis Thomas, *Channel Four*, February 28th; Margot Heinemann, *Marxism Today*, March 1988; Kevin Davey, *Interlink*, March 1988.

难的一件事。清理威廉斯的思路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也无法面面俱到。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认为在这里将那些贯穿于威廉斯的观点和作品之中的政治诉求揭示出来是有必要的。

一 抗议与文化理论

雷蒙·威廉斯是《新左派评论》的创始人之一,他发表的18篇文章涵盖了杂志迄今为每一个发展阶段。每个特定年代,他的著作都会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原则问题上引发批判性回音。例如,60年代早期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的文章,70年代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和安东尼·巴纳特(Anthony Barnett)之间的讨论,以及80年代《新左派评论》第148期中弗朗西斯·穆尔赫恩(Francis Mulhern)对《走向2000年》一书的探究等等。《新左派评论》还与雷蒙·威廉斯合作出版了他的访谈文集《政治与文学》(1977年),对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生活和工作做了最完整的概括。这并不是说《新左派评论》总是给予威廉斯以恰当的回音,也不是说我们一直在无限度地利用他的思考、洞察力和支持——现在,不同情况下的关注比起令人误解的直接合作来说更加难以解释。但威廉斯在杂志历史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却是毋庸置疑的。^①

当然,这里谈到的仅仅是他对于“新左派”诞生所作贡献中的一个方面。威廉斯所做的那些贡献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和左派评论》,作为60年代后期《五一宣言》的编辑,80年代早期“社会主义者社团”的创始人,以及作为作家、演说家和多种多样的工人组织、运动、科研计划的参与者等等。

^① Edward Thompson, “The Long Revolution; Part 1”, NLR 9; “The Long Revolution; Part 2”, NLR 10 (1961); 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Politics: the Work of Raymond Williams”, NLR 95 (1976); Anthony Barnett, “Raymond Williams and Marxism: a Rejoinder to Terry Eagleton”, NLR 99 (1976); Edward Thompson, “Afternote to Romanticism, Utopianism and Moralism: the Case of William Morris”; Francis Mulhern, “Towards 2000”, NLR 148 (1984).

自《文化与社会》(1956年)和《漫长的革命》(1961年)出版以来,威廉斯的著作一再成为左派争论的主题。帕尔姆·杜德(Palme Dutt)认为它不过是“贴着某种标签的改良致”。爱德华·汤普森和詹姆斯(C. L. R. James),尽管分有不同的背景,且分隔在大洋两岸,但都赞扬威廉斯的成就并在一种不同于杜德的意义上讨论其重点和不足。他们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李尔本(Lilburne)和普特尼辩论的大众话语,如何理解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概念,以及阶级机构和革命在“日常意义”和“感觉结构”讨论中发生了什么变化?^[1]

威廉斯对前社会主义者或反社会主义传统的诉求,对于左派批判家来说是令人惶恐的。但这使得他能够捡起社会批判中被忽视的那些资源,构建出一个历经政治风云变幻并被证明为经得住风雨的社会主义信仰。他对于统治阶级霸权形成的理论洞察以及在自身作品中展现出来的批判力,得益于他对已经确立起来的文化模式内部核心要点的审视,而非满足于从一个纯粹激进立场出发的简单化理解。50年代威廉斯的主要写作动力是去建立(重建)一种针对作为人类秩序的工业资本主义批判,而不是去追究生产力领域中那些明确的经济失败或所谓的失败。《漫长的革命》致力于阐述这样一些新的概念工具,以便揭示政治变迁的隐性维度和社会形态的深层结构。对外在于政治经济制度的经验和社会实践领域的强调,对整体生活方式和长时段的关注,多少预示了《新左派评论》第40期(1966年)上朱丽叶·米歇尔(Juliet Mitchell)发表的女权主义先驱文章“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中的主题和方法。因其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一些既定范畴的拒斥,雷蒙·威廉斯对于英国社会形态或文化工业的分析已经或逐渐具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性。

威廉斯对保守主义传统的关注与其对新的实践和制度的大胆拥护是一致的。文化借以产生和再生产的模式、被大众传播技术变革所开启的民主可能性都是他的研究对象。在新左派编委会的早期讨论中,作为编辑,他曾支持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努力,即提出上述问题并尝试对当代大众文化做出新的诠释。他对教育和传播的研究创造了一种讨论和期待的氛围,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英国政府的决策。由企鹅出版

社多次再版的《传播》中，他期待一种传播手段的公共所有，但也强调这必须受制于一种由生产者和消费者构成的自我管理的团体。威廉斯不是开放大学和第四频道的直接创建者，但是他的讨论对于这些制度的完善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1968年4月的《听众》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工党的教育部长没有邀请威廉斯参与上述活动。这份由英国广播公司出版的刊有柏林爵士(Isaiah Berlin)和希思(Edward Heath)的文章的周刊上，发表了威廉斯的一篇题为“我为什么示威？”的文章，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加入反越战以及在德国大使馆外抗议鲁迪·多茨克(Rudi Dutschke)被暗杀的示威。这篇文章很有价值，因为它很好地例证了威廉斯的这种能力，即强调干预以展示我们自身行动所具有的更广泛意义，并把当下问题置于一个全新的和值得期待的情境之中：“在今天的许多城市中，抗议游行已经成为政治活动的一种常态。过去在英国，像在彼德鲁(Peterloo)和宪章派的游行中，有一种先于自由主义民主的示威形式，那些没有选举权的游行队伍代表了被排除在政治决议之外的大多数人，他们举着标语走街串巷，因为这是最迅速和最显而易见的传播手段。今天传播手段已经大大发展了……但是议会民主在舆论的压力下已经变得日益正式……而具有特定形式和缺陷的代议制民主理论，正在现代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压力下在实践中被超越，以便向非选举者灌输决议。现代传播体系在代议制民主的替代中正起着关键作用，除非是以完全否定的方式，它根本不是也不准备以民主自居。当德国学生在鲁迪·多茨克被暗杀之后发动示威反对新闻垄断的时候，他们是因自己的良好动机而走上街头，这些动机多年来一直是新左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任何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社会里，报纸、广播和电视构成的传播体系都是一种主要的政治制度——提供必要信息，在自身范围内筛选、强调或是拒斥信息，有能力产生影响并进行引导。但是这个制度……永远都是向着富人、新的传播联合体的叫卖，他们再通过简单的购买来驾驭这一巨大的政治权力……议会自身在经济计划和传播中已经让与了许多决定性的权力域给非民主的体系，且不准备有所挑战。西欧社会民主党派的失败正是在这些问题上的妥协，他们放弃了对迈向民主和社会主

义的方法之类的问题的思考。在失败所导致的夹缝中新的运动正在形成……严肃而冷静地说,政治制度的腐朽和堕落,以及那些事实上指向世界穷苦大众的暴力,必将继续为所有行之有效的行行之手段所抵抗。”^[2]

二 帝国主义与悲剧

威廉斯的成长背景不仅使得他对反殖民斗争和农民运动尤为同情,也使得他的理论探索受益良多。威廉斯的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他家曾住在威尔士边界靠近潘迪(Pandy)的农村,那里有农场主、农民、教师、牧师以及工联主义者。当威廉斯向《新左派评论》讲述他早期的政治经历时,他曾回忆起建在潘迪的左派读书俱乐部(the Left Book Club)对西班牙和中国的声援运动^①,并提及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或是柯尼·希力亚客士(Konni Zilliacus)的一次演讲给他留下的印象。^{[3](p. 31)}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自然会形成一种初步的但具有持久影响的“感觉结构”——为亲身感受以及政治文化模式所加强的国际主义。在197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威廉斯说明了他的战时经历是如何促成了他对第三世界人民反对军事统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抗的回应;“我成长于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父亲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样的环境中,激进工联主义思想和对战争的憎恨被混同在一起,后者是一种自觉的和平致观念……我们对社会变革支持暴力行动的同时却对战争持和平主义观点。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种矛盾之中。1938年我还自称是和平主义者,1944年的时候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役。我记得有一天,我们遭到一个纳粹党卫军坦克团的反击,就在那时,在那种情况下,我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我发现很重要的一点,他们是纳粹党卫军,而不仅仅是德国人,抑或乌克兰人或一般意义上被派上前线去抵御我们袭击的希特勒帝国的士兵。他们是纳粹党卫军这一

① 左派读书俱乐部,似乎已经协助培养了一大批战后杰出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不会被认为同亲民的“人民阵线”派(Popular Front)的陈词滥调颇为相似——雷蒙这里记得,十八九岁还是潘迪左派俱乐部(Pandy Left Club)新人的他是如何跟他在剑桥见到的共产主义组织者说的“我想和最革命的共产党人在一起”。

点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彰显了一种我已从报道、从西班牙战役中得知的意义。从那时起,我再也无法去反对用军事力量来保卫革命。相反,我开始相信一场不准备以军事力量保卫自身的革命是没有意义的……当我翻看一下中国、古巴和越南的革命历史时,我能感觉到它们不仅在目标上而且在取胜的方式和方法上都基本一致。”^[4](pp. 231—43, p. 238)

威廉斯对于那些 20 世纪中很难下定论的革命有足够的了解。他特别厌恶那些把可避免的和不可避免的革命苦难变成一场可怕的哑剧却同时遗忘帝国主义的暴行的人。在《现代悲剧》(1966)里,他思考了这些主题以及由“反对混乱的混乱战争”带来的苦难:“我们必须以一种近距离和直接的经历中认识到这场苦难,而不是名称来掩饰它。但是我们考察整个过程:不仅是不幸,还有抵抗不幸的人;不仅是危机,还有它释放出的能量以及从其中生长出来的精神。”^[5](p. 83) 在他 1975 年的一篇文章中,威廉斯反对在“实行政治民主的社会”里任何诉诸身体暴力的行为,除非是保卫民主自身。^[4](p. 239) 但示威和罢工、静坐和联合抵制,都可能结合他们的目标以及民众参与的程度,对扩张一种正在中心地带萎缩的民主有所裨益。

有意思的是,当代问题的直接政治反映都可以在威廉斯批判性著作的主体部分中找到,当然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可能不怎么样容易。威廉斯的所有著作都具有一种历史维度。但这个历史是植根于当下现实的;而且当代经验是在文化理论的批判性检验中出场的。在威廉斯的笔下,受利维斯影响的有关本真性和经验的试金石凸现了一个以前几乎没被批评主义承认过的世界。在像《现代悲剧》一样作品中,威廉斯能够看到,“我写作的一天正是英国军事力量被用来反抗南阿拉伯的‘持不同政见的部落成员’的一天。”这恰恰是工党政府的行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根据我一生中所经历过的那些一而再再而三的事件,我对它们及其文饰都非常清楚,因而无法认同那种日常的幻象。我的许多同胞都曾反对这些政策,并在不少特定情况下取得实效。但是很难相信,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已经致力于人类解放的事业当中,甚或是致力于那种作为真正革命动力的针对所有他人人权的承认当中。在一个经济不平等和组织化操纵所掌控的

社会中,我们也很难说自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三 对人类生态的挑战

为了获得一种有关文化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理解,威廉斯不仅仅出现在越南团结运动的讲台上,而且还研究了乡村抵抗和海外侵略的普遍复杂性。《乡村和城市》(1973年)揭示了隐藏在英国“乡村别墅”文化和田园牧歌式的习俗背后的,英国本土的资本主义掠夺以及对外的殖民奴役过程。同样,在建立一种恰切的社会语境的过程中,威廉斯重新定位而不是简单否定了那些以道德敏感性戳穿田园牧歌的作家。他力劝其英国读者如果他们要去了解自己社会的过去,最好尊重像威尔逊·哈里斯(Wilson Harris)和西昂戈(Ngugi)那样的当代第三世界的作家。与那种昭示着“后现代城市”争论的“新大都市”观点向左,威廉斯辨识出了一种准备对整个“人类生态”负责的新的“社会意义”。^{[6](p. 239)}

去年秋天在关于近来小说反乌托邦浪潮的交谈中——像保尔·瑟罗(Paul Theroux)的《欧区》以及皮特·戴维斯(Pete Davis)的《最后的选举》——威廉斯嘲笑这些载满厄运的预言和讽刺性的作品,并认为它们的影响也就持续几年,而非一到两代人。如果说《现代悲剧》将自身置于一个帝国主义和革命的世界之中,那么《乡村与城市》则为针对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生产主义”变型的彻底生态学批判打下了基础。70年代后期,威廉斯成为社会主义环境资源协会的支持者。他也是第一批回应爱德华·汤普森关于核武器竞赛导致危机升级的主题的人之一;在“核裁军政策”中,他声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建立和平,而且需要建立的不止是和平”,这是因为在核军事主义同持续的掠夺及失业之间有着实质的联系。^[7]

当威廉斯一以贯之地批判那种隐匿了劳动过程的田园牧歌或消费文化的脆弱幻想时,他无法认同一种正在展开的阶级主体观念。他对社会意义的追寻集中在主体间性及其物质前提之上,并认为社会意识既产生于阶级内部也形成于阶级之间。暧昧混杂的60年代国际遗产,复杂纷争

的 70 年代英国形势,或是虚无缥缈的 80 年代“后现代”,都可以在这一关系分析中得到阐明,这与其对复杂的社会总体、代际转换以及具体性的结合的关注相关。

威廉斯对复杂性加以说明的理论特征,并非折中主义的反映而是源于对确定性和现实的考察——及其人的社会能力不断增加和转变这一理念。一方面,他的作品谈及了资本主义文明的逐渐暴露出来的危机以及抵御这场危机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借助于对文化形势和联合的多样性的敏锐判断,表明需要在人类意义上对盲目的经济过程和狂乱的军备竞赛加以控制。威廉斯对生态学危机的讨论是严肃而有经验根据的,因为他希望建立谨慎有效的社会抵抗形式。如果威廉斯的社会主义有时看起来是效仿和继续了莫里斯(Morris)对资本主义的浪费和破坏所做的控诉,那么他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上都没有陷入后者的简单化倾向。社会主义不是超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绝境的现成而平坦的道路。在理解社会主义生态学批判的复杂性之中,他同时看到了一种全球“共识”建构的紧迫性和面临的困难。《走向 2000 年》(1983 年)这部著作最明显地展现了威廉斯所有探索的政治内核,在该书中他试图将阶级政治的遗产与“新社会运动”的必要调整嫁接起来。尽管受到自己党派意识的影响,但他承认后者对于重建一种超越于特殊阶级利益之上的“普遍利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坚持认为那些由社会运动提上议程的关键性问题将会“引导我们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体系以及……它的阶级体系。”^{[8](pp. 132-7)}

四 工党联盟和社会主义

尽管威廉斯对于文化实践政治学的强调给他带来了广泛的称誉,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政党和国家组织的有效性和正当性的关注——尤其是关心这些组织是否有能力促进作为“漫长的革命”的民主。从威廉斯作品的许多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工人运动的组织构成了集体记忆和思想的主要文化载体,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只需要完成他们所面对的任务。60 年代中期发表在《新左派评论》第 30 期上的一篇关于“英国左

派”文章中，威廉斯曾指出，工党的内在结构，实际上是受一个非民主集团的选举控制，而将社会主义左派限制在一个由短期共同利益和费边改良主义结合起来的政治联盟之中。“工党作为联盟的事实已经导致了理论上的贫乏，任何试图超越那种一般界限的尝试将立刻导致这个复杂联盟的紧张状态。”即使是工党推动的最积极的社会变革也带有“道德家长主义”的色彩，工党政府的对外政策更是为“冷战”、“危险的极端沙文主义”和“吉卜林式帝国主义”所“玷污”。左派对于工党的结构性从属关系迫使左派在工党的范围之外采取行动，比如核裁军运动(CND)、“具有战斗性警惕”的共产党以及更加广泛的文化和政治“新左派”等。在1965年年初的几个月中，威廉斯这样写道：“英国年轻人的声音，对所有已经默认现状（即‘一个异化世界中没有希望的沉默’）的人来说是可怕的，它是一种深刻而生动的声音；其意义在于，当它带有政治色彩时，它就是在反对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不是简单支持或反对议会政治中的一个特殊群体。”^[9]

尽管威廉斯对工党主义和工党本身提出了深刻的批判，但他还是看到了那些具有潜在的开放性以超越既定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感情。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曾对工党内部一个新的激进派别的出现欢欣鼓舞，因为它力图改变而不是简单占有现存的组织结构。他曾准备主办并编辑《新社会主义》这样一个由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创办的杂志，那时党内右派在1974—1979年威尔逊-卡拉汉政府下台后曾一度失势。《新社会主义》杂志得益于詹姆斯·库兰(James Curran)的天赋和信仰，发表了威廉斯的许多重要评论，特别是对“游资资本主义”及其政治体制撒切尔政府的批判，对煤矿罢工期间异常顽强的工人社团的赞扬等等，再就是对左派持续屈服于工党联邦结构的抨击。在工党是否应形成一个反撒切尔联盟的争论中，威廉斯采取了这样一个立场，他抛开政治辞令直奔主题，指出工党本身从来就是一个部分社会主义者同大西洋主义者和支持资本主义的工党右翼的联盟：“不管它是(联盟)的大版本还是小版本，只要是它的支持者就已经实际上抛弃了那种旨在改变信条和观点的斗争。”在威廉斯看来，无论是同中央一致还是同工党内部保守派的结盟，只要做出这种允诺就意味着认同这样一个计划，它极其软弱、缺乏一贯性并放弃了对

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和深化。在去年8月《新政治家》上发表的一篇对特里·伊格尔顿的访谈中，威廉斯警告左派应该注意工党主义联盟中存在的妥协倾向。他主张一种能够在工党中央和保守派之间形成新的合作关系的选举。尽管他认为“这种新的合作关系的形成不仅是左派的事务”，但他相信如果它能带来选举改革，就或许会开启一条通往某种社会主义者、绿党和激进民族主义力量三者联合的道路。威廉斯坚信“工党向社会主义党派的大规模转变”是一个虚假的目标，这通常会导致左派的沉默。但是他知道，任何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形式都需要建立在工人阶级和政治共同体反抗的潮流之上，在撒切尔政府时期这种反抗已经在工人运动内部和外部有所发展。^[10]

不同于传统的工党左派政治，威廉斯拒绝接受英国政府的结构作为社会主义行动的必要基础。他非常坚定地与欧洲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者联系，并期待一场针对英国政府建立原则本身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挑战。1982年威廉斯为社会主义社写了一本题为《民主和议会》的小册子，他不仅谴责了行政机构的不坦率和等级原则，而且批判性地指出了英国代议制体系中的寡头政治和差别偏见特征。对威廉斯来说，比例代表制和威斯特敏斯特体系的解体本质上是社会主义要求的补充。这本小册子的结尾是对政府民主化的一个全面规划，威廉斯将其理解为对经济和文化过程的民主控制的一个必要前奏。

正是在威廉斯的上述理论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些活动既包括他对一个真正民主社会所需要的文化和政治所进行的探讨，也包括他致力于与前者相关的制度改革中的实践问题的努力。

五 继续下去的漫长革命

威廉斯曾说过，他更愿意把自己看做是一个革命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听起来感觉“比共产主义者礼貌”，但是它不应该把数百万

人投身其中的传统简化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事业身上。另一方面，威廉斯不仅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还以“文化唯物主义”的形式做出了自己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帮助社会主义者确定是什么阻碍人类解放力量的发展：“不只是选举的对手或是传统的敌人，而是一个敌对的组织化的社会形态……”^{[4](p. 241)}这个社会形态的挑战者只可能是一个异于费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传统的普遍自治的发展——这也将不可避免地挑战压迫和剥削的资产阶级霸权的根源：“根据我自己的思考和亲身经历，以及对别人生活的观察，我了解了霸权的现实机制，看到了一个特定社会中的感觉结构的教化作用。在我们的一生中，如果努力，我们就能揭穿隐藏在我们自身内部这种异化形态的特定机制。”威廉斯并没有将意义的文化结构同物质生活的直接压力对立起来，因为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相对宽裕的工人后者仍然存在。“我赞成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必要的经济斗争，”他写到，“我相信这仍然是我们社会中最富创造性的活动，就像我多年前把大规模的工人阶级组织称为伟大的创造性成就，以及政治斗争中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手段一样。但是……我知道还有一项非常必要的有关文化霸权的工作要做。我认为那些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和价值体系需要在总体上和细节上为那种持续进行的教育和工作所打碎。这就是我称之为‘漫长的革命’的一个文化过程。这也意味着，这是一场真正的斗争，是通向民主的必要战斗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在经济取得胜利的一个部分。的确，人民在斗争和行动中也发生改变。那些像主导性的感觉结构一样的深层事物只有在新的现实经验中才能被改变。但是……一场成功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不仅涉及到现实和制度，而且包括感觉和想象。”^{[4](p. 239)}

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第二次选举成功之前，广泛认为的左派在学术文化中的成就与大众文化中“新右派”的出现之间，就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分化。与威廉斯六七十年代蜚声文化研究领域相伴生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以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一般人文学科中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视。但正当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学界产生影响时，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却先后在保守党和国家政治

层面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在《新左派评论》第140期(1983年)中,威廉斯这样认为,英国特殊的政治制度为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提供了便利条件,尽管事实是后者从来没有得到过多数派的支持。此外,80年代英国特有的经济和意识形态压力可以归结于70年代工党的失败以及撒切尔主义提出的“流动私有化”妄想。它以惊人的社会成本为代价换来短期的和不公平的消费满足。在威廉斯对放宽信贷和失业控制的质询中,对消解社会决定观点并倡导个人主义的种种复杂机制的批判中,包含着他对不同的多数派和新的组织原则的思考。^[11]

威廉斯从来不仅仅满足于自己得出结论,或是在学术界对这些结论进行捍卫。《关键词》(1976年)的出版标志着他深化了关于意义的文化结构的论证,并且使得他的结论更加容易理解。威廉斯恰好可以借用“个体”、“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些术语的历史讨论来强调一些问题,尤其是面对那些不难理解它们的人。在关于煤矿罢工的文章中,威廉斯主张社会主义者必须从那些经历这些斗争的大众的集体经验出发阐明那些斗争的关键词。“现在,新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在于所有这些充斥着危机的共同体之中:这不是特例,而是一般情况。正是在对多样性以及多样性的关注中,新的大众力量正在形成并期待某种有效的结合。这在细节上将是一个长期而困难的过程。但是在反抗那种掩盖了新阶段资本主义的真实运转的破坏性口号‘管理、经济、法律和秩序’的过程中,矿工在试图保护自己利益时也勾勒出了一般利益的新形式。”^[12]

在《新左派评论》第158期中,威廉斯还提到了左派在教育,特别是成人教育方面的现实进展,以及他对那种自我孤立化的理论探索和政治口号的保留意见。为了寻求打碎文化建构和驯化的方法,威廉斯这样问道:“我们是不是应该按照‘凡是’逻辑不去关注那些文化多样形态、它们的理论及著作,而这全都是为了否定它们并同一种超越性的中性文化划清界限?一种意识形态理论的形式却妨碍了对撒切尔主义的分析,并导致在一个复杂易变得多的社会形势下却出现了绝望情绪和政治上的不作为。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吗?或是小资产阶级理论家用短期形势来估量长期发展的做法还没有被完全消除?或者,以近期以来的一些艺术形式为例,我们

能否重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将被剥削者描写为被侮辱的人就是对剥削者的批判与否定?”^[13]

威廉斯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问题,有一些对我们来说依然如鲠在喉,还有一些更需要我们仔细玩味。同样,他也在不同地方留下了许多解答这些问题的线索——在他文化批判主义的伟大著作之中,在他的散文和评论之中,在他像《走向 2000 年》一样的直接政治作品之中,而尤其是,在他自己对于历史和未来的强烈的责任感之中。

参考文献:

[1] Edward Thompson, op. cit.; C. L. R. James, “Marx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 first published in *Facing Reality*, May 1962, reprinted in *Spheres of Existence*, London 1980, pp. 113—30.

[2] Raymond Williams, “Why Do I Demonstrate?”, *The Listener*, April 25th 1968.

[3] Raymond Williams, *Politics and Letters*.

[4] “You’re a Marxist Aren’t You?”, in Bhiku Parekh, ed., *The Idea/Concept of Socialism*, London 1975.

[5] Raymond Williams, *Modern Tragedy*, revised edition, London 1979.

[6] 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London 1973.

[7] Raymond Williams,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Disarmament”, *NLR* 124(1980).

[8] Raymond Williams, *Towards 2000*, London 1983.

[9] Raymond Williams, “The British Left”, *NLR* 30(1965).

[10] *New Socialist*, March - April 1984; Raymond Williams and Terry Eagleton, “The Practice of Possibility”, *New Statesman*, 7 August 1987.

[11] Raymond Williams, “Problems of the Coming Period”, *NLR* 140(1983).

[12] Raymond Williams, “Mining the Meaning: Key Words in the Miners Strike”, *New Socialist*, March 1985.

[13] Raymond Williams, “The Road to Vitebsk”, *NLR* 158 (1986).

(夏娟 译,单位: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

爱德华·P. 汤普森的伦理激进主义及其遗产^①

[英]迈克尔·肯尼

E. P. 汤普森(1924—1993)的辞世让英国失去了一位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和最著名的学术名家。汤普森的形象横亘学术与政治两个世界,在上世纪 80 年代他成为英国和欧洲反核武器运动的卓越领导者之后,这种情况就更为突出了。因为他的逝世,我们也失去了一位在英国文化中已经变得极为少见的“公共道德家”:他是一个从伦理观念出发抗议一切国内国际不公正事务的人。事实上,他的一些核心理论关切——著名的如他炽烈的爱国精神以及在个人事务与身体政治中培育“德行”的责任感——与 20 世纪的政治理念相去甚远,反倒与 18 世纪后期的政治激进主义更合拍。本文力图大致勾勒出汤普森思想的基本特征,同时说明:他对特定“德行”观的倚重,将他与共和思想传统以及更晚近一些的伦理社会主义传统联系到了一起。也就是说,汤普森继承并发扬了自 18 世纪以来一直激励着英格兰激进主义的公民不服从传统。这种不服从传统内容丰富,既有宗教性的也有政治性的。

① 本文首次刊载于《求实学刊》2007 年第 5 期。迈克尔·肯尼(Michael Kenny),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英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和政治理论研究。——译者注

一 汤普森的伦理观

因为出版了一系列专论 18、19 世纪英国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著作，汤普森在战后有阅读能力的公众中声名鹊起。这些著作中流传最广的当属《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1)，这本书实际上超出专业历史学研究，深刻影响了众多学科的研究者。也正是通过这本书，汤普森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一个既被人文学者也被社会科学家广泛征引的跨学科大师。

除了历史学著述，汤普森还创作了许多关于当代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杂文和论文。高度发达的伦理敏感性是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著述联系起来的主线。这推动他投身于一个接一个的道德使命和政治使命，创作出了浸透着爱恨情仇与个人好恶的历史学著作。在汤普森这里，学术争论常常会在欲置对手于死地的尖刻辩论中不断升级，这种写作模式让他的文学技巧和修辞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学术争论尚且如此，政治争论那就更不用说了。但凡读过汤普森专横跋扈的“理论的贫困”(1978 年)一文的人，有谁能忘记他倾泻在主要敌手路易·阿尔都塞及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追随者身上的那些冷嘲热讽呢？那些曾有幸看过汤普森私人通信的人都觉得它们是一笔不可小觑的财富，其中既充满愤怒，也饱含对传统观念的诙谐抨击。

不过，很遗憾，我们对深藏在这些不同类型的介入活动背后的伦理动机的形成原因和理论资源所知甚少。因为我们缺乏详尽的汤普森传记，以把他的生活还原到他所经过的那个动荡不安的历史语境中去。也因为对汤普森的伦理观缺乏理解，所以，知识左派都容易对他的理论构架中的错误——著名的如他的道德主义、爱国主义和反理论主义倾向——发动隔山打牛式的批评。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1981)对汤普森著作的“解构”中，佩里·安德森强调了汤普森历史学著作的高水准与他当代政治发展的分析的贫乏浅薄之间的断裂。虽然行文中颇多赞赏，不过，安德森在与汤普森旷日持久的理论争论和政治争论的尾声处得出的结论，或许还是不恰当地扭曲了后者的理解力。因为他为了将汤普森打

扮成一个朴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将后者身上的“资产阶级”杂质荡涤一净，结果，他对汤普森的理解极为片面。

非社会主义的传统和观点完全可能对汤普森的著作发挥更加积极的影响，但安德森的批判却模糊了这一点。浪漫主义、社会主义、各种自由主义乃至托利主义在汤普森身上所发生的创造性的伦理互动和政治互动，引来的常常是人们的曲解中伤，而非严肃的探究。因此，把汤普森放置到英国本土更早一些的激进主义理论传统的语境中重新解读，将能使我们收益良多。——这些英国本土的激进主义理论传统既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也有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们的代表人物包括托尼、柯尔，当然首先还是奥威尔，以及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浪漫主义作家。

二 爱德华·汤普森的“形成”

汤普森生于1924年。他的母亲是美国人，父亲先后做过卫斯里宗牧师、小说家、历史学家和颇具才华的诗人。1939年，爱德华·汤普森的哥哥弗兰克——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对爱德华却影响深刻——加入英国共产党，这个举动让全家为之震惊。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弗兰克志愿参加现役。几年后，当时还是剑桥大学学生的爱德华追随弗兰克加入英国共产党，然后参加英军，作为一个坦克部队军官在意大利参战。战争结束后，他周游美国，参加激进会议，然后陪伴自己的母亲访问巴尔干。此后，他作为英国青年志愿旅旅长投身南斯拉夫的一项铁路建设计划，并在那里遇到后来的妻子多萝西·达沃斯。回国后，这对小夫妻定居哈利法克斯，爱德华作为利兹大学校外部的文学讲师开始工作。他积极参加当地英国共产党的支部活动直到1956年，然后成为羽翼尚未丰满时期的新左派运动（1956—1964）的领军人物。他的第二部出版物《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不仅使之成为一名激进学者，而且使之成为一个为道德责任大声疾呼的公共人物。这就是他直到1993年去世时常常并不那么舒服地扮演的双重角色。

对于汤普森在英国共产党中的“公共”政治生涯以及加入英国共产党

对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影响(尤其是参加由道娜·多尔、莫里斯·多布、埃瑞克·霍布斯鲍姆、约翰·萨维尔、拉斐尔·萨缪尔等组成的天才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评论者往往给予了恰如其分的关注,与此同时,却对造就了他的道德良知和复杂的理论意识的那些力量和人物关注较少。在他的早期生活中,他的父亲爱德华·约翰·汤普森和哥哥弗兰克·汤普森对他的成长影响重大。在于生命的最后岁月完成的一本书中,汤普森曾回顾过自己的父亲和哥哥以及他们对自己的影响。^①在这些地方,他不再咄咄逼人,而是变得深思熟虑起来,提供了许多有关其人生和理论形成的生活细节。这些细节最清楚地刻画出来的一个主题就是他对文化边缘性与德行的联系的理解。

这可以在他与他哥哥的关系中得到说明,虽然他父亲在很多方面对他的影响也很大(我们现在还能猜测的是,对其作为一个男性和作家的形成而言,除了他父亲和哥哥的关系外,战争经历也发挥了极大作用)。1981年,应斯坦福大学之邀,他主持著名的坎普讲座,对自己的哥哥、一个在二战时期负责与巴尔干游击队联系的英军联络官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进行了再思考。时年23岁的弗兰克于被捕前6周被空投到巴尔干南部。随后他协同一支注定要遭厄运的共产党游击队前往巴尔干中南部建立一块解放区。1944年5月,这支小部队被保皇党武装包围、俘虏,在遭到严刑拷打后被处决。

在这些演讲中,汤普森超越后来在巴尔干和英国流传的不同版本的神话,对自己哥哥的最后岁月进行了重新探察和评价。就像在其他著作中一样,他利用近来才引起注意的文献,细致地挖掘自己哥哥与家人的通信,把这种历史上的普通人、自己侧身其中的事件变成一种载体,对历史方法论和因果性以及更普遍意义上的历史解释政治进行了广泛的思考。

① E. P. Thompson, *Alien Homage: Edward Thompson and Rabindranath Tago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他曾在坎普讲座中回忆过自己的哥哥,后来这些演讲以《深入敌后:失败任务的政治学(巴尔干1944年)》(E. P. Thompson, *Beyond the Frontier: The Politics of a Failed Mission; Bulgaria 1944*, Stanford, Cal. And London,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Merlin, 1997)为名出版。对这一事件的研究由汤普森夫妇发起的,这些演讲最后由多萝西·汤普森编辑出版。

演讲还对个人的道德作用在历史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从事斗争中的个人必然会遭遇的那些生存论疑虑和伦理疑虑,以及一个令人感动的、努力超越禁锢其良知和政治原则的情势的“有德”公民的榜样,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反思。

三 英雄与烈士

汤普森的伦理责任同样因为他自己在公共政治经验过程中遭遇的那里创伤——1940、1950年代陷入英国共产党内的斗争,苏联入侵匈牙利,在新左派运动初期(1950年代末 1960年代)遭到的打击——得到了发展。在新左派运动初期,他完成了一系列对他本人和其他人来说都很重要的文章,这些文章刊载在他与约翰·萨维尔合编的一份仅在英国共产党内发行的简陋的油印时事小册子(被饱含深意地命名为《思想者》)、新左派刊物《大学和左派评论》与《新思想者》(这也是与萨维尔合编的)上。^①若干年后,在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面无表情地说:“33岁那年,我开始进行理性思考。虽然我也曾竭力摆脱这种习惯,但始终未获成功。”^{[1](p.1)} 这些文章集因共产党的政治堕落而产生的个人苦闷告白,和对社会主义理念的伦理缺陷的广泛检讨于一身,明白地揭示出了同时期退出共产党的那些英国知识分子的痛苦反思。

这些篇什的创作正值他从事自己的主要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研究和写作时期。因此,《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个文本应当在汤普森从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政治经历中总结出来的伦理结论的背景上被审读。由此一来,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学术化评论所未曾发现的许多主题就呈现出来了。不服从的和边缘化的个人的牺牲和斗争是该研究中许多叙事的中心。这些人有时作为被放逐的“预言家”——他们以救赎

① 这些文章主要包括 E. P. Thompson, “Reply to George Matthews”, *The Reasoner*, 1, 1956, pp. 11—15; “Through the Smoke of Budapest”, *The Reasoner*, 3, 1956, Supplement, pp. 1—7; “Socialist Humanism: An Epistle to the Philistines”, *New Reasoner*, 1, 1957, pp. 105—43; “A Pessay in Ephology”, *New Reasoner*, 10, 1959, pp. 1—8.

的方式诊断社会疾病和痛苦——出现,有时连命都丢了。其他一些时候,他们的斗争和理念则为特定社会集团的前途和经历提供了戏剧化的包装。对那些杰出的激进人物的审判和迫害因此成了揭示他们生活的“榜样”特征的方式:“公众从哈迪身上又一次发现了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所喜爱的那个独立自主的形象:一个坚强而具有尊严的平民,对国家权力表示藐视”。^{[2](pp. 148-149)}他很推崇这些在那些年代的骚乱中丧生的领导者,认为“我们应当把这些人视为英雄”。^{[3](p. 96)}

汤普森笔下的男主人公和某些时候的女主人公常常都是些边缘化的人物,他们听任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那些文化价值和规范引导,不过,他们力图摆脱边缘化地位的斗争却造就了一种巩固的道德独立意识和坚定的自我感。通过对这些人的斗争的历史学重建,汤普森探究了强有力的自我感——既为个人也为集团——的出现是如何为强大而独立的公民的形成奠定基础的,他坚信这种公民的形成是民主进步的重要前提。他对自我的说明与他的德行观密切相联。因为在他看来,德行是一种或多或少能够提高而不是始终裹足不前的前进性特性。就像某些前人一样,他常常把德行表达为两种矛盾力量——批判理性的严格和游戏与欲望的自发性——在一个人身上的融合。这源于一种更开阔的历史洞察力:批判理性会因为人的创造、情感和欲望而变得鲜活和深化。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激情”想获得“善的”道德目标,就必须听从合理性和自我理解所强加的结构的束缚和“命令”。在他的历史学著作和政治著作中,汤普森一方面拒斥过度学院化的纯理论哲学,一方面拒斥过度乐观的快乐主义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文化,为防范这种融合的不稳定性提供了好的榜样。因为上述两种情况都说明了割裂理性与欲望割裂所具有的危险。

四 德行与公民

汤普森常常被人指责用简单化的直接形式讨论自由主体。而事实上,他的伦理责任是由既不仅仅是“浪漫的”也不仅仅是“唯意志论的”人的复杂图景支撑的。个别主体投身于抗拒社会生活中的变迁和强制的连

续性斗争中。他们永远要对外部力量——最显著的就是异化和剥削——和主导性的社会价值观的内化“严阵以待”。可最终，他们还是要与它们短兵相接，因为个人在内心深处终究还保留着必须的道德能力，且受到自我确定性这种基本追寻的驱策。他在自己的评论中将这些立场形势巧妙地置于莫里斯和浪漫主义作家的信念上：历史是“屡败屡战的人类主体创造的”。^{[1](p. 88)}

当汤普森在把这些伦理责任和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遗产调和起来时，他无疑面临着—一个独特的理论问题：既然他感觉当前条件下的个人与他们的本质、其他人是异化的，并且注意到了剥削关系实际发生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那么，个人的道德感从哪里出现呢？尽管他没有给出直接的回答，但却实际包含两个隐含的回答。一方面，他相信，社会进步与合理性在历史过程中作用的不断强化深刻地交织在一起。这使意识尤其是自我意识——使个人得以开始超越那些构成必然性王国的力量强加于他们的限制的痛苦过程的自我意识——的变换得以可能。可是，意识并不足以保证道德，尽管个人的良知就存在于意识的附近。就此而言，建立在个人良知基础上的、不管面对什么结果和诱惑都要坚持的“作证”观念成为贯穿汤普森历史学著作和政治著作的一个重要隐喻和迷恋对象。正如珀涅罗珀·科费尔德所指出的那样，汤普森深入英国不服从传统之中，这导致他认为个人应当“公开坚持他或她自己的信念……每一个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即使这意味着反对宗教信仰和政府、要面对来自朋友以及敌人的敌视与批评。”^{[4](p. 16)}

下面这段话出自汤普森发表在《新左派评论》上的一篇文章，难能可贵地简要说明了前述各种观念是如何支持他的社会主义政治责任的：

我坚持认为，人就站在史前史的终点和自觉历史的起点的交界处。我们只有鼓起全部勇气才能超越这个阈限。我并不认为这意味着人类的完美是一个乌托邦神话。因为无阶级对立的社会并不是一个任何社会摩擦都不存在的社会。莎士比亚了解的一切邪恶以及德行都将继续困扰人类的灵魂……如果人类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那么，他们就可以开启一个

相互丰富的新时代,设计出一种能够让德行大行其道、邪恶得到限制的社会制度。如果今天想要的证据似乎否定了这种希望,那么,我们依旧可以抗争,拒绝成为环境或我们自己的牺牲品。^{[5](p. 36)}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研究的是英国历史上这样的社会政治语境:在其中,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讨论各种公共话题,充满睿智的伦理批判思想茁壮成长,“德行的影响”不断壮大。在他的脑海中,这样的场所经常处于传统政治和体制构架之外,为了维护那种“很有哥们义气的”漫谈文化,它们都能够容忍不同的观点和持续不断的争论。在全部研究中,汤普森着力展现这些民主的原型空间是如何被建构成具有公开的原则、得到遵守的规范和章程的社团或协会的。该书第一段所描写的是伦敦一个革命社团的成立会议。通过他的描写,自觉地与受公开的章程支配、向所有(男)人开放的社团结合在一起的“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跃然纸上,并成为贯穿全书不断突现的主题。对理性思考的漫谈形式、不同工人集团之间集体合理性的深化、开创超越国家起源的公共空间并使之合法化的斗争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记述,支撑着这些历史地推导出来的反思。

生活在汤普森历史学著作中的那些理性的和浪漫主义的市民,通过提高理性思考能力,戏剧般地再现了那些调整自我的内省冲动和自我冲动的斗争。德行是对理性和欲望进行适当“掌控”的结果,它与理性思考、根据理性认识进行负责的争论和论证的自发意愿直接相关。研究者们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德行在汤普森思想中的中心地位,部分原因在于这种中心地位是与他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尴尬地共存一处的。在大部分情况下,汤普森是用目的论的社会主义未来观来表达这些责任的。不过,就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结构而言,与他的其他政治观念相联系并从各个方面提示这些政治观念的德行观实际占据核心地位。他终其一生都为之追寻的社会主义也因此在这种理想——他坚信——必然实现的范围内规定了自己的政治表达或“形式”。正因为如此,他与社会主义正统和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关系始终不像他的很多理论上的同志那么教条。

四 “英格兰性”政治学

汤普森的这些伦理观点并不源于抽象的思辨或形而上学的冥思，而是长期研究思考英格兰文化传统和理论传统的结果。然而，因为安德森曾对汤普森的爱国主义的局限性有过批判——安德森将这种局限性一直追溯到英国共产党上世纪30年代宣扬的进步的民族主义观——，所以，人们后来纷纷对汤普森据说不够深思熟虑的英格兰性学说提出了批评。对此，汤普森以沉默对之。这表明实际他拒绝回应理论左派并不是基于成熟的批评判断所提出的这些责难。汤普森对英格兰的描写、他与英格兰文化和体制的关系，要比安德森等人所以为的复杂得多。汤普森最初对主体的责任源于一种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构成了行动与力量在不同的民族语境中以完全无法预料的方式实现的联合。（他常常与英国混用的）英格兰的社会和历史发展在与其它民族国家进行有意义的比较之前，首先必须按它自己的方式得到理解。上世纪60年代中期，安德森和奈仁曾抛出有关制约英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缺陷的论点，在对此进行回应的时候，汤普森批评了那种要把法国革命当做解释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想模式的观念，认为这种模式并不适于评价英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因为他坚信英国的制度发展和文化发展模式自成一体，所以，它的激进传统的文化和政治也是自成一体的。正因为如此，汤普森问心无愧地大声赞美那些曾经孕育了普通民众的经验和抵抗的传统习俗，虽然他的社会主义同志对此很不以为然。1960年代早期，《新左派评论》周围的英国新左派发生分裂，而这也正是其中的一个核心话题。在仅供编辑部成员内部传阅的一份内部纪要中，汤普森对当时已经控制了杂志理论走向的安德森等人的路线进行了抵制，因为他从中察觉到了理论上的国际主义和对英格兰/英国文化的敌视：

发生在这个固执、守旧、不善变的岛国之外的事件似乎总是更“真实”、更具批判性、更紧急，……我们的确应当尽量掌握第三世界、巴黎、波

兰、米兰的情况，可与此同时，难道我们周围就不存在一种正在形成中的、不仅对我们而且对其他人都有教益的话语？这种话语对我们的确有点陌生，我们几乎不能理解它，因为它是一种我们不再能够理解的方言在述说。它来自芸芸众生的亚文化，仅仅属于英格兰人，也没有巧言善辩的代言人——在其他成熟老练的人面前，他们都是卑躬屈膝的。

争吵的主题很重要。汤普森之所以叹息，是因为英格兰话语、民族的激进遗产、根植本土的激进政治观被人们忘却了。他对没有祖国的国际主义知识分子的讥讽，与奥威尔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苛责极为类似。在同样一份纪要中，他把这种类似性拿出来炫耀了一下：

我担心，提前与第三世界阵营站到一起不仅仅是学术的。它同样有一种**没有祖国**的成分在里面，与30年代某些左派知识分子——奥威尔曾讽刺过他们的结果——鼓吹的工运中心主义潮流颇为类似。……现在的潮流似乎不再是模仿“工人阶级的”行为举止和搞穷人崇拜，而是让自己属于农民革命运动，即放弃自己的“西方”性。^[6]

不管是在对其他左派思想家的猛烈抨击中，还是在自己的历史学著作中，汤普森都对偏离本土理论实践模式的危险性提出了警告。在对雅格宾·约翰·泰尔沃的研究中——该文于其身后发表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上——他得出了一个当代激进知识分子需要严肃对待的教训：“他是一个前车之鉴，因为要求自己的政治希望和策略尽量深入到其他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的那些改革家所冒的风险他都冒了。”^[7](pp. 138—139)

有点不可思议的是，汤普森的“爱国主义”不同于时代对本民族过去的呼唤，而更类似于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爱国主义，那时候，在防御性地回应法国大革命时，英格兰性还在诉诸“教会和王国”。很多研究者都看到，这种爱国主义在上世纪60年代和上世纪70年代那种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语境中其实根本不能维持，但汤普森顽固地拒绝接受这种批评。不过，对所有这种左派爱国主义的模式缺陷而言，安德森的批判忽视了汤普森对英格兰的

过去的传统解释所发起的空前强劲有力的挑战。在其全部历史学著作中,汤普森都在质疑“官修”国史的定论和教条,并且再一次像奥威尔那样,坚信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传统的核心。对他们而言,1789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都不如农民起义、英格兰内战或宪章派骚乱重要。

汤普森还和奥威尔一起分享了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专门主义”的社会哲学。这种社会哲学让他们对社会集团和个人的经验与文化中的独特方面,而非关注人类社会的普遍方面的支撑性理论范畴形成了更浓厚的兴趣:汤普森用专门的英语写作,这种英语由“对具体的事例的偏爱……对日常用语的喜好,对形而上学沉思、抽象和系统的理论化的不信任”构成。^{[8](p.116)}这种姿态使得他们都藐视许多现代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潮流的总体化野心。

这种共享的遗产有助于解释汤普森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理论化推测和政治理论化推测的猜疑,以及为什么他的历史学著作会间或流露出“托利主义”的情绪。虽然汤普森依旧坚信,爱国主义应当把公民引向政治不服从,可是,在英国,他所采用的方言和论证方式却呈现出保守党人的特征。他知道自己这个方面立场的意识形态脆弱性,可在1970年代以后那些“欧洲怀疑论”文章中,他对这种含混还是颇为自得的:

我不认为每一代人都能得到很好的教导,就像没有历史一样去行动。我也不能认为它是清白的,并让它从零开始设计自己的制度。我希望提醒货币权利的理论家、大规模现代化论者和那些不能容忍我们的宪政丧生欧洲大屠杀的人注意柏克所说的话:“通过高歌猛进和他们对自然过程的蔑视,他们被盲目地交到了投机者和冒险家、炼金术士和江湖医生手中”。^{[9](p.2295)}

法国大革命中的现代化论理性主义者之于柏克,犹如欧共体和新自由主义的现代化论者之于他这个上世纪70年代的“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他们表现出来的共同之处是轻松和启迪。汤普森表达自我的散文风格,他对修辞技巧——讽刺挖苦和夸张——的大量使用召唤出了一种英格兰式的理论研究风格和对过度理性化与表格化的形式方式的小小敌意,而这让人想

起迈克尔·奥克肖特。正因为如此,政治右派批判家也能在汤普森这里找到共同语言。

五 找回失落的遗产

一旦汤普森著作的伦理维度得到揭示,那么,我们会看到,他身上聚集着不同的、在马克思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东西之外的理论传统和相互关系。他对有德自我的说明可以很好地将他与更早些时代的共和主义传统以及个人主义思想联系到一起。同样,他浸淫其间的不服从的“非国教”传统也以重要的方式塑造了他的敏感性。

因为人们那么不愿意承认汤普森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和伦理思想家,所以,他那些最令人感兴趣的遗产统统被人忽视了。其实,他的下列论证特别重要:在英国,民主讨论和辩论常常是在规范的体制化政治之外蓬勃发展起来的。他不无煽动性地宣称,正是在人们认为会出现政治的那些地方——中央国家、统治城镇的社团、贵族的宫殿——以外的偏僻所在,对自我确定和批判的理解的更真实的追求出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格兰,就是在教堂、小酒馆、住家和那些没有宗教建筑外观的宗教场所,自由的思想生活发展起来了,民主经验出现了。他的政治文章揭示出了一个深层次的责任,即壮大——他坚信——在当今应当重新高举、并从本土价值观和语言中重新发明出来的公民概念。他表明,承担了许多如今由官僚和精英们执行的功能的“古典的”道德独立的公民观,是如何可能存在于20世纪后期的激进政治的核心中的。

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看,他的下列企图同样很具迷惑性,即把相当古老的——根据行为与不服从、理性与欲望的和谐来理解的——德行概念更新为公民权的伦理支撑。他的公民概念是一种由最终根据自己的意识和良知来决定公共事务的、有道德责任感的个人构成的公民形象。有德的公民看样子具有坚韧而独立的心灵,以及在经历过抵抗边缘化和不义的斗争后形成的判断。因此,贯穿其历史学著作的主题始终是那些普通个人主体,而不是伟人 or 看得见的领袖,这些普通人一方面永远挣扎在冲

动和必然性两极之间,另一方面具有自我决定的要求和成为自立公民的欲望。与某些批评家爱贴的简单化标签相反,不能简单地将汤普森说成是前现代化论者或反现代化论者。因为他的伦理理解中也包含对现代性核心中的敌对趋势的思考。

当然,支撑汤普森学术和政论著作的伦理观念在一些重要方面也存在瑕疵。例如,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去解释英格兰的文化特性和历史,并希望将本土激进传统与其他国家——著名的如法国——的传统分割开来,而这就使得他的理论和概念词汇变得贫乏。这种特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他的其他重要理论理念的发展,例如,他对公民权的说明始终都不够充分。

我们看到,他的许多解释者、追随者和批评者都可以从他的著作中得出让人不安的、不同的政治结论,这表明他的著作其实并没有一条足够严格的政治逻辑。在理论方面,汤普森在对程序民主观念的追随和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排除这种民主体系的后果的欲望之间摇摆不定。这里的民主指的就是有理性的、思想独立的公民能够协商一致的那套东西的规则,和不可预知的那套东西的体系特性和政治特性。他从来没有彻底放弃目的论,相信集体的自我意识可以通往作为人类解放最高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然而,这是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必要组成部分呢?他几乎始终在回避这个回答问题。

我们决不能因为这些含混和瑕疵而否定汤普森是一个政治思想家和伦理思想家。他比同时代其他英国知识分子更积极地投身各种公共争论和学术争论,如关于政治主体的重要性、普通人在形成保障市民社会的连带的文化联系过程中的作用、伦理争论的在政治重要性,等等。直到逝世,汤普森才不再是核心政治的参与者,并最终承认自己的观念被风行 80、90 年代的学术时尚吹到一边去了。不过,他所体现的许多理论传统和特征——对国家不当行为的苛责反对、道德原则在政治中超越直接的功利计算的崇高地位、对超越国家的政治自我活动的自由主义传统的赞美——在我们时代的公共社会中已经衰落了,它们不仅很有意思,而且可能很重要。虽然他的政治学说具有弥赛亚主义色彩,自相矛盾,可能最终无法实现,但是,支撑它们的伦理基础却源于让 18 世纪以来的理论争论和政治辩论变得生动的观念

和辩论传统。随着这个独一无二的历史学家和坚忍不拔的公共道德家的逝世,我们看见了这种丰富遗产的解体、消散。鸟瞰同时代的政治图景和理论图景,这不能不是一个巨大损失。在现时代的著作家中,有谁能轻而易举地把斯威福特的嘻笑怒骂、莫里斯的想象力、布莱克的绝望和托尼的伦理信念融为一炉呢?我们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中,谁能权威性地言说我们政治决定的道德成本,并得到人们的认真倾听呢?

参考文献:

- [1]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 London: Merlin, 1978
- [2] Thompson, *The Making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 [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7
- [3] Linebaugh, "One and All, One and All": Edward Thompson (1924—1993) [J], *Left History*, 1, 1993
- [4] Corfield, E. P. Thompson, the Historian: An Appreciation [J], *New Left Review*, 201, 1993
- [5] Thompson, 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 [J], *University & Left Review*, 1, 1957
- [6] E. P. Thompson, Where Are We Now? [J], *New Left Review*, April, 1963
- [7] Thompson, Hunting the Jacobin Fox [J], *Past & Present*, 142, 1994
- [8]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 [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9] Thompson, *The Secrete State* [A], in *Writing by Candlelight* [M], London: Merlin, 1980

(张亮 译 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

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战后发展

张 亮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当代欧美马克思主义理论图景上,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群体的异军突起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理论事件。从多布(Maurice Herbert Dobb, 1900—1976)、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 1917—)、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 1924—1993)、密利本德(Ralph Miliband, 1924—1994)、霍加特(Richard Hoggart, 1918—)到霍尔(Stuart Hall, 1932—)、安德森(Perry Anderson, 1938—)、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1943—)、哈维(David Harvey, 1935—)、柯亨(G. A. Cohen)、拉克劳(Ernesto Laclau)、默菲(Chantal Mouffe),这些来自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以自己杰出的理论实践贡献出了一大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理论著作,在彻底改变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贫困面貌的同时,使英国一跃成为可以和德法抗衡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输出国。不仅如此,80 年代中期以后,拉克劳和默菲高举后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成为从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到 90 年代末的世界性马克思主义低潮期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道思想景观。那么,后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样一种思潮,应当如何理解它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尤其是英国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意义呢?要想解决这么问题,我们就必须首先回到英国马克思主义战后发展史中去。

一 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战后形成

众所周知,尽管马克思主义是在英国走向成熟和丰富,进而走向世界,成为一种改造世界和创造历史的物质力量,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的四分之三个世纪里(1845—1920年),英国一直没有能够确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即便在1920年英国共产党成立后,这种情况也没有发生明显改变。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英共是一个在苏(俄)共和第三国际扶持下成立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政党,它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长期追随、依附苏(俄)共,缺乏进行理论创新的需要、动力和能力。不过,在30年代中后期大批知识分子加入英共后,这种情况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这些知识分子党员一方面自觉地将苏联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则在将后者运用到各自研究的过程中,实现了对后者的不自觉突破,从而开启了一种良好的学风,形成了一批有创见的理论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的左派知识分子沿着战前开辟的道路继续致力于英国本土问题的研究,逐步创造出了一种具有鲜明英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英国新左派运动兴起。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深入反思、批判斯大林主义之后,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这三位新左派思想家陆续出版了一批影响巨大的著作,后来闻名于世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就此正式呈现在世人面前。

1. 苏联马克思主义与30年代英共知识分子党员的理论创新

1920年,在苏(俄)共和第三国际扶持下,英共成立。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与发展得到了一种体制保证。不过,由于英共的党员主体和党的领导都为产业工人,所以,英共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长期追随、依附苏(俄)共,这导致苏联马克思主义自然地成为英共的指导思想。1933年以后,随着纳粹的兴起、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共产主义因为其日益彰显的政治吸引力和道德影响力而成为对自由资本主义现实不满的英国知识分子的替代选择。于是,大批英国知识分子陆续加入英共。^{[1](pp. 210—213)}对于当时英共的知识分子党员而言,苏联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什么难以忍受

的教条,而是渴望学习、掌握的真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传统、思想传统等原因,30年代英共的知识分子党员绝大多数来自文学、自然科学、历史学和经济学这几个学科领域,没有专业哲学家。他们学习、掌握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目的都是为了指导各自领域的具体研究。这就使得他们能够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比较容易克服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桎梏,形成一些有创新性的成果。

在1940年的“置身鱼腹”一文中,已经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拉开一定距离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不无微词地指出:1935年到1939年间,共产党对40岁以下的英国作家们产生了无法抗拒的吸引力。^{[2](pp. 186—192)}这些青年作家基于自身的反法西斯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立场而转向共产主义,他们通常被称为“奥登一代”。^[3]由于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奥登一代”都是苏联的坚定支持者。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们热烈响应共产国际关于文学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张,创作了一大批政治正确然而却没有太高的文学价值和影响力的作品。在文学批评方面,他们努力学习、应用斯大林主义所提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分析他们所关注的英国文学问题,涌现出了阿力克·韦斯特(Alick West, 1895—1972)、拉尔夫·福克斯(Ralph Fox, 1900—1937)、杰克·林赛(Jack Lindsay, 1900—1990)、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 1907—1937)等青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不过,就像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在《文学与社会》中所批评的那样,上述青年批评家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深刻影响,在理论上几乎是乏善可陈,唯一的例外是考德威尔的《幻象与现实》。^{[4](pp. 344—356)}《幻象与现实》完成于1935年11月,但直到1937年2月12日考德威尔牺牲几个月后方才出版。很清楚,该书的基本理论框架直接来自苏联马克思主义,结构比较凌乱,原理运用比较生涩有时甚至相当机械,但是它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引下,对文学形式与社会经济过程的关系、文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分析,并深刻剖析了资产阶级“自由”的幻象本质,同时突破苏联马克思主义教条,提出了人民的主体性思想。^[5]考德威尔因此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唯一一位真正具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者。^{[6](p. 343)}

那么,为什么考德威尔能够突破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桎梏,形成这些创见呢?在长篇评论文章“克里斯多弗·考德威尔”中,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 1924—1993)提出了一种非常深刻的解释:考德威尔自觉尝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英国文化传统相结合,从而使后者中那些注重文化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反精英的人民立场、注重经验研究的历史观和文学史观等有益思想传统,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教条形成了一种不自觉的抵制或解构;他这么做的意义不仅在于使他本人因此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理论成果(尽管具有很大的含混性),更重要的是为后来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了一条正确的方向。^[7]

除了考德威尔,30年代英共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党员也完成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成果,尽管它们的创新性不像《幻象与现实》那样引人注目。他们是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家多布(Maurice Herbert Dobb, 1900—1976)、历史学家莫尔顿(Arthur Leslie Morton, 1903—1987)、物理家和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 1901—1971)。

多布1922年就加入英共,并很快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主要从事资本主义企业和苏联经济发展研究的过程中,他于30年代早期形成了一套与英共领导层从苏联马克思主义全盘接受而来的教条主义迥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观,并在1932年题为《今日之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中进行了相对系统的阐发。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据此,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直觉”或“先验的逻辑”,强调必须通过研究历史经验形成历史认识。^{[8](pp. 25—26)}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1937年,他出版《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一书,系统阐发了自己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与作用的基本理解。^[9]虽然他在总体上并没有超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我们看到,基于对政治经济学说史以及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扎实研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帝国主义发展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经济规律问题都提出了颇具创新性和影响力的观点。正因为如此,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里,该书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一直发挥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功能。

和多布一样,莫尔顿在大学时代就加入英共。1938年,他响应英共领导人发出的“向英国历史进军”的号召,出版《人民的英国史》一书。^[10]从今天的角度看,该书无疑是通俗的、相当简单化的,不过,它却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在这里,唯物史观不仅首次运用于对英国历史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英国传统史学的、符合唯物史观基本精神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已经呼之欲出:正是在这里,在以往历史书中被忽略了农民、工人等被压迫阶级首次成为英国历史的创造主体。

贝尔纳是英国现代著名物理学家,1923年就加入英共,但直到1931年才在苏联学者的影响下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研究科学史。1939年,他出版《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11]该书一经出版即得到广泛好评,被认为是科学学或科学社会学的开山之作,但长期以来,它的马克思主义之维基本上被忽视了。事实上,就像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 1917—)指出的那样,该书实际上是贝尔纳力图实现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的联姻的一个产物。^{[12](p. xvix-xix)}虽然这种联姻被证明是短命的,不过,马克思主义对于该书的成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却是不可抹杀的:正是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整体性和辩证发展观点,该书才能屏弃科学是一种纯粹的、超越世俗的东西的传统假象,将科学还原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而在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与科学的历史互动中,揭示出了科学发展的社会逻辑及其社会功能的历史变迁。

与同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那些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发展相比,30年代英共知识分子党员的理论创新不管在程度上还是在数量上无疑都是微不足道的。不过,我们必须以一种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微不足道的创新:它们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没有原创性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局面,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开了一个好头;更重要的是,它们自觉延续英国实证的文化传统,共同开创了一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英国实际问题相结合的良好风气,从而使得后来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成独具英国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2. 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进一步理论探索及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共的政治发展进入了一个高潮期,但与此同时,其内部却出现了显著的理论分裂。作为长期追随苏共的一个结果,40年代以后,英共内成长起了一批高度认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官方理论家,他们亦步亦趋地仿效苏联理论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批判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和宗教意识形态。^{[13](p. 359)[14](pp. 166—184)}虽然这些官方理论家占据了英共党内的主要理论阵地,不过其实际影响却相当有限,因为就在他们教条主义地照搬照套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则是自觉延续那些30年代知识分子党员所开辟的道路,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南,研究、解决当代英国人所关注的具体的英国问题。在这个方面,英共党内以及亲英共的一些历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的贡献最为重大。

我们知道,英国具有颇为悠久的社会主义史学传统,其发端可以追溯到左派自由主义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 1889—1975)。^[15]受此影响,建党之初就有个别历史学家加入英共,30年代以后则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历史学家加入其中。1946年,以研讨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的修订问题为契机,这些历史学家成立了著名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在1956年前的十年间,他们定期开展活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建构之路,^[16]最终取代30年代党内红色科学家团体,成为当时英共内最活跃、影响也最大的理论组织。^[17]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多布、莫尔顿、霍布斯鲍姆、汤普森外,“小组”中的青年成员还有希尔顿(Rodney Hilton)、希尔(Christopher Hill)、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基尔南(Victor Kiernan)、汤姆生(George Thomson)、哈里森(Royden Harrison)、萨缪尔(Rapheal Samuel)和鲁德(George Rudé)等人,其中,“小组”的精神导师是英共创党党员、马克思恩格斯重要的英文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934)和《马克思主义、民族性与战争》(*Marxism, Nationality and War*, 1934)的编辑多尔(Dona Torr, 1883—1957),核心则是多布。由于年资这种客观原因,“小组”成员在“小组”实际开展活动的十年间公开出版的论

著并不多,但这些论著都充分展现了一个根本特征:力图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研究、解决英国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早期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问题,以确证、修正、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结论。^{[18](pp.10-44)}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多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该书贯彻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从经济史的角度对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了首次系统研究,^[19]结果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引发一场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大讨论,“小组”也由此为人所知。另一个是希尔的《1640年英国革命》的1955年修订版。该书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17世纪英国革命,强调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尽管是一场失败了民主革命。^[20]尽管这一观点至今仍然不断被攻击,但却已经成为该问题上的主导性观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原“奥登一代”回归传统或主流的同时,年轻一代左派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成长起来了。和那些以“愤怒的青年”而闻名的左派文学家一样,以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 1918—)、雷蒙·威廉斯以及斯图亚特·霍尔为(Stuart Hall, 1932—)代表的新一代左派文学理论家大多出生工人阶级家庭或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因此,虽然他们大多不是英共党员(威廉斯在参加二战前曾加入英共,但后来没有再登记),但当时都采取了亲英共的激进左派立场,并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过,作为战后在剑桥、牛津成长起来的文学理论家,他们在思想上首先受到的是以利维斯为代表的“细察派”的深刻影响。就像威廉斯后来评论的那样,利维斯吸引他们的主要有三点:批判工业主义的文化激进主义立场,从文学走向文化的实用批评方法,对成人教育的极大重视。^{[21](pp.66-67)}然而,当他们在利维斯的影响下积极投身成人教育实践后,却深深地被无产阶级文化和新兴大众文化所感染,从而与利维斯的文化保守主义精英立场产生了尖锐对立,并自觉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任务: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利维斯主义,以实现利维斯所崇尚和接续的“文化与社会”传统的革命化恢复。那么,应当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利维斯主义呢?威廉斯等坚决反对像30年代的左派文学理论家那样教条主义地照搬照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并不存在一种可以直接

适用的文化理论：“马克思本人曾想建构一种文化理论，但没有完全建成”，所以，应当做的就是按照马克思“已显示出其丰富性和重要性的构想”，建构可以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文化理论，^{[4](pp. 338—340)}进而用这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去改造利维斯主义。很清楚，和“小组”一样，霍加特、威廉斯等人力图解决的也是在英国的民族性语境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虽然在1956年之前他们并没有形成多少有影响的成果，不过，在这种暂时的平静下面，新的探索已经基本大功告成，只待破茧而出了。

随着上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探索的不断深入，他们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差异、对立日益明显。决裂已不可避免。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及苏联入侵匈牙利事件使很多英共党员对长期追随苏共的英共彻底失望。于是近三分之一党员退党，其中包括除了霍布斯鲍姆外的全部“小组”成员。随后，前“小组”成员与包括前述左派文学理论家在内的其他许多左派知识分子一起，形成了声势颇为浩大的新左派运动，以体制外的方式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22]为了更好地前进，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反思、批判、清算长期以来一直作为英共指导思想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作为自己的首要工作。在这个方面，汤普森和威廉斯着力最多，贡献也最大：在1957年夏季《新思想者》杂志的创刊号上，汤普森发表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致非利士人书”一文，全面阐发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中包括他对斯大林主义的系统评价；^[23]威廉斯则在1958年《文化与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化”节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自己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性理解。^{[4](pp. 338—361)}对于斯大林主义，他们的总体看法大致如下。第一，斯大林主义以教条主义的方式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把它当做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而是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绝对真理体系，结果将历史唯物主义中许多具有真理性的历史的具体的科学原理扭曲为了绝对的成见。第二，斯大林主义由于未能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本质，没能发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始终是通过作为实践主体的人进行互动的，结果未能真正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的隐喻本质，始终以

机械决定论和经济还原论的方式来看待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从而把辩证的“决定”荒谬地诠释为了宿命论意义上的预先确定。第三,基于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的不正确理解,斯大林主义狭隘地把文化界定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没有看到文化实际上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由实践沟通到一起的一个综合体,它的一部分在社会意识之中,另一部分则经过实践延伸到社会存在之中,因此,文化决不是单纯被决定的,它同时也可以发挥客观的决定作用。

很显然,新左派思想家“破旧”是为了“立新”,而这个“新”就是我们接下来所要讨论的文化马克思主义。^①

3. 第一代英国新左派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说到文化马克思主义,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术语“文化主义”。按照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道雷的考证,“文化主义”其实是霍尔等伯明翰学派年轻一代文化研究学者 70 年代末杜撰出来的一个术语,以形容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这三位第一代新左派思想家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完成的那些著作,因为在他们看来,虽然这些著作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值得怀疑,但确实具有共同的理论特性。^{[24](p. 64)}就此而言,“文化主义”与文化马克思主义具有共同的所指,尽管前者具有一定的贬义。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 90 年代以后的文化研究史著作中,“文化主义”其实变成了一个中性术语,大致相当于英国文化研究的起源阶段这种意思,由此一来,霍尔以及伯明翰学派的其他早期成员都被纳入其中了。^{[24](pp. 62—100) [25](pp. 33—62)}虽然这种用法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在我们看来,它却是不可

① 我们知道,在英语理论界,“文化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这个术语有两个来源、两种用法。第一种用法源自美国文化史学者德沃金 1997 年出版的《战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新左派与文化研究的起源》一书,专指由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等英国新左派思想家所创立、存在并流行于战后至 70 年代英国的那种非教条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Dennis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 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 of Cultural Studi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第二种用法源于美国批判理论家凯尔纳 21 世纪初写作并在网络上得到广泛流传的一篇文章“文化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Cultural Marxism and Cultural Studies),泛指自卢卡奇、葛兰西以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对文化问题有过专门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其中既包括法兰克福学派,也是包括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凯尔纳:“文化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文化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6 年第 5 期)很清楚,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第一种狭义的文化马克思主义。

接受的,因为它无原则地混淆了霍尔与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这三位第一代新左派思想家的本质区别:尽管霍尔和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等一样,也是新左派运动的发起者和核心人物,[26](pp. 54-68)不过,他后来的发展表明,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理论上,他都更接近于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1938—)等30年代中后期以后出生的第二代新左派,而出生于30年代之前的那些第一代新左派具有明显的距离。有鉴于此,我们希望重申霍尔透过文化主义这个术语从批评的角度表达过的那个观点:正是在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这三位第一代新左派思想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著作中,一种新的具有鲜明英国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形成了。

在新左派运动刚刚兴起的1957年,霍加特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专著《识字的用途:无产阶级生活面面观》。在这部具有部分传记色彩的著作中,霍加特一方面追记了自己童年曾经历过的3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文化,另一方面则对50年代工人阶级文化受新兴大众文化侵蚀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抨击。[27]诚如文化研究学者经常提及的那样,该书具有相当多的缺陷:浪漫的怀乡病,对大众文化的敌意,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创造力估计不足,等等。不过,瑕不掩瑜,所有这些都不能掩盖一个基本事实:该书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涌现的第一个积极成果。在我们看来,对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而言,该书具有以下两点重要意义:第一,它自觉继承利维斯所崇尚的“文化与社会”传统,运用后者所提供的文学批评方法重建出了3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从而驳斥了利维斯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没有自身文化的偏见,体现出了一种在实践中改造利维斯主义的努力;第二,它成功揭示了工人阶级公共文化的诸方面和工人阶级私人的日常生活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力打击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狭隘理解,证明文化是在日常实践活动中逐渐建构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识字的用途》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面向未来迈出的第一步,由于这一步迈得相对较小,以致如果我们不将它与威廉斯、汤普森后来的工作联系起来看,可能难以察觉它的存在及其首创意义。

继霍加特之后,威廉斯陆续出版了《文学与社会》(1958)、“文化是日常的”(1958)、[28]《漫长的革命》(1961)[29]等著作,汤普森则陆续发表了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1957)、“漫长的革命”(1961年)、^[30]《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31]等著作,以文化研究的实证形式,共同展现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风貌。以威廉斯、汤普森的上述著作作为来源,我们可以对文化马克思主义进行如下理论刻画:^①

第一,它反对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诠释与建构,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不是绝对真理的观点体系,而是科学的批判的方法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供可以包治百病的现成的药方,但以他们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我们可以找到具体地历史地解决马克思恩格斯未曾研究过、未曾遭遇过、甚至未曾想象过的各种新问题的科学途径。

第二,它坚持《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实践唯物主义立场,主张在人的实践过程中来理解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从而打破斯大林主义的机械决定论和经济还原论的思想桎梏,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概念、结论、原理形成了全新的理解。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它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决定关系,经济基础并非总是单方面、无条件地决定上层建筑,在特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同样能够发挥客观的决定作用;生产方式及其矛盾运动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不同的文化形态中,其发挥作用的方式是具体的历史的;文化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产物,是不同的生活方式相互斗争的结果;普通人民群众是真实的历史主体,他们通过阶级斗争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工人阶级的形成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走向“自为的阶级”的过程中,英国工人阶级以文化的方式实现了自我生成,并自主生产出了自己的阶级意识;等等。

第三,它坚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改造世界的立场,反对抽象的理论建构,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解决具体的英国问题,并在解

① 以下总结主要参考了 Nick Stevenson, *Culture, Ideology and Socialism: Raymond Williams and E. P. Thompson*, Avebury Woodhams, 1995; 张亮:《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P. 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决这些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坚持、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四,它认为当代英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工人阶级的文化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过程中,它形成了一套具有明确的自身限定性的文化研究范式;该范式具有三个支撑点,即“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人民历史”观念和超越资本主义的乌托邦议程,而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在于可以实现对真实的经验整体的倾听和再创造、对以往被忽略的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的分析与评价。

第五,作为前述文化研究的结果,它坚信英国工人阶级具有革命传统,通过适当的引导(教育),它们能够重新焕发出来,从而推动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英国具有良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再发现与重申这种传统是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

对于威廉斯、汤普森所提出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我们的基本看法是:它是威廉斯、汤普森等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思想家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60 年代上半叶的特定历史情境中,反对斯大林主义,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英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探索的思想结晶,是在特定理论语境中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成功的具体化、民族化尝试。很显然,它具有确定的适用条件,一旦这些条件发生变化,它的真理性和合法性基础就会随之发生改变甚至动摇。

二 英国马克思主义在 60 年代初至 80 年代初的内部冲突与发展

1959 年下半年,为了宣示新左派运动的团结一致,英国两份主要新左派刊物,即汤普森、约翰·萨维勒(John Saville, 1916—)主编、体现前英共知识分子立场的《新思想者》(*The New Reasoner*),和霍尔等主编、体现当时在校激进大学生立场的《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决定合并重组为一个新杂志《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新左派评论》从 1960 年开始出版,由霍尔任主编直至 1961 年底。为了摆脱《新左派评论》面临的业务困境,1962 年 5 月,杂志编委员会决定由更

加年轻的第二代新左派佩里·安德森接管编辑工作。在安德森的领导下,《新左派评论》进行了一次残酷的现代化改造,其结果是:一年后,在《新左派评论》的业务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创刊元老们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光荣革命”的对象,于是他们退出编辑部。^{[32](p. 245)}这实际上是第二代新左派崛起后两代新左派正式分裂的一个标志。在此后的近二十年间,我们看到,第二代新左派广泛吸收、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欧陆当代思想资源,逐渐偏离英国本土化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立场,创立理论化程度更高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在与第一代新左派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尖锐碰撞的过程中最终确立了自己的话语权。面对第二代新左派的猛烈批判,第一代新左派以不同方式做出了回应,并在理论上进行了程度不等的自我澄清与自我更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上一个高度理论化的发展阶段就此热烈上演。

1. 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的崛起及其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不满

我们知道,英国新左派运动是一股由法国传入、以反对英国工党和英国共产党这两个主要左派政党为目标的思想潮流和政治潮流。作为一种思想潮流,它的思想谱系相当驳杂,其主体是三种主要的左派思想:“1. 建立在工人阶级文化和政治,以及其他 19 世纪本土激进传统基础之上的持不同政见的共产主义;2. 独立的社会主义,它源于牛津—剑桥知识中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与伦敦民粹主义抗议传统的融合;3. 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它受到经典国际主义与欧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激励。”^{[22](p. viii)}具有第一种左派思想的基本上是像汤普森和威廉斯这样的前英共或亲英共的知识分子。以拉尔夫·密利本德为代表的工党左派则坚持第二种左派思想。这两个集团的新左派思想家基本上都出生于 30 年代以前,虽然其中有些人(如霍布斯鲍姆和密利本德)是欧陆移民,但他们却拥有类似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和社会经验。所以,虽然他们的思想来源有所差异,但对很多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却是非常接近的,尤其是他们都基本认同威廉斯和汤普森所高举的、具有鲜明英国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这批年龄相仿、思想相近的新左派思想家称为第一代英国新左派。

当时,和第一代新左派并肩战斗的还有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经

济学院等高校的一批激进的左派研究生和本科生,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1932—)、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1931—)、汤姆·奈恩(Tom Nairn, 1932—)、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1938—)等。尽管他们和第一代新左派战斗在一起,但实际上是与后者迥然有别的两代人。这些差别表现在思想上就是他们具有更加国际化的眼光和政治追求,渴望掌握理论化程度更高的马克思主义。就此而言,他们从一开始就对第一代新左派倡导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持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和反对。也因为如此,早在1957—1958年间,双方就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出现了道德与革命争论。^[33]当时,汤普森在1957年《新理性者》的创刊号上发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致非利士人书”一文,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立场对斯大林主义进行评析,在肯定斯大林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一种方式前提下,批评它是一种有缺陷即具有“不道德性”的方式。^[23]《新理性者》第二期刊发了两篇回应文章,其中一篇出自前英共党员哈里·汉森之手,认为汤普森的这种人道主义批判在道德上还不够有力,^[34]而在另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文章中,查尔斯·泰勒则实际认为汤普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相当肤浅,因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念本身都是需要再思考和批判的。^[35]当时属于第一代新左派的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 1929—)随后分两期发表了很有力度的长文“来自道德荒野的笔记”,力图证明汤普森的人道主义批判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立场的,^{[36][37]}但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对这种人道主义立场嗤之以鼻,认为它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民粹主义的和前社会主义的。^[38]

思想路线的差异注定两代新左派迟早会发生分裂。不过,在新左派运动的第一阶段(1957—1962年),之所以双方没有分裂,除了第二代新左派当时羽翼未丰这个原因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双方都发现:1959年以后,工党内左派暂时占据了上风,因此,英国历史性地出现了通过民主社会主义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是,1961年以后,工党右翼重新占据上风。^{[39](pp. 111—112)}新左派的希望彻底破灭。第二代新左派决意进行独立探索,分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转向欧洲大陆,从那里寻找科学的马克

思主义,以为英国的社会主义寻找到新的未来,这是安德森等第二代新左派当时非常强烈而自觉的愿望。所以,1962年5月走马上任之后,安德森立刻开始在《新左派评论》上译介莱茵(R. D. Laing)、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等大陆思想家的著作与思想。在转向大陆的最初阶段,萨特的《共产主义者与和平》、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和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对安德森等人的思想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40](pp. 14—18)}其中葛兰西的影响尤为重要:在60年代初,《新左派评论》的同仁们“在葛兰西那里发现了两个适合英国国情的核心主题。他是第一个将自己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民族特征,追溯到将那种资本主义社会引导进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特定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也是第一个承认需要为已经争取到普选权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寻找特定的社会主义革命战略的革命家。”^{[41](p. 3)}借助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学说,安德森等人很快就对英国的民族性问题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纲领性认识,并通过安德森、奈恩的系列论文公诸于新左派。^{[42][43][44][45]}现在人们所说的安德森—奈恩论题有四个要点:第一,17世纪英国革命不彻底,它只改变了英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没有改变它的上层建筑,结果依旧是土地贵族在统治英国;第二,因为17世纪革命不彻底,并且是以宗教斗争的形式进行的,所以,英国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形成革命的意识形态;第三,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导致不成熟的工人运动,因此英国工人阶级既缺乏革命传统,又无法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第四,英国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已不在于英国工人阶级,甚至不在于英国自身了。毫无疑问,安德森—奈恩论题与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完全针锋相对的。

安德森—奈恩论题一经提出即在第二代新左派中产生热烈反响与共鸣,因为它以简洁明了的方式回答了后者十分关注的两个问题:英国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出现当前的危机?为什么英国是西方工业化国家中唯一一个贵族统治的国家?第一代新左派当然不能赞同安德森—奈恩论题。汤普森随即发表“英格兰的特性”一文,^[32]以老师的口吻告诫第二代新左派:该论题在历史认识上是肤浅的,在理论上则是教条主义的。^{[46](pp. 136—144)}从安德森1968年的“民族文化的构成”一文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根本没有接

受汤普森的反批判，^[47]不过，他们也由此认识到自己的理论准备还很不充分。于是，从1966年到70年代初，《新左派评论》开始有计划地系统译介当代欧洲大陆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流派和思想家的著作，最后，安德森发明了一个新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来指称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所开创、发展的“共同学术传统”。安德森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向第一代新左派证明自己的既有立场，即英国没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二是希望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鉴，找到建构英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道路和资源。^{[48](p. 4)}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安德森等人最初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不过，在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分别于1969、1970年英译出版后，情况顿时为之一变：阿尔都塞以其结构主义的哲学取向、反人道主义的政治取向以及对马克思思想的激进解读，在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二代新左派争相模仿的马克思主义范本。^{[49](pp. 7-8)}

第二代新左派大多成了阿尔都塞不同程度上的追随者，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就在事实上成为他们扬弃文化马克思主义，建构革命的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于是，从70年代初开始，第二代新左派经历了一次集体性的结构主义转型。

2. 第二代新左派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对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言，第二代新左派的结构主义转型意义深远：它不仅使第二代新左派获得了大量新的理论资源、理论化程度大幅提高；更重要的是，它使第二代左派实现了一次方法论创新，从而在文化马克思主义已经开辟的学术疆域中，将第一代新左派所开创的各项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扬弃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非理论化倾向，使已经积累的理论成果获得了一种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具备了世界性传播的现实性。

文化研究是第二代新左派在结构主义转型中取得成就最大的一个领域。毋庸置疑，英国的文化研究传统是由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这三位第一代新左派开辟的。不过，将文化研究从一种传统转化为一个成熟的

学科领域,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却是霍尔的功绩:“斯图亚特·霍尔这个名字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代名词”。^{[50](p. 1)} 作为真正的文化研究之父,霍尔最初也是运用第一代新左派开创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范式或“文化主义”范式进行研究的,其以《通俗艺术》(1964)为代表的早期文化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了该范式的基本特征:在由“生活方式”所建构起来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文化—非文化统一体中,具体地、历史地研究各个文化要素。就像霍尔指出的那样,这种范式的最突出优点就是打破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文化与非文化之间的机械决定关系,恢复了文化的整体性。同时,该范式的不足也非常明显。除了缺乏适用的工具模型、难以习得外,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它不解释“经验”、“文化”的由来,而直接确认它们是真实可信的。^{[51](pp. 56—57)} 对于这个问题,霍尔最初的定位是利维斯主义的残余影响。可当他接触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后,立刻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经验”、“文化”都是意识形态生产的结果,脱离意识形态,根本不可能确定它们的真实与虚假!这时候,同样反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元对立模式的结构主义就表现出了更为巨大的活力与优越性:它强调“决定性条件”,从而避免了“天真的人道主义”;它强调理论实践的重要性,从而能够透过纷繁芜杂的复杂性把握到真实存在的关系和结构;它对意识形态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从而完成了对“经验”、“文化”的去中心化。^{[51](pp. 61—65)} 这些优越性对霍尔产生了无法抗拒的引力性,所以,60年代末以后,他广泛涉猎阿尔都塞、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自觉综合各种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最终在1973年创造出编码/解码理论,对电视话语现象进行了成功分析。^{[52](pp. 345—358)} 我们看到,正是因为有了这类可操作的分析技术,文化研究才在70年代获得了爆发性的发展,并迅速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53]

在历史学和历史社会学领域,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的结构主义转型也取得了长足发展。我们知道,历史学和历史社会学是以第一代新左派中以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长期经营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领域。按照美国学者凯伊的总结,该学派做出了三点突出的集体贡献:“自下而上”的历史观,阶级决定理论,以古证今的历史

政治学。^{[8](pp. 221—249)}这三点在汤普森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中得到了最为典型的体现。^{[46](pp. 38—39)}作为历史学和历史社会学家,安德森一向尊重汤普森的杰出成就,但并不认同他的历史学观念和历史学方法,认为它们具有片面性,已经不再能够有效适用于当代变化了的历史形势。具体地说,较之于“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安德森认为现在更应当重视“自上向下看的历史”,“今天,当‘自下向上看的历史’不仅成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和非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共同的口号,而且对我们理解过去产生重大影响时,十分有必要重提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阶级之间的长期斗争最终是在社会的政治层面——而不是在经济或文化层面——得到解决。换言之,只要阶级存在,国家的形成和瓦解是生产关系重大变迁的标志。因此,‘自上向下看的历史’——阶级统治的复杂机制的历史,其重要性不亚于‘自下向上看的历史’;实际上,没有前提,后者最终只是片面的历史(即使是较重要的一面)”^{[54](pp. 5—6)}。因此,安德森对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著作中广泛运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范式充满微词,认为它太注重主观因素,对客观因素关注比较少,且沉溺于历史细节,对历史的整体进程几乎未加关注。^{[55](p. 33)}在充分吸收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后,我们看到,70年代初安德森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研究范式,其特点是强调政治国家视角的优先性^{[54](pp. 4—5)},主张从普遍性出发看待特殊性,即从世界出发看待欧洲、从欧洲出发看待英国。^{[56](p. 2)}1974年,安德森接连出版了两部历史学著作《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前者通过辨析西欧历史发展的显著特征,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什么会起源于西欧,后者则分析了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形成、类型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意义。同时代的历史学家高度评价这两部具有鲜明的结构主义特征的著作,认为它们将汤普森等人启动的历史社会学运动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57](pp. 116—125)}类似的结构主义方法在其他第二代新左派历史学家那里也有不少成功运用。

文学理论领域中的结构主义转型是由伊格尔顿承担的。1976年,在威廉斯的指导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伊格尔顿出版了两部新书《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和《批评与意识形态》。在前一本书中,他对马克思恩格斯

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进行了概要性的梳理，^[58]并在字里行间明确表达了自己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范式的欣赏，认为这是一种既可以避免形式主义又可以避免庸俗社会学的比较理想的方法。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式是比较理想的，那么，应当如何定位、评价他以前从威廉斯那里继承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范式呢？在《批评与意识形态》的第一章中，他对从马修·阿诺德到威廉斯的英国文化研究传统进行了系统回顾，基本判断是他们都没有能够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对于威廉斯，他更是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后者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主义的，在方法论上是经验主义的，在美学理论上是有有机主义的，在政治观念上是改良主义的，总之，威廉斯至多是一个左派利维斯主义者，而根本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者。^{[59](p. 24)}随后，他正面建构并验证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从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尤其是阿尔都塞、戈德曼、马舍雷等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他的重要影响。虽然伊格尔顿的这种举动颇类弑父，不过，必须肯定的是，正是经过他的努力，“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文学理论领域确立了自己的主导地位。

除了上述领域，我们看到，在整个70年代，第二代新左派在各个领域中都忙于进行结构主义转型，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屏弃具有英国本土经验论色彩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走出英国，走向国际，成为具有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在原则上，马克思主义渴望成为一种普遍的科学——同任何其他对现实的客观认识相比，并不更带有民族的或大陆的属性。……只有当历史唯物主义摆脱了任何形式的地方狭隘性，它才能发挥起全部威力。这种威力尚有待历史唯物主义来加以恢复。”^{[48](p. 120)}

对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战后发展而言，第二代新左派转向“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可谓意义重大：首先，它改变文化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无为作风，为英国知识界提供了具有更多文本依据、更加理论化、更加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力扭转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成见与偏见，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趣，明显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其次，它超越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范式，

提供了一种更清晰、更具批判性、更容易学习与操作的结构主义范式，并在不同的领域中进行了颇为成功的运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发展；最后，它打破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对封闭性，自觉走国际化道路，提升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促进了它自身以及文化马克思主义在其他国际地区的传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承认，作为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和第二种发展形态，“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扬弃与超越。

3. 第一代新左派的反批判与自我更新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快速崛起过程伴随着第二代新左派对第一代新左派及其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批判是以隐蔽的、甚至是有意忽视这种形式存在着的，不过，很清楚，第二代新左派当时在结构主义的方向上已经走得有些远，从而矫枉过正，表现出了一种试图全盘否定文化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它的历史主义范式的虚无主义倾向。就像汤普森指出的那样，这种虚无主义倾向在比阿尔都塞还阿尔都塞的经济史家和社会学家赫斯特那里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表达，^{[60](p. 2)}因为在赫斯特看来，“虽然历史专业具有经验主义的主张，但历史的现实对象对认识来说却是难以认识的”，所以，“作为一种理论实践和一种政治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与历史学著作和历史学研究的联合中一无所获。历史学研究不管在科学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毫无价值”^{[61](pp. 300\312)}。换言之，赫斯特因为经验主义而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存在价值，而根据他的逻辑，注重经验研究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不管在科学上还是在政治上”应当是“都毫无价值”，从而应当取消的！面对第二代新左派的进攻，第一代新左派大多没有或者不准备给予反应，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理论兴趣和敏感性，要么觉得无所谓，要么觉得不可思议、一笑了之。真正认真对待这种进攻的主要是密利本德、威廉斯和汤普森。他们不同程度地卷入了与第二代新左派的论战，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1969年，密利本德出版了一本新书《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主要基于

英国的现实,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和作用进行了分析,重申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工具的观点。^[62]很快,阿尔都塞的学生普兰查斯就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资本主义国家问题”一文,重申两年前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一文中已经表达过的基本立场,^[63]对该书进行了评论,其基本观点是:密利本德不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只是一味援引事实,犯了“抽象的经验主义”错误,于是陷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不自觉。^[64]密利本德随即发表“资本主义国家:答尼·普兰查斯”一文,初步回应普兰查斯的批评,认为后者用理论来压制、贬低经验研究,而其所使用的结构主义方法并不能辩证地认识国家和整个社会系统之间的真实关系。^[65]在三年后的“普兰查斯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文中,密利本德更加系统地阐发了自己对普兰查斯的反批判,强调脱离了经验研究的结构主义方法只能是抽象的,因为人们不可能用该方法获得对具体现实问题的政治分析;同时,他证明普兰查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些本文的解读是错误的,从而对当时已经流行起来的“问题式”阅读的真理性提出了质疑。^[66]

虽然密利本德的反批判主要是围绕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具体问题展开的,不过,他却让其他第一代新左派看到了结构主义方法的内在局限性,并指出了进行反批判的基本方向。所以,我们看到,1978年,汤普森发表了著名的长篇论文“理论的贫困或太阳系仪的错误”,从密利本德打开的缺口出发,以极具论战性的文体,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局限进行了系统攻击。他的基本观点是:第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缺乏普遍的合法性,只适用于抽象的理论认识,而根本无法面对文化马克思主义所要着重关注的普通人民群众的日常性认识活动;第二,它将必要的经验对话与作为意识形态的经验主义混为一谈,歪曲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践,否定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经验研究的重要性和必然性;第三,它因为历史“事实”具有历史学家主体建构的性质而否定历史学研究能够把握历史真理,从而在客观上体现出了否定历史决定论的倾向;第四,它或许能够适用于停滞的结构化存在,但却不能胜任文化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过程性问题。^{[46](pp. 162—166)}基于上述认识,汤普森给“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一个极为严厉的死刑判决:“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集

中挑战了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他们不是改进而是取代了它。在意见交换过程中,他们给出了一种非历史的理论体系,而它一经检验就证明自己是一种唯心主义。”^{[60](p. 3)}应当看到,汤普森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上述批判包含很强烈的个人情绪色彩,不少言论、结论是明显偏激的。不过,同样必须看到的是,这种批评包含已经得到历史检验的正确性,^{[67](p. 110)}80年代后,霍尔、安德森、伊格尔顿等从70年代的立场后退,确实和汤普森的这一批判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

在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方法论反思的同时,汤普森还思考了一个重大问题:究竟应当如何对待民族理论传统和外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他坚决反对第二代新左派那种虚无主义地对待民族理论传统,盲目崇拜外来理论传统的做法,提出了三条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第一,正确理解理论上的国际主义,把是否有利于民族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解决,作为衡量、取舍外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标准;第二,历史主义地对待民族文化传统,把是否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当代传播与发展作为衡量、取舍传统激进思想的标准;第三,务实地对待理论建构,把是否有利于经验研究的开展作为衡量理论建构是否必须的标准。这些思想在《理论的贫困及其他论文》的序言中得到了最集中的表达:“国际主义不应当始终匍匐在我们选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面前,或者始终在寻找模仿其话语模式的途径。……即便我能化腐朽为神奇,我也不相信,葛兰西是因为将他的思想建立在对意大利历史和文化进行拷问基础之上这个事实,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不仅应当去认真倾听国际话语,而且还应当用本土资源去丰富和发展它。……几十年来,我们始终生活在接连不断的‘危险时刻’之中,因此,我们的历史和过去的文化就把自身展现为一种对危险保持惊醒的、以寻找民主持久性的证据和文化力量与文化成长的源泉为目标的精神。文化遗传的某些部分的特征只能是‘民族的’,它自己独特的要求、适应性和语言特性,它们不仅构成了我们所思所感的一部分,而且构成了我们据以思和感的一部分。……如果未来将被创造出来,那么,它一定更多地是从这些传统中被创造出来的,而决不会是从某些理论家的脑

子蹦出来的。”^{[68](p. iv)}

如果说密利本德和汤普森是以“针尖对麦芒”的方式主要致力发掘、批判“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与问题,那么,威廉斯则是以一种求同存异的心态,从第二代新左派的批判中既看到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不足也体会到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可取之处,进而响应第二代新左派的主张,学习、研究然后吸收、借鉴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思想,^{[69](p. 4)}最终促成了自己的思想更新。从1977年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我们可以看出,威廉斯的自我更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成果,对自己50年代就阐释过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学说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化阐发;第二,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文化理论;第三,努力实现与包括结构主义在内的各种“语言学转向”思潮的沟通与融合,提出“历史符号论”,并对自己早期的文化理论进行了延伸与重述。^{[70](pp. 303—403)}

对于当时正踌躇满志的第二代新左派来说,威廉斯的自我调整无疑是一个意料中的胜利,不过,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汤普森会发动如此凌厉且充满杀伤力的进攻。于是,一时间,第二代新左派纷纷打破以往的沉默,发表措辞激烈的论文,对汤普森进行公开批判。这场大批判的顶点是安德森在1980年出版《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一书,主要围绕《理论的贫困及其他论文》对汤普森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批判与分析。历史地看,这场大批判、大论战的意义就在于中断了第二代新左派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高歌猛进,被迫开始思考它存在的问题。就在这种连续性的暂时停滞中,80年代开始了。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为特征的一个新时代,而英国马克思主义也结束了自己在两代新左派的相互争论中不断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个全然未知的新阶段。

三 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发展

1979年5月,在两代英国新左派围绕“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问题

鏖战正酣之际,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保守党赢得大选,出任首相。论战的双方当时谁都没有意识到现代英国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已经悄然开启。然而,随着“撒切尔主义”强势的推进,双方很快就发现:资本主义似乎已经治好了“英国病”,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社会主义在英国再一次变得遥遥无期。这使得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政治诉求的英国新左派运动的存在基础受到严重侵蚀,开始走向终结。与此同时,随着英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日益盛行,70年代就出现的各种亚政治的新社会运动(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等)逐渐取代新左派运动成为左派抗争的主要形式。在这种时代语境中,左派思想家的政治诉求和理论旨趣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多元分化。结果,在经历过战后至60年代初的一元(文化马克思主义)统一阶段,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的二元(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立阶段后,英国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一个多元分化发展的新阶段。

1. 英国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散裂化

进入80年代以后,在自然规律的作用下,威廉斯、汤普森等原本引领、决定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基本走向的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思想家陆续进入暮年。虽然他们依然思想不辍、佳作时出,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已经逐渐从当代理论舞台的中心淡出,从思想的创造者更多地转变为了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执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之牛耳的主要是两类思想家。一类是以安德森、霍尔、伊格尔顿为代表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思想家。他们大多出生于30年代到40年代初,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陆续走上理论舞台,60年代末以后自觉进行结构主义转型,是70年代盛行一时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建构者和推动者。进入80年代以后,他们的思想创造力和影响力逐渐走向顶峰。另一类是以柯亨、拉克劳、默菲为代表的、1968年学生革命前后投身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左派学者。虽然他们在70年代就已经崭露头角,但在理论上并没有形成自身的独特性。只是在进入80年代以后,他们方才塑造与第二代新左派思想家显著不同的理论形态,其理论效应逐渐显现。在整个70年代,上述两类思想家汇聚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周围,与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思想家倡导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激

烈论战,表现出了某种趋同性。但进入 80 年代以后,这种趋同性迅速崩溃,英国马克思主义阵营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散裂化趋势。

英国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散裂化趋势首先表现在乌托邦期待的多样化上。在 60 年代初以前,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热情期待英国的社会主义前景,坚信英国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1956 年以前他们分别寄希望于工党和英国共产党,1956 年之后则将希望主要寄托在工党身上——能够带领英国走向社会主义。但是,1961 年以后,工党右翼重新占据上风。社会主义在英国的前途重新变得暗淡。这导致英国新左派在政治期待上出现显著分化。尽管不再寄希望于工人阶级政党,不过,以威廉斯、汤普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坚持认为英国工人阶级具有革命传统,能够重新革命化,从而在未来带领英国进入社会主义。为此,他们积极投身各种参与性民主政治活动,试图重新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激情。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则认为英国缺乏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统,如果没有外部革命运动的推动和帮助,英国不可能自行走向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英国社会主义的希望已经不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身上,而在于青年学生。为此,他们通过《新左派评论》等刊物大力译介古巴、意大利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新进展以及欧洲大陆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学说,力图以这些真正革命的理论来武装青年一代。1968 年学生运动之后,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等新社会运动在英国蓬勃发展。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大多程度不等地参与了各种新社会运动,并最终形成一种认识:各种新中间阶级的形成改变了英国的传统阶级结构,社会主义已经从排他的工人阶级运动,转变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多元社会政治力量的共同运动。进入 80 年代以后,“撒切尔主义”大行其道,新社会运动最终取代工人阶级运动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的主要运动形式。这使得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乌托邦期待进一步走向分化:一部分人坚持社会主义信仰,把参加新社会运动视为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反抗资本主义、保持社会主义革命性的一种现实方式;一部分人则认为运动即是目标,从而在不宣称放弃社会主义信仰的前提下,把各种新社会运动的目标作为自己的乌托邦期待;另外一些人则把传统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本质主义的观念公开加以抛弃,转而将“链

接”了各种新社会运动的政治、社会、文化诉求的多元激进民主作为自己的乌托邦期待。

英国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散裂化趋势其次表现在对后结构主义等后现代思潮的态度分化上。60年代初以后,安德森领导下的《新左派评论》杂志开始系统地向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译介当代欧洲大陆思想,其重点是后来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时兼顾其他激进思潮。这极大地开拓了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视野,同时使他们养成了自觉接受外来激进思潮的习惯。这一点可以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70年代英国的盛行得到有力印证。与此同时,在结构主义的发源地法国,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已经因其忽视人的历史主体作用而从法国思想界淡出,取而代之的是由在结构主义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福柯、拉康、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者所创立的更激进的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这些后现代思潮在其形成之初即开始零星传入英国,进入80年代以后则得到了非常系统的译介。但是,对于这些更加激进的思潮,此时已经走向成熟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像过去那样非批判地热情拥抱,而是在冷静思考后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多数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理性主义以及作为宏大叙事的马克思主义的颠覆、解构,选择以沉默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少数人在对后现代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乌托邦潜力给予正面评价的同时,对其理论本质保持了警惕和怀疑,最终判定它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一种无意识呈现。只有极少数人坚信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必须吸收的理论资源,并以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后现代主义的诠释、改造,提出了颇有影响的“后马克思主义”。

英国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散裂化趋势最后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多样化发展上。在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战后至60年代初),具有鲜明英国本土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范式得到了绝大多数新左派思想家的认同。但在60年代初第二代新左派崛起之后,这一范式遭到第二代新左派的严厉批评。他们力图通过引进、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来铸造适合英国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义理论范式,其结果就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范式在70年代的盛行及与文化马克思主义范式的二元对立。进入80年代之后,随着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乌托邦期待以及理论资源、学术旨趣等的多元分化,前述二元对立格局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受结构主义的马克思研究的激发,70年代中后期,一些具有英国本土分析哲学背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开始系统研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创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基于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取消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存在论基础或本体论承诺的不满,80年代早期,有哲学家尝试运用批判实在论解释、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批判实在论的马克思主义”,另外一些哲学家则回到《资本论》及其手稿,建立了新辩证法学派。与此同时,“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反思自身局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向文化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回归,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运用生产方式分析范式分析新兴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现象,填补马克思的构架中存在某些“空场”,从而成为杰姆逊所倡导的“晚期马克思主义者”;个别人则从结构主义走向后结构主义,创立了“后马克思主义”。

2.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及其反动

我们知道,作为分析哲学的发源地,英国哲学界一向缺乏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与热情。即便是有所研究,通常也是批评性。^① 不过,这种情况在70年代末期得到了根本改变:“在哲学方面,G. A. 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第一次把分析哲学的程序标准引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中,这部著作显然是70年代这一研究领域的里程碑。”^{[71](pp. 22—23)} 以此为起点,一场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而闻名的理

① 例如,在1955年的《时代的幻觉——作为哲学教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主流哲学家阿克顿(Harry Burrows Acton, 1908—1974)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批判性”解读。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并非一个有机的整体理论,而只是一堆没有条理性的、不具有连贯性的“混乱”概念的“杂合”体。他认为,构成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基本概念不仅缺乏条理、经不住推敲,而且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论证都是“重言式”的逻辑。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核心概念一一展开批判,他最终得出的判断:“马克思主义是两种哲学的混合物,一边是实证主义,另一边是黑格尔哲学,而这两者是无法调和得了的。”换言之,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杂凑的哲学。”(Harry Burrows Acton, *The illusion of the epoch: Marxism-Leninism as a philosophical creed*, Cohen, 1955)

论潮流开始在英美流行起来,并在 80 年代后期达到鼎盛。这成为 80 年代以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多元图景中很引人注目的一个理论景观。

那么,“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在轻视、敌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英国兴起呢?这大体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 60 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英国勃然兴起,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陆续涌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狭隘认识。由于政治、理论、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原因,60 年代以前,英国一般知识界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极为有限。大多数人的马克思形象主要来自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的《卡尔·马克思传:他的生平与环境》(1939)。新左派运动兴起之后,随着理论需求的逐渐增加,这种状况出现了明显改观。1961 年,乔治·李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 1912—1973)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一种历史的批判的研究》(1961)一书,让英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有了一个完整的了解。60 年代中期以后,伯林以及 1969 年流亡到英国的列泽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 1927—)陆续指导了一批专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青年博士(如戴维·麦克莱伦、特瑞尔·卡弗),他们致力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编译、研究,出版了许多高质量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集和研究专著,显著提高了知识界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第二个原因是 60 年代末期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被译介到英国后,他的马克思解读在激发了英国哲学家的研究兴趣的同时,其研究方法也遭到了后者的强烈批评。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的序言中,柯亨直言不讳地提到了这一点:“首要的是,我发现《读〈资本论〉》的很多内容极为含混。逻辑实证主义以及它坚持的理智活动的精确性主张,在巴黎从未受到重视,这也许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英语国家的哲学早已超过逻辑实证主义,但还在它一直同后者有关系。阿尔都塞的含混会给英国的马克思主义造成不幸的后果,因为在英国明晰是一种宝贵的遗产,而且在英国一般都不假定理论陈述必定是一种难以理解的东西。”^{[72](p. 11)}

根据柯亨后来的自述,我们知道,他出生于加拿大的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犹太工人家庭,在 1961 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分析哲学之前,就已经

确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信念。60年代中后期,他尝试用一种不严格的分析哲学方法去描述马克思的观点,但却与正统的分析哲学家碰撞,这促使他用严格的分析哲学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他坚信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但却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一些概念不清晰,论证不严谨;二是对社会历史问题只有宏观论述而缺乏微观分析;三是一些理论或者已经过时,或者是错误的。他的目的就要用分析的方法去重构、修正、补充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真正革命的科学的理论。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他崇尚分析的思维,反对“辩证的”思维和“整体主义”的思维,因为他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拥有它自己的有价值的思维方法。他宣称自己的分析的方法主要来自西方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思潮,主要有:从20世纪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哲学发展起来的逻辑和语言分析方法;现代西方经济学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继承发展而来的经济分析方法;源于“决策论”、“博弈论”、“理性选择理论”的描述选择、行为和策略的方法。^{[72](pp. 1-10)}

1978年,柯亨出版了自己的多年思考所得《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该书一经出版,立即吸引了欧美三个同样具有分析哲学背景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组成了一个“九月小组”每年定期在伦敦进行专题研讨,从而创立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进入80年代后,其影响不断扩大,并在80年代末期达到高潮。对于80年代以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体现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本土化发展的努力,用英国知识界熟悉的分析的方式,对英国知识界感兴趣的、具有重大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了重构、修正与补充,使得马克思主义更容易被在分析哲学传统中成长的英国哲学家以及其他知识分子所理解和掌握,从而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这一点在更年轻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乔纳森·沃尔夫的记述中得到生动体现:“1986年,我在伦敦大学学院担任哲学讲师。这一职务的责任包括讲授马克思主义,它是由我的老师杰瑞·柯亨(Jerry Cohen)开创的一门课程的一部分……我也想到这一课程不会长期存在。我能理解学生们愿意让那时最主要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来教授

马克思主义的心情,不过我认为,随着科恩的离去,学生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也会随之消失。然而,我错了。柯亨走后,对马克思主义的讲授在伦敦大学学院哲学系仍在继续。这门课在柏林墙倒塌以后还在进行,并且在当今学生疏远激进主张和追求名利的情况下而变得越发吸引人。”^{[73](p. 1)}就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作为本土化的积极成果,它的突出成就在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进行了澄清,从而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考、论证资本主义替代方案提供了明晰性基础。^[74]

但作为本土化的消极的副产品,它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存在论基础或本体论承诺。这一点引起了其他一些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不满,并试图对此进行弥补或反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批判实在论的马克思主义”和新辩证法学派。“批判实在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英国的科学哲学家罗伊·巴斯卡(Roy Bhaskar)。在70年代批判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时代背景下,他提出了批判实在论,力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哲学传统之间,开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第三条进路。^[75]80年代以后,他开始将批判实在论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作为社会科学而非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提供辅助性的补充,以及本体论基础。90年代以后,围绕他的这一倡议,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形成了一次不小的争论热潮,^[76]从而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主导地位构成了某种挑战或反动。新辩证法学派的主要代表是曾长期在苏塞克斯大学讲授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克里斯托弗·阿瑟(Christopher J. Arthur)。阿瑟是一名具有深厚的黑格尔哲学修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长期从事《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的编译工作,以及《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哲学思想的研究。1986年,他出版《劳动辩证法: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一书,对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的辩证法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进行了深入阐发。他关于辩证法的主张得到了包括美国左派学者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在内的许多英美左派学者的支持,从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新辩证法学派。该学派的基本思想就是反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否弃,^[77]坚持辩证法

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78]

3. “晚期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重装上阵

1972年,深受第二代新左派推崇的托派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厄尔奈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23—1995)出版了《晚期资本主义》一书,系统深入地阐述了自己的资本主义“长波”理论,指出资本主义除了短的经济周期之外,还有长达几十年的“长波”,而资本主义在经历了战后的繁荣长波之后,正在无可避免地走向衰退长波。^[79]1974年,因石油危机而导致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证实了曼德尔“长波”理论的正确性。这让第二代新左派异常振奋,坚信新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已经来临,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不再是解释世界,而且现实地改造世界。这种乐观主义情绪在安德森1974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得到充分体现:“1974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战后第一次各国同时发生的大衰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群众实践之间,以工业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为导线,重新开辟一条革命线路的机会已大大增加。”^{[48](p. 22)}正因为如此,他从政治上对长于理论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表示出了某种蔑视,认为它实际上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失败主义的产物:“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48](p. 117)}然而,随着“撒切尔主义”的强势推进,第二代新左派最终发现:在经历了危机后资本主义重新变得生机勃勃,它的必然灭亡再一次被延宕。于是,就像1848年革命后的马克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法兰克福学派一样,他们被迫从实践退回到理论,通过理论批判资本主义,保持自己的左派立场,等待下一次危机的来临。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们看到,大多数第二代新左派开始反思“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中介,不同程度地回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肯定马克思可错性的同时重申了马克思生产方式分析范式的科学性和合法性,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运用生产方式分析范式分析新兴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现象,填补马克思的构架中存在某些“空场”。就这样,他们在后来杰姆逊十多年后才发明的“晚期马克思主义”旗帜下重新集结了起来。^[80]

在“晚期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最先重装上阵的是伊格尔顿。1981年，伊格尔顿出版《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一书，公开表明自己是一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承认自己已经从《批评与意识形态》时期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向着第一代新左派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生产方式分析范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归或发展，“部分是受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重重压力，部分是受社会主义内部新主题和力量的影响，文化研究所关注的中心，已经从狭隘的纯文本或概念分析转移到了文化生产问题和艺术品在政治中的运用。与这一普遍转变相交织的是笔者本身写作《批评与意识形态》以来的演变发展”^{[81](p.2)}。整个80年代，伊格尔顿都在不断地反思、调整、回归，期间多次向自己曾尖锐批评过的老师威廉斯致敬，“当你拼力到达某个理论高度时，发现威廉斯早已不声不响地占领了那个位置，而且是沿着自己的思路到了那里”^{[82](p.262)}。结果，80年代末，伊格尔顿最终明确、完善了自己的文化政治批评方法，其核心是强调“文化的复杂关系结构表现为一种‘生产’关系或物质关系，即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决定因素是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关系，这种经济社会关系集中表现为政治权力的结构形式，因此‘文化’不是超验的可以任意漂浮的能指，而是与我们的日常感觉紧紧联系着的实在问题，是现实政治问题；文化范畴仍然是利益和权力激烈斗争的场所，是矛盾和问题本身，而不是消除问题的办法；文化政治批评不是用文化来解释一切，而是用一切来解释文化。”^{[83](pp.8-9)}90年代以后，伊格尔顿娴熟地运用文化政治批评方法，在批判后现代主义这个大方向上，对大量当代文化现象、美学理论、政治问题等进行了出色的分析，牢固确立了自己作为“晚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地位。

继伊格尔顿之后，霍尔领导下的伯明翰学派也对70年代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进行了反思与回归。1983年，理查德·约翰生在伯明翰学派的油印材料上发表了著名的“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一文，指出生产的视角是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把这些相互迥异的著作连结在一起的，在于它们都采用了关于生产的理论观点，即便不是文化生产者的观点的话。它们最感兴趣的是文化形式的生产和社会组织。当然，正是在这

方面,马克思主义范式占据了非常核心的位置,即便这是一个一直有争议的位置”^{[84](p. 24)}。尽管接下去约翰生对生产视点的两个限制即“经济主义”和“唯生产论”提出了批评,但更重要的是,他对银幕派的结构主义立场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批判,认为他们几乎完全忽视了生产的观点,已经有点走火入魔了。^{[84](pp. 35—38)}与此同时,我们看到,霍尔也对自己1973年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进行了更新,将它从单纯的文本转移到复杂的意识形态中,从而发现了政治语言的复杂作用,提出了阅读政治学,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指南。^[85]

作为第二代新左派曾经的理论旗手,安德森也以自己的方式重新集结到了“晚期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我们知道,1980年,安德森出版《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一书,基于自己70年代标榜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对汤普森的理论立场进行了全面批判和分析,尽管他把汤普森尊崇为“当今最杰出的社会主义著作家”。^{[55](p. 1)}不过,到了1983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轨迹》,我们看到,他对汤普森批判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不管我们对这场辩论的功过是非看法如何,今后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像他们多年来所做的那样,站在任何一方来辩论,宛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理论属于两个不同的精神世界,两者之间只少许有些交叉,令人有点难以理解。……这双重的收获——理论和历史之间新的交流,及跨越国界——成为过去十年中最有成效的变化之一。”^{[71](p. 28)}同时,对于自己曾热烈欢呼过的结构主义的内在局限性,他也有了更加清醒的反思:“如果结构在一个单独超越所有主体的世界中得到承认,那么什么能确保它们的客观性呢?极端的结构主义也决不会比它所宣告的人类的毁灭再刺耳了。”^{[71](p. 68)}既然“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再值得坚持,那么,在当代如何才能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呢?在沉默了十多年后,1998年,安德森最终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是年,他以书的形式出版了为杰姆逊——杰姆逊是安德森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引以为同志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和安德森一样都曾经经历过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80年代初以后率先转向晚期马克思主义——的新书《文化转向》撰写的长篇书评《后现代性的起源》,通过捍

卫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认识,表达了自己对杰姆逊所倡导的“晚期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认同。^[86]

说到英国第二代新左派思想家在“晚期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重装上阵,我们不能不提到大卫·哈维。与大多数第二代新左派不同,由于地理学的特殊性,哈维 60、70 年代并没有受到结构主义的明显影响。70 年代初,他通过卢卡奇对实证主义的批判转向对《资本论》的研究,从而确证了马克思生产方式范式的基础意义及其当代价值,并把资本市场的逻辑变迁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80 年代以后,他一方面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将地理学提升为空间政治学,另一方面则借助城市化经验把历史唯物主义发展成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87]成为当代欧美“晚期马克思主义”阵营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理论家。

4. “后马克思主义”的异军突起

在 70 年代的英国,阿尔都塞的影响如日中天。可在法国,他实际上已经因为忽视人的历史主体作用而从法国思想界淡出,取而代之的是由在结构主义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福柯、拉康、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者所创立的更激进的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在其形成之初即开始零星传入英国,并得到了某种曲折而微弱的回音:70 年代后期,被认为比阿尔都塞还阿尔都塞的新左派学者赫斯特和希丁斯就仿效后结构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阶级政治进行了解构。^[88]80 年代以后,英国理论界对后结构主义进行了非常系统的译介。但是,绝大多数具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背景的英国新左派思想家,并没有像当年接受结构主义那样接受后结构主义,比较罕见的两个例外是拉克劳和默菲。之所以他们对后结构主义具有较强的亲和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长期生活和战斗在不同于英国语境的拉丁美洲。拉丁美洲 60 年代高涨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跨阶级的民族民主斗争,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理解与判断。结果,在他们眼中,一些基本理论(生产方式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工人阶级及其阶级斗争的重要性,等等)变成了可以修改甚至放弃的一般学说。正因为这样,他们比较容易接近、接受后结构主义。^[89]

虽然拉克劳和默菲与后结构主义具有很强的亲和性,不过,作为严肃的思想家,他们并没有匆忙投入它的怀抱。只是当他们发现,进入 80 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似乎已经变得僵化,不再能够面对、解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转变以及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社会斗争的新形势。于是,他们开始用后结构主义解构、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阐发他们所勾画的“后马克思主义”多元激进民主规划。^{[90](pp. 1-5)} 他们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 1985 年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

不管今天我们怎样评价《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及其中的“后马克思主义”,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这实际上是拉克劳和默菲直面变化了的资本主义现实,探索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道路的理论结晶。所谓变化了的资本主义现实指的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迁及其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具体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工人阶级数量不断下降,中间阶级人数不断上升。相应地,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日渐低落,工人阶级运动的活跃程度和政治重要性迅速下降。与此同时,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等由各种新中间阶级主导的新社会运动却蓬勃发展,最终取代工人阶级运动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91] 在拉克劳和默菲看来,这种变化是根本性的,它说明“在当代资本主义现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能够合法包容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日渐扩大的裂痕”。^{[90](p. 2)} 基于这种判断,他们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概念,认为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的统一性基础已经不存在,留下来的只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名词。之所以“工人阶级”死亡了,那是因为“阶级”和“主体”已经先行死亡了,存在的只有“主体身份”或“主体立场”。^{[90](p. 128)} 在这种通过“认同”建构起来的“主体身份”或“主体立场”基础上,他们随即以后结构主义的方式建构出了新的、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工人阶级概念:它们不过是各个“主体身份”在特定状态和利益关系中的相互联合或“链接”的产物。最终,他们从理论上证明:在现时代,阶级已不再具有确定的物质基础,而更多地成为一种随意的主观身份认同。

虽然拉克劳和默菲的上述理论让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感觉匪夷所

思,不过,谁也无法否认:它似乎比同时代其他阶级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这使得他们敢于放手用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解构、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本质主义话语,使之从对资本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批判性认识,转变为一个在话语实践基础上可以任意“链接”或填充的理论空场:“我们把任何建立要素之间关系的实践称之为链接,那些要素的同一性被规定为链接实践的结果。来自链接实践的结构化总体,我们称之为话语”。^{[90](p.114)}既然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重新建构为一种非本质主义的话语,那么,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经济基础与政治、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决定关系也就不存在了,人们由此获得了根据实际需要,历史地“链接”、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权力。最终,拉克劳和默菲合乎逻辑地解构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社会主义规定性,先将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与各种新社会运动的社会文化斗争等量齐观,再将它们无差别地“链接”为激进多元民主规划,从而在“回到领导权斗争”的激进口号下,放弃了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仰与追求。

应当看到,拉克劳和默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体现了一种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努力。但是,它的“发展”在太多方面都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线。因此,它一经过提出即得到同等程度的赞誉与批判。围绕它所展开的争论至今没有终结,从而成为激励英国马克思主义继续前进的一个动力。

参考文献:

[1] Noreen Branson,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27—1941* [M],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5

[2] 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M],刘沁秋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 Samuel L. Hynes, *The Auden Generatio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in the 1930's* [M], Viking Press, 1977

[4] 雷蒙德·威廉斯,文学与社会[M],吴松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5] 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M],陆建德等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6] 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7] Edward Thompson, *Christopher Caudwell* [A], in Edward Thompson, *Making History: Writings on History and Culture* [M], The New Press, 1994

[8] Harvey. J. Kaye, *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M], Polity Press, 1984

[9] 道布(多布),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M],松园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62

[10] 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M],谢珺造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62

[11] 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陈体芳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

[12] Eric Hobsbawm, *Preface*, in Brenda Swann and Francis Aprahamian, ed., *J D Bernal: A Life in Science and Politics* [M], Verso, 1999

[13] 梅斯里夫钦科主编,当代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M],中央编译局研究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14] 易克信、吴仕康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八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15] 周櫟楷,史学思想与现代意识的辩证:近代英国左派史家的研究[M],台北:合志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

[16] Bill Schwarz, *The 'People' in the history: 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 1946—1956* [A], in R. Johnson, etc, ed., *Making Histories: Studies in History Writing and Politics* [M],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1982

[17] Edwin A Roberts, *From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o the Science of History: Scientists and Historians in the Shaping of British Marx-*

ist Theory [J], *Science & Society*, 69,4(2005)

[18] Dennis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 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 of Cultural Studie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9] Maurice Dobb,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M],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46

[20] Christopher Hill,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0* [M], Lawrence and Wishart, 1955

[21] Raymond Williams, *Politics and Letters: Interviews with New Left Review*[M], Verso, 1981

[22] 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3

[23] E. P. Thompson, *Socialist Humanism: An Epistle to the Philistines* [J], *The New Reasoner*, 1, 1957

[24] 斯道雷, *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M], 杨竹山等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25] 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M], third edition, Routledge, 2003

[26] Michael Kenny, *The First New Left: British Intellectuals after Stalin*[M], Lawrence & Wishart, 1995

[27]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 Class Life*[M], Chatto and Windus, 1957

[28]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is Ordinary* [A], in John Higgins, ed., *Raymond Williams Reader* [M],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1

[29]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M], Harper Torchbooks, 1966

[30] Edward Thompson, *The Long Revolution*[J], *New Left Review*, No. 9—10, 1961

[31]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M],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2] Edward Thompson,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A], in Edward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 [C],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33] 布莱克雷治,革命和道德:英国新左派中的伦理论争[J],现代哲学,2007(1)

[34] Harry Hanson, An Open Letter to E. P. Thompson [J], *The New Reasoner*, 2, 1957 (Autumn)

[35] Charles Taylor, Marxism and Humanism [J], *The New Reasoner*, 2, 1957 (Autumn)

[36] Alasdair MacIntyre, Notes from the Moral Wildness I [J], *The New Reasoner*, 7, 1958—59 (Winter)

[37] Alasdair MacIntyre, Notes from the Moral Wildness II [J], *The New Reasoner*, 8, 1959 (Spring)

[38] Perry Anderson, The Left in the Fifties [J], *New Left Review*, 29, 1965 (Spring)

[39] 佩森特、托马斯编,西欧社会民主党[C],林幼琪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40] Paul Blackledge, *Perry Anderson, Marxism and The New Left* [M], Merlin Press, 2004

[41] 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M], Verso, 1992

[42] 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J], *New Left Review*, 23, January-February, 1964

[43] Tom Nairn, The Anatomy of Labour party-1 [J], *New Left Review*, 27, September-October, 1964

[44] Tom Nairn, The Anatomy of Labour party-2 [J], *New Left Review*, 28, November-December, 1964

[45] Tom Nairn,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J], *New Left Re-*

view, 24, March-April, 1964

[46] 张亮, 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 爱德华·P·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47] Perry Anderson, Components of the National Culture[J], *New Left Review*, 50, July-August 1968

[48] 安德森,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 高钰等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49] 麦克莱伦, 历史与现在: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J], 世界哲学, 2005(1)

[50] Helen Davis, *Understanding Stuart Hall* [M], SAGE Publications, 2004

[51] 霍尔, 文化研究: 两种范式[A], 载罗钢、刘象愚主编: 文化研究读本[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52] 霍尔, 编码、解码[A], 载罗钢、刘象愚主编, 文化研究读本[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53] 桂杰, 霍尔与文化研究[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54] 安德森, 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M], 刘北城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55] 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M], Verso, 1980

[56] 安德森, 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M], 郭方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57] 史密斯, 历史社会学的兴起[M], 周辉荣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58] 伊格尔顿,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 文宝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59] 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 [M], London and Atlantic Highlands, 1976

[60] Edward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or An Orrery of*

Error[A], in Edward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M],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61] B. Hindess and P. Q. Hirst, *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M],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5

[62] 密利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M],沈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63] Nicol Poulantzas, Marxist Political Theory in Britain [J], *New Left Review*, 43, May-June, 1967

[64] Nicol Poulantzas, The Problem of Capitalist State[J], *New Left Review*, 58, November-December, 1969

[65] Ralph Miliband, The Capitalist State -Reply to N. Poulantzas [J], *New Left Review*, 59, January-February, 1970

[66] Ralph Miliband, Poulantzas and the Capitalist State[J], *New Left Review*, 82, November-December, 1973

[67] 琼斯,盎格鲁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及历史推论法[A],载何秉孟、姜辉,《阶级结构与第三条道路——与英国学者对话实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68] Edward Thompson, *Foreword*, in Edward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M],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69]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70] 刘进,文学与“文化革命”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学批评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7

[71] 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M],余文烈译,上海:东方出版社,1989

[72] 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M],段忠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73] 乔纳森·沃尔夫,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M],段忠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74] 段忠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征及其三个代表性成果[J],教学与研究,2001(12)

[75] 殷杰、安麓,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思想——兼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之第三条进路[J],哲学研究,2007(9)

[76] 布朗等,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M],陈静等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7] Tony Smith, Analytical Marxism and Marx's systematic dialectical theory[J], *Man and World*, 1990(23)

[78] Robert Albritton and John Simoulidis, ed., *New Dialectic and Political Economy*[M],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79] 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M],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80] 张亮,作为思潮的晚期马克思主义[J],南京大学学报,2003(2)

[81] 伊格尔顿,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M],郭国良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82] 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M],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83] 马海良,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84] 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A],载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85] 武桂杰,霍尔的阅读政治学[A],载霍尔与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86] 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M],紫辰、合章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87] 胡大平,从历史唯物主义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升级及其理论意义[J],南京大学学报,2004(5)

[88] 周穗明,后马克思主义关系当代西方阶级结构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述评(上)[J],国外社会科学,2005(1)

[89] 周凡,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和莫菲思想演进的全景透视(上)[J],学术月刊,2008(5)

[90] 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91] 安德森主编,西方左派图绘[M],张亮、吴勇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

Contents

1. The Modern Crisis of German Philosophy (Moses Hess)
2. The Ruling Form of the Principles of Communism (Moses Hess)
3. The Essence of Money (Moses Hess)
4.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Moses Hess)
5. Questions and Answers of Communism Faith (Moses Hess)
6. The Critical Re-constitution of the Face of Early Marx (Hiromatsu Wataru)
7. Is Hess the Coordinates Ax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Young Marx's Thinking? —A Review of Hiromatsu Wataru's Thinking about the Face of Early Marx (Chikara Rachi)
8. The Manuscripts of "German Ideology" and some Episodes in the Course of its Compilation and Publishing (Zheng Wenji)
9.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ading Endorsement of Marx's and Engels' Books and the Issue of its Publication (Zheng Wenji)
10. The Research of Marx and Engels in South Korea—Focused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Works and the Status Quo of the Research (Zheng Wenji)
11.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Marxist Understanding of Capitalism (Zhang Yibing)
12. The Evolution of Critical Theory of Capitalism during the Peri-

od of Second International (Yao Shunliang)

13. The Model of Understanding Capitalism in the Soviet Marx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Reflection (Liu Huaiyu)

14. Critical Theory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from the viewpoint of Economic Philosophy (Tang Zhengdong)

15. Critical Theory of Capitalism of Western Left Marxist (Hu Daping)

16. Mode of Production in History and Marx's Texts (Zhou Jiabin)

17. Marx's Theory of Reproduc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un Leqiang)

18. Richard Hoggart, "*The Use of Literacy*" and The Cultural Turn (Hall Stuart)

19. Raymond Williams and the Political Science of the New Left (Blackburn)

20. E. P. Thompson's Ethical Radicalism and its Heritage (Michael Kenny)

21.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Marxism Since 1945 (Zhang Liang)

中文摘要

德国哲学的现代危机

[德]莫泽斯·赫斯

摘要:青年黑格尔派虽然在把自我意识运用到生活中去在这一点上已超越了黑格尔哲学,但在根本的意义上并没有超出以理性为基础的黑格尔哲学,他们的观点并没有背离黑格尔哲学,而是作为从黑格尔哲学的核心中得出的。黑格尔哲学有着强烈的对现实的批判意蕴,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承认有完善的东西和永恒的东西,同时他又寓于人的自我意识或所谓“绝对精神”而避免与生活产生任何冲突;青年黑格尔派虽然对现实进行了毫无顾忌的批判,但并没有超出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视域。

关键词: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绝对精神;批判

共产主义原则的统治形式

[德]莫泽斯·赫斯

摘要:赫斯总结了发表在《年轻一代》杂志上转载的一篇文章的大意。共产主义原则的统治形式不是民众统治,而是科学统治,任何工作在达到一定的高度时都会变为一种科学。具体而言,每个行业都必须从自身任命一个委员会,其职责是裁决这个行业的各个专业的进步、完善、等等,更重要的是选才。赫斯认为这种思想所是具有创造性和独特性的。

关键词:共产主义原则;统治形式;科学

论货币的本质

[德]莫泽斯·赫斯

摘要:人们的共同活动或是交往是人的类本质,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时,人的本质在历史的进程中经历的斗争和毁灭而不断发展,从而形成人类的自然史。但是在小商人世界,即资本主义社会,个体被提升为目的,作为人的本质的类被贬低为手段,人的本质的异化了。现代商业世界的本质即货币,是基督教的实现态,作者用异化概念分析货币,提出货币是人的异化的本质,对源于基督教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进行道德的批判,把爱看成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从人本主义的角度论证共产主义。

关键词:交往;类;基督教;货币;异化;人本主义;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德]莫泽斯·赫斯

摘要:本文叙述了从巴贝夫经圣西门和傅立叶到蒲鲁东的法国政治革命,和从康德经费希特和黑格尔到青年黑格尔派无神论的哲学革命,认为德国以绝对的精神自由的学说和法国以绝对的社会平等的学说,各自的一切归结为共同产生的同一的根本原理,把自由和平等统一起来,真理才能在生活中现实化。在此基础上本文批判了施泰因的思想,施泰因没能正确把握法国思想的精神,即作为主体的自由与作为客观的平等的正义的统一的真理,只是局限于其向往的平等的志向中。施泰因只知道由巴贝夫而发明的早期最粗俗形式的共产主义,把本来的社会主义完全从共产主义割裂开来,因而没有正确的理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及其学问的联系。

关键词:法国;德国;平等;自由;施泰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信条问答

[德]莫泽斯·赫斯

摘要:本文从人本主义的立场解答了关于劳动、金钱、财产、自由、婚姻、宗教、共产主义等问题。自由的活动才是合乎人的本性的,现在人们却不能够按照人类的整个本性活动,受到社会关系的强制压抑,金钱是就用数字来表示的人的价值,其存在本身就是人类的奴隶制度的标志。财

产是由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创造的,却属于少数的有产者,而没有有保证的财产,也就谈不上有公民自由。通过教育和财产税、改革继承权等措施,目前的所有制关系就会逐渐地被改造成共产主义的关系。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男女婚姻结合的纽带是相互的爱情,大家应该信奉爱和人道的宗教。

关键词:共产主义;劳动;金钱;财产;自由;婚姻;宗教

早期马克思像的批判的再构成

[日]广松涉

摘要: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对黑格尔左派内部的三大潮流进行综合、扬弃而形成。在黑格尔左派开始三极分化的时候,从作为鲍威尔派的稳健的一员出发的马克思,以偏右的批判为契机而转移到卢格的阵营,通过与黑格尔法哲学的对决而从“从市民社会到国家”的主题脱却出来,巩固了通向作为真正的人类共同体的共产主义的志向。接着,对这个作为共同社会的否定之否定的实现,采取通过自我异化和回归的逻辑作辩证法的展开的姿态,确保进行历史哲学的透视,而得以踏上所谓三个源泉的综合统一之途,并最终采取了赫斯的立场。他们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也成为了马克思真正综合、扬弃黑格尔左派的三极,从赫斯的思想的立场和水准脱却出来的“自我了解”的过程。这样的纵向视角才能填平所谓早期马克思论的裂缝,使将马克思主义像作为有机的整体进行再构成的工作最终成为可能。

关键词:早期马克思像;赫斯;纵向;黑格尔左派;综合;扬弃;

赫斯是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坐标轴吗? ——评广松涉的早期马克思像

[日]良知力

摘要:广松涉是以主体概念为轴心来确认早期马克思像的再构成,他强调了在这一过程中赫斯的压倒性影响。本文从赫斯早期思想本身发展史的视座,即从《二十一印张》的费希特-鲍威尔的立场到《论货币》的费尔巴哈的立场的两极分解及其在此前的赫斯那里的表现形式,出发来

考察其与青年马克思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关系。虽然主体概念为轴心进行再确认这件事可以说是不可欠缺的作业,但是广松夸大了赫斯对同时期的马克思思想的影响,赫斯不是对早期马克思作纵向的再构成之际的坐标轴。

关键词:广松涉;赫斯;青年马克思;主体概念;早期马克思像;坐标轴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及编纂出版过程中的若干插曲 [韩]郑文吉

摘要:文章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极高的学术价值,但是该著作的文本至今仍未最终确定。作者选取《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研究史和编纂史上的若干轶事趣话,以图提高读者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关注度。它们分别是:1.《德意志意识形态》部分手稿的公开与早期评价。2.梁赞诺夫和迈耶尔的论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重要性的最初认识及学术功名心的冲突。3.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和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之间的倾轧——社民党内关于在德国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部分手稿的论争。4.《德意志意识形态》在MEGA1中的歪曲——手稿的肆意编纂与部分佚失手稿的发现。5. 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推迟出版。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编纂史

马克思恩格斯藏书中读书批注的意义及其出版问题——关于MEGA2 IV/32(先行版)的评述

[韩]郑文吉

摘要:MEGA2 IV/32先行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稿和藏书的目录。马克思和恩格斯藏书中的读书批注、摘录笔记,以及个人藏书中的阅读痕迹对于理解他们的思想形成与发展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文章还回顾了马克思恩格斯藏书中读书批注等重要资料的保存、编辑及出版过程,并就电脑技术问题,对准备完本的MEGA2 IV/32的出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读书批注;摘录;阅读痕迹;《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考证版”全集》

韩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以著作的翻译和研究现状为中心

[韩]郑文吉

摘要:本文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和研究现状为中心,对韩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由于朝鲜社会 20 世纪的特定历史环境,韩国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和对他们的思想研究是 1980 年代中期之后的最近的事情,并且最初都是与政治、社会等实践需要紧密联系,所以,历史的来看,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进行系统编辑和完美翻译还为时尚早,而关于他们的著作以及思想的学术的、客观的研究成果估计在不久的将来还难以出现,但作者对此充满了期待。

关键词:韩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研究现状

应当重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的研究 张一兵

摘要:择取“资本主义理解史”这一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认识和批判的思想史全程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改革开放 30 年“资本主义研究”的反思和积累,同时借鉴西方左派资本主义理解得失、激活马克思理论当代意义的内在要求和历史任务。在批判传统研究在方法论上所遗留的预设论和非历史性倾向之后,文章还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解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进展,即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理解经典模式的历史生成。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经典理解;西方左派理解

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演变 姚顺良

摘要:第二国际时期,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解史上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第二国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完成期,从马克思的经典资本主义理论向以列宁为主要代表的帝国主义理论的过渡期,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分化期。因此,第二国际是考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重要一环,但是由于过去从教条主义出发,国内对第二国际的研究还十分薄弱。

关键词:第二国际;经典资本主义理论;帝国主义理论;批判理论的分化

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模式及其当代反思 刘怀玉

摘要:俄罗斯知识界结合俄国的民族特色、时代内涵与阶段特色,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理论有着一个长期的跟踪、接受与研究的思想“前史”或学术传统,为俄国及尔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才具备了良好的基础。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但在总体的历史逻辑上是对列宁本来正确、但有历史局限性的资本主义观的片面理解与发展过程,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对不断变化着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现实的客观认识。研究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苏俄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理解;列宁资本主义观;当代反思

经济哲学视域中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唐正东

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学者一般都从文化的角度来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同时也存在着那些坚持从经济线索出发来展开其批判理论的思想家,如斯威齐、巴兰、曼德尔、阿格里塔、利比兹等。但是这种基于经济学线索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理论也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由于没有充分地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贯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对资本主义的解读中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往往忽略了对历史主体的研究。

关键词:经济哲学;批判理论;文化批判;经济批判;历史发生学

西方左派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胡大平

摘要:本文通过深入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及其逻辑深化等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内在逻辑关联,展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显著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概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探索的全部历程,并详细阐述了其资本主义批判的类型或模式。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深化;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历史与文本中的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

周嘉昕

摘要: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概念的“生产方式”概念在思想史上的讨论主要是在三个不同的论域中展开的,并且前后形成或遭受了五种误解与挑战。只有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本身才能科学理解“生产方式”概念,及其在马克思文本中的双重理论维度。

关键词:生产方式;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双重维度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

孙乐强

摘要: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包含三个不同的理论层次:狭义再生产、广义再生产和日常意识的再生产,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体现了科学抽象、历史发生学的本质和边界原则,不仅在客体向度上深化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在主体向度上也把历史唯物主义推进到一个更高层次。

关键词:再生产;科学抽象;边界;历史唯物主义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及文化转向

[英]斯图尔特·霍尔

摘要:《识字的用途》为文化研究的三大“奠基作”之一,本文从该书所处的特定语境的分析 and 具体内容的思考中阐述了其对早期文化研究的影响,特别是在方法论上对早期文化研究的意义。《识字的用途》是文化转向早期的一个实例,同时也在产生这一现象过程中发挥了开创性的作用,即文化对社会及经济生活各个方面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它渗入当代社会生活每一角落,创造出一种次生环境的扩散,并调停一切事物的方法。

关键词: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文化研究;文化转向

雷蒙·威廉斯与新左派政治学

[英]布莱克本

摘要:威廉斯开创了一种研究文学、文化研究、传播学和成人教育的全新方式,甚至开辟了许多研究和实践中的新领域。尽管与这种文化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他有关民主的“漫长的革命”思想,但其合法性和

重要性也已被那些此前并不同意他的反资本主义政治学的人所承认。

关键词:文化理论;悲剧;人类生态;漫长的革命

爱德华·P. 汤普森的伦理激进主义及其遗产 [英]迈克尔·肯尼

摘要:汤普森思想的本质是一种伦理激进主义。他不仅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受到英国本土许多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尽管其理论存在某些模糊性,汤普森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及其对民主辩论的倡导都是弥足珍贵的财富,而其思想遗产的消散既是巨大的理论损失,也是巨大的政治损失。

关键词:汤普森;伦理激进主义;社会主义;英格兰性

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战后发展

张亮

摘要: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发展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理论事件,本文通过深入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揭示了这一阵营的历史性生成过程。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是在二战后形成的,第一代英国的新左派突破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藩篱,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教条,历史性的创立了具有英国本土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20世纪60年代初,第二代新左派开始崛起,他们在广泛吸收、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欧陆当代思想资源,逐渐偏离英国本土化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立场,创立理论化程度更高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在与第一代新左派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尖锐碰撞的过程中最终确立了自己的话语权。8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左派思想家的政治诉求和理论旨趣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多元分化,英国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一个多元分化发展的新阶段。

关键词:英国马克思主义;新左派;文化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多元分化

稿 约

一、《社会批判理论纪事》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集刊，主要刊发与国内外社会批判理论的历史发展、研究现状与未来走向等有关的论文及译文。

二、本刊实行匿名审稿制和三审定稿制，取舍稿件重在学术水平。

三、来稿以 10000 字左右为宜。欢迎简明扼要而又论证充分的短文。所论重大学术问题的论文篇幅可不受此限。

四、本刊发表的所有文章均为作者的研究成果，不代表编辑部的观点。译稿请附原作者或有关出版社的委托书。稿件凡涉及国内外版权问题，均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法》及有关国际法规执行。

五、稿件请径寄编辑部，且勿一稿多投。稿件寄出三个月后未收到刊用通知者，可另行处理。来稿一经采用，即奉薄酬和当期刊物 2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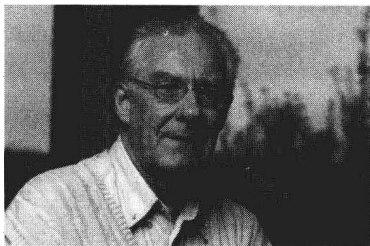
六、投稿格式参照本刊已出刊物，并于后文附上作者简介，要求著名作者真实姓名、性别、年龄、职称职务、工作单位、详细通讯地址及联系电话或电子信箱。

七、投稿请寄：210093，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编辑部，或电子信箱：Marxism@nju.edu.cn。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编辑部

第5辑专题预告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是当今欧洲左翼知识界最炙手可热的明星之一,他与齐泽克、阿甘本、拉克劳等人共同构成了当今左翼思想界的脊梁。



现为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哲学教授的阿兰·巴迪欧 1937 年出生于北非的摩洛哥,此后就读于巴黎高师的哲学系,师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师阿尔都塞,从阿尔都塞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历程。巴迪欧从阿尔都塞那里吸收了许多理论营养,诸如问题式、认识论的断裂、多元决定等等,这些都对其后来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作为一个数学教授的儿子,阿兰·巴迪欧从涉入哲学之初就力图在数学理论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他加入了认识论小组,康吉莱姆、卡瓦耶斯、康托尔、哥德尔等人的科学哲学和数学哲学思想深深铭刻在其思想轨迹之中,尤其是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数学本体论转向成为了其思想最为显著的标志。直至今日,他仍然致力于用后康托尔的数学集合论思想在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废墟上重建唯物主义。

现已处在耄耋之年阿兰·巴迪欧仍然笔耕不辍,他创作了大量颇富影响力的著作,《模式的概念》(1972),《矛盾理论》(1975),《主体理论》(1982),《如何思考政治》(1982),《伦理学:对恶的理解》(1983),《存在与

事件》(1988),《非美学手册》(1988),《贝克特:爱和一般性的文体》(1989),《哲学宣言》(1989),《数和数字》(1990),《条件》(1992),《贝克特:不倦的欲望》(1995),《德勒兹:存在的喧嚣》(1997),《圣保罗:普遍主义的基础》(1997),《临时性本体论导论》(1998),《元政治学》(1998),《世纪》(2005),《论辩》(2006),《世界的逻辑》(2006),《萨科奇的意义》(2007),《第二哲学宣言》(2009)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阿兰·巴迪欧在七十年代还将我国哲学家张世英先生的《黑格尔的哲学》的一章翻译成法文,并收录在他主编的延安文丛系列之中。此外,阿兰·巴迪欧还创作了一些小说和戏剧。可见,阿兰·巴迪欧仍然积极地活跃在世界左翼思想界舞台之上。

本刊将在第5辑隆重推出“阿兰·巴迪欧专辑”,希望通过该专辑让这个在世界思想界有着广泛影响力的思想家能够在中国点燃新的思想火花,让更多的学界同仁来关注他的思想发展及其影响。



无论从他（马克思）的倾向来看，还是从他的哲学修养来看，不仅超越了施特劳斯，而且超越了费尔巴哈。……如果我在波恩，而他讲逻辑学的话，我将会是他的勤勉的听讲者吧。我常想将这样的人作为哲学老师。现在我开始感到自己在哲学上好像并没有什么才能。

——莫泽斯·赫斯

马克思与赫斯的关系这个问题，不是作为横向的影响关系的问题，而是应该作为黑格尔左派的自我展开过程的契机来研究的东西，必须置于作为这个过程的归结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的追认这种纵向的视角中来考察。

——广松涉

比之前三位（巴加图利亚、陶伯特、广松涉）而言，郑文吉的情况显然还要更有意思一些：早期，他曾是一位哲学研究者，其成名之作就是关于马克思和弗罗姆的异化思想研究，可是后来他却又转变成一位文献学专家，并且，一转就是20年。在这漫长的20年里，“孤独”的郑文吉只做了一件事，即从事MEGA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研究。

——张一兵

在现时代的著作家中，有谁能轻而易举地把斯威福特的嘻笑怒骂、莫里斯的想象力、布莱克的绝望和托尼的伦理信念融为一炉呢？我们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中，谁能权威性地说我们政治决定的道德成本，并得到人们的认真倾听呢？

——肯尼

ISBN 978-7-214-06486-8



9 787214 064868 >

定价：33.00元